

大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八旗源流

第五辑

瀛云萍著 于植元校

大连文史资料第八辑“特辑”

八 旗 源 流

瀛云萍著 于植元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大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大连市总工会印刷厂印

1991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1092×787 1/32 字数：130,000

印数1—3,000册 工本费2.85元

大连市文化局出字(内)NO: 005381

目 录

代 序.....	5
作者自序.....	8
第一章 八旗前史.....	10
第一节 努尔哈赤族源的追述.....	10
第二节 建州诸卫的建立与迁徙.....	12
第三节 建州三卫的变化.....	17
第四节 八旗形成前女真人的分布情况.....	26
第五节 努尔哈赤的世系.....	28
第二章 八旗的建立.....	31
第六节 八旗满洲的建立.....	31
第七节 八旗蒙古的建立.....	40
第八节 八旗汉军的建立.....	44
第三章 八旗的发展变化.....	46
第九节 八旗的扩展.....	46
第十节 八旗的变化.....	50
第十一节 八旗兵的补充和编制变化.....	57
第十二节 八旗官兵粮饷的变化.....	70

第四章	八旗的民族	75
第十三节	“满洲”族名的由来.....	75
第十四节	八旗满洲的民族成分.....	80
第十五节	旗人的民族称呼问题.....	85
第十六节	现在旗人分布的情况.....	92
第五章	五个满族自治县旗人的来源	96
第十八节	岫岩满族自治县.....	100
第十九节	凤城满族自治县.....	103
第二十节	清龙满族自治县.....	107
第二十一节	丰宁满族自治县.....	110
第六章	其他旗人集居区旗人的来源	113
第二十二节	桓仁县.....	113
第二十三节	本溪直属区及本溪县.....	116
第二十四节	大连地区.....	119
第二十五节	北京.....	128
第二十六节	锦州市地区.....	133
第七章	锡伯旗人源流	137
第二十七节	锡伯源流综述(附图三).....	137
第二十八节	锡伯源出于女真的论证.....	155
第八章	蒙古巴尔虎旗人源流	172
第二十九节	巴尔虎族发祥地与族源.....	172
第三十节	巴尔虎人的南迁.....	174
第三十一节	盛京地区的巴尔虎旗人.....	176
第三十二节	吉林、黑龙江地区的巴尔虎旗人.....	178

第三十三节	呼伦贝尔地区的巴尔虎旗人.....	180
第三十四节	其他地区的巴尔虎族人.....	182
第八节	八旗汉军的建立.....	191
第三章	八旗的发展变化.....	193
第九节	八旗的扩展.....	193
第十节	八旗的变化.....	196
第十一节	八旗兵的补充和编制变化.....	204
第十二节	八旗官兵粮饷的变化.....	221
第四章	八旗的民族.....	226
第十三节	“满洲”族名的由来.....	226
第十四节	八旗满洲的民族成分.....	231
第十五节	旗人的民族称呼问题.....	236
第十六节	现在旗人分布的情况.....	243
第五章	五个满族自治县旗人的来源.....	246
第十七节	新宾满族自治县.....	248
第十八节	岫岩满族自治县.....	250
第六章	其他旗人集居区旗人的来源.....	261
第二十二节	桓仁县.....	261
第二十四节	大连地区.....	266
第二十五节	北京.....	274
第二十六节	锦州市地区.....	278

第七章 锡伯旗人源流	282
第二十七节 锡伯源流综述(附图三).....	282
第二十八节 锡伯源出于女真的论证.....	300
第八章 蒙古巴尔虎旗人源流	318
第二十九节 巴尔虎族发祥地与族源.....	318
第三十节 巴尔虎人的南迁.....	320
第三十一节 盛京地区的巴尔虎旗人.....	322
第三十二节 吉林、黑龙江地区的巴尔虎旗人.....	324
第三十三节 呼伦贝尔地区的巴尔虎旗人.....	326
第三十四节 其他地区的巴尔虎族人.....	328

代 序

读罢云萍先生的这部新著，确实获益良多，也因此触起了一些与之有关的感想，不妨在这里谈一谈，算是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之一。

这是因为云萍先生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学者，是我们学院的老专家，也是我四十年前的老同事。同经沧桑，白首重聚，面对着他的新著，真不禁感慨系之矣！按他的条件，完全可乐其所好，颐养天年；然而犹能日以继夜地忙于著述，而且卓有成就，其精神是可敬可学的。

云萍先生早岁治地理及历史地理，若干年后，又在这两门学科坚实的专业基础上转攻少数民族史。几十寒暑，孜孜矻矻，深研史籍，旁及杂著，寻幽烛隐，补阙拾遗。然犹感文献之不足征也，乃又多次不惮跋涉，亲至边远地区少数民族集居之村寨聚落，查阅家谱，考证文物，访问故老，搜集旧闻，苦心孤诣，所获滋多。终于完成巨帙之《少数民族史》，而本书则为该巨著中之部分专题而已。

应当承认，近年来有关满族研究的著作出版已渐可观，然而集中对八旗问题予以系统探讨之专著，据我所知，当以此书为首见。十几年来，我多次参加过中外学者共聚一堂的满族学术研讨会，包括中国满族文化研讨会和几次满族文学史讨论会，收获自然不小，但也存在着某些一时难以弄清的问题，比如“满族”的定义和“满族文学”的义界等等。国外的学者们对此也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而究其原由，大多在于重视了横断面的研究，相对忽略了纵剖面的系统探索，或者未得纵横联结统一考察之故。此卷的问世，对于上述有关的某些难题的解决，将会起到有理有据的推动作用。作者从八旗前史的考证着手，

顺理成章地对八旗的开始建立和以后的发展变化，做出系统的阐述。在此基础上衍派分流，对八旗的民族作出分析，最后结合实地考察，对今天的五个满族自治县以及其它地区居住的满人一一详加考辨，找出这些地区的民族来源，了解他们的现状，从而作出科学的论断。从大量的史实中，使人看到由多民族构成的伟大的中华民族，他的优秀的子孙们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以同气连枝般的兄弟之情，共同发展了自己的民族，更共同遵照历史的趋势，越来越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因此，本书虽是以八旗源流为主要内容阐述了满族的发展史，但与此同时也清楚地写明了与满族有关的许多少数民族的过去和现在，更从长期的各种联系中，勾勒出兄弟民族间那种不可分割的骨肉关系。所以，本书具有着了解少数民族史的典型意义和借鉴作用。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汉满两族自远祖以来，就一直是处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中，其间汉变满、满变汉、汉变满后又变汉，满变汉后又变满，往复交叉的融和变化交织在一起，是永远再也不可能分开的兄弟骨肉之亲。”这个结论是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得出的客观论断。

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值得肯定之处恕不详述。仅从一二小例中，也足以看出作者治学的谨严。比如：满洲一词的来历迄无定见，作者在本书中列举出十五种说法，并一一予以辨析，最后以翔实的史乘为依据，提出个人的看法：“我的结论是：满州一词，是努尔哈赤的父(塔克世)、祖(觉昌安)以来，其直属部落所在地的名称，也是其直属部落的名称，也是对内的国名。皇太极时的‘满州’一词，为已变化了，以女真人为主体的，又融合了大批汉人、蒙古人及部分朝鲜人于其中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族名。”又如对努尔哈赤的姓氏、名字的考证，均极详细而有说服力，他说：“努尔哈赤的名字全是回鹘语，努尔，在回鹘语是光明的意思；哈赤(哈齐)，在回鹘语中是圣裔的意思，也当太子、世子用。汉文史料从突厥史料译来的合卓木、火者、虎者、和加、哈吉木等，都是哈赤、哈齐的同音异译。努尔哈赤的全意是“光明的圣裔”。从而驳斥了有些书中解释“努尔哈赤”意为“野猪皮”，其弟舒尔哈齐意为“小野猪皮”的说的谬误。此类例证不再多述。

总之，一部新著的问世须经一段时间才会为学术界逐渐了解和认识其价值，而我只不过读过几遍而已，又怎能写出合乎本书价值的序言？只不过由于作者是老同事，而我又在满族文学研究会和满族联谊会中忝列着不敢当的职务，谊不容辞地写出以上的话，未妥之处，谨希作者和读者不吝匡正。

于植元

1990年4月2日

作者自序

这里从一本“小人书”谈起：

1985年秋，买了一本《索伦杆传奇》，是王琴改编，王弘力绘画，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封面是三只乌鸦和枯树掩护着一个小孩。该书的“内容介绍”是：

这本画册是《沈阳故宫传说》套书的一种。写的是索伦杆的来历。索伦杆是满族传统的祭神杆。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叫布库里雍顺的人，到鄂多里城平息战乱，受到人们的尊敬，推举他为鄂多里城三个部落的头人。又过了若干年，他的后代居祖先之功，骄奢起来，压迫和剥削人民，激起部众的反抗。人们揭竿而起，杀死头人一家。头人的小儿子凡察趁机逃了出来，跑到荒野之中。追兵赶来，他躲到一棵枯树旁等待一死。一群返巢的乌鸦飞来，落在树干上，把凡察掩护起来，才使他免得一死。传说凡察就是老汗王努尔哈赤。为了不忘乌鸦救命之恩，满族子孙便在门前竖根杆子，放上米谷，以饲乌鸦。

这是极为错误的说法。史有明文记载着凡察是努尔哈赤前六世祖童猛哥帖木儿的“同母异父弟”，是建州右卫的始祖。努尔哈赤是童猛哥帖木儿之后。童猛哥帖木儿是建州左卫的始祖。从母系上讲，凡察是努尔哈赤的前六世叔祖。而《索伦杆传奇》中说凡察就是努尔哈赤。如此荒谬的小书为何能大量出版发行呢？一句话，多数国人对满族的历史“不理解，不认识，不知道”而已。甚至今天多数的满族对自己的历史也不清楚，这是笔者在实际的调查采访中，感受较深之处。为了使兄弟民族们，我们旗人自身都能对八旗的历史有个简明的认识与理解，藉以加强今天满族内部，中华民族内部的团结，所以写了这本“八旗源流”的小册子。

满汉两族发展到清末以后，实际上的民族差异实在太小了，在多民族共处的民族大家庭里，汉满两族的关系，不同于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满汉两族自远祖以来，就一直是处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中。其间汉变满，满变汉，汉变满后又变汉，满变汉后又变满，往复交叉的民族条件的融合变化，真如一团乱麻交织在一起，确乎已是

“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是永远再也不可能分开的兄弟骨肉之亲。所以我用“八旗源流”这个标题力求有条不紊地把汉满两族间这种交叉复杂的演变历史写出来，公诸国人。

今天人口调查中的满族，并不等于清代的满族，今天的满族，是由清代的“旗人”发展变化而来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在清代，旗人中，只有“八旗满州”人才算满族，其外的“八旗汉军”人、“八旗蒙古”人则不算满族，但他们都是“旗人”。到清末则发展到“只分旗、民，不分满汉”的程度。旗人们由于长期的共同处境，已自然形成了一个民族共同体。所以今天所有清代的旗人，基本上都报了满族，这是铁的客观现实，例如“青龙满族自治县”基本上都是汉军旗人之裔，诸如此类详见本书。

民族史学千头万绪，余所涉览九牛一毛，又以垂暮残年，耳聋眼花记忆减退，虽心有余念，而已力不足，故拙作缺漏谬误之处不可拟略。今勉强为此，意在抛砖石以引美玉耳，大有厚望于后哲今贤。

瀛云萍

1990年3月13日

第一章 八旗前史

第一节 努尔哈赤族源的追述

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世相继创建而成的。努尔哈赤的家史与建州三卫的历史是连结在一起的。建州三卫，是明代东北女真人的主要部分。明代东北的女真人，是金帝国入主中原后，遗留在东北的部分女真人的后裔。当年追随金帝入关的女真人，基本上都变成了汉人。元朝将全国人分为：(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汉人(四)南人。这里所指的“汉人”，包括汉化了的女真人、渤海人、契丹人和南宋境外的汉人等。而原南宋境内的汉人，则被称为“南人”。只有留居东北没汉化的女真人保留了女真原名。

元代女真人的分布区全归辽阳行省管辖，于女真分布区设置了五个军民万户府：胡里改万户府治今依兰县城；斡朵怜万户府治今依兰西牡丹江西岸的马大屯；桃温万户府治今汤旺河口附近；孛古江万户府治今富锦县城；脱斡林万户府治今桦川县东北万柳通河镇。每个万户府就是个较大的女真部落。

明代将东北的女真人分为三大部分：(一)建州女真，活动于今长白山周围地带，范围很广；(二)海西女真，活动于海西江(今松花江)两岸地带；(三)野人女真，活动于今黑龙江沿岸。

关于努尔哈赤祖宗的起源，首先有“三仙女”的神话故事。其内容说的是：古时有不平凡姐妹三人，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古伦”。某日，三姐妹同浴于长白山天池，佛古伦误吞神鸟衔来的朱果而成孕，生一子名“布库里雍顺”。布库里雍顺长大出山后，来到俄莫惠之野的鄂多里城，被当地人拥立为王，国号“满州”。这就算满州的起源。此说首见于蒋良骥的《东华录》卷一。类似的故事散见于近年出版的很多书刊中。以神话故事作为民族起源的传说，许多民族都是这样。

《钦定满洲源流考》卷八《疆域》中说：满洲始祖居长白山东，俄莫惠之

野鄂多里城。城在兴京东一千五百里、宁古塔西南三百三十里，勒福善河西岸”。按兴京，即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宁古塔，即今黑龙江省宁安县。按其所指的方位，距离交会点，正当今吉林省敦化市，正与史实相符。

综合元、明、清三朝史的研究，明朝的“建州三卫”，是从元代的胡里改、斡朵怜两个万户府女真部落发展变化而来的。元末，胡里改万户部沿胡里改江(又名虎儿喀江，即今牡丹江)东岸南下，止于唐渤海国率宾府建州之地。元时此地为开元路凤州，治今吉林省东宁县城东四里许的大城子。后来明朝于此地始置建州卫。

明洪武五年(1372年)斡朵怜万户部亦沿胡里改江西岸南下，首先止于俄莫惠之野的“鄂多里”城。清肇祖童猛哥帖木儿(孟特穆)就出生在这里。布库里雍顺是神话里的人名，童猛哥帖木儿才是信史中的清肇祖——努尔哈赤的前六世祖。

俄莫惠之野，指的是今敦化市所在的小盆地，牡丹江上游诸河流汇集其间。《金史》称此地为“窝谋海”，《大清一统志》称之为“俄莫惠”。元代，此地本为斡朵怜万户辖境，今敦化县北的“额穆镇”即俄莫惠之遗名。鄂多里城即今敦化市治东边牡丹江西北岸的“敖东城”，也称“阿敦城”，皆“斡朵怜”的对音。鄂多里城名，是斡朵怜(时已转读为鄂多里)部居此以后而得名的，女真语意为“神仙”。此城原为渤海故都“奥娄城”。渤海国于唐天宝十四年(755年)迁都上京龙泉府(今宁安县南境，镜泊湖北，牡丹江东岸之渤海镇)后，改称此城为“旧国”。今列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保护单位(参看附图一)。牡丹江在镜泊湖以上部分，清代称之为勒福善河。此鄂多里城与《钦定满洲源流考》所说的地理位置完全相符。笔者于1985年8月间亲访其地在敦化市民委及市文物保管所刘忠义所长的帮助下，一一对证无讹。

前言的“三仙女”故事中，第三仙女名“佛古伦”。“佛”，满语意为

“旧”；“古伦”，满语意为“国”。佛古伦产生了满洲始祖。即“旧国”产生了满洲始祖。由这点看，三仙女故事，是反映了一些历史事实的。

童猛哥帖木儿是努尔哈赤的前六世祖，是建州左卫的第一任指挥使，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顷，猛哥帖木儿率部自鄂多里城迁于图们江各地，依附于高丽江陵道都统李成桂。旋李成桂代高丽恭让王自立为君，奉明帝命改国号为“朝鲜”，童猛哥帖木儿数至李氏朝鲜王都献方物。

第二节 建州诸卫的建立与迁徙

(一)建州卫与毛怜卫

明永乐元年(1403)十一月辛丑，居于古渤海国建州(注)的胡里改女真部首领阿哈出等，到南京(应天府)去朝见明成祖。明朝遂于是年设建州卫军民都指挥使司，以阿哈出为指挥使，赐名李思诚，意为唐代黑水都督李献诚与中原朝廷关系的继续。

(注)：古渤海国率宾府统三州：(一)华州，治所在今绥芬河下游东岸双城子(乌苏里斯科)，率宾府治华州；(二)建州，治所在今东宁县大城子，元时为凤州，开元路治凤州；(三)益州，治所在华州东，详址待考。

永乐三年(1405)十月甲戌，明朝以毛怜(穆陵)等处渤海后裔部落为毛怜卫，以其头目巴儿逊为指挥。(毛怜卫印今已发现，钢制，正面刻“毛怜卫指挥使司之印”，背面刻“礼部造，永乐三年十二月 日”。)

永乐八年(1410)李思诚卒，其子释家奴袭职，朝廷赐名李显忠，晋级都督僉事。是年春，建州卫与毛怜卫侵扰朝鲜庆源，朝鲜反击之，巴儿逊战死。次年，明政府命李显忠之弟猛哥不花为毛怜卫指挥，晋级右都督僉事。永乐十九年(1421)猛哥不花率子弟部属到北京朝见，次年从帝北征蒙古阿鲁台。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因建州卫首领李显忠已死，其子李满住暂领部众待朝命，遂率其所部向西迁于婆猪江(今浑江)西北的兀刺山(即今桓仁县城西北九公里许的五女山)南的瓮村(后称长冈村)今已没于桓仁水库底)。

宣德元年(1426)三月命李满住为建州卫都指挥僉事，掌管卫事。后李满住与朝鲜不睦。宣德五年(1430)三月甲寅李满住入朝贡马；四月乙卯李满住上奏朝廷，言“欲与朝鲜市易，而朝鲜不纳”。于是帝遣使谕满住曰：“朝鲜国王素守礼法，小心敬慎，不与外交，于理为宜。尔等既受朝廷爵命，亦当禁绝外交。毋纵下人侵越邻境。若欲市易，听于辽东境上不尔禁也。”宣德六年正月辛巳李满住之母康氏入朝贡马及方物。

宣德八年四月朝鲜大举进攻建州卫，李满住大败，身被九创，其妻死难。满住避入兀刺山城得免，部人被朝鲜俘去很多。后来明帝出面干涉。朝鲜始归还俘去的军民。战后李满住迁其部落于兀刺山北偏东十八公里许的“兀弥府”，其地当今桓仁县北的拐磨子镇南的“东古城村”。此后仍与朝鲜不和，时有冲突。朝鲜间谍经常出没于兀弥府一带。

正统元年(1436)闰六月，李满住遣长子古纳哈入明廷贡马，并送还东宁卫逃移人口四十八名。次年八、九月间，朝鲜出兵八千，分三路攻入兀弥府，杀建州兵丁六十名。因李满住早有准备，故损失不大，并设伏要路，给入侵者以有力的打击。

正统三年(1438)李满住为避朝鲜的侵扰，率其部落迁于苏子河(苏克素护河)畔的烟突山下，设卫所于费阿拉城，其故址在今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南二道河边。事后即奏闻朝廷。时李满住所部只剩下一千多户。

正统十二年(1447)明廷晋李满住为都督同知。时李满住虽在费阿拉城，但对兀弥府一带并未放弃，例如于正统十三年七月古纳哈曾往婆猪江一带射猎。

景泰六年(1455)十二月丁卯以李满住年老，命其子古纳哈代职，然古纳哈

才能远不如父。

(二)建州左右卫

永乐三年(1405)三月帝派千户高时罗、王教化等为钦差，持谕往图们江谷(当时又称为阿木河、斡木河、吾都里、鄂多里)招抚童猛哥帖木儿，谕曰：“前者阿哈出来朝，言尔聪明识达天道，已遣使赉敕谕尔，使者回复，言尔能恭敬朕命，归心朝廷，朕甚嘉之……尔可亲自来朝，与尔名分赏赐，命尔安抚军民、打围放牧，以便生理。”同时谕朝鲜王曰：“东开原毛怜卫等处地面万户猛哥帖木儿能恭敬朕命，归心朝廷，今遣千户王教化等赉敕劳之，道经王之國中，可遣一使与之同行，故敕”。(见：《李朝实录》卷九)然朝鲜王李芳远(李成桂第五子)实不愿猛哥帖木儿返归明朝，故又暗中遣使赐童·猛哥帖木儿(朝鲜当时称之为“女真斡朵里豆漫夹温猛哥帖木儿”)为“庆源等处管军万户”给与印绶及许多礼物，劝他“勿从朝廷使臣之命。”但猛哥帖木儿乃明成祖妃子之家属，虽对朝鲜顾虑重重，最后仍决心归命天子。遂于是年九月初三日随同王教化等入朝。帝即封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卫指挥使。永乐八年(1410)猛哥帖木儿率部离开阿木河，迁往奉州与李显忠同住。永乐九年以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使，是为建州左卫建置之始。时猛哥帖木儿势盛，分其所部为三军，自掌中军，同母弟凡察掌左军，长子阿古掌右军。

永乐十二年(1422)猛哥帖木儿以皇亲和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双重身分，被征调率部参加成祖亲征鞑靼(蒙古)阿鲁台之役。战后，猛哥帖木儿随帝到北京。因当时蒙古兀良哈人横行东北，猛哥帖木儿奏准迁回阿木河谷，即今图们江谷地的会宁、稳城、庆源、钟城、庆兴、茂山等六城女真故地。于次年始自凤州分批迁徙，共军士一千名，民众五千二百五十名，“归于旧居耕农”。同年女真辽东千户杨木塔兀叛变，假传圣旨掠走东开原(即凤州)军民千余口，随同猛哥帖木儿之母的部落约五百多户迁往阿木河。

宣德元年(1426)正月，宣宗以猛哥帖木儿“忠顺守边按时进贡”，晋封为都督僉事，赐冠带。同时下旨责斥杨木塔兀。

宣德三年(1428)正月癸卯猛哥帖木儿遣使与三万卫赵·锁古奴等入朝贡

马。宣德七年(1432)三月，宣宗封凡察为都指挥僉事，以其招抚远夷归附有功。是年明廷派张内官到建州捕鹰，回京。凡察遵旨随张内官送回杨木塔兀所掠去的军民一百三十名，宣德八年猛哥帖木儿入朝。宣宗以猛哥帖木儿“忠于职守行为可嘉”，晋级为右都督，同时晋凡察为都指挥使。此时猛哥帖木儿与朝鲜太宗李芳远相处也很好。是年明辽东指挥裴俊奉旨率官军一百五十名，会同朝鲜官员共一百六十多人前往阿木河。拟于再次接回被杨木塔兀掠去的军民人等。十月十四日到达。猛哥帖木儿迎裴俊于驻地。

十五日拂晓，杨木塔兀伙同古州女真，即阿速江等卫，又称七姓野人三百多名突然将官军包围。裴俊立即应战。猛哥帖木儿闻讯，立即率部来救，将匪全部包围，凡察阿古也都率部来援，杨木塔兀败逃。战斗中凡察负伤。十九日，凡察等正准备到各部去接人。杨木塔兀忽又率大批七姓野人来攻，将裴俊、猛哥帖木儿等全部包围，混战结果，猛哥帖木儿及阿古均殉国；凡察负伤逃出重围，印信敕书等被掠一空；猛哥帖木儿的次子童仓(董山)及阿古之妻等许多妇女和一些朝鲜人被俘。裴俊率官军杀出重围后，调来援军，击败叛众，救回朝鲜人六十四口。童仓及阿古夫人仍在叛众手中。宣德九年(1434)凡察入朝，以功晋升为都督僉事，代其兄统领建州左卫，因印信被掠，乃重给新印。不久，在毛怜卫指挥哈儿秃等斡旋下，童仓及阿古夫人被赎回。凡察请朝廷处理阿速江等卫攻杀其兄猛哥帖木儿事。明廷只敕阿速江等卫责还所掠建州左卫人马财物等，对围攻朝廷军队，攻杀朝廷命官等大罪，竟未敢声讨。

宣德十年(1435)顷，凡察、童仓以在阿木河居住环境艰难，奏请愿迁辽东与李满住“同一坐处”。明廷以童仓为建州左卫指挥使，为其叔父凡察的副手。旋童仓入朝称旧印已得。明廷谕凡察，对迁来辽东事“从尔所便”。并将此意通知李满住。原来李满住与凡察是连襟，猛哥帖木儿是李满住的舅父，童仓是李满住的表弟。所以李满住接得朝命后，立即派人去接凡察等。

朝廷给凡察及李满住的敕书内容，都被朝鲜间谍侦知。朝鲜王李禔对凡察及李满住的此举深为不满。于是遣使敕凡察说：“你诬奏朝廷，欺天罔上。”“尔若不改前心事我不诚，汝无生理矣。”凡察答称“予实不知”。“满住虽赉圣旨来促，我实无离去之意，永世归顺”。因此李禔更仇恨李满住，所以于正统二年打击了李满住。

正统五年(1440)六月，李满住在费阿拉已站稳脚跟。于是凡察与童仓只带得邻近的建州左卫部落三百多户军民，只占全部的三分之一的人口逃出阿木河谷地——镜城地面，来到苏子河畔与李满住相会。两部合一共有一千四百户左右。其余的建州左卫人口仍留居于图们江南谷地中，如凡察之弟五沙哥及其所部即仍留居于会宁。留居于左卫故地——阿木河的遗民是由童、高、李三姓，六个血族集团组成的。后来基本上都融合于朝鲜族中。(见《明实录》正统七年卷之九十二)

凡察逃离时，还有原叛土军马哈拉等四十六户同来。明廷赦其前罪，与凡察部众同样给以救济安置。命彼等住于三土河(今辉发河支流三统河)，及婆猪江西冬古河(又称东果河、董鄂河，即今浑江西来的大支流大雅河)两界间。

正统六年(1441)正月戊午，晋建州左卫指挥使董山(童仓)为都督僉事。次年童仓与凡察为争建州左卫的实际领导权，叔侄间形同仇敌。明廷调查了实际情况，主要是人心的向背。于七年二月将左卫分成左、右二卫。以童仓继其父掌左卫，用旧印，晋为都督同知，居冬古河畔；以凡察掌右卫，赐给新印，亦晋为都督同知，居三土河畔，自是建州女真形成了三卫。

这时李满住娶阿古遗孀为妻，童仓娶满住之女为妻。(见《李朝世宗实录》二十年八月及二十二年六月)是表叔娶表侄女为妻，婚姻无行辈之分。

景泰二年(1451)李满住又迁回兀弥府，从此他投靠了朝鲜，直到1465年的十几年间，李满住的几个儿子经常到朝鲜王廷去献方物，送情报以表示友好。

是年建州右卫都督同知凡察卒，其孙纳良哈袭都督同知职。

第三节 建州三卫的变化

天顺二年（1458）二月壬辰晋建州左卫都督同知董山（童仓）为右都督。因童仓奏称其先父猛哥帖木儿原任右都督，乞袭职。朝廷以猛哥帖木儿歿于王事，有功，故恩准之。至是建州三卫中以童仓的官阶最高，实力也最大。当时建州卫都督同知李满住因年老已于1455年退休，由其子古纳哈代职，因能力远不如父，故日渐衰微。建州右卫都督同知纳良哈袭职后，势亦渐衰。于是童仓乘势起而控制了建州三卫，成了建州事实上的总领袖，居于费阿拉城（明人称之为“虎城”）。

童仓得势之后，便向朝鲜靠拢，亲率李古纳哈、纳良哈等往见朝鲜世宗李 。童仓、李古纳哈均接受李王的厚赏，唯纳良哈不受李王赏赐。天顺三年（1459）正月乙亥，明帝敕朝鲜王李 ，讯问与董山等私相交往事。李 回奏多所辩解，文过饰非，颇失藩臣礼。是年三月甲申朝廷敕董山等曰：“近者边将奏报，尔等私往朝鲜，见其国王，俱得赏赐而回。且尔父祖以来，世受朝廷重职，保守领土，未尝与朝鲜私通，何至于尔辄为此举……毋贪图微利，以貽后悔。”于是年四月复敕李 ，命其勿与董山等私交。六月，以纳良哈不受李 赏赐忠贞可嘉，晋爵右都督。然童仓等一面不断向明朝进贡谋取暴利，一面仍与朝鲜私交不断往来。到成化二年（公元1465年，李 十一年）童仓竟接受李 册封为“中枢密使”的高级官爵，乃加紧反明，纠集毛怜、海西女真诸部合兵一万五千多人侵掠明边。仅成化二年的一年内即入侵明边九十七次，“自开原以及辽阳六百余里，数万余家率被残破”。杀掠明边居民十多万口。而明廷“格遵祖训”不愿兴兵问罪。并多次派员开导童仓（董山），命其归还掠去的人口。而童仓不理。

成化三年(1467)四月初明廷派中军署都督武忠(女真族人)出使女真各部，晓谕招抚。月末，建州女真董山；李古纳哈、纳良哈等共率大小头目眷属等一百六十多人应抚入朝贡马及貂皮等。帝召董山等至阙下，降敕谕之曰：“尔等俱系朝廷属卫，世受爵赏，容尔在边驻牧。朝廷何负于尔。今却纵容下人纠合毛怜等处夷人，侵犯边境，掠虏人畜，忘恩背义。论祖宗之法，本难容恕。但尔等既服罪而来，朕本天地好生之德、姑从宽宥。今尔等回还，务各改过自新，戒伤部落，敬顺天道，尊重朝廷，不许仍前为非，所掠人口搜访送还，不许藏匿，若再不悛，必调动大军问罪，悔将何及？其省之戒之。”于是诸首领均顿首输服。仍赐宴如例。宴席间董山部下指挥有的竟出口谩骂。帝复降敕责之，亦未降罪，照常赏赐。董山李古纳哈二人复求蟒服金带及金银酒器等等。帝命各赐衣帽一分。董山又言其指挥可昆等五人效力有功，乞赐服。帝复命赐与裘衣靴帽各一套，下不为例。至是辞归。而董山竟当众扬言：“此还即纠合海西野人抢掠边境。”毫无忌惮。事闻帝复降敕谕之曰：“尔之先世僻居荒落，后为部落所逼，远来投顺。我祖宗怜尔失所，赐与近边地方，使尔住牧，设立卫分，父死子代，世世不绝，自尔祖尔父以来，或边方效劳，或岁时进贡。朝廷升赏宴劳俱有定例，我之所以加恩于尔者，不为不厚。而尔之所以享有家室之乐官爵之荣，数十年间部落莫不听尔约束，邻封不敢辄加以兵，是谁之赐欤？尔等正宜尽心竭力，为我蕃屏，以报大恩。乃敢悖逆天道，纠率外夷，寇我边境，掠我人畜。朝廷不即出兵征剿，虑恐尔等中间善恶不一，是以命都督武忠赉敕往谕，欲令尔等改过自新。尔等既已服罪来朝，所有往愆悉置不问，从厚赏赐。兹尔等归，宜晓谕本卫大小头目人等，务各敬顺天道，洗心改过，亟以其所掠人畜尽数送还。遇有外人纠众为非，尔等或聚众截杀，或捉送辽东总兵官处首告。论功升赏，必不尔惜。如或执迷不悛，似前寇扰边方，朝廷必调大军征剿，悔无及矣。尔等省之省之。”而董山等仍不悛改，且扬言“各执佩刀，一齐杀出，还匿妻子，据险拒战。”于是明廷只将董山等带去的眷属十余口(应有李古纳哈在内)放还，而将董山等一百一十五人押赵广宁(今北镇县)于七月二十七日到广宁帅府馆驿。总兵官赵辅再向彼等宣布上谕，宣

读未毕，“董山等即逞凶肆骂，袖出小刀刺伤通事等”。赵辅即令甲士杀出擒捕。时在馆驿服役的女真人哈塔哈等百零一人，当即加入叛乱。赵辅即命甲士共擒之。混战结果，女真人二十六名当场被格杀，余一百九十名均被捕入狱。（见《明宪宗实录》卷三十八至四十五）

同年九月二十四日，明提督辽东军务左都御史李秉、总兵官武靖伯赵辅、都督佥事王英等统兵五万，由抚顺关出境，兵分五路，每路一万向建州女真进攻。十月初四，五路先后杀到董山老营——费阿拉城。十月七日战斗基本结束，共阵斩女真人六百三十八名，生擒九十四名，俘虏男妇一百三十一口，余均逃避于深山密林中。夺回被虏去的汉人男妇四百九十七名。（见《明宪宗实录》卷之四十七）

当时朝鲜王李瑈奉明帝指示，派其中枢密府知事康纯率兵万余进攻建州。时李满住及李古纳哈久已归附朝鲜，且得到朝鲜王“在一旦出兵建州时，保证李满住部族的安全”的诺言，所以未有防备，岂知李瑈奉帝命派兵来攻！朝鲜兵于三年九月末攻入兀弥府，斩李满住、李古纳哈及部众三百八十六级，生擒二十三名，获牛马牲畜等二百余头，焚其积聚二百十七所。（见《明宪宗实录》卷之五十）

战后，明廷将董山处死，其余发配到福建省安置，永远不得返回。这是对建州女真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后李满住的幼子甫乙加大为报父兄之仇。以仅存的八户小部落头目身分，联合毛怜、乌拉等女真部落共数千人，对朝鲜和明边进行杀掠报复。

成化五年(1469)因董山死后，建州大首领位空缺两年无人敢袭职。是年秋七月间，董山长子脱罗悔罪入朝。建州左卫指挥佟那和等保奏脱罗为建州大首领。朝廷准奏，乃授脱罗为建州左卫都指挥同知，总管三卫；以李满住之孙完者秃为建州卫都指挥佥事掌卫事。成化六年(1470)二月完者秃等欲侵朝鲜，朝

廷下旨谕止之。七月建州右卫凡察次子卜哈秃入朝贡马及貂皮。赐宴及金织衣彩缎等。八月以原右卫左都督纳良哈死无后，于是授卜哈秃为都指挥同知掌卫事。成化九年十二月、十一年正月卜哈秃均入朝贡马及貂皮。十二年正月、十四年八月脱罗等均入贡马匹及貂皮。

自脱罗总管三卫后，努力发展生产、事朝廷恭顺，三卫经济得到恢复，生活相对安定。

成化十五年(1479)建州各部除脱罗外，又有侵扰明边者。于是明廷命抚宁侯朱勇等率兵出抚顺关，分兵五路，对扰边各部进行了打击。破四百五十多寨，阵斩叛众六百九十五级。俘男妇四百八十六人，获牛马千余头。于是伏当加等女真首领又叩关请贡。伏当加在一次朝贡中为其兄某指挥请升级职。脱罗在会同馆指责伏当加乱边达七八年之久，导致女真人的大量死亡，今天又隐瞒真实情况，欺君入贡，依法当斩。脱罗的仗义直言，震动了朝廷。为保护脱罗，流伏当加于广东，晋脱罗为建州左卫都督。成化十七年(1481)建州卫都督完者秃入朝贡马及貂皮。

成化十九年(1483)二月脱罗入朝贡马及貂皮。同年根据建州卫请求，命建州卫寄居毛怜卫夷人郎引答忽赤等二百五十家。成化二十年二月完者秃等入朝贡马及貂皮。成化二十二年(1486)二月，脱罗入贡。弘治二年(1489)二月完者秃入贡。弘治三年正月建州右卫都督尚哈入贡。弘治六年(1493)二月脱罗入贡。弘治九年(1496)完者秃入贡。弘治十年(1497)二月赐完者秃大帽金带。弘治十一年十一月脱罗入贡，晋脱罗为一品都督。十三年(1500)十二月，十四年二月脱罗均入朝，于正赐外复加赐脱罗，以其有夺回被虏的汉人之功。是年二月建州右卫都督尚哈、建州卫都督佉事弗刺答(卜刺达)均入贡。四月赏赐弗刺答，以其父致仕都督完者秃(兀者秃)之请也。

弘治十五年(1502)脱罗、尚哈、弗刺答同入贡。十七年二月尚哈入贡。十八年(1505)末脱罗病故，终孝宗之世，脱罗凡五次入朝。正德元年(1506)朝廷以脱罗之子脱原保袭父职，为左卫都督，仍统领三卫。他承其父志，安定部落，效忠明廷，于正德二年二月、三年二月、四年三月、五年四月连续入贡。

正德二年四月赐右卫故都督卜哈秃祭一坛，从其子都督尚哈之请也。正德十年(1515)四月右卫都督牙秃哈入贡马匹及貂皮。

正德十三年(1518)五月甲寅，“先是建州贼首赵卜速哈等寇辽阳东堡地方，岁无虚日，镇巡等官张贯等欲征兵讨之。兵部议令贯等抚谕。既而建州左卫都督脱原保等百余人款塞，自陈贼首奏事攻三等率所部三千人营于章成塞，欲乞通好。贯乃遣指挥王纲、白本等诣其营，谕以顺逆。诸夷听命，至是相率来朝，各贡方物。”（见《明武宗实录》卷之一百六十二）

嘉靖二年(1523)六月，脱原保入贡马。明廷赐以彩缎、纱帽、衣服靴袜等。自此以后至万历二十年(1592)的七十年间脱原保的子孙方中、柳尚、松塔等均有都督职称，但已非建州三卫总首领。建州卫弗刺答子孙李童有都督衔，建州右卫牙哈秃的后人真哥、来留住有都督衔，也都不是各该卫的大首领。此外建州三卫中有都督衔的达二十二人之多，统属关系、世系关系均不明，都与明廷直接保持朝贡关系。《明实录》对这些都督的卫籍——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等的区分也不十分清楚，很多张冠李戴。概此时“建州三卫”已名存实亡，正在分化演变过程中，各自为政，不相统属。此下称都督同知、都督僉事的也大有人在，他们的部落实力也不一定小于诸都督的部落。

嘉靖十一年(1532)四月建州右卫都督僉事牙令哈入贡。嘉靖三十一年(1552)建州左卫都督柳尚入贡。努尔哈赤的祖父佟叫场(觉昌安(?—1538)也有都督僉事衔，统辖过建州左卫的部分部众，自称“宁古塔”(六)贝勒，也称王，占有苏克素护河上游地区。

嘉靖三十七年(1558)顷海西女真哈达部长王台(原是乌拉部人)势强，统一了海西女真诸部，也控制了建州女真诸部，成为实际上绝大部分女真部落的总领袖，是金帝国灭亡后，第一位统领女真大部分的大汗，握有军、政、司法之全权。

当时女真人的经济生活，一部分靠自己的畜牧，采集所得；一部分靠以马匹、貂皮、人参、鹿茸、金针、木耳等与明朝“贡市”，贡市的文凭是历代明帝赐给各部的敕书。市贡额的多少，以敕书件数的多少为准。所以各首领持有敕书的多少，可说明其经济实力。当时王台汗拥有敕书七百道，兵强马壮，忠于明廷。这时建州女真崛起一新首领王杲，他控制了浑河流域抚顺关以东地区，而附属于王台。

王杲，姓喜塔拉氏，其遗族今改汉姓为“齐”，落于岫岩县杨家堡子乡及北京等处，属镶白旗。王杲的曾祖父名乌都里巴颜(巴颜，意为“大财主”)。乌都里之子名都力金。都力金之子名多力齐，势渐盛，有都督称号。多力齐之子名缠查，即王杲。王杲生二子，长子名阿古(阿台)，次子名券孤(阿海)。阿台的女儿哈分不哈为塔克世妻，即努尔哈赤生母。阿台之妻为佟叫场(觉昌安)的孙女。

觉昌安也拥有敕书十八道，经常率私属几十人到明边市易。明人称之为“市夷头目”。觉昌安之子塔克世虽为王杲部将，但不满王杲的统治，因而暗通明朝。这时又有一女真首领王兀堂崛起，控制了浑江(婆猪江)流域。

嘉靖四十一年(1562)元顺帝的直系后裔察哈尔部图们汗(明史作“土蛮”)势较强，常侵扰明辽东抚顺一带。王杲也乘势抢辽阳一带。次年王杲大掠辽东。王兀堂受图们汗封为都督，也同时抢掠辽东。

嘉靖四十二年(1563)李成梁(朝鲜族)出任明险山堡参将，此时险山堡在辽阳镇东二百余里。隆庆四年(1570)九月，李成梁升任辽东总兵官，得此良将，明廷的辽东形势为之大振。

隆重庆五年(1571)明廷封王杲为建州右卫都指挥。然王杲寇边不止。明廷不得已，乃停其市赏出兵讨伐。次年未，经王台汗从王杲处索还一部被掠去的汉人一百四十九名，王杲表示不再犯边。明边官又准其市贡。王杲又以明边官验马从严而不满，又于万历二年(1574)联合诸部侵犯明边。抚顺备御裴承祖等被王杲所惨杀。王杲又犯清河堡(今本溪县北部清河城)及抚顺。明再罢辽东市赏。罢市赏对女真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很大。因此王台汗率所部及建州诸部首领

款关跪拜请开市赏。明廷碍于王台汗的颜面，只好又开市贡。王台汗再劝说王杲、又索出被掠去的苍头军八十四名，和劫杀边官的凶犯黑的一名交与明边官。然王杲又准备纠合蒙古大举犯明。明廷侦悉，乃于同年十月命巡抚张学颜会同总兵官李成梁讨伐王杲。觉昌安塔克世父子任向导，明兵六万驰入，围王杲寨，（寨名“古勒”位于今新宾满族自治县西北边境苏子河口北岸的古楼村）王杲虽猛力拒战，然终非李成梁对手。李用火攻，杀败王杲。王杲逃出古勒寨后，又于次年二月纠合残众再犯明边，又被明兵击败。王杲惨败后携眷属投奔王台汗。时王台汗早已得到明边官缉捕王杲通令，又恨王杲恃强不听约束，屡犯明边破坏市贡。乃于七月间将王杲及其眷属共二十七人全部捕拿，械送给李成梁，献俘京师，八月间将王杲处决。明帝晋王台官“右柱目、龙虎将军”，以赏其功。

战后，李成梁将王杲辖地拨给塔克世接管，命为建州左卫指挥使。旋王杲长子阿台（阿古）自称都督复据古勒寨抗明。同年明将险山堡徙于今凤城县东北之石头城。

万历八年（1580）四月，王兀堂对永奠边官不满，（永奠今作永甸，在宽甸县城南）屡犯明边。被李成梁击败于永奠，追出塞外，斩七百五十余级，生擒一百六十口，歼其首领八名，破其坚寨数处，获马匹器械甚多。以功，明廷于六月封李成梁为“宁远伯”世袭。十一月王兀堂复集残部从宽甸堡进犯。副总兵姚大节追击之阵斩六十七级，生擒十一名。从此王兀堂部消灭。

时王台汗晚年失政，各部酋纷纷叛离，女真人又陷于群龙无首的纷乱状态。万历十年（1582）七月王台汗故去。是年十一月，阿台连合蒙古掠孤山堡（在今本溪县城东南兰河峪满族乡新城子村）。总兵吴兑迎击之，斩俘一千八百多。

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建州图伦城(今新宾县嘉禾村附近)城主尼堪外兰向明军告密,愿导官军讨阿台,于是明分兵二路进讨:一路由秦得倚率领攻阿台弟阿海所据的沙济城。秦得倚出奇制胜,阵斩阿海。李成梁一路由尼堪外兰、觉昌安、塔克世等任向导,从抚顺王刚台直捣古勒寨,经两昼夜激战,并用火攻破之,亦阵斩阿台。寨中军民死伤二千三百多口,觉昌安塔克世父子亦死于乱军中。

建州卫李思诚世系表

人 名		最高职称	任职时间	
旁系	直系		起	止
	李思成 (阿哈出)	建州卫指挥使	永乐元年 (1403)	永乐八年(1410)
猛哥不花	李显忠 (释家奴)	建州卫都督僉事	永乐八年	永乐二十年 (1423)
	李满住	建州卫都督同知	永乐二十年	景泰六年 (1455退休)
甫乙加大都 喜	李古纳哈	建州卫都督同知	景泰六年	成化三年(1467)
完者秃	----	建州卫都指挥僉事掌卫 事、都督	成化五年 (1469)	弘治十三年 (1500致任)
佛刺答	----	都督	弘治十四年 (1501)	正德四年(1509)
李童	----	都督	正德四年	嘉靖四年(1525)
?				
李以难		万历十七年(1589)降于努尔哈赤,其部族仍居浑江流域		

大连文史资料-八旗源流

此表见于《明实录》中的建州卫都督还有九名：嘉靖二年，八年有撒都鲁，七年二月有阿都赤、九年五月有兀乞纳、十七年五月有也隆哥、十八年五月有纳速、二十九年有卜刺答、四十三年有木力哈；隆庆四年八月、**万历四年十一月**、五年十二月、九年八月、十二年五月均有纳木章，万历三年三月有纳答哈等，均称都督，而世系不明。

附表二

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世系表

人 名		最高职称	任职时间	
旁系	直系		起	止
	猛哥铁木儿	建州左卫右都督	永乐九年 (1411)	宣德八年 (1433)
凡察	---	建州左卫都督僉事	宣德九年 (1434)	正统七年 (1442)
	童仓(董山)	建州左卫右都督， 统治三卫	正统七年	成化三年 (1467)
	脱罗	建州左卫一品都督 总管三卫	成化五年 (1469)	正德元年 (1506)
	脱原保	建州左卫都督， 总管三卫	正德元年	嘉靖二年 (1523)
	方中	建州左卫都督	见于嘉靖九年、十一年、十三年、十五年、二十三年	
	柳尚	建州左卫都督	见于嘉靖三十一年，隆庆元年	
	松塔	建州左卫都督	见于万历六年、九年、十六年、二十年	

自嘉靖二年以后，见于《明实录》中的建州左卫都督，除方中、柳尚、松塔外，尚有九名。即嘉靖三年、五年、十年、十二年的章成；嘉靖九年的撒哈，嘉靖十二年的锁鲁塔，嘉靖三十五年的古鲁哥、伏塔什；隆庆元年、五年、万历三年的胜勒，万历三年、十二年的王忽，万历三年、七年、十二年的佟克，万历十八年的哈塔吉等。此外称都督同知、都督僉事的更多，世系不明，不相统属。《明实录》中对三卫的关系也常混淆不清，如松塔有时就写成右卫去。凡察是猛哥帖木儿的同母异父弟

附表三

建州右卫凡察世系表

人 名		最高职称	任职时间	
旁系	直系		起	止
	凡 察	建州右卫都督同知	正统七年（1442）	景泰二年（1451）
卜哈秃	阿塔哈			
	纳良哈	建州右卫都督同知	景泰二年	成化三年（1467）
	---	建州右卫都指挥 僉事掌卫事	成化六年（1470）	弘治三年（1490）
尚 哈	---	建州右卫都督	弘治三年	正德九年（1514）
牙秃哈	---	建州右卫都督	正德十年（1575）	
真 哥	---	建州右卫都督	见于嘉靖二十九年、三十三年	
来留住	---	建州右卫都督	见于隆庆四年、万历十三年	
忙 子	---	建州右卫都督	？	

此外见于《明实录》中的建州右卫都督还有四名，即嘉靖十三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的阿拉哈，隆庆四年十月、五年七月的安台什，万历三年、七年的八当哈等，世系关系均不明。卜哈秃是纳良哈之叔父。

第四节 八旗形成前女真人的分布情况

此顷原建州女真已演化为建州、长白山两大部。建州部为原建州三卫女真人，已演化为满洲部：在今赫图阿拉故址周围地带（参看《圣武纪·龙兴记一》）；苏克素护河部：在苏子河中下游；浑河部：在今浑河中游；哲陈部：在今浑河上游；王甲（王家、完颜）部：在今浑江上游；董鄂（东果）部：在今桓仁县城附近；共六部。长白山部又分为鸭绿江部：今鸭绿江上游北岸；讷殷（内阴）部：在长白山北麓；朱舍里部：在长白山东北麓，共三部。

原海西女真已演化为“扈伦四部”。扈伦四部即叶赫、哈达、辉发、乌拉四部。叶赫（叶黑）部在今开原东北部及梨树县南部，今两县间尚有叶

赫河，乃辽河支流清河的北源。梨树县南部叶赫河东南岸尚有叶赫古城，分省地图上都有明确的现示。哈达部在今开原县东部及梨树县西南部，哈达城即开原南城子，今已淹没于清河水库中。今清河即彼时的哈达河。辉发部在今辉发河中游，辉发城在今辉南县城（朝阳镇）东偏北十九公里许的辉发河南岸。乌拉部在今第二松花江中游两岸，乌拉城即今吉林市北松花江东岸的乌拉街。

野人女真已演化为东海女真、黑龙江女真两大部。东海女真又分为呼尔喀、瓦尔喀、窝集三大部。黑龙江女真又分为索伦、萨哈连（呼尔喀部之一）、使犬、使鹿四大部。

呼尔喀部亦称库尔喀、虎儿哈，主活动于今牡丹江中上游地带。牡丹江彼时称为虎尔哈江。瓦尔喀部主分布于今图们江东北珲春一带。窝集（靺鞨、勿吉）部主活动于今乌苏里江以东至沿海地带。

索伦部讯指黑龙江以北至外兴安岭间广大地区的诸部族，或谓“索伦”即肃慎之对音，主要包括今鄂温克、达斡尔两族在内。萨哈连部按《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所示在今瑗瑋以南江东地带。使犬部亦称鱼皮部，黑斤部即今赫哲族，按《战迹舆图》所示在今依兰县以东，阿速江（乌苏里江）下游一带。使鹿部按《战迹舆图》所示在使犬部东，今黑龙江至库页岛间一带地，后该部西迁于大小兴安岭森林间，即今鄂伦春族。

以上都是游牧部落，其位置因时而异。总之白山黑水间兴安岭、鲸海（日本海）库页（苦夷）岛及鸭绿江图们江诸流域地区都是女真人的活动地区。靠近明朝辽东边境地域，成为彼时女真人的活动中心。

第五节 努尔哈赤的世系

努尔哈赤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父名塔克世(塔失)，祖父名觉昌安(佟叫场)，生母喜塔拉氏。建州左卫始祖童·猛哥帖木儿，是努尔哈赤的前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又作孟特穆，女真姓“夹温”，意为童，朝鲜《龙飞御天歌》中作“夹温猛哥帖木儿”。童为姓认为不雅，后改为佟。明万历末年到辽东视察的司业张鼐。在其所著的《辽东略》一书中，记有“佟叫场建州左卫都督佥事也。”故努尔哈赤本姓佟。万历二十四年(1596)正月努尔哈赤致朝鲜书曰。“女真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努尔哈赤稟，为夷情事，蒙你朝鲜国，我女真国二国往来行走学好，我二国无有动兵之礼”(见申忠一《建州图录》)。又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一月十一日努尔哈赤致朝鲜边将书说：“建州等处地方国王佟，为我二国所同计议事……”(见吴晗《李朝实录史料》2163页)都证实努尔哈赤仍继承其父祖姓佟无疑。大约在万历四十年(1612)顷，努尔哈赤改姓“爱新·觉罗(jiaolao)。(见《满文老档太祖朝第一分册第二卷》)

当时女真人使用蒙古文(也用汉文)。蒙古文是从回鹘文演化而来的。所以蒙古语中、女真语中都夹杂有回鹘语成分。如彼时女真人称富翁为“巴依(巴颜)”，就是回鹘语，至今新疆维吾尔族(回鹘之裔)仍称富翁为“巴依(巴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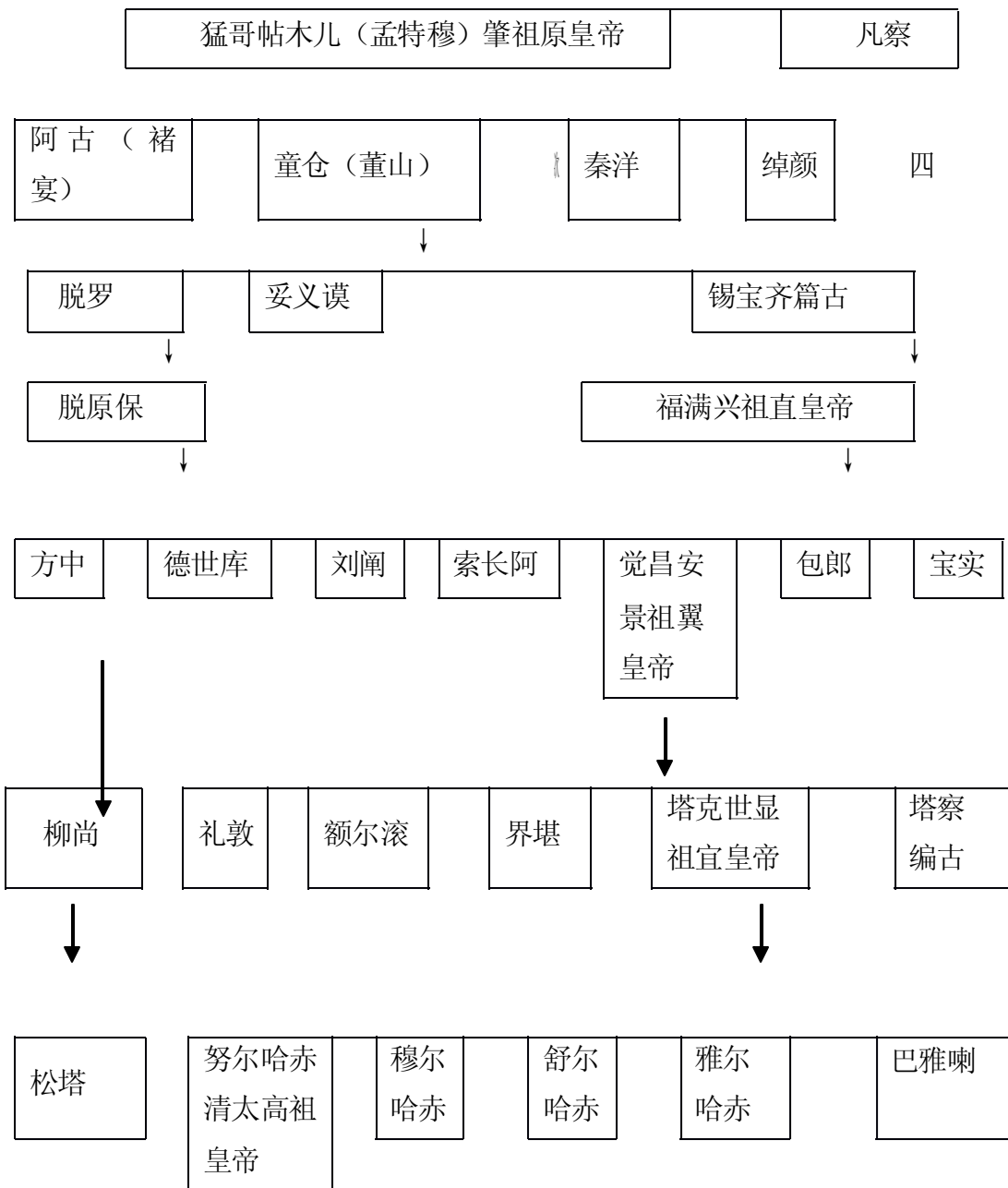
努尔哈赤的名字全是回鹘语，“努尔”在回鹘语中是“光明”的意思；“哈赤”(哈齐)在回鹘语中是“圣裔”的意思，也当“太子”、“世子”用。汉文史料的突厥史料部分译来的“合卓木、火者、合卓、虎者和加、哈吉木等都是哈赤、哈齐的同音异译。“努尔哈赤”的全意是“光明的圣裔”。有些书刊中说“努尔哈赤”当野猪皮讲，“舒尔哈齐”当小野猪皮讲。其用心可恶，应自悔改。

“爱新”（阿什）女真语意为“金”；“觉罗”，是“徽宗语”“赵”字的反切还原。宋徽、钦二帝北狩时从亡宗室三千多人，他们都在“五国头城”今依兰县附近居住。因彼时女真人中多通汉语汉文，从亡汉人们乃创造了“徽宗语”，或谓即徽宗所创造，将单音的汉字拆开为复音，谈故国情恩时用之，以避免女真人的窃听。直到民国十八年时，安东（丹东）、凤城一带尚流行。徽钦二帝及其从亡宗室大臣等的后裔，基本上都转化为赫哲族（黑斤～徽钦族），也有的融合于斡朵怜、胡里改两万户部落中，但他们都以“觉罗”～赵为姓，又因其为中原天子贵姓，故女真人中也有随之姓觉罗～赵者。后又因诸觉罗氏的居地或处境不同，乃演化为舒舒觉罗、西林觉罗、通颜觉罗、嘉木瑚觉罗、伊尔根觉罗、阿哈觉罗等等。诸觉罗的前两（三）个字是地名或身份，后两个字是姓，即嘎山与哈拉。这些赵姓都是在“爱新觉罗”之前就有的。

努尔哈赤取“爱新·觉罗”为氏的用意是：既要继承女真人创立的大金朝的光辉事业，更要如“赵官家”的君临中华。其整个姓名都表示他的雄心壮志。女真人起名是很重视内含的。这位“一代天骄”行如其姓名，真的改变了中华的历史。

努尔哈赤的出生地，是苏克素护河畔的费阿拉城，是他前五世祖童仓以来的故居。他出生时家业已中衰，祖父觉昌安虽拥有宁古塔（苏子河上游称宁古塔川）贝勒，和建州左卫都督僉事的头衔，然彼时建州三卫均已名存实亡，其所统治者只是自己的直属小部落，成为没落的贵族家庭。他父亲塔克世虽仍拥有“建州左卫指挥使”的衔名，也只能统领自家的私属，并无实际的左卫存在。努尔哈赤十岁丧母，继母那拉氏对他不仁，他十八岁时就同伙伴们入山，从事采集劳动，十九岁时不容于那拉氏，乃与父分居，独立门户，是年与佟佳氏结婚。努尔哈赤的世系如下表

努尔哈赤的世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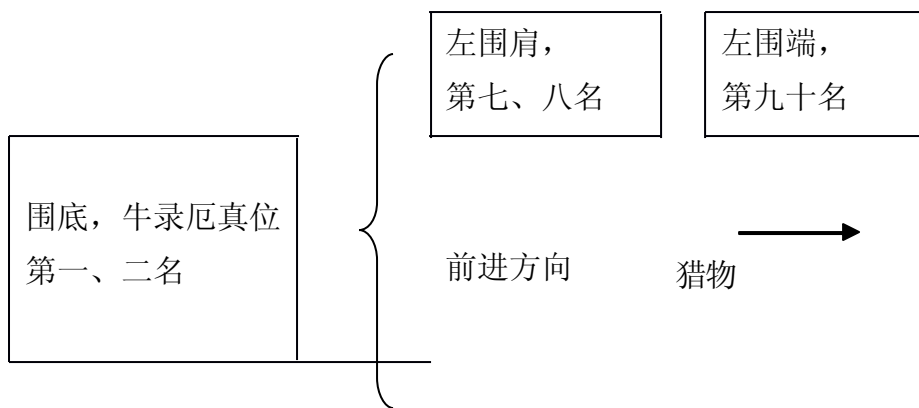
第二章 八旗的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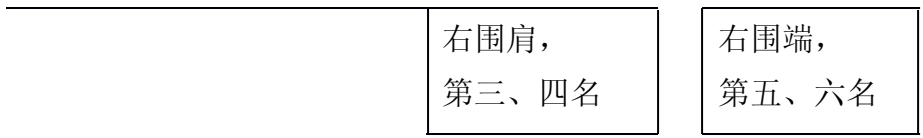
第六节 八旗满洲的建立

八旗制度是以“牛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牛录是明代女真族一种狩猎时的临时组织。每次狩猎前，临时组成牛录，狩猎完毕即行解散。

牛录，满语音为 niru。《武皇帝实录》卷二记云：“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枚，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意为大箭）厄真（意为主）”。

满人称狩猎为“打围”。围猎之前，十人既集，则公选一人为牛录厄真，依其指挥进行这次的狩猎。每一牛录围猎时十人的定位如下图：





即用此队形将猎物捕获或射杀之。

努尔哈赤起兵时，把牛录组织用为军队的编制。由牛录发展到甲喇，由甲喇发展到固山。固山中的牛录，除名称与原来女真人围猎的牛录相同外，其内容与围猎的牛录已无任何相同之处。所以说“八旗制度”是以牛录为基层组织，是正确的。但不能说八旗制是以女真的围猎牛录为基础组成的。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的发明创造。

努尔哈赤是明万历十一年(1583)二十五岁时，在费阿拉城起兵的。他是年二月在费阿拉城，得到他父亲塔克世和祖父觉昌安同死于古勒寨的消息。其经过如前文第三节之未所述。这次用兵是听了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之计。尼堪外兰忠于明廷，李成梁有意扶植尼堪外兰为建州大首领。然尼堪外兰的资望、实力均不相副。

努尔哈赤借“报父祖之仇”为名，于是年五月联合了其附近的八个寨主，共兵百余名，以其父塔克世的遗甲十三幅装备，进攻图伦城，尼堪外兰不能抗，败逃，后被明军捕送给努尔哈赤处死。

努尔哈赤这次进攻图伦城时，就用的牛录组织。从此开始，他将“牛录”做为军队的基层组织单位。将牛录厄真变成了基层管军的官名。从此，他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兼并战争”。

万历十二年(1584)努尔哈赤在进攻董鄂部时，被敌人的勇士鄂尔果尼、罗克二人射伤很重。伤愈后，复率众攻克董鄂的翁鄂落城(在今桓仁县城西北江对岸)，生擒鄂尔果尼(鹅儿古尼)、罗克(老科)以归。众将请杀此二人。努尔哈赤说：“二人射我，乃锋镝之下，各为其主，孰不欲？我今释而用之，后或遇敌，彼岂不为我用命哉！此等之人死于锋镝犹当惜之，何忍因伤我而杀之也”。乃均用为牛录厄真。(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由

此可见彼时努尔哈赤之军队已用“牛录”为组织单位，并已成为永久性的组织。牛录厄真是由上级任命的官员职称。

万历十四年(1586)九月，努尔哈赤已自称“女真满洲国昆都仑汗”(见《旧满洲档》)。万历十六年(1588)努尔哈赤攻克完颜部(在浑江上游北岸)。万历十七年(1589)努尔哈赤已先后并有苏克素护河、董鄂、哲陈、浑河等建州部落。乃于其统治地区内统一实行牛录制。这时努尔哈赤特遣贡夷马三非入明廷，奏述其祖与父图王杲、阿台有殉国忠、请得封职，掌东夷。明廷查实，乃封努尔哈赤为都督僉事，承认了他在建州的领导地位。

是年苏完(苏苏刷觚、刷烟、苏瓦烟、今吉林省双阳县)部长索果率五百户投于努尔哈赤，即以其所部编成五个牛录，以其子侄等任牛录厄真。

万历十九年(1591)努尔哈赤兼并了鸭绿江部。是年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解任。

万历二十一年(1593)努尔哈赤在古埒山击败“九国联军”：是年九月海西女真四部~叶赫、哈达、辉发、乌拉联合蒙古科尔沁及科尔沁所属的挂勒察、锡伯两个女真部落，再加上朱舍里、讷殷两个女真部落，共九部，也称九国，向努尔哈赤进攻。被努尔哈赤击败于古埒山，史称为“癸巳之战”或“九国之战”。努尔哈赤乘胜于十月招服了朱舍里都，于闰十月收复了讷殷部。

万历二十三年(1595)明廷封努尔哈赤为散阶正二品“龙虎将军”。这时努尔哈赤的“甲喇制度”已形成。据出使楚州的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所见的努尔哈赤军队的运动情况写道：“正月初四日胡人百余骑，各备兵器，裹粮数斗许，建旗出北门，乃烟台及防备诸处擲奸事出去云。旗用青黄赤白黑各付二幅，长可二尺许，初五日亦如之”。这段记载说这支队伍是十个牛录，分成两

个甲喇。每一牛录仍是十人。每甲喇各为五个牛录。各牛录分别用青黄赤白黑均五色小旗。五种色是代表木(青)、土(黄)、火(赤)、金(白)、水(黑)的“五行”颜色。五行学说在女真~满~旗人中一直很盛行，这是他们很早就接受的汉文化。

这时，努尔哈赤的牛录制，已从单纯的军事组织发展成军民合一的社会基层组织。还是如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中所记的：“奴酋于各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酋长掌治耕获”。“动兵时则传箭于诸酋长，各领其兵、军器、军粮使之自备、兵之多寡则由酋定数云”。

这段记录中的“酋长”即指“牛录厄真”，“部落”当即指“牛录”。“兵之多寡则由奴酋定数云”，说明此顷每牛录的兵丁已不限定是十名的组织。各牛录的人口及兵丁数各有不同。“奴酋”即指努尔哈赤。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始建“四旗”兵制。此时归服于努尔哈赤的各部首领已有一百九十多名，直属兵丁一万多名，战马七百多匹。其三弟舒尔哈赤已有兵五千多名，战马四百多匹。于是扩大统一编成了四个“固山”仍取狩猎四方合围之义。其总领四方的固山为中旗，旗用黄色；其他三个固山为“围翼”，西方固山用红旗，东方固山用白旗，南方固山用蓝旗。

四方固山旗的颜色。仍是根据“五行生克”的关系制定的。北方属水，土能克水，土色黄，故黄旗居北方。西方属金，火能克金，火色红，故红旗居西方。东方属木，金能克木，金色白，故白色旗居东方。南方属火，水能克火，水色蓝，故蓝旗居南方。军事行动时，四色旗均依此定向行动。同时制定了严密的军事法令。

这四个固山，每固山辖五个甲喇(也作札兰)每甲喇辖五个牛录，每牛录有兵丁一百五十名左右。总计是四个固山、二十个甲喇、一百个牛录、一万五千多兵丁。

自万历二十六年(1598)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的十八年间，努尔哈赤

大连文史资料-八旗源流

从各部迁移来的人民总计有五万多口。其领土往南扩展到鸭绿江口，往东扩展到东海（日本海）滨的图们江口，各旗中的牛录数，各牛录中的人口兵丁数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兹将万历四十三年前，努尔哈赤先后编成的部分牛录列表如下，以供参考。

此表采自周远廉著的《清朝兴起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6 年 7 月版）118~119 页。

姓名	旗别	地名	简况	出处
索尔果	镶黄	苏完	率五百户来归，编五牛采，使其子侄统之	《八旗通志》卷十一
三潭	正白	苏完	错三百户来控，编牛录令其子布赖统之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一，以下简称《通谱》
札鼎	正白	苏完	来归，设牛录，使统之	《通谱》卷一
赫东额	正白	马佳	同弟厄玛禅率五十户来归，授尼玛禅为备御	《通谱》卷七
何和礼	正红	栋鄂	率部属来归，编牛录，使统之	《通谱》卷八
鲁可苏	正白	栋鄂	领四百人来归，编牛录令其子石汉统之	《八旗部统衙门档》
兑齐巴颜	镶红	栋鄂	玄部属来归，编三牛录，令其子噶尔呼机、侄阿兰珠、郎格统之	《通谱卷八》
罗屯	正红	安褚拉库	率八百户来归，编二牛录，令其子艾唐阿、侄安充阿统之。	《通谱卷十一》

乌尔古岱	镶黄	哈达	率属来归，将其属下人分隶八旗，所余之人编牛录，令其孙克什纳统之。	《通谱卷二十三》
苏巴海	镶白	哈达	率二百人来归，编牛录，令其子莽果统之。	《通谱卷二十三》
约兰	正红	哈达	来归后，其子懋巴里授参将，设牛录，使统之。	《通谱卷二十三》
夏瑚	正黄	哈达	率十八户来归，设牛录，令其子雅琥统之。	《通谱卷二十三》
常舒	镶白	沾河	来归后，编牛录，使统之，又编半牛录，令其子布汉统之。	《通谱卷三十二》
阿球巴图鲁	正蓝	沙鲁穆吉尔	率族众及八十人来归，编牛录使统之	《通谱》卷四
明安图巴颜	镶红	绥芬	率亲族及女真“一千余众来归”编二牛录，令其子哈哈纳、绰和诺统之	《通谱卷二十一》
阿尔都山	镶白	额宜湖	招抚萨齐库城女真三百余，编牛录，令其子哈宁阿统之。	《通谱》卷二十五
乌珠阿穆巴	镶红	蜚优	来归后，编牛录，使统之。	《通谱》卷二十五
策穆特赫	正白	蜚优	率五百户来归，编牛录，使统之。	《通谱》卷二十五
孟古慎郭和	镶白	纳殷	率子弟及“同里壮丁”五百名来投，授以牛录厄真。	《通谱》卷二十六
康古里	正白	那木都鲁	与弟喀克骂里率壮丁二百名来投、编牛录，令其弟兄二人分辖。	《八旗都统衙门档》
叶克苏	正	长	率尼马察村三百余人来归，	同上

大连文史资料-八旗源流

	红	白山	编牛录，使统之。	
琥球	镶红	尼马察	率三百户来投，编牛录使统之。	同上
图尔坤 黄占	镶白	费雅郎阿	率一百户来投，设牛录，使统之。	《通谱》卷四十
僧 额	镶黄	宁古塔	率兄弟及同村三百人来旭，编二牛录，令僧额及其子塞纽克统之。	《通谱》卷四十一
雅穆什达	正黄	绥 芬	率一百五十人来，以其孙任牛录厄真	《通谱》卷四十一
南 济 兰	镶黄	乌 拉	率二十五人来编牛录，使统之。	《通谱》卷四十四

由上表可以看出这些先后编成的各牛录，很不整齐，大的牛录有众五百户，小的牛录只有十八户，实力方面悬殊太大，管理使用都不方便。所以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首先对各牛录统一进行了调整，基本上平均了各牛录的人口数。在牛录厄真之下增设了两员代子（又称分得拔什库，或骁骑校）为牛录厄真的助手。又将每一牛录均分为四个“达旦”（嘎山、村庄），每一达旦设章京一员，嘎山拔什库（领催）一名负责管理该达旦的生产生活、军事、教育、行政、司法等一切事宜，向牛录厄真（额真）负责。军民合一的牛录制，至此完全成熟。

又将原有的四旗扩展为“八旗”的编制。对原有的四旗称“正黄旗、正白旗、正蓝旗、正红旗”。新建四旗的旗帜是将原有的黄旗镶红边、称“镶黄旗”；原有的白旗镶红边，称“镶白旗”；将原有的蓝旗镶红边，

称“镶蓝旗”；将原有的红旗镶白边，称“镶红旗”。“镶”字，许多图节上写成“厢”字。

旗子样式是：正四旗左右长七尺五寸？上下宽六尺许的长方形。镶四旗是正四旗的尺寸而剪去外止下角。八种旗上均作龙图案，龙的白描形象基本相同，只是镶四旗除去四边后中间的面积小些，所以龙形也小些，龙与旗的采色配合是：黄旗蓝龙、白旗蓝龙、蓝旗红龙、红旗黄龙。旗杆长一丈五尺，朱红色，龙头面向旗杆，旗杆端为银抢头。八旗的真形彩图如附图二。八旗的样式，是经过复杂变化的过程才归于这样的。

建州八旗编成后，努尔哈赤亲统两黄旗，代善统两红旗，莽古尔泰统正蓝旗，阿敏统镶蓝旗，皇太极统正白旗，杜度（努尔哈赤的长孙）统镶白旗。所有治下军民均隶于八旗之内。八旗内的军民，就是八旗领主的私产。从这时起各旗的固山厄真之下增设左右梅鹿厄真各一员，为固山厄真的副手。八旗制度至此完成。

重编八旗时已有四百多个牛录，平均每旗有五十多个牛录，每牛录的兵丁增至三百多名。但每旗仍是五个甲喇，每甲喇有十多个牛录。

万历三十六年（1608）努尔哈赤与明边臣划界立碑，从此自称为国。遣将攻克乌拉宜罕山城（在乌拉城东南），将城中人畜全部收归建州，得甲三百副。

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改国号称金，自称大英明汗（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建元“天命”，这一开始建立的就是“中华式”的国家。不再向明廷称臣，成为与明朝并立的中国王朝之一，史学界称之为后金。意味是女真完颜氏王朝“大金”国的复兴。这时后金统治下的人口已达一百四十多万，每旗平均有十八万人左右。

八旗领主之下都设有固山厄真，但各旗开始的固山厄真都是谁？史录上没有完整的记载。在朝鲜人李民克写的《建州见闻录》中可找到天命四年有四位固山厄真的名字，即努尔哈赤亲统的两黄旗的固山厄真是阿敏、额亦都。代善所统的两红旗的固山厄真是“虾”·费扬古和多弼二人，但不

知谁在何旗，又在《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十八里可找到天命六年二月间的八位固山厄真是扈尔汉、阿敦、穆哈连、济尔哈郎、汤古岱、博尔晋、何和礼、阿巴泰，但也未知他们各在何旗。

1619年灭叶赫后，将叶赫军民全部编入八旗之中。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死，其第八子（四贝勒）皇太极继汗位，改元天聪，史称清太宗，以明年（1627）为天聪元年。对各旗领主有所调整，太宗（天聪汗）亲统两黄旗。多尔袞统正白旗，（原皇太极领）。多铎领镶白旗（原杜度领）。阿济格领镶红旗（原代善的两旗之一）。代善仍领正红旗。阿敏领镶蓝旗（后天聪四年阿敏获罪，由济尔哈郎领镶蓝旗）。莽古尔泰领正蓝旗（天聪六年莽古尔泰获罪，由其弟德格类领正蓝旗，旋德格类又获罪，太宗乃将正蓝旗分两半，分属于两黄旗。以额驸杨古利之弟谭泰为正黄旗固山厄真，以宗室拜伊图为镶黄旗固山厄真。

天聪九年（1635）二月太宗下谕停止使用“诸甲”（肃慎、女真）的民族名称，改用始建国时的“满洲”名称。从此，以前编成的“建州八旗”始改称满洲八旗，入关后改称“八旗满洲”。凡此以前加入八旗的军民统称“陈”（旧、佛、老）满洲。

太宗死后，多尔袞执政时，恢复了正蓝旗编制，而归自己统辖，从而多尔袞领有正白、正蓝两旗。顺治七年多尔袞死，其所领的正白旗改由皇帝领有，自此始称两黄旗与正白旗为上三旗，“上”指皇帝，即“皇帝三旗”。其余五旗由诸王贝勒等分领。其五旗领主与各旗的固山厄真时有变化。

第七节 八旗蒙古的建立

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创业时，蒙古人可分为以下诸大部：

(一)喀尔喀蒙古：也称漠北蒙古。喀尔喀之称始见于明代，共分十二部，其中“内喀尔喀五部”居东，为鞑靼中兴名主达延汗(大元汗)第五子阿尔珠博罗特及其所部后裔，明末徙幕于大兴安岭东南，分为札鲁特、巴林、敖汗、奈曼等四部五旗，属于内蒙古。外喀尔喀七部，为达延汗第六子格勒森扎及其所部后裔，居于漠北，仍称喀尔喀蒙古。

(二)察哈尔部：为达延汗长子图鲁斯博罗特后裔，即元帝室正统相承的部落，乃蒙古诸部之共主，然已徙拥虚名，政令并不能行于蒙古诸部。图鲁斯博罗特于1521年(明武宗正德末年)顷由杭爱山北徙幕于漠南，死，传位于长子博迪。博迪汗即位后，因受其三叔巴尔斯博罗特一支(在漠南西部)即衮必里克及俺答等之威胁，欲讨之，而不能胜。乃徙幕于辽东边外，即今开原、铁岭、沈阳、辽中一带地。蒙古语称边境为“察哈尔”，遂以地名为部落名，改称为察哈尔部，明人称之为“插”。博迪传位给达赉孙库登，达赉孙库登传位给图们(明史作“土蛮”)势稍振，常侵扰其东邻女真诸部。图们传位给布延，布延传位给林丹汗(1601~1633年在位)称呼图克图汗，明史称之为“虎墩兔”。时俺答后人势衰，林丹汗势强，有重新统一蒙古之思想和行动。

(三)科尔沁部：明人称之为“好儿趁”，是元太祖铁木真之弟哈布图哈萨儿后裔的部落。明洪熙元年(1425)哈萨儿的第十四代孙奎蒙克为部长，因避乱，自其原牧地~额尔古纳河以东、海拉尔河以北地，南迁到兀良哈三卫牧地~嫩江中下游地带，成为兀良哈的附庸，自号其部落为“科尔沁”部。

兀良哈三卫亦称“朮颜三卫”，即朮颜、福余、泰宁三卫，乃洪武廿二年(1389)所设。正统(1437~1499)以后，逐渐向南迁徙，最后迁到大宁

(今宁城县大明城)一带。兀良哈三卫南迁后,科尔沁继承了三卫牧地,并向南扩展到东辽河流域,与海西女真叶赫部相接。

原在正统九年(1444)顷,有女真瓜尔佳氏苏完部(今双阳县地)的一支在其首领御玉军汗及子超莫尔根的带领下北迁于溪泊地方~今嫩江下游以西绰尔河流域,即以地名为部落名,称溪泊部,后讹为锡伯部。其另一部用瓜尔佳姓为部落,后讹为“挂勒察”部。科尔沁部强盛后,锡伯、挂勒察成为科尔沁的附庸。

(四)厄鲁特蒙古:即明初之瓦剌,游牧于天山以北,阿尔泰山西南地区。明末屈鲁特训为卫拉特,清初始作“厄鲁特”或额鲁特,与八旗形成的关系不多,故从略。

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科尔沁部翁阿岱、莽古思、明安三贝勒共统兵一万(其中包括锡伯、挂勒察两个女真部落之兵)号称“蒙古三部”。连合海西女真~扈伦四部,及长白山女真两部,号称“九国联军”进攻建州。被努尔哈赤击败之于古埒山(古勒山,今新宾县西北边古楼村北山)。科尔沁诸贝勒震于努尔哈赤之强大,遂即遣使通款。后来明安贝勒之女、翁阿岱之女都赠给努尔哈赤为妃。莽古思贝勒之女及孙女先后嫁给皇太极,即“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

后金天命四年(1619)三月,后金于萨尔浒(今抚顺上马古乡哈塘村)大破明军后,七月又取铁岭城。旋,喀尔喀五部的斋桑巴科、巴本及科尔沁明安贝勒之子桑噶尔等率兵万余援明;袭杀后金收牧马厮卒百余名。八旗军乃痛击之,色本、巴本等二十余名首领被俘。喀尔喀五部及科尔沁部大震动,于是喀尔喀五部诸贝勒,以卓里克图洪巴图鲁为首遣使到后金求盟,愿共同抗明,“征之必同心合谋,讲和亦同议定”。努尔哈赤允之,双方对天盟誓,议定“征则同征,和则同和,若违誓言,短命夭折”。金

蒙关系从此大变。

从天命六年(1621)起，喀尔喀五部及科尔沁诸贝勒、台吉等，纷纷归顺后金：六年十一月喀尔喀部的古里布什、莽果尔两台吉率部六百余户归于后金。努尔哈赤厚待之，以聪古兔公主嫁与古里布什，以族弟吉日里牡吉胡之女嫁给莽果尔，均称额駙，授总兵官世职。七年三月科尔沁、喀尔喀等部的明安、锁诺木等十七位贝勒及一些台吉等率所部三千余户归于后金。喀尔喀五部又有一千二百户来投。努尔哈赤对彼等均厚赐财物，授给官职，亦分别将彼等编入八旗之中。

天命十一年八月努尔哈赤死，皇太极即位，十月，皇太极派兵击败背盟的喀尔喀扎鲁特部。十一月察哈尔蒙古阿喇克绰特部贝勒图尔济率部一百户归金。天聪元年(1627)初，皇太极征服朝鲜。二月喀尔喀蒙古的奈曼部衮出斯巴图鲁与敖汗部锁诺木杜稜、塞臣卓里克图等三位贝勒因避林丹汗之侵逼，而“举国来附”。皇太极优礼相待，并以皇姐哈达公主嫁与琐诺木杜稜，尊为额駙，赐号“济农”(在蒙古次于国汗的高级尊号)，赐居开原。塞臣卓里克图还牧故地。赐衮出斯巴图鲁为“达尔罕”，亦还牧故地。八月，喀喇沁与后金盟誓议和。巴林部贝勒塞特尔等亦率部归金。

天聪二年(1628)正月，后金击败曾截杀后金使臣的察哈尔多罗特部，阵斩其台吉古鲁，生俘其部众一万一千二百名。九月，后金又会合其所属的蒙古科尔沁、敖汗、奈曼等诸部兵，同征察哈尔林丹汗、大破之，连克席尔哈、席伯图、汤图等地，一直追至大兴安岭南端，大胜而归。

天聪三年(1629)喀喇沁(当时其牧地在今建平县北部)部归于后金。

天聪六年(1632)四月，皇太极率八旗军会合所属的蒙古科尔沁、喀喇沁、土默特、喀喇车里克、伊苏特、敖汗、奈曼、阿绿、巴林等部兵西征盘据于归化城一带的察哈尔林丹汗，长驱直入。林丹汗“举国惊恐无措”被迫“弃故业，徙人畜十余万自归化城西奔，沿途死亡逃散十之七八”。林丹汗忧忿交加，病死于祁连山南大草滩祁连城。后金军收降林丹汗的残众数万人。

天聪九年(1635)初,西征的后金军迫使林丹汗太子孔果尔额哲奉母苏太妃率残众千余人降,献出元传国玺。至此,后金完全征服了漠南蒙古。消灭了元裔汗系正统部落。皇太极对归附的蒙古及原为藩属的冠勒台吉等头目,均优礼相待,厚赏财物,封官赐爵,并互相婚娶。皇太极有十四个女儿,又抚养图伦、岳托各一女,共十六位格格(公主),其中有十二位下嫁给蒙古贝勒。皇太极的两位皇后,三位贵妃也都是蒙古贝勒之女。后金的代善、阿敏、莽古尔秦等三大贝勒及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袞、德格类、多铎、岳托等诸贝勒的“福晋”,也都是蒙古的格格。

是年二月皇太极编成了“八旗蒙古”军,即将原来已编入“八旗满洲”内的蒙古兵丁抽出一部分,及新收服的蒙古兵混合到一起编成的。最初“八旗蒙古”的八位固山厄真是:

正黄旗固山厄真、阿代
镶黄旗固山厄真、达赖
正白旗固山厄真、伊拜
镶白旗固山厄真、苏纳额驸
正红旗固山厄真、恩格图
镶红旗固山厄真、布颜代额驸
正蓝旗固山厄真、吴赖
镶蓝旗固山厄真、扈什布。

八旗蒙古的一切编制、旗帜皆同八旗满洲。其后又陆续有蒙古人加入八旗蒙古。入关前,八旗蒙古共有117个佐领,共有兵丁16,810名。八旗满洲内有蒙古佐领35个。其余的蒙古都留居故地,称“外藩蒙古”。外藩蒙古也编旗,大约以五十丁为一佐领,合若干佐领为一旗;由金(清)国政府划分给牧地,各守地界,不得互相侵越,遇有纠纷,由皇帝裁定,政

根统一于金(清)政府。但外藩蒙旗，不算“八旗制度”，即不属于八旗范围，其人民也不属于“旗人”。后来发展为“盟旗制度”。

天聪十年(1636)四月己卯(初五)后金国贝勒等文武诸臣及蒙古十六部四十九名台吉和察哈尔旧太子额哲同上书请上皇太极尊号，十一日皇太极正式登极，称“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

康熙十四年(1675)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察哈尔八个旗”，驻于大同边外，在今乌兰察布盟东南，及锡林郭勒盟南部，属于外藩蒙古。

第八节 八旗汉军的建立

“八旗汉军”，‘就是大清国八旗制度内，用汉人或汉化了的女真人为将，统领汉旗兵的部分。大清(后金)国内汉将领汉兵的军队，从八旗制一开始就存在。八旗最初编成时的四百多个牛录中，就有十六个汉将领汉兵的牛录，即由汉人任牛录厄真，率领由汉人编成的牛录军民。这些人都是原来就居住在后金(女真)国内的汉族人。编成八旗后，他们基本上都变成了“陈满洲”。

后金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围攻抚顺时，明游击将军李永芳投降，努尔哈赤厚待之，以女孙妻李永芳，称为：“抚顺额驸”，为三等副将，即令其管领抚顺投降的汉族军民。但彼时他们没编入八旗牛录，也不称“汉军旗”。天命六年(1621)后金攻沈阳、辽阳等地时，李永芳均率所部汉军从征，有功，晋升三等总兵官。又有汉化了的女真人佟养性，原居辽东佟佳地方，遂以居地为汉姓，迁居抚顺为商贩，暗通后金，明边官捕之入狱。后逃归努尔哈赤，赐以宗女为妻，授二等副将。时归附后金的汉人日众，遂以佟养性为总兵官统领之。天聪初，为佟养性单编一队汉军，满语呼之为“乌真超哈”。天聪五年(1631)以佟养性为昂邦章京(领四个牛录)天聪六年七月卒。

天聪七年(1633)早已叛明的将领孔有德、耿仲明率其所属的官兵及眷属等二千多人投奔后金。太宗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仍领其旧部官兵，称之为“天佑兵”。次年，明将尚可喜又率部降于后金。太宗封尚可喜为智顺王，仍领其旧部官兵，称之为“天助兵”。以上这些汉将领汉兵者，均无“汉军旗”的称号。

正式建立汉军旗是从天聪七年一月开始的。太宗下令，原先分入八旗满洲中的汉人壮丁，每十丁中抽出一丁披甲入伍，共得一千五百人，组成了一个“汉军旗”。旗用黑色，由汉将马光远任固山厄真。

马光远，明顺天大兴人，原任明建昌参将，天聪四年正月永平战役中，降于后金，升为副将。天聪五年攻明大凌河，马光远有功，故以之为此一汉军旗的固山厄真。

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登极称帝后，于议定《令典》中，明文规定：“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式样，男不许穿大领大袖、戴绒帽，务要束腰；女人不许梳头、缠脚……该管牛录章京稽查，若有违者，本身及该管牛录(章京)拔什库俱有罪”。从此，清帝统治下的汉人均改着满装，女人天足。

崇德二年(1637)七月，太宗又把一旗汉军扩展为两翼旗汉军，以马光远为右翼旗固山厄真以石廷柱为左翼旗固山厄真。旗的编制均照满洲各旗办理，两翼旗均用黑色。

石廷柱原系女真人，姓瓜尔佳氏，。世居苏完。其曾祖布哈，明成化中任建州左卫指挥僉事。其祖阿尔松袭父职。其父石翰始迁辽东，遂以石为姓。天命七年太祖攻广宁，廷柱时为明千总，出迎。太祖赐之金印鞍马，令其抚慰城中士庶，廷柱遵以城降，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命其管领降众，旋以随上征巴林有功，晋三等男爵。天聪七年以积功晋三等子，后

以罪解任，至是起复为左翼固山厄真。

崇德四年(1639)六月，太宗又将两翼汉军旗扩展为四旗汉军。每旗辖十八个牛录，下设梅鹿章京二员、甲喇章京四员(即每旗分四甲喇)，每甲喇辖四或五个牛录。

马光远为汉军正黄旗固山厄真。马光辉、张大猷为梅鹿章京，用蓝旗镶黄边。

石廷柱为汉军正白旗固山厄真。达尔汉、金维城为梅鹿章京，用蓝旗镶白边。

王世选为汉军正红旗固山厄真。吴守进、孟乔芳为梅鹿章京，用蓝旗镶红边。

巴颜为汉军正蓝旗固山厄真，李维汉、佟图赖为梅鹿章京，用蓝旗不镶边。

每旗仍为十八牛录，每牛录兵丁百余名，四旗合计兵丁七千二百名。

崇德七年(1642)六月，太宗又将四旗汉军扩展为“八旗汉军”。旗式、编制、官兵员名额数均同于“八旗满洲”。总共有兵丁24,050名。此八旗的固山厄真分别是：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喇、佟图赖、石廷柱、巴颜、李国翰等。

同年八月，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奏请以所部在汉军旗下行走。太宗允之，以孔有德部入汉军正红旗籍，耿仲明部入汉军正黄旗籍，尚可喜部入汉军正蓝旗籍，其后所有汉兵均入汉军旗籍。如佟养性部、李永芳部均入汉军正蓝旗籍。

第三章 八旗的发展变化

第九节 八旗的扩展

八旗制度自万历四十三年(1615)“八旗满洲”组织完成后,即继续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程度的扩展中。天命三年(1618)十二月,东海女真的呼尔喀首领金达,率一百多户归附后金,天命四年(1619)三月,明经略杨镐与朝鲜联合进攻后金,被金击败之于萨尔浒。朝鲜兵统帅姜宏烈率其残部五千多兵降于后金;是年八月努尔哈赤灭叶赫部,均分别编入八旗中,他们后来都变成“陈满洲”。太宗天聪元年(1627)后金兵入朝鲜,原居于朝鲜境内的女真人瓦尔喀部二百多户都回归后金。天聪六年(1632)赫哲部的乌札拉族归附后金,分别编入八旗满洲的镶白、正蓝、正黄三旗中。天聪七年后金又将瓦尔喀部 1,950 名收服。天聪八年(1634)十二月,金将霸奇兰等北到黑龙江滨收得呼尔喀部 1,590 名。天聪九年(1635)又得呼尔喀人 7,202 名,收服编户壮丁 2,483 名,又得瓦尔喀壮丁 560 名,妇幼 590 名。天聪十年(1630)又得瓦尔喀部 2,100 人。崇德三年(1638)黑龙江呼尔喀部萨哈连族受抚来归,均分别编入八旗满洲的镶白、镶黄、正白三旗中。崇德四年(1639)三月,平定了黑龙江上游索伦木博果尔之乱,得其壮丁 2,709 名,妇幼 2,964 名均编入八旗满洲之中。不久,又有索伦部 337 户:其中丁壮 481 名来归,安置于郭尔罗什、玛库玛勒之地,也都属于八旗满洲籍。又得索伦部鄂温克人、鄂伦春人共 5,673 名,亦编入八旗满洲之中,并单编牛录。十二月又得索伦男妇 900 名,呼尔喀部男妇 336 名,又得呼尔喀部男丁 419 名来降。崇德六年(1641)索伦部 147 人来降。次年又招降呼尔喀部 1,400 人。崇德七年(1642)将汉化了了的佟养性一支编入汉军正蓝旗。崇德八年(1643)又得呼尔喀部 3,703 人,以上先后来归之众,均分别编入八旗满洲之中。另外俘虏来的人口,则分别编入八旗满洲中为“阿哈”(家奴、或农奴)。这些太宗时代获得八旗满洲籍的,均称“伊彻满洲”,即新满洲。

顺治元年(1644)关外的八旗兵大部分“随龙入关”，参加讨伐明国的战争。仅有小部分八旗兵留驻于东北各地。留驻盛京地区的计盛京八佐领，746人，兴京50名。凤凰城150名，牛庄32名，盖州96名，广宁28名，合计1102名。

顺治八年(1651)在嫩江流域有不属于科尔沁蒙古的女真人“挂勒察”部，有的被编入八旗满洲之中，特保留其原名，称“挂勒察满洲”。

康熙十年(1671)居于东北地区的墨尔哲人，由宁古塔将军巴海收编为四十个牛录，共二万多人，均加入“八旗满洲”籍。康熙十年至十六年间，将原驻松花江、瑷春河一带的赫哲人、库雅拉人连续在宁古塔及乌拉编成78个牛录(佐领)，这78佐领于康熙十七年(1678)移驻于北京八佐领，移驻于盛京地区31佐领(共1,131户，壮丁3,531名，眷属11,180名)。其中章京29员、骁骑校29员，苏拉哈番一员，领催及甲兵1,378名，在盛京地区的驻盛京17佐领，甲兵850名；驻锦州5佐领，甲兵291名；驻义州7佐领，甲兵325名，驻广宁3佐领，甲兵141名。

康熙二十年(1681)在金州地区“就地编旗”，共征壮丁576名，其中百名披甲，余为附丁，约合五丁供一甲，连同眷属均入八旗满洲籍，驻防于当地。

康熙二十一年(1682)在盛京又编成八佐领，壮丁419名披甲驻防。到康熙三十八年(1699)止在盛地区驻防的新满洲，共40佐领，甲兵1,991名。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间又有一批入关的“八旗满洲”兵又“随龙出关”，到盛京，然后分配到各地驻防，目地在巩固东北边防。

康熙三十一年(1692)原属于科尔沁蒙古的女真部落~锡伯人、挂勒察人和部分达翰尔人等，共男丁14,158名，全部由皇帝出钱，以每丁80两纹银的“赏额”，从科尔沁王公手中赎出。其中可披甲者11,850名，编为84个佐领，均籍列上三旗的八旗满洲籍，但保留“锡伯”称呼。分别驻于齐齐哈尔，伯都纳(今扶余县城北15公里许)，乌拉三城。驻齐齐哈尔地方者，壮丁

3, 600名, 其中1, 200名披甲, 2, 400名为附丁, 合编为24个佐领。其中锡伯人佐领19个, 兵丁2, 580名; 达斡尔人佐领五个, 兵丁750名。驻伯都纳地方者, 壮丁四千名, 其中二千名披甲, 二千名为附丁, 共编成40个佐领。其中锡伯人佐领30个, 挂勒察人佐领十个。驻防乌拉者, 壮丁三千名, 其中一千名披甲, 二千名为附丁, 共编为二十佐领。

以上合计八十四个佐领, 用上的壮丁10, 600名。

还有蒙古巴尔虎人于康熙年间被编入八旗之中。详见本书第八章《蒙古巴尔虎旗人源流》。

康熙三十八年(1699)至四十年(1701)间, 将锡伯兵总分为四部一部驻黑龙江, 一部驻北京, 一部驻盛京, 一部驻德州。移驻盛京者三千名壮丁, 不再单编牛录, 而混编于满蒙八旗佐领中。乾隆二十九年(1764)由盛京地区抽出锡伯兵一千名, 携眷开赴新疆驻防。今新疆伊犁河南的“查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 即其裔也。

康熙五十三年(1714)原居于东北纳奇林、锡绿林一带的赫哲人, 和原居于珲春以东的雅库特人也都编入了“八旗满洲”中。这些都称伊彻满洲。

同年又将金州城西南辽东半岛南端的全部民人(汉人)编入上三旗汉军旗籍, 驻防原地。计镶黄旗包括毛营子、南关岭、大连湾一带居民; 正黄旗包括老虎滩、青泥洼、小平岛、营城子一带居民; 正白旗包括长城、龙头、水师营、旅顺街、双岛、老铁山一带居民。这些人是明末清初, 主要是顺治十年(1653)由山东登莱青等府先后迁来辽东半岛的民人。雍正四年(1726)又从山东、云南拔来庄河(当时属岫岩)的报地植田的汉人, 编为正红、正黄、镶红、镶蓝四个旗籍。凡编入旗籍的就统称“旗人”, 以别于及高于民人。

据《盛京通鉴》卷四记载：“查金州汉军佐领，系康熙十九年经前任将军安(珠瑚)奏请，将该城招安壮丁420名编设二佐领，选甲兵一百名，按月发给饷银……嗣于廿六年……请编为厢黄、正黄、正白汉军三旗”。则1714年及1762年辽南汉军旗的增编，是康熙廿六年(1687)的继续。

第十节 八旗的变化

八旗制度，开始是努尔哈赤创建的一种军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其内容随时随地都在发展变化中。大体看入关前后的变化很大。入关前，八旗制是以农奴制为经济基础，以军事为目的，全体壮丁战时为兵，平时生产，兵天定数，兵器装备等一切自备的初级社会组织。入关后，变成了以封建地主经济为基础，以提供八旗兵源为目的，为封建帝王中央集权统治服兵役，军械装备薪饷统由政府负担的组织。

八旗的基层是牛录(佐领)，各牛录都包括人民、土地和军队。初编旗时是合五牛录为一甲喇，合五甲喇为一固山。这是一般的规定，实际上一固山不一定是五甲喇，一甲喇也不一定是五牛录。每甲喇所辖的牛录数差别更大，有的一甲喇只有三牛录，有的一甲喇可有二十多牛录。有的牛录籍贯上属于某旗，实际上并不属于某旗的某甲喇，而直属于其驻地的军事长官，或某位宗室贵族私人。

各牛录的兵丁数相差也很大，有的一牛录只有几十名兵，有的一牛录则有几百名兵。这些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变化很大。

牛录，汉译为佐领。甲喇，满语意为“节”，汉译为参领。固山，汉译为“旗”。牛录的首长，满语称牛录厄真，天聪八年(1634)改牛录厄真为“牛录章京”。汉译仍为佐领。(单位与首长同称)。甲喇的首长满语称甲喇厄真，天

聪八年改称“甲喇章京”。汉译仍为参领(又是单位与首长同称)。固山的首长满语称固山厄真，顺治十七年(1660)定名为“都统”。

佐领的副手满语称“代子”，或“分得拔什库”，汉译为骁骑校，每佐领二员。都统的副手满语称梅鹿厄真，天聪八年改称“梅鹿章京”，顺治十七年改称“副都统”。各牛录在佐领、骁骑校之下有四员章京，四名领催(小拔什库)分管本佐领的四个达旦，向佐领负责。

旗内各级官员的品级及顶戴如下：

都统：一品，亮红顶，单眼大花翎，相当于现代的上将。

副都统：二品，大红顶，单眼大花翎，相当于现代的中将。

参领：三品，涅红(菠菜根色)顶，单眼花翎，相当于现代的少将。

副参领：四品，亮蓝顶，蓝翎，相当于现代的上校。

佐领：五品，正蓝顶，蓝翎，相当于现代的中校。

骁骑校：六品，涅蓝顶，蓝翎，相当于现代的少校。

章京：七品，水晶白(亮白)顶，野鸡翎，相当于现代的上尉。

各级官员的品级都可上下浮动一级，当然一品大员不能向上浮动，各级官员之下都可配置“笔帖式”掌管文书，其官阶由四品到九品不等，以六、七品者最多。八品官为正白顶，九品官为涅白顶，都是野鸡翎，相当于现代的中、少尉。

计八旗内，每一旗有都统三员、副都统六员，即满、蒙、汉军都统各一员，副都统各二员。每旗都有印务参领一、二员，带兵的参领五员(也有多少不同)。带兵的正参领与副参领员数相等。参领下有印务章京四至八员。佐领数不定。八旗内的官员，都由各本旗的人员担任，到光绪三十二年以后，开始

有民人任八旗都统的，如刘永庆、冯国璋、王世珍、王栾楷、秦绶章、葛宝华、张英麟、段祺瑞等。

牛录是八旗的基础，佐领是全牛录的父母官，平时负责管理本牛录的户籍、婚丧、比丁、授田、租税、差役、教育、诉讼、生产生活等一切事宜，战时则为全牛录的指挥官。佐领的任命大体上可分为“世袭佐领”和“流官佐领”两大类。凡后金建国初期努尔哈赤的旧部任牛录厄真者，努尔哈赤、皇太极时率部来归的酋长，即以其所部编为牛录，以原酋长或其宗支任牛录厄真者；有功之臣受封为牛录厄真者，基本上都是世袭。其中又有“勋旧佐领”及“世管佐领”的两大类，但二者之间界线不易分清。“世管佐领”中又有一种“互管佐领”，即原来是由两个部落全员合编为一个牛录的，该两酋长及其后裔即互相交替任该牛录的佐领。原任佐领出缺时，即由两家中选出贤者继任佐领，而不是平均的互相替换。还有宗室及觉罗佐领也都是世袭。

清帝室宗族，有“宗室”及“觉罗”的区别：凡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的后代子孙均属宗室，努尔哈赤的曾祖福满的后代，除宗室一支外，其余均属“觉罗”。这是天聪九年（1635）规定的。《宗人府则例》卷一“宗室觉罗支派”条云：“凡宗室载入玉牒者，以显祖本支为宗室，叔伯兄弟之支为觉罗。宗室束金带（黄带子），觉罗束红带（红带子）。”由宗室编成的牛录最多时有十个，由觉罗编成的牛录，是从雍正二年（1724）开始的，当时觉罗牛录均在上三旗行走，由皇帝直辖。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时，觉罗牛录有三十一一个，平均分隶于八旗，每旗四个，只有正红旗三个。

流官佐领是量才录用的，基本上都是由骁骑校升任。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基本上都是世袭佐领。但也有流官佐领。八旗汉军中基本上都是流官佐领，但也有世袭佐领，如尚可喜海城墓地的守墓佐领即由尚家世袭，一直到民国建元才终止。

公中佐领，较其他佐领为贵，例如李侍尧在乾隆十四年（1749）任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十七年（1752）六月授公中佐领，十二月调热河副都统，可见公中佐领的地位相当于副都统。觉罗佐领在上三旗行走时，亦称公中佐领。

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等二十四旗编成后，即按旗色归宗，凡同一色的旗，即归同一旗主领有。如《雍正令典卷一兵部~官制》记曰：“国初设立八旗，曰镶黄、曰正黄、曰正白、曰正红、曰镶白、曰镶红、曰正蓝、曰镶蓝……又以镶黄、正黄、正白为上三旗。五旗以王贝勒统之。每旗又分为满洲、蒙古、汉军为三旗”。这个“国初”当指入关之后，满蒙汉军混编的八旗情况。因入关前无所谓上三旗，更非努尔哈赤时，因役时并无二十四旗。

牛录，即是八旗的基层组织，也是皇帝、诸王贝勒、宗室贵族封建领主们的财富。各领主们拥有的牛录数随时都有变化。有功的可受到增牛录之赏，有过者可受到拨出减少牛录之罚。同为旗主、同等爵位，而功罪不同，则实际领有的牛录数也不相同。每因整编，也可将各旗的牛录数变更。如《康熙会典卷104兵部27》记载：“国初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遇敌交锋，若七旗败遁，一旗攻战有裨于七旗者，将七旗七个佐领人丁给予一旗。若一旗败遁，七旗攻战，则将败遁旗人丁与七旗。若一旗内一半攻战，一半败遁，则将败遁之人丁与攻战之人……”。（此军令首见于《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八月庚午）这是各旗牛录数变化增减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兹不一一列举。

各牛录属于何旗，随时随地都可变更，拨到何旗，就属于该旗籍，但原来的族籍是不变的。变更都是整个牛录的行动，即八旗满洲牛录，拨到何旗，都仍是八旗满洲牛录。八旗蒙古牛录拨到何旗，都仍是八旗蒙古牛录。八旗汉军

牛录，无论拨入何旗，都仍是八旗汉军牛录。牛录的族籍是基本稳定的，旗籍是不定的。今天满族~旗人所报的旗籍，是他家在八旗制消亡时所属的旗籍。但旗籍的变化不是很大的，有的家的旗籍是未曾变过的。

入关后总共只有八旗，每旗内再分满、蒙、汉军三旗。即镶黄旗内又分为“镶黄旗满洲”、“镶黄旗蒙古”、“镶黄旗汉军”。余类推，严格的说不应再称“满洲镶黄旗”、“蒙古镶黄旗”、“汉军镶黄旗”。旗内各族旗又称“旗分”，如“镶黄旗满洲旗分”、“镶黄旗蒙古旗分”、“镶黄旗汉军旗分”等。

每一旗中究竟有多少满洲、多少蒙古、多少汉军?入关后，八旗成为常备兵制。定期在八旗各佐领中挑补旗兵，兵额基本固定。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八旗兵数，全国共有两千多佐领。八旗平均，则每旗应有 250 佐领，但没有各旗牛录的全数记录。《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 171，八旗都统条，只记有驻京八旗在乾隆二十二年的佐领数目是：

满洲佐领镶黄旗八十五有半(内宗室一、觉罗四、蒙古九、俄罗斯半、新满洲四)。正黄旗九十二有半(内宗室三、觉罗四、新满洲四、蒙古八有半、朝鲜二)。正白旗八十六(内宗室三、觉罗四、新满洲四、蒙古二)。正红旗七十四(内觉罗三、蒙古一、朝鲜四)、镶白旗八十四(内宗室一、觉罗四、蒙古四)。镶红旗八十六(内宗室一、觉罗四、蒙古一)。正蓝旗八十四(内宗室八、觉罗四、蒙古八)。镶蓝旗八十六(内觉罗四、蒙古二个半)合计 678.5 佐领，内老满洲 581 佐领，其他 97.5 佐领。

蒙古佐领镶黄旗二十八，正黄旗二十四、正白旗二十九、正红旗二十二、镶白旗三十一、镶红旗三十二、正蓝旗三十、镶蓝旗二十五、合计 221。

汉军佐领镶黄旗四十、正黄旗四十、正白旗四十、正红旗二十八、镶白旗三十、镶红旗二十九、正蓝旗三十、镶蓝旗二十九，合计 266。

总计一千一百六十四佐领，三个“半佐领”。《圣武记》《兵制兵饷》条中所记的佐领数与此不同。驻防京师以外的各旗籍的佐领数无法统计。

乾隆二十二年驻京八旗各旗分的佐领数是：

镶黄旗籍：满洲旗分佐领85个半、蒙古旗分佐领28个、汉军旗分佐领40个。正黄旗籍：满洲旗分佐领92个半、蒙古旗分佐领24个、汉军旗分佐领40个。正白旗籍：满洲旗分佐领86个、蒙古旗分佐领29个、汉军旗分佐领40个。正红旗籍：满洲旗分佐领74个、蒙古旗分佐领22个、汉军旗分佐领28个。镶白旗籍：满洲旗分佐领84个、蒙古旗分佐领31个、汉军旗分佐领30个。镶红旗籍：满洲旗分佐领86个、蒙古旗分佐领32个、汉军旗分佐领29个。正蓝旗籍：满洲旗分佐领84个、蒙古旗分佐领30个、汉军旗分佐领30个。镶蓝旗籍：满洲旗分佐领86个半、蒙古旗分佐领25个、汉军旗分佐领29个。

入关后每旗领旗的王公数目都不止一人，每位王公领有的佐领数有以下的记录可供参考。如康熙十四年顷正蓝旗和硕亲王常宁领有的佐领数是：满洲旗分佐领六、蒙古旗分佐领三、汉军旗分佐领三、包衣佐领二、管领一，共为14个佐领，一个管领。其中满洲旗分佐领是从镶黄旗拔来的津分(金布)佐领、噶布喇(嘎布拉)佐领；由正黄旗拔来的噶布喇(嘎布喇)佐领、霍尔敦(和尔敦)佐领；由正白旗拔来的夸代佐领、布鲁佐领。其中蒙古旗分佐领是从XX旗拔来的墨赫德(墨克得)佐领、恩克佐领；由镶黄旗拔来的额卜根(厄博根)佐领。其中汉军旗分佐领是从正白旗拔来的李廷霖佐领。佟文玉佐领。其中汉军旗分佐领是从正白旗满洲拔来的阿那代佐领。从正黄旗汉军拔来的姚质义(姚智义)佐

领；从正黄旗拔来的噶布腊管领(半佐领)。此例请参看《八旗通志·初集“满洲规则”“实录”旗分志》。

道光十八年(1838)有规定，如《宗人府则例‘卷六’仪例》道光十八年云

凡外旗佐领，王公内有道光十八年前全无佐领，并有独缺蒙古旗分者，型未添给。此后定额军功之爵所属佐领：亲王应有满洲八、蒙古四、汉军四……

总的佐领数，乾隆二十二年的情况一直到清末无大变更。

各旗中的官员，除各旗中的佐领以下官员基本上由各该族所属的人员担任外，参领以上的高级将领均可越旗，越族任用。即统率满洲旗分的参领，不限定用满洲人，用八旗蒙古人、八旗汉军人均可。同样统辖各旗中蒙古旗分的参领，统辖各旗中汉军旗分的参领，只是旗人都行。至于都统，副都统等大员更没有旗别族别的限制，只是旗人都行。例如道光年间的正蓝人灵桂，他一个人曾先后出任过正蓝旗蒙古都统、镶白旗蒙古都统、镶兰旗汉军都统，镶白旗满洲都统，正黄旗蒙古都统，正红旗满洲都统、正蓝旗汉军都统等职。

八旗都统，在顺治前是各旗领主的僚属，到顺治十六年(1695)才正式铸“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都统印各一颗”(共二十四颗都统印)发给各都统，到雍正年间(1723—1735)才正式设立都统衙门，开府治事。

入关前各旗中旗分的都统、副都统均由各旗领主推荐本旗人员充当之，直接向本旗领主负责。入关后逐渐改为由皇帝量才委用，直接向皇帝负责，不再秉承各该旗领主的意志办事。政府对都统的职守也作了明确的规定：“掌管八旗政令、宣布教养、厘诘戎兵，以赞旗务”(见《清史稿》卷117)实际上掌握了各旗分的军政大权。八旗领主的权利逐渐被削减，除上三旗外，各代皇帝都先后分封子弟到下五旗，以分原领主的权势，变成了各旗都是很多王、贝勒、贝子等贵族共有一旗的局面。雍正年间更把下五旗的“旗分佐领”(由正身旗

人编的佐领)全部拨入公中,由皇帝直接控制。只有各旗的包衣佐领仍归各旗王、贝勒等直辖。上三旗的包衣佐领由内务府管辖。

入关后,八旗户口有“正身旗人”及“户下旗人”的区别。正身旗人是国初平民以上身分者的后人,他们有独立的户籍,当兵的义务,读书的机会,做官的权利。他们是封建帝国的平民,不再是各旗领主的私属。户下人,又称旗下人、旗下家人,是皇帝、各旗领主、八旗官员们的家奴,庄园上的农奴。他们没有独立的户籍,依附于主人的户下。户下人有功,可以另立户口,称为“开户”,多由国家代为赎身,或由其主子“恩赐”开户的。雍正时,开户者仍须与原主人保持一定的从属关系,与正身旗人仍有不同。

正身旗人的户口称“正户”,正户的子弟成丁后,可分出报户口,称为“另户”。另户的子弟再成丁时,再分报为另户,原另户即成为正户。所以正户、另户都属正身旗人。开户者不能称另户。这种封建奴主关系阶级压迫的社会制度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才被彻底推翻。

第十一节 八旗兵的补充和编制变化

清代规定,凡八旗正身男丁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但并非一律当兵,因时因势规定抽丁服役的比例,入关前基本上是三丁抽一,康熙时五丁抽一,乾隆时八丁抽一。其后抽丁比例更加缩小。被抽上的丁,入伍当兵(或某级官员),没服役的丁,称为“闲散”。

国家对旗人丁壮三年编审一次，是为“比丁”。比丁时各户家长将本户丁壮数如实呈报。对每名丁壮都须写清其祖、其父的姓名年龄，任过何职，是否健在；本丁的名字，年龄，是老丁或新丁。如服现役者，须写清呈报时的职级、入伍年月等，是谓之“比丁册”。比丁册由各牛录的佐领、骁骑校、领催族长等逐一签名做保，然后上报给参领或当地驻军长官，再总呈报给各该旗，最后到京师都统衙门旗务处存案。尔后遇有出缺挑补、出兵、调防或袭职等情，均以比丁册为根据办理。

旗兵有缺即补，无缺时，新丁多了，也可增编新牛录。挑选新兵时，要考试马术和箭法。选中者才能入伍。入伍后，骑射均佳者可当马甲，次者充步甲。步甲优者可升马甲。步甲马甲中之优秀者可升领催，委前锋校、护军、前锋等。领催，委前锋校可升骁骑校、护军校、这就进入了军官行列。承平无事时，也不扩编军队，由兵升官是很不容易的，八旗兵的升迁皆重才能，有才者虽出身奴隶亦可升官，亦可升至高级官员。

八旗兵制在定鼎燕京后，有了显著的变化，渐变为驻防京师的“八旗劲旅”和驻防京师以外各地的“八旗驻防”两大类型。（主参看《圣武记·兵制兵饷》）

八旗劲旅的编制可分为六种：（一）八旗骁骑营；（二）八旗前锋营、八旗健锐营；（三）八旗亲军营（内务府三旗前锋、护军、骁骑三营）；（四）八旗护军营、圆明园护军；（五）八旗火器营、八旗虎枪营；（六）八旗步兵营、五城巡捕营。兹分述如下：

（一）八旗骁骑营，起于天聪间的“阿里哈超哈营”，到顺治初详为定制。八旗中满蒙汉军每旗分各设一营。满蒙旗分每佐领各出兵二十名组成汉军旗分每佐领各出兵四十二名组成。按乾隆二十二年各旗所有各种旗分佐领数计：

镶黄旗：满 85 佐领×20 名兵=1,700 兵；蒙 28 佐领×20 名兵=560 兵；汉军 40 佐领×42 名兵=1,680 兵。

正黄旗：满 $92 \times 20 = 1,840$ 名兵；蒙 $24 \times 20 = 480$ 名兵；汉军 $40 \times 42 = 1,680$ 名兵。

正白旗：满 $86 \times 20 = 1,720$ 名兵；蒙 $29 \times 20 = 580$ 名兵；汉军 $40 \times 42 = 1,680$ 名兵。

正红旗：满 $74 \times 20 = 1,480$ 名兵；蒙 $22 \times 20 = 440$ 名兵；汉军 $28 \times 42 = 1,176$ 名兵。

镶白旗：满 $84 \times 20 = 1,680$ 名兵；蒙 $31 \times 20 = 620$ 名兵；汉军 $30 \times 42 = 1,260$ 名兵。

镶红旗：满 $86 \times 20 = 1,720$ 名兵；蒙 $32 \times 20 = 640$ 名兵；汉军 $29 \times 42 = 1,218$ 名兵。

正蓝旗：满 $84 \times 20 = 1,680$ 名兵；蒙 $30 \times 20 = 600$ 名兵，汉军 $30 \times 42 = 1,260$ 名兵。

镶蓝旗：满 $86 \times 20 = 1,720$ 名兵；蒙 $25 \times 20 = 500$ 名兵；汉军 $29 \times 42 = 1,218$ 名兵。

合计满洲兵 14,540 名，蒙古兵 4,420 名，汉军兵 11,172 名，总计 29,132 名兵。

汉军骁骑营内有特种兵炮甲每旗 40 名，共 320 名；藤牌兵每旗 100 名，共 800 名；舁鹿角兵每佐领下八名，共 2,128 名，合计 3,248 名，余 7,924 名为普通马甲。此 3,248 名特种兵为满蒙骁骑营中所无者。

入关后的八旗兵，唯“八旗骁骑营”仍归各旗都统直辖，分驻京城

内，战时需要则外调出征。平时驻扎京师的分布，根据《八旗通志·旗分志·八旗驻防》条载：

镶黄旗居安定门内，西至鼓楼大街，南至东直门大街，东至北城根。

正黄旗居德胜门内，东至鼓楼大街，南至西直门大街，北至城根。两黄旗并在北方。

正白旗居东直门内，北至东直门大街，南至朝阳门大街，西至皇城根，东至城根。

镶白旗居朝阳门内，北接正白旗，南至单牌楼，西至皇城根，东至城根。两白旗并在东方。

正红旗居西直门内，北至西直门大街，南至阜成门大街，东至皇城根，西至城根。

镶红旗居阜成门内，北接正红旗，南至单牌楼，东至皇城根，西至城根，两红旗并在西方。

正蓝旗居崇文门内，北至单牌楼，西至东长安门，东南至城根。

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北至单牌楼，东至西长安门，西南至城根。两蓝旗并在南方。

四色旗居地的分布，都是按“五行”的生克关系配备的，骁骑营是八旗劲旅的主力，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

(二)八旗前锋营，备折冲(防敌)之用，起于天聪间所设的，“噶布什贤超哈营”。顺治初详定军制，由八旗满蒙旗分中，每佐领各出丁二名组成。依乾隆二十二年八旗劲旅的佐领数计；满洲旗分佐领 $678 \times 2 = 1,356$ 名兵，蒙古旗分佐领 $221 \times 2 = 442$ 名兵。合计前锋营应有兵丁1,799名，分左右两翼，设统领、参领等官统率之。

八旗健锐营，亦前锋营之一种，是乾隆十三年(1748)组成的。斯时因用破两金川敌石碉之需要，仿前锋营兵源由满蒙旗分中选拔精锐士卒二千名，施以

攻破石碣的特技训练，后随大学士傅恒大军赴两金川参战，后又于乾隆三十七、四十一年两次赴金川参战，所到之处都大显神威，战绩辉煌。回京后，因其有大功于社稷，特保留其建制，驻于北京香山，即原来训练特技故地。其驻营以香山为中心。依山势往东为左翼，驻镶黄、镶白、正白、正蓝四旗兵；依山势往南为右翼，驻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兵。

(三)八旗亲军营，司宿卫、兵额数与前锋营同。即内务府三营，由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出丁组成为；护军、前鋒、骁骑三营。初隶领侍卫内大臣，后隶于内务府总管。

(四)八旗护军营，主司扈警蹕，始于天聪间的“巴牙喇营”。初制，上三旗守禁门。雍正时始定为均司禁卫。兵源由各旗满蒙旗分每佐领各出兵 17 人组成。依乾隆二十二年八旗劲旅佐领数计：满洲旗分佐领 $678 \times 17 = 11,506$ 名兵，蒙古旗分佐领 $221 \times 17 = 3,757$ 名兵，合计护军营应有兵丁 15,283 名。

圆明园护军，置于雍正三年(1725)由护军营中拔出。每旗设护军统领一员率领之。

(五)八旗火器营，司远攻，康熙三十年(1691)置，又分为“鸟枪护军”与“炮甲”两种。“鸟枪护军”由京旗满蒙旗分中，每佐领出六人组成，依乾隆二十二年京旗佐领数计：满洲旗分佐领 $678 \times 6 = 4,068$ 名兵，蒙古旗分佐领 $221 \times 6 = 1,326$ 名兵，合计“鸟枪护军”共有兵丁 5,394 名。炮甲由京旗满蒙旗分每佐领各出兵一名组成。即满洲旗分 678 名，蒙古旗分 221 名，合计 899 名。“城内外、城上共贮炮 1,937 位，每年秋

季配一百位运芦沟桥燃放。白塔山设信炮五，有警则鸣放，九门信炮毕应”。又有八旗虎枪营，康熙二十三年(1684)置，兵额六百名，为皇帝行围进哨之用，皆以领侍卫内大臣兼任总统。

(六)八旗步兵营，康熙十三年(1656)置，由京旗满蒙旗分中，每佐领出步兵领催二名，步兵十八名；由汉军旗分中，每佐领出步兵领催一名，步兵十二名组成之。依乾隆二十二年京旗佐领数计：满洲领催 $678 \times 2 = 1,356$ 名，步兵 $678 \times 18 = 12,184$ 名，蒙古领催 $221 \times 2 = 442$ 名，步兵 $221 \times 18 = 3,978$ 名，汉军领催 266 名，步兵 $266 \times 12 = 3,192$ 名。合计领催 2,064 名，兵 19,354 名，总计士兵 21,418 名。其任务是驻守京师九门，设步兵统领管辖之。雍正元年(1723)又设“五城巡捕营”步兵一万名，由绿营兵中挑选组成，亦归八旗步兵统领管辖。此官对八旗步兵称“统领”，对五城巡捕营称“提督”。其全衔是“提督九门巡捕五营步军统领”，或“八旗步兵统领、兼提督九门事务”，简称“九门提督”。其机关称“步军统领衙门”。其职守是：稽查门禁、缉捕、断狱、编查保甲等事宜，即：“统辖京营、总司缉捕”。凡统治国人的各种禁令，如官民住房，服用，乘车不许违背定制 越，不许编刊警句、小说，不许夜间行走等，该衙门都有权干涉。

京师还有“养育兵”，在清室统一全国后，八旗兵额有定数，而八旗人口不断增加，故顺治十七年(1660)即从八旗满、蒙、汉军各旗分中，挑选余丁之优者四千八百人训练之，称“养育兵”。到乾隆时养育兵增至二万多名。

总计京师八旗劲旅兵额为 85,724 名，(养育兵不在内)。

八旗驻防：据《钦定八旗通志》卷二十五《兵志》所载，全国各地驻防八旗兵九十处，总计兵额 123,893 名。计盛京驻防 25 处，兵额 18,652 名，吉林驻防 10 处，兵额 9,960 名。黑龙江驻防 6 处，兵额 11,047 名。直隶驻防 18 处，兵额 16,956 名。直省(各省)驻防 20 处，兵额 47,

126名。新疆驻防11处，兵额20,098名。合计如上数。

八旗驻防自乾隆年间以后，改为携眷长期定居。再据《圣武记·兵制兵饷》条所载，加上守陵兵1,419名，守围场兵850名，总计全国驻防兵126,108名。兹将《钦定八旗通志》卷三十五“兵志”所示“八旗驻防详细分布情况”分别列表如下：

八旗驻防的分布（根据《钦定八旗通志》卷三十五《兵志》）

其一、盛京省驻防

驻地	兵数	兵的族属	驻军长官 衔	今地名
盛京	6,831	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巴尔虎旗，汉军旗	将军	沈阳市
北京	473	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	城守尉	新宾满族自治县
抚顺	130	属于满蒙牛录的锡伯兵，汉军旗	防守尉	抚顺市
凤凰城	635	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巴尔虎旗，八旗汉军	城守尉	凤城县
辽阳	449	八旗满洲，八旗蒙古	城守尉	辽阳市
开原	855	八旗满洲，（伊彻满洲），巴尔虎旗	城守尉	开源县老城
铁岭	200	八旗汉军	防守尉	铁岭市
牛庄	377	八旗满洲，八旗汉军	防守尉	海城县牛庄镇

广宁	400	八旗满洲（老满洲，新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	防守尉	北镇县城
巨流河	200	满旗，汉旗	佐领	新民县城东北巨流河
白旗堡	200	满旗，汉旗	佐领	新民县城西南大红旗
小黑山	200	满旗，汉旗	佐领	黑山县
闾阳驿	200	满旗，汉旗	佐领	北镇县城南西闾阳镇
熊岳	950	满旗，蒙旗，巴尔虎旗	副都统	盖县城南西 24 公里
复州	599	满旗，蒙旗，巴尔虎旗	城守尉	瓦房店市复州镇
金州	830	满旗，蒙旗，巴尔虎旗，汉军旗	城守尉	大连市金州区治所
岫岩	547	满旗，蒙旗，巴尔虎旗	城守尉	岫岩县
旅顺水师营	560	汉军旗	协领	大连市旅顺口水师营
盖州	385	满旗，蒙旗，汉军旗	城守尉	盖县
锦州	960	满旗（老满洲，新满洲）	副都统	锦州市兴城县
宁远	200	汉军旗，满旗锡伯兵	佐领	锦州市
中前所	200	同上	佐领	绥中县西南前所镇
中后所	200	同上	佐领	绥中县城
小凌河	200	同上	佐领	
义州	1, 180	满旗，蒙旗，汉军旗	城守尉	义县

加上法库等十六处边门 660 人，合计 18, 625 名兵丁。

其二 吉林省驻防

驻地	兵数	兵的族属	驻军长官 衔	今地名
----	----	------	-----------	-----

大连文史资料-八旗源流

吉林	3 , 678	满旗（满，锡伯兵），巴尔虎旗，汉军旗	将军	吉林市
宁古塔	1 , 400	满旗	副都统	宁安县
珲春	450	满旗	协领	珲春县
伯都纳	1 , 000	满旗（挂勒察，满州兵），蒙旗	副都统	扶余县城北伯都纳村
三姓	1 , 520	满州兵	协领	依兰县
阿勒楚喀	406	同上	副都统	阿城县
拉林	406	同上	协领	阿城县南拉林
伊通	200	同上	佐领	伊通县
额木赫索罗	120	同上	佐领	敦化市城北额穆乡
打牲乌拉	700	同上	总管	吉林市北乌拉街

以上加伊通、巴廷俄佛罗等四处边门满旗兵 80 名，合计 9960 名兵。

其三 黑龙江省驻防

驻地	兵数	兵的族属	驻军长官衔	今地名
齐齐哈尔	3 , 107	满洲，索伦，达斡尔，巴尔虎，汉军旗	将军	齐齐哈尔市
黑龙江城	1 , 540	满洲，索伦，达斡尔，汉军旗	副都统	爱珲县
墨尔根	1 , 900	索伦，达斡尔，巴尔虎，汉军旗	副都统	嫩江县

呼兰河	500	索伦，达斡尔，汉军旗，卦勒察	城守尉	呼兰县
呼伦贝尔	200	索伦，巴尔虎，额鲁特蒙古	副都统 銜总管	海拉尔市
打牲处	2， 000	索伦，达斡尔，鄂伦春	总管	

合计 11，047 名兵

其四 直隶驻防

驻地	兵数	兵的族属	驻军长官衔	今地名
保定府	511	满旗	蒙旗	城守尉
沧州	511	同上	同上	沧州市
山海关	860	同上	副都统	山海关
永平府	100	同上	防守尉	卢龙县
玉田县	100	同上	同上	玉田县
三河县	100	同上	同上	三河县
喜峰县	200	同上	同上	喜峰口（迁西县北）
罗文峪	100	同上	同上	
冷口	150	同上	同上	冷口（迁安东北）
密云	2，000	同上	副都统	密云县
古北口	200	同上	防守尉	古北口
热河	1，440	同上	副都统	承德市
喀拉河屯	400	同上	协领	
围场	800	满旗，蒙旗	总管	围场县
化育沟	200	蒙旗	协领	

大连文史资料—八旗源流

察哈尔	7, 700	察哈尔蒙古兵（察哈尔八旗）	都统	集宁市
张家口	1, 000	满旗，蒙旗	协领	张家口市
独石口	134	满旗，蒙旗	防守尉	独石口
辖千家店				

加良乡宝坻等九处满州，蒙古兵合计 16, 956 名

其五 直省驻防

驻地	兵数	兵的族属	驻军长官衔	今地名
青州	1, 860	满旗，蒙旗	副都统	益都县
绥远城	2, 700	同上	将军	呼和浩特市东北部
右卫	380	同上	城守尉	
归化城	5, 000	蒙古土默特左右两翼两旗	副都统	呼和浩特市西南部
太原	860	满旗，蒙旗	城守尉	太原市
开封	540	同上	城守尉	开封市
江宁	4, 246	满旗	将军	南京市
京口	1, 534	蒙旗	副都统	镇江市
杭州	2, 050	满旗，蒙旗	将军	杭州市
乍浦	1, 700	同上	将军	平湖县乍浦
福州	2, 000	满旗	将军	福州
水师营	600	汉军旗	（归上）	
广州	3, 424	满旗，汉军旗	将军	广州市
水师	600	（归上）		
荆州	5, 180	满旗，蒙旗	将军	江陵县

成都	2, 424	同上	将军	成都市
西安	6, 240	同上	将军	西安市
宁夏	3, 400	同上	将军	银川市
凉州	1, 540	同上	副都统	武威县
庄浪	816	同上	城守尉	庄浪县

合计 47, 126

其六 新疆驻防

驻地	兵数	兵的族属	驻军长官 衔	今地名
伊犁	12, 021	满, 锡伯, 索伦, 达斡尔, 察哈尔, 厄鲁特	将军	惠远城
乌鲁木齐	3, 352	满旗	都统	乌鲁木齐市
塔尔巴哈台	1, 150	满, 索伦, 察哈尔, 厄鲁特	参赞大臣	塔城县
巴里坤	1, 060	同上	副都统 领队大臣	巴里坤哈 萨克自治 县
古城	1, 060	什厄特蒙古	领队大臣	奇台县
乌什	200	满旗马兵	参赞大臣	乌什县
叶尔羌	206	同上	办事大臣	莎车县
喀什噶尔	329	同上	办事大臣	疏勒县
英阿杂尔	60	同上	领队大臣	
吐鲁番	560	同上	办事大臣	吐鲁番县
哈密	100	满旗	同上	哈密市

合计 20, 098

驻防各地的八旗兵，基本上是从京师以牛录为单位调到各地的，唯内蒙古及东三省有的是就地编旗驻守原地的。驻防屯兵虽其旗籍属于某旗某旗，但已不归各该旗都统的指挥，而由其驻防地的军事长官直辖。兵额的补充，亦由各该驻防地旗人的闲散余丁中挑选之。各地驻防的军事长官有将军、都统、独立的副都统、城守尉；总管、协领、防守尉，防御、佐领等不同的官职。将军、都统衙门中常设有副都统为副手。而副都统（二品）、城守尉（三品）、协领（二、三品）、总管（二、三品）也都可为各地独立的军政长官，直接向皇帝负责。防守尉以下各级驻防长官，可分属于某将军、某都统、副都统等。

在新疆驻防各地的军政长官除将军、都统、副都统外，还有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官职。回疆（天山以南）的渚大臣总归“总理回疆参赞大臣”节制。总理回疆参赞大臣始设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驻牙喀什噶尔。乾隆三十年（1765）因“鸣什事变”乃移驻乌什，乾隆五十一年（1786）复移牙回喀什噶尔。总理回疆参赞大臣既直接向皇帝负责，也受伊犁将军节制。准部（天山以北）各大臣均归伊犁将军节制。伊犁将军设于乾隆廿六年（1761）。

东三省、新疆驻防的“旗兵”种族复杂，可详阅《八旗驻防的分布表》中的“兵的族属”栏。驻防旗兵以满蒙合驻者最多。其次是满洲旗分独驻一地。再次是满、汉军合驻一地。蒙古、汉军合驻一地者很少。满蒙汉军与锡伯、巴尔虎、索伦、达呼尔、鄂伦春、土默特蒙古兵、厄鲁特蒙古兵、察哈尔蒙古兵合驻昔亦有之。有的并非“八旗兵”，而是外藩兵。故以上所谓“八旗驻防的分布表”的统计，只是相对的情况而矣。

八旗驻防各地的将军、都统、独立的副都统衙门，都设有左右两司，各以协领一员、笔帖式数员负责办事，分别职掌办理官员的升迁调补，旗兵编制训练及官兵给养、户口、马乾武器、旌表、抚恤等诸事务。各地八旗驻防人数较多者，则设有“旗民理事同知”、“专管硝磺、铅弹、八旗官兵米石，及旗、民交涉事件”。是旗政方面的专官，形同州县。

第十二节 八旗官兵粮饷的变化

八旗官兵的粮饷，入关前是靠旗地经济维持的。即以丁壮为基础的土地分给制。平时生活赡养家口，出征时的一切所需，均出自所分土地的生产中。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政府也实行某些补助，但那不是制度。战争时的掠夺所得，也是彼时经济来源之一。随着入关的同时，也开始产生了“俸饷制”。俸饷制的初期，仍是与原有的“旗地制度”并存的。即官有俸银、俸米，兵有饷银、饷米。同时各旗户还都有旗地。后来随着旗地制的逐渐消亡，又产生了“口粮制”。

入关后的旗地，都是“圈地政策”得来的。大规模的圈地行动有三次：第一次是顺治元年十二月（1645年元月），第二次是顺治二年十月（1646年11月），第三次是顺治四年正月（1647年2月），零星的圈地行动时有所闻。圈地的范围，开始限于京师附近三百里内，继而扩展到五百里内，最后扩展到直隶全省。除广平府（治广平、今县）、大名府（治大名，今县）外，其余保定（治清苑、今保定市）、承德（今承德市）、永平（治卢龙，今县）、宣化（治宣化，今县）、天津（治天津，今市）、正定（治正定，今县）、河间（治河间，今县）、顺德（治邢台，今市）、顺天（治京师）等九府属县，及化（今遵化县）、定（今县）、深（今县）、冀（今县）、赵（今县）等五州都有被圈占的土地。

开始圈占限于“无主荒田”，后来不论有主无主，看好了就圈占。随着八旗的需要，圈地更及于山东省的济南府（治历城，今济南市）、德州（今市）、临清州（今市）；江苏省的徐州府（治铜山，今徐州市）；山西省的太原府（治阳

曲，今太原市)、潞州府(治长治、今市)、平阳府(治临汾，今县)、蒲州(今永济县地)等处。圈占有主地虽有些补济措施，然多未落实。直到康熙八年(1669)重申圈地禁令，延续二十年之久的“圈地”行动才彻底结束。

分给官员的土地称“官员庄田”，都是由官员们拥有的奴隶(多是战争中虏去的汉人)、农奴(被圈占土地的原有农户无奈服从)为他们耕种，所以官员们都是丰衣足食的。

分给兵士的土地称“份地”，也称旗地。旗地一般计丁授田，每丁三十亩。属于士兵级的也有贫富的差别，如马甲、护军、前锋、领催等家中都或多或少拥有奴隶。分来的土地由闲散率领奴隶们合力耕种，自可丰衣足食。而绝大部分兵丁则自能由家中闲散耕耘。每因长期从征，或遇旱涝天灾，生活就发生困难，口粮不能自给。因之，自顺治十一年(1654)开始，准许家有四丁以下的出征旗兵，可将旗地交回本旗，由国家“量加钱粮月米”。从此“旗地经济”逐渐消亡。

从顺治元年(1644)至顺治十七年(1660)的过程中，俸饷制发展到基本成熟。俸饷制支給官员的称“官员俸禄”，简称“俸禄”；支給兵士的称“兵饷”，俸饷支給又分为银钱与粮米两种，米又分为“俸饷粮”、“口粮”两种。各级俸饷的数额各时期常有变化。然大清二百六十七年间，币值稳定，变化不大。

顺治十年(1653)兵饷额一律每月银二两；前锋、护军、领催每人每月银三两。兵饷米，康熙廿四年(1685)规定：前锋、护军、领催、马兵每岁发给饷米

四十六斛(每斛五斗，每斗合现在十二市斤)；步兵每岁支米二十二斛，分春秋二季支給。

官员的俸禄按《世祖实录》卷七十一，顺治十年春正月癸巳条说：

更定多罗贝勒以下品级官岁支俸禄

宗室贝勒银一千五百两、固山贝勒一千三百两……异姓一等公七百两、二等公六百八十五两……固山额真、尚书一百八十两，梅勒章京、侍郎一百五十两；甲喇章京、理事官、一等待卫一百三十两；牛录章京、副理事官、二等待卫一百零五两；托沙喇哈番品级官、三等待卫八十两；护军校、骁骑校、他赤哈哈番六十两、七品等官四十五两；八品等官四十两。其禄米照俸银一两支給一斛。

又规定官的职品有出入的，职高品低，照职支給；品高职低，照品支給。口粮的支给与否，是与旗地对立的。有旗地就不给口粮，没有旗地的就支給口粮。口粮的支给不按各户的实际人口数，而按在位者的职级定支給的人口数。顺治十一年规定的口粮支給人数是：

固山额真(都统)六十口；

梅勒章京(副都统)四十口；

甲喇章京(参领)三十五口；

牛录章京(佐领)和闲散等官三十口；

兵丁匠役等十口。

每口每月支給口粮二斗五升(今三十市斤)。凡支給口粮的，即不再支給俸米、饷米。口粮的支给，各地有所差异，如《八旗通志》卷二十九、兵制四、八旗兵饷“驻防兵饷”中记有福州驻防旗兵俸饷口粮的例子：驻福州将军俸银一年一百八十两，红心纸张银一年二百两，家口米四十口，马二十匹，春秋大料每匹日支谷六升、草二束；夏冬小料每匹日支谷四升，草一束。副都统俸银一年一百五十五两，家口米三十五口。协领俸银一年一百三十两，家口米三十口。佐领俸银一年一百零五两，家口米二十五口。领催饷银一年三十六两，家

口米十口。马兵饷银一年二十四两，家口米十口。口粮每人每月仍为二斗五升。

多罗贝勒以上官员的俸禄，据《世祖实录》卷二十二、顺治三年正月丁丑条中说：“定给俸制，摄政王银二万两，和硕亲王银一万两，多罗英郡王银一万两，多罗郡王银五千两……”。

《光绪会典事例》卷二百四十九，俸饷文武官员俸禄的定例中说：“正从一品俸银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正从二品俸银一百五十五两，米一百五十五斛……”。这与顺治十年春正月癸巳条中的规定：“固山额真、尚书岁俸银一百八十两、禄米照俸银一两支给一斛”的数额完全相同。（固山额真、尚书均一品官）。

八旗兵出征时还另加补贴，《康熙会典》卷三十七“凡出征官兵支给”中说：“顺治十年议准，出征亲王月给银二百两，郡王一百两，贝勒五十两，贝子四十两，公二十五两，伯候、都统二十两…五品官护军校、骁骑校、委署官、六七品笔帖式三两。其所辖职大品小者照职支级，若品大职小者，照品支给，永著为例。”又说：“顺治十二年议准，出征月支行粮，亲王八斛，郡王六斛，贝勒四斛，贝子三斛，公二斛，候、伯、都统一斛二斗……佐领、前锋侍卫、托沙喇哈番、品外郎、主事、委署官、笔帖式三斗，护军校、骁骑校、护军拔什库、披甲人后每二人支出一斛。”又同书，“兵饷”，凡出征官员支给中说：“顺治十八年题准，统兵大臣月给银六十两、米二斛。参赞大臣银二十五两，米一斛三斗。都统银二十两、米一斛二斗。副都统、统领银十四两、米一斛。署副都统、统领、一等待卫银十两、米一斛。参领、学士、二等待卫银七两、米四斗。佐领、散官、侍读学士、三等待卫、前锋侍卫银五两、米四斗。

委署闲散官、主事、中书银四两、米三斗。护军校、骁骑校、六七品笔帖式银三两、米三斗。止照出征职掌，不照官品支給”。这对以前出征补贴银米数额有所修改，但出入不大。

据《圣武记·兵制兵饷》中记：“八旗兵饷之制，前锋、亲军、护军、领催、弓匠长月给银四两，骁骑、铜匠、弓匠月给银三两，皆岁支米四十八斛。步军领催月给银二两，步军一两五钱，皆岁支米二十四斛。炮手月给银二两、岁支米三十六斛。由觉罗补前锋、亲军、护军者，月加银一两。教养兵月给银如步兵数，不给米。绿营之饷制，京师巡捕三营马兵月给银二两，步兵一两，皆月米五斗（给岁米二十四斛）”。

这里看出旗兵较绿营(民兵)的银粮待遇高出很多。但除官员外，旗兵及其家属的生活是很贫困的。只靠入伍当差者的饷银及口粮生活，此外不准旗人经商习艺，作其他生产活动。旗人人身固着于本牛录许可活动的范围内，形同软禁。

以上所说的都是京旗和关内驻防旗兵的情况。关外~东北地区的旗人经济情况与上不同。当明清换鼎之际，东北地区原住的汉人，除降清入旗者外，其余基本上都逃亡入关。如天命四年(1619)“萨尔浒战役”后，原居于明辽东都司境内的汉人，走死逃亡，十不存一。有的逃入山海关内，有的从旅顺跨海逃回山东，有的逃往朝鲜。辽东土地基本上荒凉无人，常常行百里不见人烟。所以原在关外的旗人也好，后来“随龙出关”重回东北的旗人也好，他们都在驻防地区“跑马占荒”，各家各户都拥有大片的沃土良田。每丁不受三十亩旗地限制，比入关前旗人在故地上的土地更辽阔，取之不尽，占之不完。有的自家人丁与奴隶合力耕种，而绝大多数都是招收关内“逃荒”(跑关东)的民人(汉人)耕种。所以关外旗人多数都成了“庄园地主”，生活是比较富裕的。他们不靠口粮生活，当差的照领俸饷银米。经营的范围也不限农业，凡牧畜、渔猎、养殖、采集和农副产品的交易均可。

逃荒出关到东北地区的民人，基本上都投靠于占有土地的旗人户下，充当旗人的佃户、农奴、世仆，民国建元后，这些人也多报了旗人一满族。

第四章 八旗的民族

第十三节 “满洲”族名的由来

“满洲”一词接替女真族名使用，始于清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太宗皇太极说：“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只称我满洲原名，不得毋前妄称”。（见《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五及《满文旧档》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

太宗所说的“满洲”这个词是原来女真语“Manju”一词的音译，使用“满洲”这两个字是有深刻意义的，同次年的改国号为“清”的意义同出一辙。因满洲人非常重视“五行生克”学说。当时汉族的明帝国有三重“火”的意识在内；汉族之称，来自汉朝，汉以火德王，用赤帜，称炎汉。“炎”字分明是双火组成的；“明”字是日月二字组成的，日有火意，而帝室姓朱，朱赤色，亦有火意，故朱明之合亦一火也。故用满洲族名之双水以灭“炎汉”，用清之一水以灭明火。因五行生克，“水能克火”也。

这样从“满、洲、清”三个汉字的结构上去解释“满洲”族名，只是说明问题的表面。而根本问题是“Manju”这个女真词之所在，才是满洲族

名的真正来源。对“满洲”一词的解说截至目前止(1989. 2. 10), 史学界已有十五种说法, 兹分别列举如下:

(一)“我国肇基于东, 故西藏每岁献丹书, 皆称“曼殊师利大皇帝”, 至今汉字写作满洲音者, 盖因洲字义近地名, 假借用之, 遂相沿成俗。”

(二)“史又称金之先出靺鞨(羯)部, 古肃慎地。我朝肇兴, 称旧所属珠申, 后被称满珠, 而汉字相沿, 讹为满洲, 其实即古肃慎为诸申之音转。”(以上二说均见《满洲源流考》乃乾隆皇帝之语。)

(三)认为满洲二字从建州二字转变而来。(见傅斯年著《东北史纲》)

(四)认为是隋唐之瞞咄, 明时之满住同为国君之尊称。(见孟森著《元明清通记·满洲名义考》)

(五)主张满洲二字, 前一字取满住之“满”, 后一字取建州之“州”, 又加三点水而成。(见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

(六)谓“满洲”二字乃“蛮主”二字之音转。(见《满洲字义考》一文, 载《东北丛刊》第一期)

(七)谓满洲一词为清亮之意。

(八)谓满洲一词为勇猛之意。

(九)谓地产珠, 名满珠, 训作满洲。

(十)谓因夷酋得救于猪, 而命名。

(十一)谓满洲为满仲之重出。

(十二)谓由勿吉之音转。

(十三)谓满洲乃满节之音转。

(十四)谓出自建州女真之尊号“满住”。

以上(七)至(十四)均见冯家升的《满洲名称之种种推测》一文, 原载《东方杂志》第三十卷, 第十七号。他还提出与(一)(二)(四)相同的三种说法, 合计他搜罗了十一种说法。

(十五)主张“满洲”一词是由地名变为部落名, 又被皇太极推而广

之。”（见孙文良的《满族发展史上的几个问题》一文，载《满族研究》1986. 2. 29页）

以上十五种说法的前十四种，包括乾隆皇帝自己的说法在内，都有牵强附会处。唯有第（十五）种说法，言之有据，他是从朝鲜人申忠一写的《建州纪程图纪》中研究出来的。在《图纪》中用“蔓遮”一词称呼山川部落等名，先后出现九次之多，其地域皆在努尔哈赤及其父、祖们活动的范围内。后来这些“蔓遮”地方都被努尔哈赤首先统一的，所以孙文良先生“初步认定满洲与蔓遮可能就是一个名称。二者在朝鲜人的发音大约是相同的”。因此他本人的结论是：“满洲由地名而变为部落名，又被皇太极推而广之，定为十七世纪初年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专用名称……”

其实，“满洲(Manju)”一词，在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太宗下令用“满洲”接替“诸申(女真、肃慎)”一词之前，就早已记入了中国史册。我翻阅了不太多的有关书刊，就发现十处之多，兹分列于下：

（一）《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记载叶赫曰：“乌拉、哈达、叶赫、辉发、满洲语言相同，势同一国，岂有五王分立之理。”这与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太宗所说的范围完全一样。

（二）《清史稿》“杨吉努”列传也谈到，“扈伦诸部与满洲语言相同，宜合五为一”。

（三）《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记有，努尔哈赤起兵时(1583年)女真已分成十五部，其情况是：“时各部环满洲国扰乱者，有苏苏河部、浑河部、王家部、东果部、折陈部、长白山内阴部、鸭绿江部；东海兀吉部、斡哈部、虎儿哈部；胡笼国中兀喇部、哈达部、叶黑部、辉发部。各部烽

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攻杀。”

（四）《满洲实录》明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载“有苏完部长索尔果率本部军民来归……又栋鄂部长克辙孙何和里亦率本部军民来归……又雅尔古部长扈拉瑚杀兄弟族众率军民来归……太祖遂招徕环满洲而居者”。

（五）《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辛卯年(万历十九年、公元 1591 年)记有夜黑派人告努尔哈赤说：“兀喇、哈达、夜黑、辉发、满洲总一国也，岂有五王之理”。

（六）《八旗氏族通谱》卷七载有：“赫东额、镶黄旗人，世居马佳地方，国初同亲弟尼玛禅率满洲五十户来归”。

（七）《旧满洲档》万历四十一年(1613)九月载有“女真满洲国昆都仑汗”努尔哈赤的称号。

（八）《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 1619）八月，在努尔哈赤攻灭叶赫后，记有：“叶黑自此灭矣，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至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语言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

（九）《满洲老档秘录》上编天命八年(1623)七月《郡主自缢》中记有癸未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时，其“一祖所生六贝勒之子孙，亦欲杀朕，屡施毒手，竟未如愿。于是各处之满洲、汉人皆存杀朕之心，相继攻伐”。

（十）汉译《满文旧档》辽宁大学历史系印第 57 页载：“天聪九年(1635)五月初六，一来自黑龙江的降人穆克什克讲起了满洲起源的神话故事，也说布库里克雍顺是满洲部（国）的同族。”

以上这些记有“满洲”一词的史录，可说明以下问题：

（一）天聪九年(1635)九月十三日太宗谕旨中句句都与史实相符合的。他明言“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在上面十条史录中完全可以证实。即最迟在太祖努尔哈赤起兵时(1583)年，亦即太宗下谕时

(1635年)的52年前,就有了“满洲国”的称号。彼时国名、族名是分不清的。

(二)“满洲国”的地理位置:综合这十条史录研究,也很明显,这个“满洲国”就是努尔哈赤父、祖以来直属部落所在地,即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南苏子河畔,烟筒山东麓的费阿拉城(努尔哈赤起兵地)故址,及永陵镇东的老城—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的首次都城)城址附近一带地,原称“Manju”,苏子河上游一小支流本称满洲河。

这十条史录第(三)条的部落名与本文第四节相对照:苏苏河部,即苏克素护河部,王家,即王甲(完颜)部。东果部,即董鄂(栋鄂)部。折陈部,即哲陈部。内阴部,即讷(纳)殷部。东海兀吉部,即窝集(勿吉)部。斡哈部,即瓦尔哈部。虎儿哈部,即呼尔喀部。胡笼国,即扈伦四部,他们都姓那拉,有时四部统一。叶黑部,即夜黑,或叶赫部。较第四节少了个长白山的朱舍里部,尚未远及于黑龙江诸部。

(三)“满洲国”的地理范围随着努尔哈赤的王业发展而发展。如十条史录的(八)《太祖武皇帝实录》1619年所记,太祖攻灭叶赫后,“满洲国”的范围扩展到“自东海至辽边北至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间的广大地区。

(四)天聪九年时,后金国的领域已及于鸭绿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日本海以西,大明国以东的广大地域,较1619年时,又超过了五、六倍,统一了所有女真人的分布区。当然“满洲国”一词的使用地区也应随之而及于全域。当时“金国”号与“满洲国”国号,在人们意识中还是并存的。正如中国历朝都有国号如唐宋元明等,但也都称中国或“汉”(少数民族当国例外)一样。所以太宗下谕用“满洲”一词接替了“诸申”(女

真、肃慎)一词，是自太祖以来“满洲国”发展史的延续。这一点在历史上阿尔泰语系诸族，建立国家名称的由来大都如此。如鲜卑、蠕蠕、突厥。薛延陀、回纥、蒙古等莫不如此。都是由统治者所在原来小部落的名称，扩展为所建立的国家的名称。其实中原王朝的夏、商、周、秦、汉、晋、隋、唐等国号的由来，也都是这个规律。只大金国不用女真为国号，和忽必烈将民族名与国名分开，改蒙古国为“元”，是一大进步。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新国时，不再用“满洲”旧名而称“金”。然这种较高级的意识，在后人的思想里是有反复的。所以在1619年的史录里又出现“满洲国”的称呼，忽视了彼时的正式国号是“金”。

皇太极对国号与民族号的概念在天聪九年时，还是模糊不清的，所以下谕时还说：“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长，相传奕世，自今以后止称我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改的是国名呢？是民族名呢？到次年改国号为“大清”时，他的认识才算清楚了。其后“满洲”一词才专做族名用。但太宗对“满洲”一词由来已久是很清楚的。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满洲”一词，是努尔哈赤的父(塔克世)、祖(觉昌安)以来，其直属部落所在地的名称，也是其直属部落的名称，也是对内的“国名”。皇太极用“满洲”一词为已变化了的，以女真人为主体的，又融合了大批汉人、蒙古人及部分朝鲜人于其中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族名”。彼时女真族分化后的各部族名，基本上都是由所在的地名而来的，很少例外。

第十四节 八旗满洲的民族成分

“八旗满洲”编成时，总共是402个牛录，其中蒙古女真混合牛录308个，纯蒙古牛录78个、纯汉人牛录16个。后来又加入了朝鲜人和俄罗斯

人。总的说以蒙古族的成分为最多，其次是女真人的成分，再次是汉人成分，再次是朝鲜人的成分，最少的是俄罗斯人成分。

(一)蒙古人的成分：初编八旗时308个女真蒙古混合牛录，以女真、蒙各占一半算，应当是154个女真牛录、154个蒙古牛录。154加上78个纯蒙古牛录等于232个蒙古牛录，占总数402个牛录的半数以上。属于蒙古语支的达斡尔族，也是八旗满洲的成员之一。他们是太祖太宗两世先后经营黑龙江女真、东海女真时，收入八旗满洲的；清代的吉林将军长顺就是达斡尔族，他姓郭博罗氏，属八旗满洲正白旗。到乾隆二十二年顷，八旗满洲中还有单由蒙古族编成的牛录三十五个，和两个“半牛录：即镶黄旗满洲旗分中九个、正黄旗中八个半、正白旗中二个、正红旗中一个、镶白旗中四个、镶红旗中一个、正蓝旗中八个、镶蓝中二个半。他们是属于满洲旗分的，与“八旗蒙古”不同。

这些满洲旗分中的蒙古佐领，有的详记其来源，如镶白旗满洲都统下第五参领的第八佐领“系国初从察哈尔地方来归之人丁编立……”（见《八旗通志》卷七（旗分志七）。又如正黄旗满洲都统下第五参领的第八佐领“系康熙十八年将准噶尔玛索诺木额附之蒙古及公主随嫁满洲编为佐领……”（见《八旗通志》卷四（旗分志四）还都不是初编八旗时的蒙古之裔。

(二)汉人的成分：明末，原居辽东的汉人，在明清换鼎的连年战争中，除逃亡者外，其余都投归满洲，编入八旗。

八旗的人口由初编八旗时的402个牛录计，每牛录约300兵丁，合120,600名兵丁。当时三丁抽一，则全壮丁数为361,800名。每丁以有眷二口计则全人口是1,085,400人。在这百万人口中，编成佐领的汉人是16牛录，4,800名兵丁，14,400名丁壮，43,200人口。此外则是战争俘束为奴的汉

人，计算在满洲人口户下，不计其数。仅举一例，可见一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55页记有：“毁抚顺城，上率大军还，至抚顺城东之野，各营兵齐集出边，至甲板驻营，论将士功行赏，以俘获人三十万分之”。仅这一次战俘就有三十万加入“八旗满洲”人口中，等于全八旗人口的三分之一多。其他各次战争的俘虏呢？由此可见“八旗满洲”中汉人成分之大了。

八旗满洲中的女真人口有多少呢？初编八旗时的402个牛录中，一个纯女真牛录也没有，由308个女真蒙古混合牛录中，分出一半计算，是154个牛录，合46,200名兵，138,600名丁壮再乘以3，等于415,800人口。这四十一万五千八百人中，除俘入的汉人外，其奴隶贵族平民以上的“女真人”，也不全是女真血统。如董鄂部是八旗满洲中，女真人口的主要成员之一，但他们却是赵宋皇族的后裔，是女真化了的汉人部落。这段的证明，是清代满人昭禔的《啸亭杂录》卷十《宋人后裔》条记曰：

两汉以下，惟宋室最为悠久，虽屡遭变迁，其业犹存，即亡国后，其裔亦未遭酷毒者。按野史谓元顺帝为天水苗裔，事虽暗昧，未必无因也。近日“董鄂冶亭”制府考其宗谱，乃知其先乃英宗越王之裔，后为金人所迁，处居董鄂；以地为氏。数百年之后，尚有巍然兴者，何盛德之至也。

文中的“董鄂冶亭”印铁保、满洲正黄旗人，姓董鄂氏，为清代乾隆四大书法家（成刘翁铁）之一。这是说清代大书法家铁保，自己考证自己的家谱，确知自家一董鄂氏是宋英宗之后，非其他史家考证所得者之可比，当然是可靠的。

考宋徽钦二帝北狩时，宋宗室除康王外，举族三千多人皆同俘从亡，东北迁于松花江畔的五国头城，即今牡丹江入松花江口的伊兰县地。这批人的子子孙孙都同化于女真人中。而彼时女真人绝大多数都随金帝西南入于中原，居留东北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只是全女真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当时三千多人的汉人部落处在留居东北的女真人中，是个不小的数目，后来与女真人共同生

殖繁衍成为元明时女真的的一部分。他们女真化后，改原来的“赵”姓为“觉罗”（jiaolao）哈拉，就是今天许多“觉罗”氏满族之先民。今天诸觉罗哈拉，都基本上复原为“赵”姓，也有例外的是极少数在松花江一带的宋裔，一部分后随胡里改、斡朮怜两万户府南迁，辗转落脚于董鄂地方（今辽宁省桓仁县境内）是合乎历史变化情况的。今浑江西来的一大支流一大雅河，原名董鄂（冬古、东果）河。在建州女真分化为许多。小部落时，董鄂部落就住在今桓仁县。

今天居住在黑龙江省的同江、抚远、饶河一带的赫哲（黑斤、黑津）人，也是八旗满洲中女真成员之一。天聪六年（1632）赫哲部的乌扎拉族即归服后金，编入八旗。然赫哲族也是女真化了的宋帝后裔。此说明典籍证明如下：

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三记有：三姓中有民觉罗。国初之黑斤秀而黠者来投，因编为旗。其人以国家有民公之封，自以为宋后，因自名为“民觉罗”（伊尔根觉罗）。

同书同卷又记曰：

“黑斤”乃“徽钦”二字之音讹也。在三姓东三千里外散处，东至海边，以鱼为生，即以鱼皮为衣，故由“鱼皮管子”或谓“黑斤管子”，名异而实同也。……余内弟左子恕宜任伯都纳巡检，知之最详，为余言之。

按姚元之（1776～1852）安徽桐城人。此段记事是根据他内弟左恕宜讲的。左公是任过伯都纳（今吉林省扶余县城北）巡检的。伯都纳与黑斤人居住的地方都在第一松花江沿岸，一水相通，春秋夏用船舶，冬用爬犁（雪橇）交通便利，连络容易，况左公是地方官，调查研究都远较一般治史者为容易，所以他讲述

的资料是可靠的。况董鄂为宋裔之说出在乾隆承平之世如非史实，清廷岂有不过问之理。

由此看来，满汉两族先人的“交叉迁徙”～女真人向西南迁入中原，汉人向东北迁入松花江滨；又“交叉同化融合”～迁入中原的女真人同化于汉族，迁到松花江流域的汉人同化于女真族。到明末清初，女真、蒙、汉混成的“满洲人”再同华北迁来的“汉化女真人混成的汉人”再同化、再融合而形成清代的“八旗满洲”新的民族共同体。所以“八旗满洲”绝不等于任何一个古代民族。有人把“八旗满洲人”说成是单纯女真人的后裔，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旧《辞海》中对“觉罗”一词之解释：

[觉罗]清室宗族之称号。《清会典》“凡玉牒所载以显祖宣皇帝之本支子孙为宗室，以伯叔兄弟等旁支子孙为觉罗”按此为官觉罗；又有宋徽钦二帝北狩时所留之后裔，居于三姓（即今吉林省依兰县）等处，清初编入八旗者，亦有觉罗之号，是为民觉罗。

这段解释词与《竹叶亭杂记》卷三所记可互相印证。

（三）朝鲜族成分：八旗满洲中的朝鲜人成分，主要是天命四年（1619）收入的。是年三月，朝鲜兵助明军进攻后金，被努尔哈赤击败之于萨尔浒后，朝鲜助明军统帅姜宏烈率残部五千余人降于后金，均被编入于八旗满洲之中，后来他们的眷属也陆续迁来。天命九年（1624）十二月又有朝鲜叛臣韩明链的儿子韩涧、韩义兄弟来投于后金，亦被编于八旗之中。到乾隆二十年顷，八旗满洲中还有由朝鲜人单编的六个牛录：即正黄旗满洲旗分中有二个朝鲜牛录，正红旗满洲旗分中有四个朝鲜牛录。每牛录以300兵计，六个牛录则有兵1,800名，当时是八丁抽一，则应有丁壮14,400名，则全人口应为43,200人。其中正黄旗包衣第四参领的第二高丽佐领“系国初编立……”（见《八旗通志》卷四“旗分志四”）正红旗满洲都统第一参领的第十二佐领“系国初从朝鲜来归人丁编立……”（见《八旗通志》卷六“旗分志六”）

（四）俄罗斯族人成分：八旗满洲中的俄罗斯人，都是顺治五年到康熙二十二年先后归来的俄罗斯人编立的佐领。到乾隆二十二年顷，镶黄旗满洲都统第四参领的第十七佐领，即由俄罗斯人编成的。（见《八旗通志》卷五“旗分志五”）

这就是：民族血统似江流，汇集百川下归下游，百川各有源名在，江水谁知是哪流。

第十五节 旗人的民族称呼问题

旗人，不单是清代的“八旗满洲”，而是指八旗的全体成员。其中包括“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巴尔虎旗”、锡伯人、挂勒察人等。到清末，旗人已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在历史的长河中，某些旧民族形象、名称的消失，新民族形象、名称的产生，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的。如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大民族鲜卑、大月氏（曾在印度建立贵霜王朝）等不都早就消逝了吗！蒙古、满洲等不都是后来新产生的大民族吗！

八旗制度中的“满洲旗分”（其中包括锡伯兵、挂勒察兵不单编牛录）“蒙古旗分”、“汉军旗分”、“巴尔虎旗”（属于满旗，但单有牛录）都是八旗制度的整体。而满洲旗分的成员民族成分是很复杂的。“蒙古旗分”中同样也有满洲人、汉军人。“汉军旗分”中也不单纯是汉人。如鼎鼎大名的汉军旗固山厄真石廷柱，本文第七节中已交代过，他原是女真人，可他的后人却都编在汉军正白旗中。又如曾任昂邦章京的佟养性，也是女真人，他的后人都编在汉军正蓝旗中，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在清代，旗人与民人（没有旗籍的汉人）之间有着森严的壁垒。清廷规定：“旗、民不交产”、（旗人与民间不得互相买卖田宅）“旗、民不通婚”、（不是满汉不通婚）“旗、民不同刑”（审判机关不同，服刑的办法不同，旗、民之间在法律上不平等）。而实际上旗人与旗人之间，不分满、蒙、汉军，一切皆通。做为区分民族的重要条件之一的“血统”，在满旗、蒙旗、汉军旗间已混成一团，形同水乳。尤其满旗与汉军旗之间，满旗与蒙古旗之间婚姻关系最多。从清太祖、太宗时起，满汉上层之间的婚姻就已经开始。如本文第七节中交代的“明抚顺游击李永芳降金后，太祖即以孙女儿嫁之，招为“抚顺额驸”。太宗曾下令对于降清的汉官“凡一品官，以诸贝勒之女妻之，二品官，以国中大臣女妻之……复查各牛录中寡妇，给配各官”，成为制度。（见《清太宗实录》）。在下层，原居辽东的汉人（多是辽代、明代移来的）早已与女真人通婚。皇太极时五次入关掳获大批汉族的妇女，多配给满洲的兵丁为妻。大清定鼎中原之后，八旗满洲官员多娶八旗汉军的小姐，因其知书明礼，会侍奉丈夫。而八旗汉军的官员，则多愿娶八旗满洲的格格为夫人，藉以加深与满洲人的关系，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满蒙之间的婚姻关系开始得更早，原居东北地区的蒙古人与女真人早已互通婚嫁，所以弄得有些部落很难分清是蒙古？还是女真。例如扈伦四部的叶赫部，原本都是从松花江北一个支流的呼兰河（扈伦、胡笼皆呼兰之对音）流域迁到辽河流域的女真人。但因叶赫与蒙古关系最密切，所以就有的人认为她们是蒙古人。如《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就记载说：“夜黑始祖蒙古人，姓土默特”。蒙古科尔沁部与满洲通婚也最早，太祖努尔哈赤就娶科尔沁贝勒明安之女及翁阿岱之女为妃。天命末年太祖以聪古兔公主嫁给喀尔喀蒙古台吉占里布什，以族弟之女嫁给喀尔喀蒙古台吉莽果尔。太宗皇太极的孝端文皇后是科尔沁贵族莽古斯之女；孝端后早卒，太宗又纳莽古斯之孙乌克善之女为继室，即大名鼎鼎的孝庄文皇后。皇太极共有十六个女儿，有十二个是嫁给蒙古贝勒的。太宗的三位贵妃，也都是蒙古贝勒之女。天聪元年太宗又以皇姐哈迭公主

嫁给蒙古赦汉部长琐诺木杜棱。顺治帝的孝惠章皇后也是蒙古贝勒绰尔济之女。满蒙间的婚姻，也逐渐成为制度，并以法制形式固定下来。而满蒙间的婚姻并不限于旗人，八旗以外的蒙古亦可通婚。这较满汉通婚只限于八旗满洲与八旗汉军之间者，更为广泛。八旗汉军与八旗蒙古间的直接婚姻较少，但间接的血缘关系，还是千丝万缕的。所以在旗人与旗人之间的满、蒙、汉军间的界线，只是从男(父)系关系维系的，如从母系看，则八旗中满、蒙、汉军的界限已不复存在。

旗人的衣冠制度也是一致的，本文第七节中已有交代；天聪七年编成一旗汉军后，天聪十年于议定《令典》中，即有明文规定“凡汉人(指汉军旗)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式样……女人不许梳头、缠脚……”后来国人称缠足的小脚女人为“民装”，旗人不缠足的女人为“旗装”，有人把“男女一双鞋”(都是天足)看成是旗人不同于民人的显著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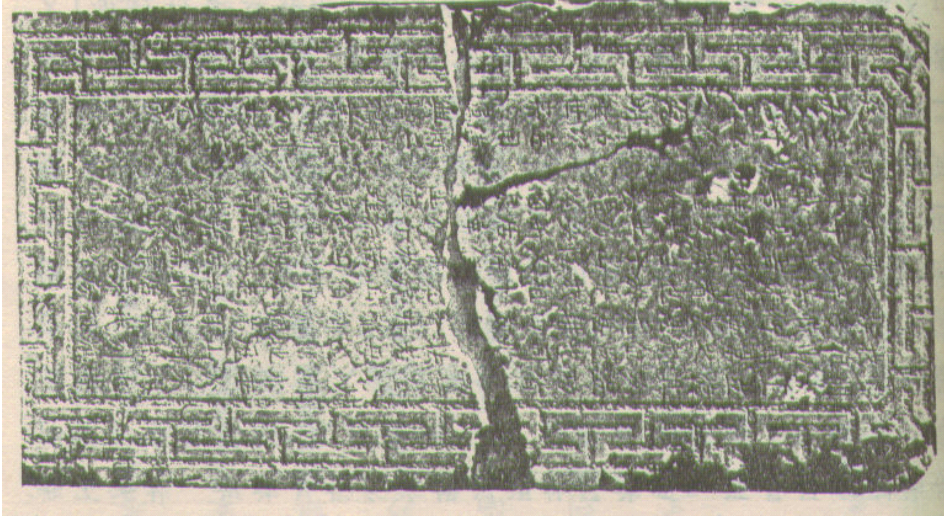
八旗人由于长期居住于共同地域，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的社会组织(牛录)，共同的经济来源，共同的兵役任务，各种文化间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从而形成了共同的语言文字(汉语文)共同的心理状态。为什么汉语文成了旗人的共同语文呢？一则由于汉语文的科学性远较蒙古文、满文为高，且使用范围广，古往今来积累了大量的图书典籍，可谓之“书山学海”取用无穷。二则无论驻京旗人，驻防各省各地的旗人，都处于汉族民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旗人的生活都得与民人打交道，而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所以旗人的共同语文，只有向汉语文方向发展。这种波澜壮阔的历史潮流，绝不是某些少数人的意志所能阻止的。所以最后八旗中的满蒙成员，尤其是满旗成员都放弃了自己

固有语文文字，而操汉语，用汉文。也正由于采用了汉语文，旗人的文化才得到了高度的发展。旗人高水平的文学、史学成就都是用汉文写出来的。

做为同一民族的应有条件：共同的语言文学，共同的居住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心理状态，共同的血缘(表现在历史和体貌上)和某些基本相似的风俗习惯，共同的宗教信仰如都信奉或不反对佛教，供奉关羽，都不同程度信萨满教等等，凡属旗人都具备了这些共同的条件，所以早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旗族”。清末在北京广泛流传着：“只分旗民，不分满汉”的说法。就是说彼时只有“旗人”与“民人”间有明显的区别，而旗人内部不再有满、蒙、汉军的明显界限。因此，“旗族”的称呼到清末，民国初年间，已经普遍。如民国初年就出版了《旗族》杂志，其第一期(1914. 4)发表了署名的文章《旗族解》：“八旗制度，又有满洲、蒙古、汉军之畛域乎……究其(八旗种族)实质，固非纯一血统；然往籍流传，俱可考里，有清一代之历史，其血统(指绝大多数而言)、语言、文字、宗教、住所、习惯、精神、体质，确已纯然同化矣。”因之该作者的结论是：“凡旗人不应再分满蒙汉军三旗，而应统称“旗族，”。(见李燕光《满族史中的几个问题》载《满族研究》创刊号 19 页)

又如民国三年(1914)成都地区的旗人上层人物为解决八旗人的生计问题，曾给当时民国政府写了份报告，中称“阖城旗族约一万四千余人，其中能自立者，不过十之一二，余皆家无恒产”。“成都旗族，不能自立者不下一万二千人”。(见关克笑《满族试论》载《满族研究》1988. 1)

笔者在实际调查采访中，还发现一座刻有“旗族”称呼的碑文，是大连市金州区七顶山满族乡，满族又姓满的一家的墓碑。碑文中记其先人“籍列旗族，受职行伍”。碑主人满家原是巴儿虎蒙古人加入八旗满洲的。彼家现住七顶山满族乡老虎山村。兹录其碑文如下：



尝闻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皆欲勒诸金石以期永垂于不朽也昔我祖由燕京之赴金邑也同胞兄扶老母远旧地历山河籍列旗族受职行伍蒙思无息耕田教子背井离乡荒烟满目此皆我祖之辛苦备尝者也于是我祖卜居老虎山伯祖奉老母卜居东房身先择吉地于台子山阴又择佳城于南山之阳安居乐业以终天年于是乃安是土乃宴新居幸得子孙绳绳百世荣昌瓜瓞绵绵千载吉祥谨修墓志以慰泉壤幽冥虽隔情理何殊我祖有灵尚其来飨

择字二十以备后辈名次选用谨将二十字开列如左

廷玉连治水德明继世荣 运兴增鸿业 文士复元成

金州七顶山满族乡老虎山村满家墓碑（民国十二年立）

事实上现在全国已报“满族”的九百多万人口中，是包括着清代的“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巴尔虎旗”等各种旗人的后裔在内的，绝不只是清代的“八旗满洲”人。在清代对“八旗成员”中统称他们为

“旗人”，但绝不能称其中的“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巴尔虎旗人”为“满族”。而只能称“八旗满洲”人为满族。到清末，“满洲”的名称渐被“旗人”的名称所掩盖。“旗人”也成了满族的代称，而又包括了所有的旗人在内。“旗人”一称，也冲淡了旗人内部满蒙汉军残存的民族界限。所以清末民国初年间，自发的产生了“旗族”的称呼，这是顺理成章，反映了真实历史面貌的事。我们在历史上所称的汉人、满人、蒙古人、西藏人，不就是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人吗？则“旗人”自然就是“旗族”了。可惜辛亥革命后，国民党人举起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旗帜。今天几乎尽人皆知我国不只是这五个民族。五族的说法显然有“挂一漏万”之失，且其所指的“汉、满、蒙、回、藏”五族的概念，除藏族外，其他回族都不清楚。汉族是指所有操汉语的民族吗？还是另有别的条件呢？满族是指“八旗满洲”人？还是指全部旗人？还是指操满语的人？汉军旗人算汉族？算满族呢？蒙族是指“盟旗蒙古”？是指“八旗蒙古”呢？回族是指今天的回族（用汉语文信伊斯兰教的人）呢？还是指所有信回教（依伊斯兰教、天方教）的人呢？维吾尔、壮族，这些大民族又属于五族中的哪一族呢？因受当时“民族知识”水平的限制，他们是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其“满族”一词，却一直影响到今天。就以大连地区的二十多万“满族”来谈，其中汉军旗人、蒙八旗人、巴尔虎人、随旗人（包括母系是旗人，旗人的农奴、世仆、佃户等之裔）等人口之和，占全满族人口的半数以上。如金州石河满族镇的一万多满族中，汉军旗王氏一姓的人口就有五千多。庄河县桂云花满族乡二道岭村的满族曹姓就是汉军旗，曹家一姓占全村人口半数以上。这些汉军旗人及当地民人（汉人）的意识中，认为“旗人就是满族”。桂云花人认为曹家是“老满洲”。所有因母系而报“满族”的，他们只说“随旗”，而不称“随满”。历史的客观现实如此。再详读本书第十七节和十八节的内容，则对“满族”一词的问题就会有更新的认识。今天的“满族”，实际

上已不同于清代的满族，正同清代的满洲已不同于明代的女真的情况一样。在清初对包括诸申、蒙古、汉人、朝鲜人的八旗人——新的民族共同体，如仍称“诸申”（女真），则原来的女真人、蒙古人、朝鲜人、汉人对此称呼的内心感受是不会相同的。改称“满洲”后，这原是编旗时所在的地名，在满洲中的各族人根本就消除了客主之分，大家都去掉原族名，而用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新名。同样对今天包含着“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巴尔虎旗人”、“朝鲜旗人”、“随旗的人们”在内的，旗人的民族共同体，他们是因“旗”而结合在一起的，单用其中一部分人的原名为代表，就显然存在着主客之分，人们对此称呼的感受是不同的，这会影晌旗人——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团结。这一点笔者在与现报满族的人们的调查采访中，是有深刻的感受的。

第十六节 现在旗人分布的情况

今天旗人的分布，同清代八旗驻防的情况有密切的关系，（参看本书第十节）。当然时过境迁，百余年来已有了显著的变化。兹列出 1982 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中，“满族”人口分布的情况如下；今天的满族，基本就是清代的旗人，有出入，但不会很大。

大连文史资料-八旗源流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的满族人口分布情况					
政区	满族人口	分布情况			
北京市	116, 776		浙江省	1, 220	杭州
天津市	16, 587		福建省	2, 090	福州
河北省	383, 233	全省都有， 北部密	江西省	1, 890	
山西省	8, 625	太原、大同	湖南省	2, 456	
山东省	11, 706	益都、青 岛、德州	四川省		成都
内蒙古自 治区	236, 390	全区	甘肃省	8, 499	武威、永 登
辽宁省	1, 989, 989	全省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7, 085	银川、石 山咀、银 南
吉林省	577, 276	全省	青海省	3, 048	西宁
黑龙江省	908, 910	全省	广东省	4, 427	广州
陕西省	8, 488	西安、宝鸡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河南省	23, 811	开 封 、 南 台、叶县、 内乡、栾川	云南省		
江苏省	2, 649	南京市	贵州省		
上海市	2, 164		西藏自 治区		
安徽省	1, 744	肥东	新疆维 吾尔自 治区	9, 137	伊宁、乌 鲁木齐、 奇台
湖北省		江陵、沙 市、武汉	全国合 计	4, 418, 191	

1953年全国人口统计中，满族人口是2,418,931；1982年的全国人口统计中，满族人口是4,418,101；到1988年全国的满族人口已达到七百多万。199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满族人口已达九百多万。

1982年的统计表多与客观现实不相符合，例如该表中的甘肃满族是8,499人，而1959年8月甘肃省的调数则只是1,330人，岂有一十三年中翻了七翻之理，而1983年辽宁省编辑的《满族社会史调查》中采用的是：1959年旧数，又未加说明其问题。又如1982年的统计表中四川省没有满族，而《满族社会调查史》转载的1959年10月写成的《四川省成都市满族社会史调查报告》中，明言“成都市共有满族1,536人，占全市总人口的0.13%”。笔者曾亲临其地接触过许多满族一旗人，而1982年统计表中竟无一人。又1982年的统计表中湖北省也无满族，而辽宁省《满族社会史调查》最后的《全国满族人口分布略图》中明白标注江陵、沙市、武汉有满族人口分布，这三个城市笔者都亲历其地，确知那里有不少旗人，可证《满族社会史调查》是正确的。

1982年统计表中，贵州省也无满族，而《满族社会史调，全国满族人口分布略图》中也明白标注贵阳、黔西、金沙都有满族分布。

实际上全国满族人口数还不止于九百万，因清末全国满族就有四、五百万，（见关克笑的《满族拭论》载《满族研究》1988. 1）而彼时全国的人口是四亿。今天全国人口是十一亿多，满族相应数当为一千万左右。何况今天的满族是包括了清代的各种旗人在内的。虽然辛亥革命后，无知的北洋军阀对满族一旗人（旗族）有所杀害，但为数不多。因彼时汉、满两族的表面区别实在太少了，所以满人完全可以混入汉人行列中隐遁下去，况有的地方革命军的领袖就是满人（如新疆伊犁革命军的领袖是故将军广福）。到民国年间满族总人口下降到一百五十万左右，原因也如上述。就新中国成立后满族人口的增长率看，由1953年的二百多万，上升到1982年的四百多万，又上升到1988年的七百万。这比1953年多出来的五百多万人口，当然不是由人口的自然繁殖而来的。基本上都是原来报汉族的“旗人”子女的后裔改报“满族”而来的，直到现在（1990，2）也不会全改报完的。

凡属旗人的子女，就都是直接或间接满洲旗人，蒙古旗人、汉军旗人的混血种。从清末到现在旗人与“民人”的混血儿又日益增多。今天的民族政策规定，父母为不同民族的子女，都有报父母任何一方族籍的权力。现在同胞兄弟姐妹不是同一族籍的多得很。目前旗人与民人的混血儿多报的“满族”，由母亲是旗人而报满族的，则俗称为“随旗”，由父亲是旗人而报满族的，则视为当然，而无“随旗”称呼。这还保留着“男权社会”的残余思想。这些情况笔者在采访中屡见不鲜，特别在农村，因父母双方都是少数民族可多生一胎，所以能与少数民族有关联者，就向少数民族方面靠拢。由此往后汉人与少数民族

间的通婚比例就显然下降。旗人与民人间过去的血统关系，已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况。如果“民、旗混血儿”都报满族，那个数目就无法估计了。

第五章 五个满族自治县旗人的来源

到 1988 年止全国已建立五个满族自治县，到 1989 年止全国已建立 317 个满族乡镇，64 个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混合乡镇。

五个满族自治县一览表如下

五个满族自治县一览表

县名	治所	面积 方公 里	全县 总人 口	满族 人口	占全 人口%	成立年月	含其它少数民族人口
辽宁省 新宾 满族 自治 县	新宾 镇	4 , 378	305 , 100	185 , 440	63.5	1985. 1. 17	朝鲜、蒙古、回、锡伯、达斡尔、苗、土家，共 13，656 口
辽宁省 岫岩 满族 自治 县	岫岩 镇	4 , 500	474 , 896	304 , 727	71.7	1985. 6. 11	蒙古 2，772 口 朝鲜 77 口，回 1，754 口锡伯 59 口，尚有苗瑶壮彝等

大连文史资料-八旗源流

辽宁省 凤城 满族 自治 县	凤城 镇	5 , 755	594 , 932	319 , 800	54.5	1985.6.17	蒙古, 朝鲜, 锡伯, 回等共 88, 549 口
河北省 青龙 满族 自治 县	青龙 镇	3 , 580	247 , 734	51, 4		1986.11 月	
河北省 丰宁 满族 自治 县	大阁 镇	8 , 760	342 , 039	166 , 355	48.64	1986.11 月	朝鲜, 回, 蒙 古, 锡伯, 达 斡尔, 苗, 土 家, 共 13 , 656 口

第十七节 新宾满族自治县

新宾县地处辽宁省东部山区，属抚顺市，东接吉林省、南接本溪市，北接抚顺市，西接辽阳市。县治在新宾镇，即明时的新宾堡。八旗的创建人努尔哈赤自其前五世祖童仓以来，就生息繁殖于这个地区。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创业的费阿拉城，就在该县的主要河流—苏子河中游的南岸。

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建立了四旗兵制。所以费阿拉城是“旗兵”的发祥地。万历三十一年(1603)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北三公里许建筑了“赫图阿拉城”，(即今老城址)徙都之。万历四十一年(1613)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满潮国昆都仑汗”，当时满洲的地面包括今新宾县大部及集安县北部、恒仁县东北部在内。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将四旗满洲兵制扩展成八旗满洲制。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八旗满洲”在这里发展成成熟。次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金，建元天命，称大莫明汗，后发展成大清帝国，所以说“赫图阿拉又是大清帝国的发源地”。

努尔哈赤的前五世祖童仓就驻节费阿拉城。童仓是建州左卫的第三任领袖，与其叔凡察—建州右卫的始祖，都是从图们江南故地迁徙而来的。新宾县的坐地户就是满洲人。这和其他满族自治县的满族都是外来户不同。

新宾县地区的开发很早，西汉玄菟郡的第二治所就在新宾永陵镇南苏子河南岸的台地上。汉初，这一带乃古高句丽族集居地，属于汉族燕人卫氏所建的朝鲜王国。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灭卫氏朝鲜置玄菟、乐浪、临屯、真番四郡。玄菟郡置有高句丽、上殷台、西盖马等县。于是在今永陵镇南苏子河南岸台地上，为高句丽县筑县城，汉昭帝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又在高句丽县城附近筑玄菟郡城。原来玄菟郡治在沃沮城(今朝鲜咸镜南道兴城附近)后因受貂夷侵逼，乃于昭帝元凤六年迁于高句丽城。渤海国时在此建木底州。辽金时此地归沈州管辖。明代此地先后为建州卫(李满住时)及建州左卫的治所。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在赫留阿拉称女真满洲国昆都仑汗，后又发展成金国。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公元

1621年)后金由此迁都辽阳又迁沈阳。今天聪八年(1634)金(清太宗以赫图阿拉为兴王故地,乃改称为“兴京”,派旗兵驻守。康熙帝有诗云:“霭霭兴王地,风云莫可攀,滌洄千曲水,盘造万重山”,以推崇兴京。康熙九年(1670)设永陵总管(正二品)衙门。十一年增设永陵掌关防衙门(正四品),二十六年(1687)设兴京城守尉衙门,旋改为兴京协领(正三品)衙门。乾隆二十八年(1763)以锦州理事通判移驻兴京,改为“厅”,隶奉天府。光绪三年(1877)改为兴京抚民同知,移治新宾堡。宣统元年(1909)升为兴京府,辖今新宾、桓仁、通化、浑江,集安一带地。民国二年废府改置兴京县,民国十八年(1929)七月二日改称新宾县。伪满时又称兴京县。1947年解放后又改称新宾县。1985年一月七号经国务院批准建为“新宾满族自治县”。全县分九个镇、十一个乡、一个市(抚顺市)辖矿区。

新宾是满洲人的故土,古满洲国地,八旗满洲的发祥地,大清帝国的发祥地,第一个满族自治县。

依《建州纪程图记校注》(申忠一著、徐恒晋校注)所示:努尔哈赤直属部落的农场在今新宾县治东十五公里许的“旧门”。舒尔哈赤直属部落的农场,一处在旧门东偏南八公里许的旺清门)一处在今桓仁县水库北端库内(富尔江入浑江口)。佟阿敦部落的农场在今新宾县东南边境双砬子之东,(富尔江一小支流)。佟时罗波(sirab)的农场在今集安县北部新开河入浑江口处财源村附近。佟流水的农场在新开河中游台上村东南五公里许处。(佟姓即努尔哈赤本家)这些地方都在浑江的支流富尔江、新开河一带。可见当时“满洲国”的中心地带是今苏子河、富尔江、新开河一带。

第十八节 岫岩满族自治县

(一) 概说:

岫岩县属丹东市，地处辽宁省东南部，千山南麓、大洋河上游山地间东接凤城、南接庄河、西接盖县、营口、海城，北接辽阳市境。县治在岫岩镇，东距丹东市政府 158 公里，北至辽宁省会—沈阳市 250 公里。

岫岩设治置官，始干金太祖收国元年(1115)在此设大宁镇，归盖州管辖。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升大宁镇为秀岩县。“秀岩”二字来源于金转运使王寂的《鸭江行部志》：“已未发龙岩山前，数十里北望，大山连绵不绝，数峰侧立，状如翠屏，秀色可鞠，里人谓之磨石山，以山出磨石故也，予恶其各不佳，欲改为竞秀岩”云云。元时属辽阳路。明洪武元年(1368)取同音字，改为“岫岩”，设通判，仍属盖州。今该县红旗营子乡(在县治东北 14 公里许)双山村，出土了明代的“岫岩营粮通判关防”长方形(3.9×5.8 公分)篆文铜印。清天命六年(1621)抚降岫岩，天聪七年(1633)派兵驻防。顺治元年(1644)八月设修岫岩城守尉。康熙廿六年(1687)于岫岩设三品城守尉一员、七品笔帖式一员、五品防御八员、归熊岳副统管辖；廿八年(1689)又增设六品骁骑校八员；三十一年(1692)又增设四品佐领一员，这些职官统归城守尉管辖，其下设八个牛录及巴尔虎牛录，统称“九旗”。八旗(八牛录)各由五品防御一员、六品骁骑校一员、领催五名管理之；其中正黄、正白、镶蓝、镶红四旗(四牛录)各有马甲五十名，其余四旗各有马甲四十九名巴尔虎旗(一牛录)由四品佐领一员、六品骁骑校一员、领催六名管理之，有马甲五十名。此外各旗设“图记处档房”办事外郎各二员。乾隆三十七年(1772)将熊岳通判移驻岫岩，同时置巡检衙门，次年发给“管理岫岩等处理事通判关防”主办民事。至此，岫岩有城守尉、通判、巡检三个衙门(见《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一年(1776)凤凰城移归岫岩管辖(见《岫岩志略》)。光绪二年(1876)升岫岩为州，三十二年(1906)分出岫岩南部为庄河直隶厅。民国二年(1913)改岫岩为县新中国 1985 年 6 月 11 日由国务院批准成立“岫岩满族自治县”。全县分二十个乡、四个镇、共

253个村，满族分布全县各地。据1985年统计全县人口474,896人，其中满族3,10,727人，占全县总人口的7%。

(二) 岫岩满族的来源

(A)八旗满洲(含锡伯、巴尔虎)。最早进入岫岩的八旗满洲人，是天命六年抚降岫岩城后，即派八旗兵前来驻防。第二批是太宗天聪七年三月派舒尔哈赤之子济尔哈郎率八旗兵到岫岩筑城和驻防。第三批是顺治八年(1651)由京师拨一批八旗满洲到岫岩，如偏岭乡满族关氏(瓜尔佳氏)即其后裔。第四批是康熙三年(1664)由京师拨一批八旗满洲到岫岩，如哨子河乡、满族曹氏(索绰罗氏)原属镶红旗满洲，即其后裔。第五批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又从北京拨出一批八旗满洲人到岫岩，如杨家堡乡齐氏(喜塔拉氏)属镶白旗满洲京牛录。据杨氏谱书记载，其始祖名昂乌都礼“巴颜”，二世祖名金都力，三世祖都督多力齐。多力齐的长子缠查生二子；长子阿古都督，次子卷孤都督。阿古都督之女“哈芬不哈”为显祖宣皇帝后，太祖努尔哈赤之生母。从这段谱书的记录与明、清史书相对照，则缠查即明史中的王果。阿古，即明史中之阿台，卷孤即明史中之阿海。王果之世系由此可见端绪矣。

第六批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又从北京拨出一批八旗满洲来岫岩，如哨子河多正蓝旗汪氏(完颜氏)、正黄旗白氏、大房身乡镶蓝旗蔡氏(萨麻喇氏)}红旗营子乡正白旗傅氏(富察氏)、正红旗罗氏(萨格达氏)；场沟乡正白旗赫氏(赫台里氏)兴隆乡正黄旗赵氏(伊尔根觉罗)、镶黄旗费氏、正黄旗田氏；苏子河乡镶黄旗王氏、岫岩镇正蓝旗唐氏(他塔拉氏){朝阳乡镶黄

旗吴氏；雅河乡正蓝旗洪氏等先人都是康熙二十六年拨来岫岩驻防的。

据《清朝文献通考》第二册卷 182 所载：康熙以前岫岩常驻的八旗兵只有 205 名，由于不断的调来调去，至康熙二十六年岫岩常驻的八旗兵增至 1, 205 名。其后各时岫岩的驻防旗兵数是：康熙三十年 (1691) 905 名，三十一年 050 名，三十三年 844 名，三十四年 229 名，三十七年 612 名，三十八年 604 名，三十九年 649 名，四十五年 606 名。

按成丰二年 (1852) 修补的《盛京通志》记载：岫岩驻防满洲兵五百二十七名，巴尔虎蒙古兵五十五名，蒙古兵七十六名。此数之和是 658 名。又据《钦定八旗通志》卷三十五《兵志》记载：岫岩驻防八旗兵有满旗、蒙古旗、巴尔虎旗和计 547 名。

驻防岫岩的八旗兵中的锡伯兵，是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间从齐齐哈尔、伯都纳等地调来盛京的三千多锡伯兵中，有 171 名调来岫岩，乾隆二十九年 (1764) 又由岫岩调走 28 名锡伯兵到盛京集合一千名锡伯兵带着眷属赴新疆。今岫岩满族中只有红旗营子乡关氏（瓜尔佳氏）记得他们的祖先是锡伯人。

岫岩满族中的巴尔虎人，是康熙三十一年将游牧于张家口外的巴尔虎人每百丁编一佐领。共编十佐领，每佐领中 55 名披甲，先移驻于辽阳、牛庄等处放牧，同年九月二十三日奉命拨往盛京三佐领，辽阳、开原、熊岳、复州、金州、岫岩、凤凰城每城各一佐领。拨来岫岩的一佐领，属正黄旗满洲旗分。惟巴尔虎人怕被佛满洲人轻视，经北京批准，独立巴尔虎旗衙门，因满洲原有八旗，因号巴尔虎为第九旗，（仍是正黄旗满洲）。今岫岩县满族中的巴尔虎旗人，有寇姓、白姓、石姓等。

岫岩的八旗满洲中，还有原是汉人的。据《岫岩县志》记载：“哨子河街张氏，原籍云南，有张宽者，清初随京兵来岫岩驻防，雍正四年因功编入满洲正黄旗当兵“（他不属汉军旗）。

(B) 八旗蒙古：岫岩的八旗蒙古人，也是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间，由盛京拨来岫岩驻防的。今哈达碑乡镶红旗蒙古李氏（李雅拉氏）、镶蓝旗

蒙古谢氏(萨拉氏);前营乡镶黄旗蒙古张氏(治良匡氏){汤沟乡正黄旗蒙古卜氏;苏子沟乡镶红旗蒙古何氏;大营乡蒙古族黄氏;朝阳乡蒙古族鄂氏、包氏、勒氏等皆其后裔。这些八旗蒙古之裔有的报满族,有的报蒙古族。

(C)八旗汉军:岫岩满族中的八旗汉军有三种来源。第一种是明代原居此地的汉人,先入盛京旗籍者。第二种是顺治八年及雍正四年(1726)开垦岫岩,准民户报领旗地入旗当差的。第三种是平定三藩之乱后,将俘虏的官兵进山西,又转送往山东,又由山东转送来岫岩,编入汉军旗籍的。这些经山西、山东转送来的吴三桂叛军,常称他们在山西、山东曾驻过的地方为:“小云南”,以纪念云南故籍。现在岫岩满旗中八旗汉军之裔多居住在哨子河乡,有张、邓、杨、刘四大姓。其次在黄花甸子乡、三荣子乡、牧牛乡等乡的满族刘氏,也是八旗汉军之裔。

第十九节 凤城满族自治县

凤城县属丹东市,地处辽宁省东南部,河中上游及大洋河支流牛子河、拉古河等流域的山地间。有“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的说法。其县境东接宽甸,南接东沟,西接岫岩,北接本溪市境。

凤城县地自战国末期至秦统一六国后,一直为辽东郡地。两汉西晋时,在此置武次县。高句丽地方政权割据时的隋代,在此地置乌骨城(乌骨城即凤凰山城,又名古里城,在今凤城县东南五公里处,故城址尚存)。唐时属安东都护府。渤海国盛时,凤城县地属渤海国东京道开州开远县。金

代属东京路（治辽阳府）来远州。元时属辽阳行省辽阳路。

凤凰城之名，始见于《明史·地理志》“……东南有凤凰城堡，在凤凰山东南（应为西北）成化十年（1474）年筑”。凤凰城堡隶辽东都指挥使司，明嘉靖中（1522～1565）将原在辽阳的定辽右卫移于凤凰城堡（见《明世宗实录》553）。清天聪八年（1634）太宗派部分旗兵进驻通远堡（在今凤城镇北铁路线上），此堡乃当时沈阳与朝鲜交通孔道，在军事上很重要。崇德三年（1638）将通远堡旗兵移驻，凤凰城堡，即今凤城县治。时有甲兵300名，附丁20名设城守官（后称城守尉）。顺治六年（1640）凤凰城设全八旗。前此凤凰城地区地广人稀，只有少许人家散处于林海草原间，以渔猎为业，兼亦务农，因无治安设施，居民们只能过着贫困生活。既八旗开始驻防后，当地仅有的居民们纷纷投入八旗，如土著王姓，原籍山东，于明代逃荒东北来此，至是投入八旗被编入汉军旗籍。又如土著胡尔佳氏，乃元世祖忽必烈后人，元亡，避居于此，至是率子弟加入八旗。

康熙十年（1678）从乌拉（今吉林市）地方迁出伊彻满洲万余口到盛京，其中吴、杨、陈等三姓拨来凤凰城，加入八旗驻防中。康熙廿六年（1687）从京师拨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等携眷来凤凰城充实八旗，并置城守尉管理军政事务。康熙三十一年（1692）编成巴尔虎蒙古兵十佐领，拨来凤凰城一佐领。巴尔虎佐领属于八旗满洲，但单立旗衙门处理本牛录事务，称“第九旗”。据《凤城县志》卷二“九旗”载：“九旗共设防御七员骁骑校八员、领催62人，满洲兵529名，蒙古兵94名，巴尔虎兵48名，汉军兵34名，共计兵705名”。（此记录当有误，按九旗应设防御八员，骁骑校九员，另有巴尔虎佐领一员。

九旗共有兵705名，加武官18员，领催62名，总计官兵应为784员（城守尉衙门在外）每位官兵都代表一户旗人，由此可概见当时旗人的总人口数。

凤凰城东南十三公里许有“边门”，在凤凰山南，为当时朝鲜与中朝交通必经之路，故又称“商丽门”。清廷于此设章京一员，宁兵五十名管理之，二年轮换一次。此“边门”除接待朝鲜使臣外，朝鲜商人亦可在此与清人互市。

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后，从云南经山西、山东拔来一批氏人(汉人)充当台丁，驿丁等，彼等也都加入了八旗。台丁分驻凤凰城，边门、 阳。驿丁分驻通远堡、凤凰城、雪里站等地。

康熙三十八年(1699)自伯都纳拨来盛京的二千多锡伯兵中，有部分拨来凤凰城加入八旗满洲中。

乾隆二十六年(1761)发给凤凰城城守尉关防“专司催科，捕盗及旗籍、户婚等事”。是即“旗衙门”，衙内设库、户、兵三司，各司各设笔帖式一员，下有司员、司达等职无定额。(见《凤城县志》卷二城守尉。)

乾隆二十九年(1764)将凤凰城旗兵调往塔尔巴哈台(今新疆西北部)45名，次年又裁兵45名(仍留原地)，后又拨往金州、海城各若干名。至此每旗(牛录)尚有甲兵63名、铁匠一名，合计九旗共有兵匠576名。

乾隆四十一年(1776)设凤凰城巡检司，隶岫岩通判。光绪元年(1875)将凤凰城改为“直隶抚民厅”，即“凤凰厅”，设同知衙门。衙门设经历、教谕、驿丞等官，其后大批民人(汉户)来此开荒植田。光绪年间凤凰城地区人口情况如下表：

光绪年间凤凰城地区人口情况如下表：

类别		男口	女口	人口合计	占总数%
旗人	满洲	21, 305	14, 780	36, 030	10.7
	蒙古	10, 500	6, 732	17, 232	5.2
	锡伯	5, 846	4, 030	9, 876	2.9
	汉军	22, 820	18, 425	41, 245	12.3
	驿丁	885	565	1, 450	0.4
	台丁	125	97	220	0.06
民人	汉户	124 , 590	103, 506	228, 096	68.2
居民	总计	186 , 116	148, 135	334, 251	100.0

国民二年(1913)改凤凰厅为凤凰县。次年，因与湖南省凤凰县重名乃改为凤城县。新中国 1985 年建立了凤城满族自治县，撤销原凤城县。全县分 22 个乡、三个镇。其中满族乡 16 个，满族镇一个。

据 1985 年调查，凤城县有汉、满、蒙古、朝鲜、锡伯、回等十六个民族。总人口 594, 932 人。其中少数民族 408, 259 人，占总人口的 68, 6%。其中满族 319, 800 口，占总人口的 54. 5%。

第二十章 清龙满族自治县

青龙县属河北省秦皇岛市，位于长城东端冷口、桃林口、界岭口、义院口之北，青龙河（滦河北来的一大支流）中游地带。县治青龙镇（大障子）位于七老图山脉的都山（海拔 1846 米）东南 16 公里许，青龙河一小支流的各地中。该县全境多山，重要聚落均在青龙河本支各流的河谷间。该县南界长城，北界《辽宁省，西接宽城县。在明代，令蒙古人沿长城二百里以外驻牧。因之，这一带成为荒地，林木丛生，鸟兽成群。

清廷入关后，在京 附近长城以南圈地不足，乃向长城以北扩展。据《清圣祖实录》卷三十记载，康熙帝谕户部“……至于旗人无地，亦难资生，应否以古北口外边空地，拨给耕种，令议政王贝勒大臣确议以闻”。同上，卷三十二康熙九年正月，户部议复“查以古北口外地拨与镶黄旗、正黄旗；罗文峪（在遵化县治北）口外地拨与正白旗，冷口（青龙县治南）外地拨与镶白旗、正蓝旗、张家口（万全县）外地拨与镶红旗、镶蓝旗”。于是八旗人遂分批出塞占荒开田落户。今青龙县满族—清代的旗人，就是这些占荒人的后裔，其祖先们来此者有下列五种情况：

第一种是占荒管田庄头：如大巫岚（在青龙县治东 21 公里）乡东干河子（在大巫岚北三公里）村的正蓝旗于家，他们祖先系山东省登州府大水泊（今文登市治）民（汉）人，原兄弟八人，于康熙九年（1670）自故乡（他们是平定吴三桂之乱

后，由云甫拔来山东大水泊的)拔来，编为正蓝旗籍，出冷口分别在大于杖子、东于沟子、狮子沟(在县治东北)、温家河子、马圈子西庄、小汇河等地占荒落户，其始祖于德辉任庄头，立号“德润堂”。又如巫岚大院正蓝旗翟氏祖先也是来自登州大水泊，拨来编入正蓝旗的，为豫王管理田头，是个较大的庄头，立有“古义堂”、“善德堂”、“九思堂”等字号，每个堂院都占地十亩。其管理的地面在今青龙县的大巫岚、隔头河、土门子(在大巫岚北十公里青龙河东北岸)、双山子(在大巫岚南偏西八公里)、大于杖子等处。又如木头凳子(在县治东偏北45公里)牛角沟村正蓝旗丁家的祖先，原系山东登州府黄县民人，康熙九年拨来编入正蓝旗的。从义院口出塞，在此“跑马占荒”为木头凳、邱杖子、三星口一带庄头，立号“谒然堂”。仅木头凳子一带在康熙八九年，先后来了周、林、匡、李、焚、丁等六姓，都属于正蓝旗，多是豫王的庄头。

革碾(在县治南21公里青龙河西)正蓝旗王家，至今还保留有《皇家庄头执照》记有“……顺治年间，世祖章皇帝恩赏公主祭田、座落在写字洞草碾一带。”当时派王德为“永平府迁安县之冷口外草碾庄头”，另“派王宽充当庄头之差，于历年十月十五日自行进京交纳”(租银)。

第二种，是占地定居的功臣。据伪满《热河省各县旗人情况》一书记载：“康熙八年，皇帝允许其部下十二名立下战功的出关到该地(指青龙)定居”。他们“各领部下一百五十名到该地跑马占荒，凡一日内绕行一周的土地，均归其所有，作为对他们旧功的酬谢”。这块地是在今青龙县青龙河以东的碾子沟、土胡同(在双山子东南平地间)、楼子石(在县治南偏东25公里青龙河东岸边)、小西岭、张杖子(在县治东46公里)、新庄子之间。今碾子乡歪头沟腰庄张氏宗谱记有“始祖……辽阳河工堡人(汉人)，我清奋起，以从龙功屯田永平府滦州……康熙间沿边圈地，分临榆义院口外土胡同屯田正蓝旗界，世即正蓝旗”。

又据南杖子乡庄窠董氏及其同宗楼子石董氏家谱所记：董氏原系铁岭人氏（明朝居于铁岭的汉人）其祖先从龙入关，又从征吴三桂等有战功，赐他们在滦州昌黎一带长城内外占地落户，当然也都编入旗籍，繁衍至今，现在都报为满族。

第三种是正白旗汉军包衣出口屯田：这些正白旗包衣们的先人，有的是奉明帝之旨出关开边的汉人，有的是出关经商，因而留居铁岭的汉人，有的是明清交战中被清军俘去的明朝官兵安置于铁岭定居的。后来都加入八旗“从龙入关”，开始驻防于京师、滦州一带，顺治时被调往口外开垦。当时出口的有四大姓十三户，通称“三肖、四郜、五马、一枝扬”。不久又被调到马兰庄（马兰峪，地在遵化县西）。康熙八年、九年再次调到口外屯垦。（见《河北省青龙县肖营子满族调查报告》詹绪先等1963年写，载《满族社会史调查》辽宁出版社1985年，沈阳）跑马占荒。这次出口的共有“张王李肖佟宋满高刘杨·谢马金子崔邵”十六姓。其占荒地地域：东自青龙河，南至冷口止，西至擦岭（县治西十余公里），北至虎头石（在今青龙县北界外青龙河岸边）

今肖家营子和大石门保存的杨氏谱序言中记曰：“我杨氏始祖本系铁岭人也，清初随龙定鼎，标入正白旗汉军包农牛录……康熙九年出冷口居横道河肖家营至今已传十三世。”

第四种是解决生计问题拨来口外的旗户：据董氏家谱记载“祖先随龙功劳数载，历经三世蒙皇恩浩荡，计功赏田……惟择居于法家宝城宅之内的，因支派繁衍，幼丁众多，难以同居，故又居于五口之外；长支居山拉嘎、二支居官场、三支居庄窠、四支居捎技谷。子孙繁衍，确居不下三十余处，可谓盛矣”。

又据楼子石李氏家谱记载：圈地后，李氏同宗家族散居口外肖营子(冷口外不远)，西双山、王厂(县治西偏北 21 公里)、逃军山(县治西邻)、三榆树、大石门、湾杖子、加道沟、八哈岭、石扳沟、响水沟、杨树林子、肖杖子、头道林子(县治北 15 公里)、岭后东、厂沟、小汇河等二十余处。

肖营子是青龙县旗人的集散地，许多旗户出口后，即居肖营子，然后又迁往各地。如嘉庆年间，从肖营迁往响水沟、盔家铺、榆树沟、大石门、大杖子、王坎子等地的杨家；迁往西双山的肖家、迁往打虎店的于家等。

第五种是逃荒而来的旗户：如张杖子(冷口北 10 公里)乡石杖子村的石家祖先，就是乾隆三十六年由永平府卢龙县逃荒至此，立庄加入旗籍的；马杖子马家祖先是嘉庆年间由山东逃荒至此种旗地定居加入旗籍的；河南村王氏祖先是光绪六年由永平府迁安县逃荒至此定居加入旗籍的。

乾隆二年顷，今青龙县地是分属临榆、抚宁、迁安三县的，1930 年由三县分出置都山设治局，伪满时置青龙县、治青龙村，光复解放后，仍为青龙县。1986 年 11 月经中央批准，改为青龙满族自治县。

总观青龙县的今满族均非女真人后裔，基本上都是八旗中满洲旗分的汉人包衣和汉军旗分包农牛录等的后人。

此段资料来自杨贺春先生的《青龙县满族源流初考》载《满族研究》>>1987, 3。

第二十一节 丰宁满族自治县

丰宁县属河北省热河地区，位于河北省北部中央、北京市正北，北接内蒙古南边，西接沽源、赤城，东接滦平、隆化。治大阁镇，滨潮河西南岸。全县境皆山地，重要聚落皆在河谷地带。

丰宁县的旗人，是从顺治元年(1644)入关后，即开始陆续移入，及当地蒙古人加入旗籍形成的。其迁入户大体可分为五种类型。

第一种是皇庄、王庄的庄头庄丁等。顺治元年，朝廷就在喜峰口外、古北口外设置“皇庄”，（见《内务府则例。会计司》卷一：粮庄纳粮定额条）康熙四年（1703）“古北口以外……远近悉成皇庄”，见汪颢《随銮记恩》。古北口外皇庄，主要就在滦平、丰宁二县辖区内。肃亲王豪格、庄亲王石塞，等在丰宁都有免赋庄田，“乾隆年间庄亲王永曾以……丰宁庄地九十顷……分给兄弟”（见扬学琛《清代的王公庄园》）永，即石塞的后人。肃亲王之妹下嫁给蒙古王子，死后葬于隆化城，故隆化城又称“皇姑屯”，她有陪嫁的“胭脂地”在丰宁的西北川（彼时丰宁县治凤山）。

第二种是御马场和军马场的官兵服役人员。据《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国初，称近口横豆诸山曰大坝，定坝内为农田，坝外为上驷院及王公牧场”。这些牧场都派有佐领，防御和兵丁管理，并有放牧人员保护和放牧牲畜。彼等长期工作和生活在这里，久之遂成为当地的居民。如现在的“官场沟”、“骆驼场”（在大阁镇西十五公里）、海留图（又名大滩，在县境西北边地）都是彼时的牧场所在地。

第三种是“守围”和驻防的满蒙八旗兵：自顺治时即开始派遣八旗兵到此驻防，委派都尉管理之，将大片土地收归官有，并指定当地蒙古人加入“八旗蒙古”。康熙年间，先在丰宁西部设立“西围”，后来又开“东围”，即“木兰围场”。八旗驻防兵遍布于丰宁境内。现在丰宁境内很多“xx营子”、“xx旗”等地名，都是当时驻防旗兵留下的名称。乾隆十六年（1751）五月礼部铸造的八六二号铜印“满洲镶黄旗第七牛录之图记”犹保存至今。据实地调查证明，现在的“镶黄旗村”（在大阁镇南东三十五公里潮河北岸）一带，即第七牛

录驻防地；石人沟(在镶黄旗村东偏北九公里)一带为第四牛录驻防地；南辛营子(在大阁镇南)一带为第三牛录驻防地。

第四种是圈地、封地等功臣官员及其服役人员等：如南辛营子乡满堂村陈姓先人陈友功，曾任京兆尹，原属正蓝旗，后升入镶黄旗，因封地在满堂村，于是由蓝梁底下(今属滦平县、在县治(鞍匠屯)东北三十五公里)迁往满堂村定居下来。又后营子满族乡姜营子村吴姓一族的人口，即占全乡满族人口的三分之一。吴姓的先人吴能(档子名七十五)“从龙入关”，于康熙初曾任镇殿将军，后封地于此定居。光绪六年(1880)的吴氏墓志记有“七十五四世孙京都正黄旗内务府都尉司佐领下，五扎拉七古六家祥泰”。此“祥泰”即七十五四世孙。

南三营村满族石氏先人，于雍正三年退役，持“路引”(护照)来此定居，按人丁分配给“马莲滩”每人三十亩。现存有1.3公尺高的石柱标记。

清政府为旗人颁发的“田照”顺契的“契尾”现存丰宁县档案局的有一百多份。

第五种是上三旗京官的眷属和包衣等在此定居的：南辛营满族乡汤牛沟门刘氏先人，世代为“佟王府”的包衣，晚清佟王府的大管家周士元(汉人)就死于汤牛沟门，葬于刘氏墓地，其墓碑尚存。

丰宁的设治始于雍正十三年(1735)，清政府将原设于八沟(今平泉县治)的“通河理事通判厅”迁来凤山(又称土城子在大阁镇东50公里)，是为丰宁设治之始。乾隆元年(1736)改设“察哈尔四旗厅”(镶黄、正白、镶白、正蓝)于凤山。乾隆四十三年(1765)改厅设县，取名丰宁。伪满时迁治丰宁村(今大阁镇)。1968年11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丰宁满族自治县。全县辖四十三个乡、二个镇，其中有满族乡四十个，满族人口遍布全县各乡镇村。

本段资料主来自闫秀峰先生的《丰宁满族来源》载《满族研究》1987, 3。

第六章 其他旗人集居区旗人的来源

第二十二节 桓仁县

桓仁县属辽宁省本溪市，现在全县共有十八个乡镇，其中有十一个满族乡镇，六个满族朝鲜族联合乡镇。满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42.1%，1986 年比 1982 年恢复的满族人口 111，

222 人。（以上资料来自杨友清的《关于本溪满族历史及现状的调查报告》（载《满族研究》1988.3）

桓仁县的满族基本上都是坐地户，这里同新宾一样，是满旗的故乡。其先人都是在努尔哈赤建立“满洲国”（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前就居留在该地的女真人，大体可分作下列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明代的建州卫李满住部，是永乐二十二年（1424）从古渤海国率宾府建州（今绥芬河畔东宁县东大城子）地方迁来此地的，他们到此地后，开始住在兀刺山（今桓仁县城北偏东九公里许的五女山）南的瓮村（在今桓仁水库底，没前为长岗村），有众一千多户。宣德八年（1433）因受朝鲜李氏王朝的打击，乃迁部落于兀拉山北的兀弥府，即今桓仁县东北部拐磨子镇的东古城地方。正统二年（1437）又遭到朝鲜的袭击，次年再迁其部落于苏子河南灶突山东的费阿拉地方（今新宾县永陵镇南苏子河南二道河村附近）。景泰二年（1451）初，又率

部落离开费阿拉，迁回瓮村故地。景泰六年(1455)朝廷以李满住年老，命其子李古纳哈代其职，盖于此顷又迁至兀弥府故地。成化三年(1467)九月，因建州女真总管三卫的大首领叛乱，明廷出师讨伐，同时命朝鲜国王派兵助攻。于是李王派其大将康纯帅兵万余进攻兀弥府，阵斩李满住及李古纳哈。杀其部众386人，生擒23人，获其牛羊马匹二百余头，焚其积聚217所，予该部以沉重的打击。战后仅余八户，由李满住幼子甫乙加大率领。成化五年(1469)明廷命李满住之孙完者秃为建州卫都指挥佥事章卫事。成化十七年晋其级为建州卫都督，弘治十三年(1500)致仕，由其子弗刺答继任。弗刺答正德四年(1509)歿，由其子李童继任。到嘉靖二年(1523)以后建州诸卫均分裂。建州卫先后自称都督者有九名之多。不相统属，各自为政。到万历十七年(1589)李童的后人李以难降于努尔哈赤，李氏建州卫至此告终。其后努尔哈赤的建州卫称呼，是指他所统辖的建州诸部而言。

李以难降于努尔哈赤后，李氏建州卫的后裔仍居留于兀弥府一带。

第二部分是建州右卫凡察的后人。自正统七年(1442)二月建州左卫分编为左右两卫后，凡察掌右卫，居于三土河(今辉发河支流三统河)一带；童仓掌左卫居于冬古河(今大雅河)一带。但三卫部落犬牙相错，并三卫领导皆亲属关系，故三卫间并无不可逾越的界限。总之今辽宁的新宾、桓仁、吉林的柳河、通化一带皆建州三卫共同的活动地域。右卫凡察之孙纳郎哈为都督掌卫事时，约在景泰二年(1451)顷，迁其部落于婆猪江(浑江)西支“吾毛水”(今六河)畔，当今六道河子村附近。吾毛水南之山称牛毛大山。吾毛水盖为牛毛水之对音。彼时左卫童仓亦与李满住同居于瓮村。大约在明景泰五年(1454)顷，童仓迁往费阿拉城。而右卫无再迁徙的史录，其后裔当仍在六道河村一带。

第三部分是董鄂部，(参看本书第十三节《八旗满洲的民族成分》)董鄂部的远祖是宋英宗的后裔，金时，随徽钦二帝北狩，迁于五国头城(今依兰)同化于女真族中，后随胡里改、斡朵怜两万户部落南迁到长白山以东，后又辗转西迁

于婆猪江流域的董鄂水(大雅河)一带定居下来,遂以地名称其部。董鄂部有三个重要集居点;其一是“董鄂城”,在今桓仁县城西、浑江西岸的“南老台村”附近;其二是齐基达城,约当今六河北岸的“三道河村”附近;三是翁哥洛城,在今桓仁县城东,水库南端,横道川村附近。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二年(1584)进攻的齐基达城和翁哥洛城即此。董鄂部就分布在这三城及其附近地带。万历十六年(1588)董鄂部长何和礼率部归于努尔哈赤《清史稿》“何和礼传”曰:“何和礼、董鄂氏,其先自瓦尔喀迁于董鄂,别为一部,因以地为姓”。董鄂部众只一部随何和礼北上,其大部分仍留居于原地,是当地土著的主要成分。

第四部分是岐州卫部;据《满族研究》1986,3 刊载的《满族先世在桓仁》一文中所记。

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这一部落自成体系,号称岐州卫,居住在左右两卫之间,共八十户,约是十五世纪五十年代自朝鲜北部迁来的^①。其部落离婆猪江很近,在弘治十年(1497)八九月间这个部落的王山赤下等人在婆猪江上曾阻拦朝鲜往建州三卫的官员渡江^②。为报仇,专门与朝鲜为敌。其第二代酋长金山赤下(即王山赤下)曾数次率人至朝鲜掳掠^③。按《李朝实录》记载的方位里程推判,此部落弘治年间当在今桓仁县洼泥甸子附近^④。

①《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二 750 页

②《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二 758、759、768 页

③《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二 750、758、759 页

④《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二 558、559 页

按桓仁县洼泥甸子村,在县城北偏东 21 公里许富尔江东岸,则该部与

建州卫相邻。其地彼时正当朝鲜与建州三卫间的交通要道。

第五部分是王兀堂的残部，王兀堂是嘉靖(1522~1566)年间与王杲同时代兴起的建州女真大酋之一。王杲一直与明朝为敌，而王兀堂则不犯明边(参看本书第三节《建州诸卫的变化》)万历三年(1575)王杲被明军消灭后。王兀堂仍与明边保持和平共处关系。到万历七年(1570)因明永甸边官参将徐国辅的贪鄙压榨，王兀堂乃兴兵报复。于万历八年开始侵掠永甸(奠)、宽甸(奠)等地，旋即被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及副总兵姚大节所消灭。其所部伤亡惨重，共残部当仍留于桓仁、宽甸、集安地区内。

第二十三节 本溪直属区及本溪县

本溪直属区共有九个乡镇，其中有三个满族镇。本溪县有十七个乡镇，全部都是满族乡镇。1982年本溪市直属区人口 793,401 人，报满族的只有四百四十多人，本溪县人口 310,962 人，报满族的只有一万九千多人。1986年后，市直属区报满族的达到五万五千多人，本溪县报满族的达到十五万人左右。以下统称这两个区划为“本溪”。

本溪满族的来源可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原住本地的女真人后裔：本地区原是女真人的故乡，在八旗满洲编成前，这里就是女真人的居留地。明朝于洪武十五年(1382)就在草河堡(本溪县草河城满族镇的草河村，在本溪县城南偏西 45 公里许)设千户所，安置和管理女真人。可见彼时这里女真人口的密度已达到相当程度，否则不会在这里设治。《明实录·太祖》卷之一百四十四中记有“洪武十五年夏四月辛丑，辽东东宁草河千户所招降故元合罗城万户府校卒及鸭绿江东遗民凡二千六百八十六人，送至辽阳，诏以衣粮给之”。可见草河千户所彼时的国防、政治地位都很重要。成化三年(1467)明廷为防备建州女真童仓等的骚扰，据《辽东志》的记载·曾设东州、马根、清河、碱厂、瑗阳诸堡。后又增设一堵墙、孤

山等堡。其中清河、一堵墙、碱厂、孤山等堡均在今本溪县境内：清河堡故城址，在清河满族镇政府所在地，在县城北偏东 18 公里，故城址四框尚明显，正方形，每边长约 500 公尺。碱厂堡故址在县城末偏南 20 公里，今碱厂满族镇政府所在地，故迹已无痕。孤山堡故址在县城东南 29 公里，兰河峪满族乡的孤山子村，故迹犹存。明万历元年(1573)孤山堡往北移五公里许，在兰河峪满族乡新城子村，孤山新堡故迹亦存。其城正方形，每边长 300 公尺。以上这些城堡的连线，在今本溪县东部，今本溪的大部地区，在明朝直接统治区内，居留该地的女真人与汉人同住，渐渐汉化。后来是否全入了旗籍，无详细史料可证。

第二种是驻防八旗满洲的后裔；后金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努尔哈赤亲统八旗满洲兵夺取了抚顺等地，是年七月夺取了清河堡，平毁了一堵墙堡、碱厂堡。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 年)草河城、孤山堡、威宁营(今本溪市高台子满族乡威宁营子村，在市街东北三公里许铁路东)等三城归降于后金(见《清文献通考》)八旗满洲兵遂开进碱厂、连山关(在本溪市治南铁路线上，本溪县境内)等地驻防，同时将土地分给八旗满洲兵耕种。据《浦文老档·太祖朝》卷四十六所记，天命八年(1623)三月“命爱达汗、申彻和率两白旗、两蓝旗的马甲四百人驻守草河堡”。天聪七年(1633)皇太极命杜度贝勒监筑碱厂城，设碱厂边门。据《盛京通志·兵防》记载：“碱厂边门设章京一员，防御一员，属下旧设满洲兵六名，汉军兵二十五名，共三十一名”。《盛京内务府档案》记载：“碱厂边门下设三个边台，各有台丁一百一十一名。”如今山城子满族乡邓氏始祖原住兴京、二世祖因八旗驻防迁居威宁营，三世祖一支迁往牛心台(本溪市直属牛心台镇)；一支迁居山城子(县城南七公里)磨石峪；一支迁居偏岭子(县治西北 18 公里)满族乡土家子，至今已有 300 多年。

邓氏家族至今已有一千多口，仍分布在本溪境内。又如碱厂满族镇满族赵氏《族谱》记载：其第二世祖扎库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从兴京拨往碱厂边门驻防，其后代定居碱厂赵家洼子。又如东营坊满族乡(在县城末偏南34公里)满族关氏《宗谱》记载，其始祖阿木钦于雍正年间，拨往碱厂边门驻防。又如赫氏(赫舍里氏)《谱书》记载·其始祖从龙入关，二世祖罕都将军洼尔达由京师拔往奉天，驻防凤凰城，其一支现居本溪县草河城满族乡。又如赵氏《家谱》记载，赵氏为陈满洲，康熙三十三年(1694)拨往碱厂边门为兵。又如《富氏家谱》记载，富氏原居长白山后迁叶赫城(今在四平市治东南26公里)。又从龙入关，在北京因误朝差被革佐领之职，发往盛京，随旗当差，而落户本溪，现居富家楼子满族乡(在县城东北19公里)。

第三种是八旗汉军的后裔；据本溪全县满族宗谱统计，其中五十多家宗谱记载是顺治八年(1651)开始从山东，直隶(河北)、山西等省迁来的民户(汉人)投旗占地加入八旗汉军的。如草河城满族乡满族屈氏《族谱》记载，屈氏原系山东“小云南”人，顺治八年由小云南迁来本溪草河城落户，加入盛京镶蓝旗(汉军)，随伊将军当差。又如连山关满族王氏《宗谱》记载，王氏原籍清(青州)府诸城县大王庄人，系民籍，于顺治八年始祖王采忠由鲁迁辽，投汉军正白旗第三佐领(喜纯牛录)下为丁，先居海城，康熙年间迁辽阳落户，占地九十二亩(彼时连山关属辽阳，尚无本溪县)。又如小市满族镇(县治)满族马氏《族谱》记载，马氏始祖原居山东登州府栖霞县，于顺治十三年(1656)迁居盛京城北投旗。康熙二十年前后，由盛京(今沈阳)迁到“杯犀湖”(后改本溪湖)观音阁庙东南落户，给内务府正黄旗当壮丁，交纳鱼干供品，到乾隆年间改为交纳细鳞鱼。五世祖在小市堡子“斩伐草木、，夙兴夜寐，开垦田土”有功，给红册地二十五日，升科地二十一日，内仓地四日。现马氏家族成为本溪地区满族中的大户。又满族《高氏宗谱》记载，高氏原籍云南，耕读为业，明崇祯十五年(1642)地方不靖“他处犹轻，惟云南为甚”，始避居于山东登州府蓬莱，后四豪强聚众，掳掠良氏，于是越海迁辽阳，其后一支在今本溪，以当初地广人

稀，非旗人不准播种，是以于康熙二十二年(1663)入沈阳镶白旗汉军第三佐统领下，开占红册地。现在草河城的满族陈氏、艾氏、詹氏、东营坊的满族刘氏、平山区桥头镇的满族翁氏、明山区高台乡霍家堡的满族霍氏、曹氏、新岭的满族崔氏等等都是过去皇庄的壮丁即包衣满洲。以上这些投旗的民户(汉人)由于长期与八旗满洲生产生活在一起，且满洲人居于统治地位，所以这些人与满洲人自然地融合成为一体了，他们是今天本溪满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种是旗人母性的子女及其后人，在清代有“旗民不通婚”的严格规定，旗人只能与旗人通婚，而旗人内部是不分“满洲、蒙古、汉军”的。所以旗人(旗族)这个在清代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在血统上也是单成体系的。但到晚清，“旗民不通婚”这个规章，已被历史潮流所冲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乃正式许可旗民通婚。旗民通婚后，其子女的族籍是从父系的，但这并无法律明文规定，只是封建父系制度旧习惯，在“中华民国”时期一直是这样。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父母不是同一民族的，其子女有权报父母任一方面的族籍。现在旗人与民人通婚的子女，父亲是旗人的，当然都报满族，母亲是旗人的也多报的满族，而自称为“随旗”。随旗的人数并不少，是今天“满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种情况凡有，旗人之地，概皆如此。

第二十四节 大连地区

大连市共划分为六个直属区，一个县级市、三个县。据1986年初的调查是，全市总人口4,015,800人，其中一千人口以上的少数民族有五个：满族214,320人，回族11,750人，锡伯族8,836人，蒙古族3,672人，朝鲜族3,080人。

大连地区满族人口分布的情况是：中山区 2, 729 人，西岗区 2, 544 人，沙河口区 4, 875 人，甘井子区 6, 825 人，旅顺口区 2, 622 人，金州区 52, 660 人，瓦房店市 65, 544 人，新金县 12, 273 人，庄河县 63, 856 人，长海县 128 人。已建立了十一个满族乡(镇)，是：金州区的七顶山满族乡，全人口 20, 981 人，其中满族 8, 393 人；石河满族镇，全人口 27, 667 人，其中满族 10, 660 人。瓦房店市的老虎屯满族镇，全人口 24, 043 人，其中满族 7, 909 人；三台满族乡，全人口 25, 982 人，其中满族 9, 482 人，杨家满族乡，全人口 25, 407 人，其中满族 8, 341 人。庄河县三架山满族乡，全人口 22, 649 人，其中满族 10, 104 人；塔岭满族乡，全人口 21, 855 人。其中满族 6, 981 人；高岭满族乡，全人口 17, 789 人，其中满族 6, 706 人；太平岭满族乡，全人口 23, 517 人，其中满族 7, 727 人；桂云花满族乡，全人口 10, 353 人，其中满族 3, 719 人；小孤山满族乡，全人口 21, 687 人，其中满族 10, 328 人。这里只有小孤山是 1988 年 8 月的调查数，其余都是 1986 年的数，到 1988 年各满族乡镇满族的数目都有增加。

大连地区满族的来源可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坐地户的后裔：坐地户就是清代以前就住在这个地方的渤海、辽金等国的后裔，他们都先后被编入八旗，主要是八旗满洲之中。由于东北是他们的故乡，史书上对他们的居留情况却少有记载。只有渤海后裔的迁来辽南，史书上是有记载的，第一次是辽太祖天显元年(926)正月，辽国攻下渤海国西北边疆的重镇扶余府(其故址在今四平市或农安县)，即迁其民的一部分到今复州、金州一带地，在今复州镇(复州古城)地置“扶州”以居其民。旋改为“迁民县”。第二次是天显二年辽灭渤海国，当时渤海国人口总计十余万户，由渤海太子大光显率二万多户投奔新罗。旋归于王氏高丽，得赐姓王，附宗籍；辽取渤海国的名宗望族数千户来辽南。置于今盖县地方，后又迁之于迁民县，置曷苏馆女真国大王府以统治之。第三次是辽圣宗统和二十八年(1010)辽征王氏高丽，克开京(今三八线上的

开城)俘得前投高丽的渤海国人众,置于今盖县与复州古城之间,置归州刺史(治所在今熊岳城西南归州满族乡)以统治之。辽兴宗时(1031—1054)于迁民县置复州怀德军,始有“复州”之名,沿用到今。金朝亦置曷苏馆领有今大连地区。然由于年湮代远,渤海后裔已很少能自知其为渤海遗氏矣。在笔者抽访的大连满族万余人次中,只有瓦房店市三台满族乡三台村的赵氏(西林觉罗)尚能记忆其祖先是渤海遗民,是从岫岩城南十三公里许的杨家乡杨家村迁来三台的,现在他们宗族仍多住在杨家村故地。

第二种是八旗满洲的后裔:康熙二十年(1681)在金州就地编成的576名丁的八旗满洲的后裔仍多分布于金州以北地区。康熙二十六年(1687)又从北京开回一批佛满洲到盛京,在盛京就地编成一批旗兵分驻于“内城十五、路九、边门十六”合计四十处。其“十五城”为盛京、兴京、辽阳、开原、熊岳、复州、金州、岫岩、凤城、牛庄、锦州、广宁,义州、抚顺、铁岭等,分设城守尉等统辖之”。参看第十一节《八旗兵的补充和编制变化》中的附表~《八旗驻防的分布》。

雍正年间(1721~1735)将熊岳、锦州两处原设城守尉的,改设副都统,又扩大了旗兵的编制。其中复州(今瓦房店市)、金州皆属今大连市。今大连所属的庄河县是从岫岩分出来的(参看第十七节《五个满族自治县旗人的来源》中《岫岩满族自治县》)。熊岳今虽不在大连市境内,但大连地区的满族人不少是从熊岳分迁来的。乾隆二九年又从凤凰城拔来金州九十名满洲兵。大连地区古今政区的变化很大,所以无法统计今大连地区满人来此的时间和人数户数等。

据笔者采访调查所得，康熙年间迁来大连地区的满旗兵，多系“随龙入关”又“随龙出关”分来此地的，如瓦房店市胜利乡药庙下村的满族老人赵昌智，自称满姓伊尔根觉罗，祖籍长白山八道沟人，于顺治初年“随龙入关”。于康熙二十六年又“随龙出关”到盛京，又分来复州西蓝旗驻防的，道光年间因西蓝旗土薄年荒，乃大部移往双城堡(今双城县)。赵吕智家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因河患迁来药庙下屯的。又如瓦房店市老虎屯满族镇三家子村郭家，满姓郭路路氏。白云祖居长白山六道沟，属镶黄旗满洲付力户佐领下，于顺治初年“随龙入关”到北京住于草帽胡同。于乾隆年间拨来复州，后分居各地。其始祖黑达色官骁骑校，二世祖白起官协领。他家藏有乾隆十六年诰封广宁(今北镇)佐领白起及其妻佟氏的圣旨原件。该圣旨长三公尺，宽三十一公分，用五彩龙纹图案的绫子书写装裱而成。又如瓦房店市三台满族乡西蓝旗村的满旗苍家，满姓萨麻拉氏，白云祖籍长白山二道沟人，于顺治初年“随龙入关”，分驻于北京草帽胡同及固安大王庄。康熙二十六年(1687)其四世祖金太“随龙出关”，拨来复州西蓝旗驻防，占地落户，繁衍至今。金太的四世孙常平曾任开原防御。他家保存有道光二十五年(1845)诰封常平本身及其妻室、诰封常平之父母等两道圣旨原件。这两道圣旨均长2.5公尺，宽33公分，仍是用五彩龙纹图案绫子书写装裱而成。“圣旨”都是满汉文对照书写，汉文由右向左移行书写，满文由左向右移行书写，玉玺加盖在正中间，也是满汉文的各一分。

附白起，常平的三道圣旨汉文部分原文如下：

又如金州七顶山满族乡老虎山村的满族文氏，自言祖籍长白山四道沟人，顺治初年“从龙入关”，属正黄旗满洲舒勒佐领下。其祖先花色于康熙十年(1671)由北京马家胡同拨金州驻防的。其家族一小部分位于老虎山村，其余分居各地。又如七顶山满族朱家，满姓都拉欢氏，自言祖籍长白山三道沟人，属正黄旗满洲宁康佐领下，顺治初年“随龙入关”，康熙七年(1668)其始祖索弘与夫人文氏自北京草帽胡同拨来金州驻防的。其族人定居于大朱家村及小朱

家村(都是朱家定居以后才有村名的),也有分居别处的。又如瓦房店市老虎屯满族镇虎头村满族吴德厚家,自言祖籍长白山三道沟人,属正蓝旗满洲数易佐领下。顺治初“随龙入关”,驻北京穆字胡同,于康熙二十六年(1087)又“随龙出关”,拨来复州驻防的。嘉庆二十五年(1820)其族人一部分拨往双城堡,留复州的一支分布于今老虎屯满族镇各村。

还有未曾“随龙入关”直接从长白山迁居辽南的。如瓦房店市三台满族乡西蓝旗村的满族马家,自言祖籍长白山七道沟人,顺治年间直接从长白山老家拨来复州开荒的。他们家族分别驻于驼山乡、马房身、西蓝旗,北海等地,至今已传十六世矣。又如三台满族乡三台村(乡政府所在地)百岁(1985年)老人那永春自言祖籍长白山头道沟人,顺治年间由长白山老家随军来复州,在康熙年间编入八旗的,他们家族分布在三台满族乡各村。

诰封白起及其妻佟氏

于 闾 内 尔	画 於 戎 行	制 曰 干 戈 载	端 资 硕	琴 瑟 咸 和 更 赖 同 心	张 赫 濯 之 威	和 尚 辑 赴	桓 之 众 功 期 罔 懈 益	宪 大 夫 锡	之 诰 命 于 戏 师 克 在	恩 用 沛 兹	以 覃 恩 特 授 尔 阶 中	干 王 室 车	服 宜 旌 钜 典 式 逢 湛	果 毅 于	行 瓜 牙 攸 寄 懋 勤 劳	司 军 旅 材 裕 韬 铃 迪	领 白 起 职	尔 盛 京 驻 防 广 宁 佐	焕 夫 龙 章	略 思 隆 三 锡 褒 嘉 特	允 资 乎 豹	皇 帝 制 曰 政 重 五 兵 参 佐	奉 天 承 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皇帝制曰戊行效力人臣有御侮

皇帝制曰秩分介胄克抒报

之

国之忱

才策府书勋天室重酬庸之

教始庭帟诞启析薪之诚尔

典

恩

尔开原防御常平才猷英果

多力什乃开原防御常平之

器

父

识沈雄修捍疆隅允称干城

躬笃行训子义方燕翼维勤

之

殫深心于韬略象贤能继廓

选完善封守聿推保障之能

大

特

业于弓裘兹以覃恩赠尔为

賚宠光用申奖励兹以覃恩

武

授

德骑尉锡之诰命于戏恩光

尔为武德骑尉锡之诰命于

上

戏

逮式膺殊渥之施惠泽下流

措一方于 席懋巧成功涣

益

三

表令名之著

锡之丝纶钦予休命

制曰家法严明奖忠教之旧德壶

制曰建威立 国资宣力之臣

仪

说礼

纯备嘉徙宅之前劳尔关氏乃开

敦诗家赖同心之助尔开原

原防御常平之母早习规箴夙姻

防御

训典相夫以礼式彰聚敬之风教

常平之妻刘氏持身淑慎赋

子有成茂展策勋之志兹以覃恩

质才

赠尔为宜人于戏锡翟 以扬

明恒德能修聿著巾褂之范

徽

据《奉天通志》记载，复州最初的驻军是满洲兵 653 名，蒙古兵 84 名，汉军兵 15 名，巴尔虎兵 55 名，都是八旗兵。

关于八旗满洲人祖籍所报的“长白山几道沟”的问题，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按清初“八旗满洲”的成员，几乎集东北诸民族之大成，其中女真人就包括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黑龙江女真的三大部。海西女真和黑龙江女真的活动地域距长白山都很远，只有建州女真诸部在历史上都与长白山或多或少有些关系，尤其长白山三部～鸭绿江部在长白山西，讷殷部在长白山北，朱音里部在长白山东北。然编成八旗满洲时，是在赫围阿拉进行的，都住在今新宾满族自治县及桓仁县北部，木溪县东部一带地。当然这一带在地理上统属于长白山地。苏子河和富尔江各河流域，也有“几道沟”等地名，但这是否就算长白山的几道沟呢？按具体的长白山是指白头山，即天池所在的山块，这个山块周围一道沟到十几道沟的地名有三大组。就是图们江的大支流海浪河流域有一至八道沟的一组地名；婆猪江流域有一至十一道沟的一组地名；鸭绿江北岸有一至十八道沟的一组地名。此外长白山周围称几道沟的地名很多、很多。今天自报祖籍长白山几道沟的，谁也说不出来是哪个几道沟的。而海西女真、黑龙江女真与长白山根本拉不上关系，怎么今天八旗满洲人都成了长白山几道沟的祖籍呢？这显然多数出于牵强附会而来的。这是了解满族史的一大障碍。当然有的人真是祖居长白山几道沟的，如鸭绿江部就住在鸭绿江北岸的一道沟至十八道沟的；朱舍里部是居住在海浪河的一至八道沟一带的；董鄂部是居住在婆猪江的一至十一道沟一带的，这些几道沟都可称长白山几道沟的。如真是这些几道沟的祖籍，也应当说明是哪一组的几道沟才能取信于人。而现在八旗满洲都说自己祖籍是长白山几道沟的，就显然与史实不符了。

第三种，是八旗汉军的后裔：八旗汉军的后裔，是今天大连地区“满族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原因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将金州南门以南半岛上的全部汉族居民。都编入了旗籍。即今老虎滩、青泥洼、小平岛、营城

子一带编为“正黄旗汉军”、金州城西南毛营子、南关岭、大连湾、革镇堡、辛寨子一带编为“镶黄旗汉军”；今长城、龙头、水师营、旅顺街、双岛、老铁山一带编为“正白旗汉军”。这些人都是明末清初，主要是顺治十年(1653)由山东省登、莱、青等府迁来的民户(汉人)。今天这三旗汉军(俗称“汉三旗”)的后裔，已布满了大连直属六区及瓦房店市、新金县等地。如金州区石河满族镇的王家，原属正黄旗汉军。他家祖籍山东省，登州府，福山县古现村人氏，明末，由山东原籍迁于辽东宁远(今兴城县)落户，后又迁至海青岛，(在金州城东南，金新港西北)居住。大清定鼎燕京后，王京又从海青岛迁至金州城，于康熙二十六年编旗时王家投入正黄旗汉军。后世他家宗支繁盛，世代 纓。今其族人主分布于石河满族镇、革镇堡、金州镇北三里庄及七顶山满族乡的梅家村、瓦房店市的长店堡等地。单只石河满族镇，王家的人口就占全镇一万多满族人口的一半以上。王家宗谱记载其源流颇详细，其谱序云：

吾王氏原籍山东登州府福山县古现村人氏，当明末，迁来关东，先在宁远落户，后来搬到海青岛居住。适至清朝定鼎后。始由海青岛徙于本城。康熙初。在满军八旗外增设汉军，是以我祖先投汉军正黄旗。儿孙当差后，即有王连贵任汉军正黄旗佐领，于乾隆三十七年八月，在城北三里庄祖莹为其祖考永福公祖妣金太君、曾祖考有功公、曾祖妣唐太君立碑，以光祖德。嗣有王连文孙王安邦，王安广兄弟俱任佐领之职，亦于该地立碑，纪念祖先。我曾祖考廷玺公原任汉军正黄旗佐领，四品顶戴，同其胞弟廷瑶公(道光十四年甲辰举人)共立龙头碑于祖莹。此系不忘根本之谓馱，仅知梗概如此而矣，备作后人参考耳。(原谱行文乃下行右移繁字)

此谱序为石河满族镇居民王世捷所著，谱存王世捷家。谱上始祖名王孝吾，原居福山县古现村者。王永福为王孝吾第三世孙，王连贵为王孝吾第五世孙。王安邦、王安广为王孝吾第七代孙，王廷玺为王孝吾第八代孙，王世捷为

王孝吾第十一代孙。王氏谱书一厚册，其中载录数千人。王氏祖莹碑文中叙其世代分支繁衍情况更详细，都是研究旗人~今“满族”源流的宝贵资料。

又如金州区七顶山满族乡大莲花泡村自的满族周家，为正白旗汉军之裔，他家祖籍云南，后移至小云南(在山西)，又由小云南移至山东登州府大水泊(今文登县治)又由大水泊迁来旅顺，于康熙五十三年被编入汉军正白旗，今其族人仍多居旅顺。又如七顶山满族乡大朱家村的满族夏家，为镶黄旗汉军之裔，他家祖籍山东省，后迁来金州城西南毛营子，康熙五十三年被编入镶黄旗汉军的，其中一支后迁来大米家村。此外庄河县桂云花满族乡有镶蓝旗汉军的后裔，主分布于该乡二道岭、三道岭村，如二道岭村书记曹希勇(1986年顷在任)，祖籍山东省青州府安邱(其祖莹碑中误作安秋)县大曹家沟人。曹希勇的前十六世祖曹邦远，约曲明正德(1506~1520)年间自原籍迁来二道岭落户的。清初曹家依附于巴尔虎旗人，后在雍正四年(1726)顷，被抽出编入镶蓝旗汉军的。二道岭居民多为满族曹氏。桂云花满族乡居民异口同音称曹希勇家为“老满洲”。概曹家是最早开发桂云花一带的旗户之一。因此笔者先后两次拜访了曹希勇同志。他家宗谱及祖莹碑对其家史记载甚详。桂云花满族乡的满族四大姓一一曹、刘、唐、张都是汉军旗后裔。刘、唐、张三姓祖籍都是山东省登州府莱阳县人氏。里姓亦桂云花满族大姓属八旗满洲。

第四种，其他原因成为今满族的：

(一)巴尔虎蒙古人的后裔：巴尔虎蒙古人于康熙三十一年编入八旗满洲后，拨到今大连地区的有三佐领，分驻于复州、金州、岫岩三城。在岫岩的巴尔虎人有两支驻于今庄河县吴炉乡的巴尔虎营子和太平岭满族乡的土城子等地。他们现在多数报满族，少数报蒙古族。如七顶山满族乡大莲

花泡村的满族车家，就是巴尔虎蒙古人的后裔，其始祖车三会是康熙三十一年拨来金州驻防的，由车家宗谱上得知车三会是骁骑校。又七顶山满族乡七顶山村的满族姓满的，也是巴尔虎旗的后裔，其祖莹有碑文（见本文第十五节）。巴尔虎旗的后裔。以寇姓为最多，大连满族的寇姓，约占大连地区满族总人口的十四分之一。大连满族以关、赵、寇、王为“四大姓”。巴尔虎寇姓主分布于庄河县的高岭满族乡的来宝沟、曲木房、老蚕场；太平岭满族乡的土城子、吴炉乡的巴尔虎营子；塔岭满族乡东瓜川；大营乡的四家子等地。

（二）旗人女儿的后裔；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取消旗、民不通婚的禁令后，民国以来旗、民通婚已成普遍现象。由于几千年男权思想的作祟，旗人男性的子女当然还是旗人，今天都报满族。旗人女性的子女呢？今天也多报的满族，称为“随旗”。好象与随父报满族的人有所差别似的。

（三）随旗的满族；这是指并非旗人女儿的后裔。所谓“随旗”，是他们的父母都不是旗人，但他们的祖先都与旗人有长期密切的关系，从而加入旗籍的。有的是其祖先从关内随旗人出关，或从关里逃荒到关外依附旗人为生，而成为旗人的佃户、农奴、世仆等。因长期依附于旗人，生活习惯均已“旗化”，所以今天也报了满族，他们也自称“随旗”。

第二十五节 北京

北京市辖十三个区、四个县。据 1959 年统计，总人口为 6, 259, 687 人，其中满族 89, 181 人，占总人口的 1, 45%。据 1982 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统计，全市总人口 9, 230, 687 人，其中满族 116, 776 人，此外有回族 184, 693 人，蒙古族 9, 577 人，朝鲜族 3, 909 人，壮族 1, 789 人，其他少数民族 5, 353 人，合计少数民族共 322, 207 人，汉族 8,

908, 480 人。

北京市的满族都是“外来户”，都是顺治帝入关后。驻防京师八旗兵的后裔。大清帝国全盛时期，全国有旗兵二千多个佐领，二十多万官兵。其中半数驻防京师，称为“京旗”，半数分驻全国各军事要地，称为“驻防八旗”。（参看本交第十、十一节）

京旗的详细人数《清史稿·兵制一H卷130》中记载：京旗职官六千六百八十人，兵丁十二万三百九人”。《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71，八旗都统条）记载驻京八旗在乾隆二十二的佐领数是一千一百六十五个半。其中满洲旗分佐领六百七十八个半。蒙古旗分佐领二百二十一个，汉军旗分佐领二百六十六个，合计如上数。每佐领兵丁平均约一百名，兵丁总数应为十一万至十二万名之间，总之京旗官兵总数是十二万左右，是国防力量的核心、主力。

京旗的防地是按五行生克关系配备的，即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并在北方，北方属水，而黄色属土取“土能克水之义”。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并在东方，东方属木，而白色属金，取“金能克木之义”。正红旗驻西直门内，镶红旗驻阜城门内并在西方，西方属金，而红色属火，取“火能克金之义”。正蓝旗驻崇文门内，镶兰旗驻宣武门内。；并在南方。南方属火，而蓝色属水，取“水能克火之义”。这和今天北京满族的分布还有一定的关系。

今天户籍册上的“满族”，基本上是清代的旗人后裔。（参看本书第十五节）今天北京的满旗，都是京旗的后裔，是满洲旗分，蒙古旗分、汉军旗分融合而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小部分。《清史稿·兵老一》中所载的京旗官兵总数是126, 989人，是乾隆时的数目，乾隆时对旗人的兵役是“八丁抽

一”，则京旗的壮丁数是兵数的八倍，即 $8 \times 126,989$ 人，是1,115,912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则彼时北京旗人的数目当在三百万以上，而现在北京的满族人口，1957年是85,301人，1959年是89,181人，1982年是116,776人，只有乾隆时京旗人口总数的三十分之一，彼时壮丁数的九分之一。而乾隆时全国总人口尚不足三亿，彼时的领土是一千二百六十万方公里，今天只有九百六十多万方公里，却有十多亿人口，从这个比例上看，现在北京的旗人应当有多少呢？而北京现在的满族却只有十多万，原因何在呢？

其一是辛亥革命推翻大清帝国的统治后，大部分旗人憧憬着将会有一场血腥的民族报复(满汉之间)和阶级报复(旗民之间)的发生，尤其旗人中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更加恐惧，所以有些旗人，尤其满旗人都想方设法报了民人~汉族，从而蒙混下去，这在自然情况上是轻而易举的。因到清末，旗人与民人之间，满人与汉人之间，除了人为的政治上的不平等待遇外，人与人之间，在体貌上、语言文字上，风俗习惯上，宗教信仰上诸多方面的差异实在太少了，所以旗人报民人，满人报汉人皆很容易，只要没有熟人在眼前，就没有什么不妥的。

虽然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没搞什么民族报复和阶级报复。但无知的反动军阀们，是搞了一些对旗人的报复，即压迫歧视活动。如宁夏银川新满城居留的旗人，在1935年还遭到反动军阀马鸿逵的全部驱逐，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见《满旅社会调查史》165页)。在北京流传一个故事说：一个北洋军阀的小军官，骑马行于街市上，见一旗人。小军官问曰：“你是干什么的”？旗人答称：“小人是旗人”！小军官勃然大怒说：“老爷骑马你骑人？该打”。举手就打了旗人几马鞭子。旗人忙说：“不是，不是！小人在旗”！小军官仍佯怒曰：“再骑！再打”！说着又是几鞭子。旗人无奈，只得隐忍而去。这虽然是个故事，但它反映了彼时一些旗人受压迫受歧视的情景。所以旗人改报民人，满人改报汉人还是有远见的。

其二是八旗官兵及眷属们，在清代只能靠国家发给的饷粮过生活，不准许旗人有其他生产活动，不得与民争利。清室倒台了，旗人的生活来源断绝了。原来的大小官员们，靠他们积累下来的财富，还可继续生活下去。而下层兵丁们就什么依靠都没有了，只有走死逃亡，多数人不得不离开京师、到外地去谋取生路，本节后面檀营村的情况，就是清朝灭亡后，北京旗人历史的缩影。这就是大清帝国首都北京今天只剩下了十多万满族的历史根源。

新中国建立后，正确的民族政策，使所有的少数民族都得到了真正的平等对待，少数民族更得到较多的优待与照顾。少数民族成员们无不感戴新政府的深思厚泽。但要彻底弄清每个人的族籍，已成为不可能的历史事实。因凡属中华民族的“族中族”，都有着千丝万缕的互相渗透，都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尤其汉满两族之间满蒙两族之间、汉蒙两族间已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事实。绝大多数汉满之间，已难找到没有民族间鱼龙演化关系的、纯粹的的个人，所以有的已报汉族的满族~旗人不想再改报满族，这种情况以城市为最多，城市中尤以知识阶层为最多。所以北京的满族人口永远也不会有大幅度的回升，更不会恢复乾隆时的数目。

在《满族社会调查史》中1959年北京的满族人口是89,181人，其分布的情况是东城区20,185人，西城区19,214人，朝阳区10,434人。这三区满族人口的合计是49,833人，合全市满族总人口的半数以上。其次是崇文区3,242人，宣武区3,853人，海淀区9,313人，丰台区3,289人，通州区115人，大兴区1,590人，周口店区1,717人，门头沟区176人，昌平区573人，密云区6,404人，顺义区894人，平谷区10人，延庆区2,684人。

怀柔县 5,490 人。1982 年全国人口第三次普查时，北京市满族人口回升到 116,776 人。以上的数字和分布情况仅供参考。

现在北京市的满族基本上是与汉族杂居的。在市区内只有西郊西山脚下的健锐营故址，和东郊的松树、南营(朝阳门外)尚有小的满族聚居点。全北京市已成立了三个民族乡，其中有怀柔县的、“喇叭沟门满族乡”、“七道沟满族乡”和密云县的“檀营满族蒙古族乡”。

檀营满族蒙古族乡，自清亡到现在的变化情况，是这段时间内旗人历史的一个纵断面，兹简单介绍如下：檀营村原属密云县城关公社，在 1959 年顷全村人口除因修密云水库迁来的新户外，原来本村的户口为 1,188 人，其中满族 760 人，占全村原总人口的 63.9%，蒙古族 166 人，占全村原总人口的 14%，满蒙人口总合 926 人，占全村原总人口的 77.9%。

“檀营”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直到民国初年，一直是清帝驻扎亲兵的营房，民国十七年(1928)才改称檀营村。以前驻扎马甲 2,000 名，(其中八旗满洲兵 1,600 名)加上官兵的眷属，共有旗人 9,000 名，(其中满族 6,900 名)。这九千旗人中，有原来副都统以下官员 49 名，(其中满旗 37 名)及其家属占原总人口的 3%左右。其余 97%为兵丁及其家属们。

辛亥革命后，原驻檀营的贵族官员们，都先后迁回北京城或其他城市，用他们原有的较兵丁们不同程度的富有的财产，继续过他们不同程度的较优裕的生活，而留在檀营的兵丁差役及其家属们的生活则完全陷于绝境。他们原来靠“铁杆庄家老米饭”(粮饷)生活的，什么生产知识都没有。再加反动军阀的残酷压榨和部分汉人的歧视，使他们“拆典当卖，死走逃亡，卖女卖儿，妻离子散”。据檀营老人的回忆，自民国三年(1914)至解放前(1949)前的三十几年间，该村大约有 6,500(其中满旗人 4,600)多人逃亡在外。外逃最多的时间是民国九年(1920)至民国十五年(1926)。外逃人中大约有 2,000 人(其中满旗人 1,400)多人至今下落不明。最后留在檀营的只有 2,000(其中满旗人 1,

650)多人。其中多数没有生产能力,只有少数年青力壮的,开始揽地种、当长工、短工、或割柴草、挑担走乡串村作小本生意,能维持部分人的生活。有的人连这些活也找不着,或干不了,则只有在死亡线上挣扎了。有的沦为乞丐,从而檀营被称为“花子村”。由于饥寒交迫加疾病,大约有一千(其中满旗人770)多人死亡了,大约有百多户人家卖掉了儿和女,拆散了夫妻。民国六年(1917)和民国十年(1921)灾难最严重,有一天就死亡三十多口人(其中满旗人十名)。金村九千多人,到解放前只剩下了210户(其中满旗人167户)906(其中满旗人760)人,其中鳏、寡、孤、独的单身人有70户(其中满旗人66名)。原来檀营有瓦房4,800(其满旗人有3,800间),只剩下了590(其中满旗人的350)间。解放后,檀营的满旗人,蒙古旗人的贫民都得到了新生,在政府的扶助、照顾、救济下,到1958年全村都达到了有吃、有穿的温饱生活。

第二十六节 锦州市地区

现在锦州市地区,包括市直属的古塔、太和、南票、凌河、葫芦岛等五区及锦、义、锦西、兴城、绥中、北镇、黑山等七县。

在1953年的调查统计中,锦州市地区共有人口2,337,169人,其中满族为226,338人,占全地区总人口的9.68%。彼时满族的分布是:市直属五区9,566人。锦县64,035人,义县10,246人,锦西县10,800人,兴城县64,053人,绥中县63,158人,北镇县45,515人,黑山县23,000人。到1981年顷,锦州地区的全人口增加4,467,909人,满族人口按1953年的9.68%计,相应为440,515人。到1989年,按照辽宁省及大连市地区满族人口变化的情况估计,锦州市地区的满族~旗人的人口应在六十万以上。

到 1989 年底止，锦州全区的 198 个乡镇中，已有 74 个满族乡镇，一个回族满族镇。其中，兴城市有曹庄，羊安、元台子、白塔、闻家、望海、刘台子、大寨、围屏、高家岭、碱厂、三道沟、红崖子、旧门、药王庙、拣金、海滨等十七个满族乡；沙后所、东辛庄、郭家等三个满族镇。（该县共有 26 个乡镇）绥中县有宽邦、大王庙、荒地、大台山等四个满族镇；西平坡、葛家一高台、高甸子、黄家、范家、明水、网户、叶家、沙河站、小庄子等十一个满族乡。（该县共有 29 个乡镇）北镇县有常兴店、正安、中安、赵屯、青堆子、高山子等六个满族镇；大市、富屯、汪家坟、罗罗堡、鲍家、广宁、高力板、曹屯、大屯、五粮、窟窿台、沟邦子、吴家、柳家、新立等十六个满族乡，闾阳一个回族满族镇。1989 年 1 月调查，北镇县已有满族 302, 853 人，已发展有 22 个满族乡镇（全县共有 25 个乡镇），1989 年 6 月国务院已批准北镇成为满族自治县。义县有稍户营子、九道岭二个满族镇、头道沟、地藏寺、留龙沟、大定堡、聚粮屯、车坊、瓦子峪、罗家屯、红墙子、头台等十个满族乡。该县总共有二十三个乡镇。黑山县有白厂门、无梁殿二个满族镇；司屯、镇安二个满族乡。该县总共有三十一一个乡镇。锦县有右卫一个满族镇；温滴楼一个满族乡。该县总共有三十二个乡镇。锦西县有二十七个乡镇，无满族乡镇。总的看锦州市地区是辽宁省一个重点满族集居区。

锦州市地区满族人口分布的史地情况是：一部分分布在沈阳至山海关间的要道上，都是明清争夺战中的军事要地。一部分是交通比较便利，土质又肥沃的地方。前者是因军事目的而进驻旗兵的，后者是清朝的王公贵族们建立庄园而聚集旗人的。

今天锦州市地区的满族，小部分是八旗满洲的后裔，绝大部分是八旗汉军的后裔。

（一）八旗满洲人未锦洲地区的历史：自 1622 年（明天启二年、金天命七年）至 1041 年（明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间，清军先后攻取了明朝的闾阳驿（在

北镇县西南边境，今已建回族满族镇)、广宁(今北镇县城)、锦州(今锦州市治)、宁远(今兴城县治)后，即随时派八旗兵驻防各该地，皆当时兵家所必争之要地。后在锦州设副都统衙门。各地驻防八旗兵中，都只有少数八旗满洲兵。其后裔在今锦州市、北镇县的今满族中。

兴城县清时为宁远州，常驻八旗兵 200 名，其中有满旗兵 20 名。顺治、康熙年间，先后在山海关以东至锦州以北汉蒙交界地带设立了七座“边门”，即：明水边门(在夸绥中县北中部)、白石咀边门(在今兴城县西北逆境的上坎子附近)、宽邦边门(今绥中县东北角宽邦满族镇政府)、犁树沟边门(在白石咀子边门东北五公里许)、碾子沟边门(在犁树沟边门东北、新台边门西南)、新台边门(在锦县西北角与北票县边界上)、松岭边门(在锦州市西北边境外朝阳县境内)。边门上均驻有八旗兵，如白石咀边门彼时常驻八旗兵 40 名。其中满旗兵五名。

在 1953 年的调查统计中，兴城县六万四千多满族中满旗人后裔只有二千名左右，其余均汉军旗后裔。就整个锦州市地区今满族内的成分(满族的族内族)看，基本上都是汉军旗后裔，满旗后裔只有十分之一左右。

(二)八旗汉军在锦州地区的发展史；锦州地区八旗汉军的来源可分为四种：

第一种，投充旗下者：大清定鼎燕京后，此“关东走廊”一带地的汉族居民，为政治形势所迫，只好投充旗下。如绥中县今满族陶玉坤的祖先，原居上海，传说于明洪武年间，因犯罪被遣发关外，开荒种地落户于该地，到明末陶家已发展成一大家族。当明清战争中，陶家有 56 人死于战乱中。其余陶家人被迫

投充旗下，获得得旗籍，其原有的土地即破称为旗地、照旧由陶家耕种，每年向旗衙门交租，比民人向国家交租轻得多，社会地位又高于民人，故自愿如此。又如杨慎之的祖先，原系山东登州府人氏，于明天启年间(1621~1625)选荒来此地，到清顺治间，投充旗下获得旗籍。再如绥中县今满族李再南、范承路等人的祖先是同样情况加入汉军旗籍的。

第二种，降军入旗者，明清交战中，投降清军的明朝官兵，一般情况下是编入汉军八旗的。如绥中县今满族凌汉源的祖先，是明朝驻守山海关的兵士，投降清军以后，被编入汉军八旗。又如绥中县今满族石庄头的祖先、原是山东济南府人，曾任明朝驻辽阳的指挥使，投降清军后，被编入汉军八旗的，并奉命驻中后所(今绥中县城)掌管皇庄事务。

第三种，是拔民来此开荒，从而投入旗籍者：顺治、康熙之间，在关外土质肥沃的地方设庄固、放庄头、并从关内拔民户来此开垦。拔来的汉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平定三藩之乱后，将其属下调拨到此地，编入庄内，从事生产劳动；一种是从直隶、山东拨来开荒种地的民户。据说到这里的民户，入旗与否？

听其自愿。他们有的是进入庄园即隶旗籍的，有的是独立开荒种地向民衙门交租，始终还是民户。凡入旗籍的，在清代他们都是旗人，今天都报的满族。凡民户，今天都报的汉族。

第四种，是因给旗人贵族服务的匠户，从而加入旗籍的：当时关外王公贵族等所需的生活用品，是由关内拨来一批手工业者，按照贵族们的需要进行生产的。这些人被编入汉军旗籍，做为贵族们的奴仆来使役的。如义县今满族中的汉军旗后裔，就有一部分，其祖先是拨给固伦公主的“七十二匠人”中的成员

附记：

这一篇《锦州地区满族的源流》是根据《满族社会史调查》、《辽宁省县名志》、《辽宁省地图册》)分县附说地图、辽宁省测绘局编制)、

《东北地方史稿》(张博泉著)、《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图》(辽大历史系印)、《全国满族自治县,满族乡镇》(载《满族研究》1988,4及1989,4)及伪满时的分省地形图等参考编辑而成者。因所据资料较旧,新资料太少,故自知不甚理想,仅供参考而已。

据1990年初的消息,除上述五个满族自治县外,国务院又先后批准了成立吉林省伊通、河北省围场、宽城,辽宁省本溪、桓仁、宽甸、北镇、清原等八个满族自治县。

第七章 锡伯旗人源流

第二十七节 锡伯源流综述(附图三)

锡伯,为蒙古语“Shibiz”之音译,为“沼泽”之意。指的是以嫩江下游西岸月亮泡为中心的一片大沼泽而言。这片大沼泽北到齐齐哈尔东北,南到新开河流域,西到乌兰浩特西北的索伦,东到哈尔滨以西,总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与浙江省的面积相当。

这块地域内湖泊星罗棋布,河流纵横交错。这里的方言对湖泊通称“泡子”。著名的泡子有洮儿河下游的月亮泡(运粮泡)、霍林河下游的查干泡、乾安县西南的达布苏泡、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南的俄克碱泡等。其余的泡子与沼泽间的界线并不十分清楚,泡子水面的大小随季节、年代的不同多有变化。河流与沼泽间的界线也不稳定,涝年的雨季则河流沼泽连成一片,芦苇丛生,故隋唐时代对此地有“辽海”之称。这块沼泽的西侧为大兴安岭的东麓,古代森林茂密,鸟兽成群,所以这一带是渔猎民族的天然“乐园”。

在这块沼泽间，今天属于泰来县的塔子城，即明代锡伯族活动的中心城市“绰尔城”。此城曾为辽朝的泰州、金朝的泰州及乌骨敌烈部的治所。今洮安县的四家子，曾为辽朝长春州、金朝新泰州的治所，今郭尔罗斯前旗蒙古族自治县及大安县、肇源县一带，曾为达鲁古部牧地。

这块沼泽地域在元明间均为蒙古族统治地，蒙古人依自然状况称之为“Shibiz”（溪泊）是合乎客观现实的。

我们开始汉译这“Shibiz”一词时，就应还原用“溪泊”二字。这“溪泊”一词的读音与含义都与蒙古语相符合，且又与满语“sibe”（铍草）一音偶合，而这一带又真的多生铍草。

“溪泊”（Shibiz）地名如上所述。锡伯“溪泊”的部族名是因此族人久居此地而得的。明清之际女真诸部之得名，基本都是由其所居地名而来的。如哈达部是因其久居哈达河（今辽河东来的一小支流，今名清河）而得名；苏克素护河部是因其久居苏克素护河（今苏子河）而得名；乌拉部是因其久居乌拉（江边之意）而得名；鸭绿江部是因其久居鸭绿江畔而得名，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则锡伯（Shibiz）因其久居溪泊地方而得名，是合乎当时习惯的：就如今天因久居辽宁而称辽宁人，因久居沈阳而称沈阳人，都是顺理成章的事。

女真族的“瓜尔佳氏”今多姓关（原用官字）也有姓金（如鳌拜的后人）和姓葛的，及金国后裔之大姓，其人口约占女真人全数的四分之一强。其得姓也是由于久居“安图（安土”瓜尔佳城”而来的。安图瓜尔佳城故址，据《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與图》所记，当今新宾满族自治县上夹河乡腰站子村附近。瓜尔佳因人口繁盛，故部落很多，分布地域很广；散处于苏完（今吉林省双阳县）、叶赫（今吉林省梨树县叶赫村）、纳殷（讷殷、内阴，在今松花江上源二道自河一带）、哈达（故城在今开原县东，南城子）、安楚拉库（今吉林省安图县南部）、裴悠城（今吉林省珲春县三家子乡高力城子）、瓦尔喀（在裴悠城北）、嘉木瑚（？）、尼玛察（今苏联乌苏里斯克（双城子）、辉发（今吉林省辉南县城东北辉发城）、长白山各地，而以居苏完地方者最盛。

约当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前后,有苏完地方的女真瓜尔佳氏兄弟三人分掌部落,长兄名佛尔和,次兄名尼雅哈齐,三弟名珠察。于刷靛河(刷烟河、苏瓦烟河、双阳河)地方分离:佛尔和仍居苏完,尼雅哈齐向西北迁于溪泊地方,珠察迁于瓦尔喀,又南移于希尔希昂河渡口(其地当今图们江由北岸,波谢特湾之北)。

尼雅哈齐迁于溪泊(Shibiz)地方后,又分居成两部;其中的一小部分居溪泊东北部,即今黑龙江省肇源县一带,用原姓“瓜尔佳”为部落名,后往复汉译成“挂勒察部”。《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上注明的很清楚。其大部分居于溪泊中部及西部,以绰尔城为中心,印以所居地名为部落名,称Shibiz部-本应汉译为“溪泊部”,或作“西北部”亦有理,因其地在故居苏完部,即长支佛尔和部所在地的西北方,后写作锡伯,席北等等很多同音名称。

溪泊地方,元末明初在兀良哈蒙古控制中,明初先后于此设置了三个卫所。三卫即:泰宁卫,洪二十年(1387)建,在今吉林省洮安县城附近;朵颜卫,洪武二十二年建,在今绰尔河流域的朵颜山附近;福余卫,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建,在今齐齐哈尔东北呼裕尔(福余)河流域。合称“兀良哈三卫,或朵颜三卫”。

大约在明仁宗洪熙(1425)年间,元太祖铁木真之弟合萨儿的十四世孙奎蒙克哈喇因避难由海拉尔河以北原牧地南徙于兀良哈三卫控制地内,成为兀良哈的附属部,称为“科尔沁蒙古”。大约在明英宗正统(1436~1448)年间,兀良哈三卫南迁于大宁(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以西)境内。科尔沁蒙古继承了兀良三卫的故地,与锡伯部和平共处。

“锡伯部”之名最早见于《满洲实录》所载的“哈达世系”哈达国汗姓那喇名万，本扈伦回族也，后因住哈达处，故名哈达，乃乌拉部彻穆木之子，纳齐卜录第七代孙也。其祖克锡纳都督被族人达尔罕所杀。万遂逃往锡伯部(锡伯部名首见于此)绥哈城。其叔旺住外兰逃至哈达为部长。哈达部叛，旺住外兰被杀。其子博尔坤杀父仇人，请兄万，为部长…。

万高寿，至1582(明万历十年)年死去，推算其青年逃往锡伯部时，当在明嘉靖(1522~1565)初年，即十六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此时已有“锡伯部”。(见徐恒晋，马协弟著《锡伯族考略》载于《锡『白族史论考』》)

明武宗正德(1506~1521)年间，科尔沁蒙古强盛起来，控制了嫩江流域全部及西辽河以北地区，锡伯部、挂勒察部均沦为科尔沁蒙古的属部。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女真族的叶赫首领纳林布禄纠合哈达、辉发、乌拉(与叶赫合称“扈伦四部”或“胡笼国”)、朱舍里、纳殷等女真部落，及科尔沁蒙古与其所属的锡伯、挂勒察两个女真部落，(锡伯之名于此为二见，挂勒察之名于此为首见)共九部联军进攻“满州”(建州)。被努尔哈赤击败于古勒山(今新宾满族自治县西北境古楼村北)。史称“九国之战”或“癸巳之战”。其后即有锡伯部人先后投归努尔哈赤：如努尔哈赤天命十年(1625)《洲老档》记有“锡伯部巴达纳，奔其祖先世居之地，率丁三十名来投，有功，升为备御”(此为锡伯部名第三次见于史录)。又有“胡岱、巴珠、格卜库等三人自锡伯地方携妻子来投，有功，其子孙世代勿令当差”等。

癸巳之战后，锡伯及挂勒察部落组织即不存在，沦为科尔沁王公贵族之私属。

皇太极天聪四年(1630)科尔沁蒙古全部归属于后金。崇德元年(1636)科尔沁左翼族，左翼前旗，右翼旗、右翼前旗、右翼后旗，顺治五年(1648)置郭尔罗斯前旗，后旗，杜尔伯特旗、扎赉特旗；顺治六年置科尔沁左翼后旗。以上

统称“科尔沁十旗”，（这不属八旗制度）。原在科尔沁蒙古的锡伯人大部分按姓氏编成牛录，分别属于科尔沁各旗中。

科尔沁十旗，每旗设扎萨克一员为旗主（不称固山额真）以原来的王公台吉等任之，下设管旗章京、参领、佐领、骁骑校等职官。锡伯人可任参领、佐领、骁骑校等官：

康熙三十一年（1692）初圣祖将科尔沁蒙古所属的锡伯人，挂勒察人，达斡尔人等共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八丁，全部赎出，除老幼奴隶外，可披甲者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余丁，分别编成八十四个牛录，均属“八旗满洲”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等。分驻于齐齐哈尔、伯都纳、乌拉三处，隶于黑龙江将军及宁古塔将军（驻乌拉）管辖，统称为“伊彻满洲”。其后有从绰尔河流域继续来降之锡伯人，以其“归义来迟”，未获得满洲称号。

是年底科尔沁王公台吉等续献因病漏查的锡伯人等七名；其中有“科尔沁扎萨克图郡王鄂齐尔旗一等待卫珠克图家锡伯丁鄂退；二等台吉鄂齐尔所属费延图家锡伯丁阿布萨哈、阿尔彬；扎赉特固山贝子纳逊旗四等合吉乌鲁卓·波克齐家锡伯丁奇塔特；郭尔罗斯扎萨克旗阿哈泰佐领下莽色家达斡尔丁济兰泰、霍济泰；哈济噶尔家达斡尔丁齐勒泰等，对其主仍各赏银八十两”。这说明抽赎是很彻底的。

从科尔沁赎出的挂勒察人，只是挂勒察人的一部分，其余部分是早在太祖、太宗时已先后归服于满洲了，《清实录》中记有三次出征卦尔（勒）察的史事：

(一)天命十年八月，上(太宗)命雅护、喀穆达尼，率兵征东海北路卦尔察部，获其二千人以归，上出城迎之，赐宴而还。

(二)天命十一年丙辰，往征卦尔察部落大臣达朱户，俘获人口及马牛以归。

(三)崇德二年十二月甲辰，命叶克书、星讷等率兵六百往征卦尔察(但翌年四月甲午朔条只记叶克书至萨哈尔察，俘获男女人口马牛以归，未明言是否为卦尔察部)

赎出的锡伯、卦勒察、达斡尔人等编入“八旗满洲”原因如下：

(一)当时沙俄的侵略魔掌已伸入我黑龙江北岸，筑雅克萨城(在今莫河县北江北岸)为久居计。我国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以武力赶走了侵略者，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订立尼布楚条约，划定了国界。但沙俄贼心不死，又策动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准噶尔噶尔丹叛乱，东侵喀尔喀蒙古，大批喀尔喀、巴尔虎等蒙古部众东逃耒嫩江流域，当地秩序大乱。为国防土及地方治安上的需要，只有将属于科尔沁蒙古的与满洲同祖的锡伯、卦勒察、达呼尔等人抽出，编入“八旗满洲”为有利。

(二)锡伯人、卦勒察等人，在彼时较满洲人落后，性喜掠盗，既清政府官员往返黑龙江路经其地者，也常遭彼等打劫。案件发生后，黑龙江将军以彼等属于科尔沁蒙古，不便直接查问，只能咨文理藩院。待理藩院派官往查时，已事过境迁，查询不易，故十之八九的案件只能不了了之，对其掠盗行为则无法禁止。

(三)科尔沁统治者对所属部众剥削残重，对其奴役的锡伯人、卦勒察人等当然更重。康熙帝又以锡伯人、卦勒察人与满洲同族，反而役属于科尔沁蒙古为可耻。

基于以上原因，圣祖认为只有将锡伯等人抽出，编入“八旗满洲”为得策。但科尔沁为帝室之姻亲，又是最得力的藩部。不能无偿地调出他们的私属，因而采取了“赎赏办法”。

锡伯、卦勒察、达斡尔人等赎出后编队及驻防的情况是。

(一)齐齐哈尔地方，当时在国防上最为重要，从其附近居、住的锡伯人、达斡尔人中选出一千人为披甲，驻于齐齐哈尔地方，筑城镇守。又选出二千六百名为披甲之附丁，合编为二十四牛录，其中锡伯人十九牛录，兵丁二千八百五十名；达斡尔五牛录，兵丁七百五十名。因原来属于科尔沁时，达斡尔人任官者少，因之此二十四牛录的佐领均以原任官的锡伯人充之，故此二十四牛录统称“锡伯牛录”。

规定“各官兵原来住于大路附近方便地方者，仍准其居住原地。凡居住远离大路拐弯之处及嫩江西岸者，皆迁于嫩江东岸依次安置，并酌设头目，以便督察”。

(二)伯都纳地方亦水陆通衢，其周围乃三江汇合之低湿地，唯伯都纳为一较大台地，较为乾燥，便于筑城居住，于是在伯都纳旧城西方修筑一座新城。从伯都纳附近居住的锡伯人、卦勒察人中，选出壮丁二千名披甲，镇守伯都纳新城。又将原住于科尔沁所属地方，如西喇木伦河及辽河流域的锡伯人，都集中于伯都纳附近；抽出其中二千壮丁，为原驻防兵之附丁。此前后四千名兵丁合编为四十个牛录。其中锡伯兵三十牛录，卦勒察兵十牛录。该四十牛录之官员，均于原有官员内选用。此四十牛录又分为左右两翼，每翼设协领、防御各一员管领之，均由满洲人担任。并将宁古塔副都统移驻于伯都纳，总统两翼事。又以图西吞地方为松花江嫩江汇合口，关系重要，由伯都纳副都统于原驻伯都纳的兵员内，抽调披甲五百名、附丁一千名前往驻防。

(三)乌拉亦关东军事要衢，又是造船基地，原有兵员不足调用。以宁古塔将军(时驻乌拉)佟保奏请，奉准，将距乌拉较近的锡伯人移住于乌拉，编成十

六个牛录驻防乌拉。彼等的村庄田亩和附丁大部分仍在怕都纳地方。另外又编成四个牛录，驻防西喇木伦地方，其村庄田亩附丁亦在伯都纳地方的搜登、伊勒门、萨伦等地安置。此二十牛录官兵，均由宁古塔将军管辖。（以上均参看《清实录》康熙三十年四月乙巳条）

以上从科尔沁蒙古赎出的锡伯人、卦勒察人、达斡尔人等。其编成八十四个牛录，他们的任务是“驻防城池、坐卡巡边、保站护台、防范盗贼。其附丁则自备耕牛、种籽、开垦种田”。当时共有附丁七千四百名，其中一半供养披甲，一半交纳官粮。每丁每年交纳五斗。

清政府以重金从科尔沁蒙古申赎出锡伯人、卦勒察人、达斡尔人等编入“八旗满洲”，对清政府来说，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英明措施。对锡伯等人来说，是他们历史发展上，一个大跃进的阶段。从此，彼等的经济由落后的渔猎放牧，进入了当时比较进步的农业阶段。

清政府规定，对锡伯人、卦勒察人、达斡尔人等，“各旗牛录有赤贫无耕牛者，以该牛录家资宽裕人等之犁协助耕种。有因病耽误无人耕耘耨收者，以牛录之力相助。有违令怠惰者该员责罚之。倘不此畏，仍旧怠惰，则来衙署首告，从严惩之。贫困无牛者，不以牛录之力相助，则将该管官员领催等严加治罪。“还规定三年免征官粮。

由于清政府一系列有利于锡伯等人生产力，发展及扶贫的措施，和锡伯等人的勤奋努力，使其农业生产得到快速进步。所产粮食除供应披甲及交纳官粮外，尚有盈余。例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驻齐齐哈尔的锡伯二十牛录协领瓦勒达、佐领扎斯秦等奏称：

我等锡伯原系蒙古之奴，蒙皇上重佑，赎出为兵，食俸饷、赐生计，故历年足获粮食。今将迁往归化（后实迁往盛京）请将我等现在迁移十二牛录官兵之私粮一千斛（每斛为一石；后改为五斗）贮入本地（指齐齐哈尔）粮仓。

虽然这盈余数目并不算多，但足以说明彼等已丰衣足食。

在政治地位方面，锡伯、卦勒察、达斡尔等族人，由科尔沁蒙古役属的附庸或奴仆，一跃而变为“八旗满洲”的成员。上升为清帝国统治阶级的“统治支柱”的一部分，比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绿营兵（绿旗兵）的地位都优越，可谓“一步登天”。

在文化方面，自编入“八旗满洲”以来，也得到了发展。锡伯人原与满洲人同操女真语言附属于科尔沁蒙古期间，他们又通蒙古语，编入“八旗满洲”后又都使用满语，但其中实夹杂一些蒙语。康熙三十四年（1695）又为锡伯、卦勒察、达斡尔、索伦等族在墨尔根（今嫩江县）设立了学校，每翼各建校舍一座、设置教官、教授彼等子弟学满语文。自是，锡伯等人始有了文字，这在历史发展上当然是一大进步。

康熙三十八（1699）年至四十（1702）年间，清政府将驻齐齐哈尔、伯都纳、乌拉等处的锡倚等族的兵员又作了一次大的调拨。从民族角度看，是锡伯族（包括属于锡伯牛录的卦勒察人、达斡尔人，以后只谈锡伯，不再单提卦勒察、达呼尔）的一次大迁移。其迁移往各地的兵数如后表：

代	年	康熙				年代不明	小计	附计
		38年	39年	40年	41年			
往迁	兵数							
盛京		200	580		275		1,055	本表参考锡伯史论考一三九页及白友寒锡伯族源流史 纲一〇四页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锡伯族简史四六页等研 究去取调制而成。对新疆锡伯族简史中有疑问的如年代不 明调往吉林（乌拉）的一千八百名和康熙三十八年调往伯
凤凰城		250				179	429	
辽阳		247		45			292	
牛庄		10	10	45			65	
熊岳城		131					131	
金州		159					159	
复州		178				164	342	
开原		285		40			325	
岫岩		82				89	171	
铁岭		10		10			20	
宁远		20				20	20	
中前所		20					20	
中后所		20					20	
小凌河		20					20	

大连文史资料-八旗源流

巨流河	20					20
抚顺	20					20
白旗堡	20					20
小黑山	20					20
闾阳驿	20					20
广宁		40				40
锦州		44				44
北京	1 , 000					1 , 000
兴京			10		53	63
盖州					24	24
义州		108				108
德州	42					42
总计	2 , 774	782	150	275	509	4 , 490

调往盛京及其所属地区的，多是原驻齐齐哈尔、伯都纳一带的。调往北京的，是原驻乌拉的。这次调迁的原因，一方面是根据国防配备的需要，因自康熙三十(1691)年以来，对沙俄策动与支持的准噶尔酋噶尔丹的用兵，原驻盛京的“八旗满洲兵”多调往关内，盛京防务需要调兵接替。一方面因锡伯等族人，对清帝将彼等由科尔沁的奴隶身份赎出为八旗满洲官兵的深恩厚泽并不真心感戴，也不真诚忠于帝室。故康熙三十九年(1700)内务府衙门奏称：锡伯等

原系科尔沁之奴，为科尔沁纳贡奴役不堪生存。蒙皇上眷佑，不惜钱粮，支银数百万两，将伊等自科尔沁赎出。安置于乌拉等地，驾临乌拉时，(注)锡伯等本应致死效力，以报皇上大恩。锡伯等并不效力，丝毫不懂道理，故迁至盛京、锦州等地及京师诸城，均分至八旗兼管，令其披甲，俾学道理。

(注)指康熙三十七年帝巡幸东北三省时事。

故迁至盛京、北京后锡伯兵不再单编牛录皆混编于“八旗满洲”诸牛录中，从此，凡获得“八旗满洲籍”的锡伯等族人，都逐渐与满洲人融合。因系驻防性质，其后又有调动。

调盛京的锡伯兵民，于康熙四十六(1707)年顷，在盛京修建了太平寺“锡伯家庙”，始建时只有青砖瓦房五间，后于乾隆十七年(1752)起又逐渐增修了正门、中殿、大殿、配殿等，“文革”时被破坏，寺院变成了摩托车厂。其故址在今沈阳市和平区站前街实胜寺西邻。据说此锡伯家庙内原有石碑两块，一为汉文，一为满文。今只存满文的一块。1959年新疆查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的肖夫同志到沈阳发现了这块满文碑，并作了抄录。文革后经民族学院赵展同志向有关部门的呼吁，此碑被挖出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馆。经赵展同志据博物馆所赠的拓片及肖夫所录原文对照整理译成汉文如下：

总集三世诸佛之大成，广开三乘之教义，弘扬释迦牟尼佛法。历史明载世传之锡伯部族，原居海拉尔东南扎托罗河一带。其后，移居齐齐哈尔、墨尔根、伯都纳等处，编为七十四牛录，凡四十余载。康熙三十六年，荷蒙圣祖仁皇帝施以高厚仁恩，将锡伯部众分为三批，于康熙三十六、七、八年，迁入盛京，并分置各省驻防效力。康熙四十六年众锡伯筹集白银六十两，购房五间，建立太平寺。自京师虔请甘珠尔经一百零八部，每年四季，集众喇嘛，诵经不缓，永偿所愿。

乾隆十七年，协领巴岱，佐领音德布、阿富喜等众锡伯协力共建三大殿，两侧配庑各三间，正门三间，恭塑三世佛。

至四十一年，协领罗卜桑、拉锡、德固苏、绰地等锡伯，修茸全寺，立宗喀巴、五护法、观世音、四天王诸佛，增请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每年四季，不断诵经，永不休止。

嘉庆八年七月十六日，梨树沟边门章京加一级记录二十一次花沙布谨立。

此碑文，笔者手中共有三种、汉文译本。因原汉文碑已失落，又没留下碑文抄本，今天由满文碑译成的汉文，当然都不会与原来的汉文碑全同。即今三种译本除用字造句不同外，内容也有出入，唯所译碑文中的年月日等数字则全同。本文所取的汉译碑文，乃赵展同志所译者。

碑文中将锡伯祖居的“绰尔河”，误作扎兰陀罗(扎赉耗罗)河。按“扎赉”是地名、旗名，而非河名。碑文中又将八十四牛录误为七十四牛录。又将移居齐齐哈尔、伯都纳、乌拉三个主要地区落掉了乌拉。又将康熙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年调拨时间，误为康熙三十六、七、八年间，这一切应以前文所写的史实为准，勿为此碑文所惑也。

康熙五十九年(1720)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廷先后平定由沙俄支持的准噶尔民族分裂主义者噶尔丹，和由英土帝国主义支持的回部伊斯兰教“圣裔”两和卓之乱，收复新疆后，以其地远处西北，地广人稀，国防空虚，急需加强西北兵力。故自乾隆二十七(1762)年起，就从热河、凉州、庄浪等地抽调满洲兵；从黑龙江抽调索伦兵；从张家口抽调察哈尔蒙古兵和厄鲁特蒙古兵西去充实新疆防务。然当时伊犁将军(总管全新疆军政的全权大员)明瑞，尚感兵力不足，于是又向中央请求增调官兵，他奏称：

闻得，盛京驻兵，共有驻防兵一万六七千名，其中锡伯兵四五千名。伊等未放弃旧习，仍以狩猎为生，. 技艺尚可……于此项锡伯兵内，拣挑优良者一同派来，亦可与黑龙江兵匹敌。

清政府同意了明瑞的奏请，于是军机处乃行文盛京将军舍图肯：“遵旨于锡伯兵内挑选一千名眷移住伊犁”。这又是锡伯民族的一次大迁移。于乾隆二十九(1764)年，从以下各地驻防锡伯兵中抽出备齐：

计：盛京 404 名、凤城 45 名、辽阳 66 名、开原 94 名、牛庄 23 名、广宁 60 名、熊岳 51 名、复州 52 名、岫岩 38 名、金州 44 名、盖州 15 名、锦州 24 名、义州 61 名、兴京 23 名、抚顺 10 名，合计兵丁共 1, 010 名。

带队官：防御、骁骑校各十员。官兵总计共 1, 020 人。家眷 3, 275 口，总共 4, 295 人。由协领阿木呼郎、噶尔赛二员护送。编成两梯队：

第一梯队：防御五员、骁骑校五员、兵丁 499 名，眷属 1, 675 口，由协领阿木呼郎护送，于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十日起程。

第二梯队：防御五员、骁骑校五员、兵丁 501 名，眷属 1, 600 口，由协领噶尔赛护送，于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十九日起程。他们出盛京边墙的彰武台门(今辽宁彰武县)，走克鲁伦路和蒙古路，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科齐斯山、霍博科赛尔、察汗俄博、珠尔虎珠、巴图鲁克、博罗塔拉等地，历时十七个月。行程万余里。于乾隆三十年(1765)七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先后到达伊犁。

他们自盛京出发前，锡伯族人开了个盛大的欢送会宴。欢送他们到西北国防最前线去保卫祖国的边疆。战士们慷慨激昂，表示义无反顾，更有许多征调以外的锡伯族人，自愿随行。

据乾隆三十年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奏称：

据护送一千名锡伯官兵之协领阿穆呼郎、噶尔赛呈称：“去岁我等前来时，除已入册之人口，沿途陆续新生男女幼童三百五十余名。此外我等于途中查出跟来之闲散四百余名。当即询问伊等，皆答称系官兵之兄弟子女，由原地起程时跟随而来。其中男 247 名，女 158 名。实系起程时跟随而来，并无他故，惟印册内无其名额“等因具结前来。加上沿途新生的及自愿随行的人员，共计去伊犁的锡伯族人总数实为 5,050 人(包括沿途死亡人员在内)。锡伯兵到伊犁后，暂驻绥定(乌哈尔里克)。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将锡伯人安置于伊犁河南岸，巴图蒙克地方，即今查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设一昂吉(军营)，下编六个牛录，其中四个牛录各为领催、披甲一百六十七人，两个牛录各为领催、披甲一百六十六人。昂吉内设有领队大臣、总管、副总管各一员。领队大臣由京城满洲官员中钦派补放，驻惠远城。总管、副总管由伊犁戍守大员中，不论满洲、索伦拣选补放，其办事机构称为“总管挡房”。各佐领设佐领、防御、骁骑校各一员，由锡伯兵内拣选补放，其办事机构称“旗下档房”。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又增编两个牛录，共为八个锡伯牛录，分属八个旗籍，旗颜色均照八旗授给：第一牛录镶黄旗、第二牛录正黄旗、第三牛录正白旗、第四牛录征红旗、第五牛录镶白旗、第六牛录镶红旗、第七牛录正蓝旗、第八牛录镶蓝旗。

锡伯营主要驻守伊犁河南的巴图蒙克军台、固尔班托海、安达拉、沙布尔托海、托里、马哈沁布克、春稽、乌里雅苏图、额术讷察汗乌苏、塔木哈、察罕托海、厄楞莫多、哈拉乌苏色奇音(头勒克)、察林多宽等大小十六个卡伦。此外还将派兵去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英吉沙等地换防当差。所派官兵均自备马匹、口粮，每两三年流换一次。

锡伯人落户于今查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地方后，又有携眷迁移往索伦营的。锡伯人首次迁往索北营是嘉庆初年的事。因嘉庆元年(1796)索伦营天花流行，丁壮死亡很多，兵源补充困难。于是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伊犁将军保宁具奏给皇帝，他奏称：

查得，伊犁索伦营人丁孱弱。且有绝子嗣者。此之前挑选披甲之缺时，成年壮丁即不足选。不想去年染天花，该营之闲散与幼丁近四百人受损。今剩余之闲散与幼丁甚少，且均年少，尚未成人。故今挑选披甲时，难以获得壮丁。详审之，索伦营乃一支劲旅，若抽调兵丁，将未成年之幼童选入，或减少兵丁数目，均非可行。臣留意观察，这几年来，锡伯营蘖生甚好，可选披甲之幼丁与闲散甚多。索伦、锡伯俱系东三省之人，习俗亦近，若见其足用，挑选锡伯营之闲散幼丁，迁至索伦营作为补充，则可成壮年之良丁，加同索伦，负其责职。臣请由锡伯营中十八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闲散幼丁中，即刻挑选出一百六十户，过至索伦营，视各牛录闲散幼丁数目的多少补分，令其披甲……。(见《朱批奏折》嘉庆二年十月)嘉庆帝接到保宁的奏折后，立即降旨曰：

今伊犁索伦营长成之闲散幼丁甚少，不足挑选披甲，自应量加调剂，即按保宁所奏办理。(见《军机处上谕档》嘉庆二年十一月)保宁接到嘉庆帝的批复后，立即着手办理迁移事宜。嘉庆三年(1798)正月二十七日，由伊犁将军传圣旨至锡伯营，令从营内挑选十八至二十三岁间的闲散幼丁一百六十户，准备迁往索伦营。“四月为移送闲散至索伦营事。从民衙雇车一百六十辆，佣银二百四十一两三钱，交与民人，秋后由兵丁俸禄中扣除”。这次迁往索伦营的锡伯人共有“一百六十户，大口五百五十二、小口一百零六，共有六百五十八人”(见《锡伯族史料拾零》锡伯文本102、103页)

锡伯人第二次迁往索伦营补充，是道光年间事。索伦营虽于嘉庆三年得到锡伯人口的补充，到道光年间天山南路发生张格尔之乱，伊犁将军先后于道光六年，十年两次调索伦营官兵到喀什噶尔参战，索伦官兵阵亡三百三十多人，

同时嘉庆初年索伦营天花造成的后果尚未完全恢复，所以索伦营的力量仍很单薄。故当时的伊犁将军特依顺呆，决定依嘉庆三年旧例充实索伦营。

道光十三年(1883)十一月十七日，上谕内阁：

特依顺保等奏：伊犁索伦营之闲散余丁，俱未成丁，难以续挑马甲，可否照前成案，由锡伯挑选一百户，移居索伦营，以备挑选马甲，请旨一折。伊犁各营兵丁，该将军自应勤加训练，现在索伦部闲散余丁，俱属年幼，难以挑选马甲，著照所请，即由锡伯挑选一百名闲散余丁，并户移居索伦营，以备挑选马甲……。(见《军机处上谕档》道光十三年十一月)

“于道光十四年四月迁往索伦一百户，内大口四百三十八人，小口一百八十六人，共六百二十人”（见《锡伯族历史资料拾零》锡伯文本 104、105 页）

以上两次从锡伯营移往索的锡伯人共二百六十户，一千二百七十九人。据《绥定县志》载：“现在，原来翁瑚鲁索伦只剩一、二家，其余均锡伯营调补之人，至今称索伦为锡伯是也。”

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的“伊车嘎善锡伯族乡”和塔城地区，有二千五百多“锡伯索伦”。就是先后两次从锡伯营移往索伦营的锡伯人的后裔。

新疆在清代是英、土(耳其)、沙俄交相侵扰的多难地区。驻守在伊犁塔城一带的锡伯族军民为防守祖国的西北大门，作出了过多的，千古不朽的贡献。无论西北发生了什么样的变乱，他们都坚决地赤忠于祖国，赤忠于中华民族。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未尝一日安枕。在新疆的全体锡伯军民，为了保卫祖国大西北，不知流了多少鲜血，牺牲了多少生命财产，因不在本文范围内，不克详述。

他们在生产劳动上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嘉庆七年（1802）他们开凿了“查布查尔大渠”振兴农业。“查布查尔”义为“粮仓”，即今天自治县命名的由来。

乾隆三十三年（1768）二月，征剿缅甸的将军明瑞战死。清政府乃派大学士忠勇公傅恒为经略，率北京、荆州、成都、贵州、云南等省的满汉兵员赴云南南部（今西双版纳地区）继续征剿，战士们因“不服水土”，病者增多，战斗力削弱。于是清政府又征调了七千名索伦兵和贵州兵，但仍感不足。于是又征调了福建水师二千名，盛京锡伯兵一千名。

据《清实录》记载：

乾隆三十四年正月辛丑谕军机大臣等曰：“征剿缅匪，东三省兵甚属得用，着再传旨盛京将军，于新满洲锡伯兵内拣派年力精壮者一千名，酌量兵数，于城守尉，协领内择其善于弹压者陆续带领来京。其应得之项俱照从前所派一体赏给”。

他们分两队出发：第一队锡伯兵五百名，由乾门侍卫富兴管带；第二队锡伯兵五百名，由前清门侍卫鄂林管带。于乾隆三十五（1770）年二月到云南。锡伯兵的任务是：驻守要塞，保护台站。同年十月征缅战事结束，而四川大小金川又叛。帝命大学士温福从云南率师进讨，锡伯兵又从云南从征两金川。乾隆三十八（1773）年小金川平定，即命锡伯兵复员回盛京。这说明这批赴云南、四川参战的一千名锡伯兵，纯系军队的调遣行动，与携眷开往伊犁久居的一千多锡伯官兵的性质不同。赴伊犁的在民族史上是一次“民族迁移”。赴云南、四川作战，战后又复员回盛京的与民族迁移无关系。赴云南作战的一千锡伯兵，在战争中牺牲三百多，回到盛京的六百八十名。因当时是胜仗，所以伤亡数目不大。这是锡伯族在国防上，作出的又一次光辉的贡献。

嘉庆二十五(1820)年又由盛京、吉林等地调往双城堡开垦的旗人正丁四千户、副丁一千七百六十四户人口中，有四百九十五户，三千八百九十六名锡伯人。

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锡伯人口为83,629人，其中辽宁省有49,380人，黑龙江省有2,598人，吉林省有1,559人，内蒙古有1,474人，新疆有27,364人，北京有290人，其他各地有964人，与历史上迁移情况相符。

第二十八节 锡伯源出于女真的论证

(其一)《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五第十九页所记的一段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名。向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绰墨尔根之裔，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长，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

汉译《满文旧档》(辽宁大学历史系译印)天聪九年十月十三记的：

(那天)汗说：“我们的国名原来是满洲、哈达、乌拉、辉发。不晓得那个的人叫诸申。叫诸申就与席北的超墨尔根同族了。那与我们有何关系。今后所有的人叫我国本来的满洲名，叫诸申时有罪。

以上这两段史录译的是一回事，因用字造句各有不同，对原满文内容的

理解程度也有不同，所以颇有出入。

汉译《满‘文旧档’》天聪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又记曰：

二十四(日)，在大门宣告说：“称国名为满洲。使旗的诸贝勒专有的诸申，叫那(旗)贝勒的诸申”。为让众人记住宣告了。

综观以上这三段史录，清太宗明白的知道满洲族人，锡伯族人都源出于诸申(女真、肃慎)，只是当时“诸申”一词已沦为被奴役阶层女真人的专称，不能再代表女真人的基体了，并彼时已编成的八旗全员，已不单纯是女真人，所以不能再用“女真”(诸申)来称呼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了。而当时锡伯人超·墨尔根的后裔已都沦为科尔沁蒙古的“诸申”了，他们适合仍用“诸申”的称呼，而对八旗人则不能用“诸申”概括了，因之改用“满洲”称号。但对各贝勒专有的诸申，仍用诸申称呼，只是加上旗别。实际上这时皇太极的国家，国号为“金”。(史称后金)，“满洲是编成八旗时所在的地名，旧时的部落名。皇太极当时对“民族名”、“国家名”、“部落名”的概念都是模糊的。我们不能用今人的认识去要求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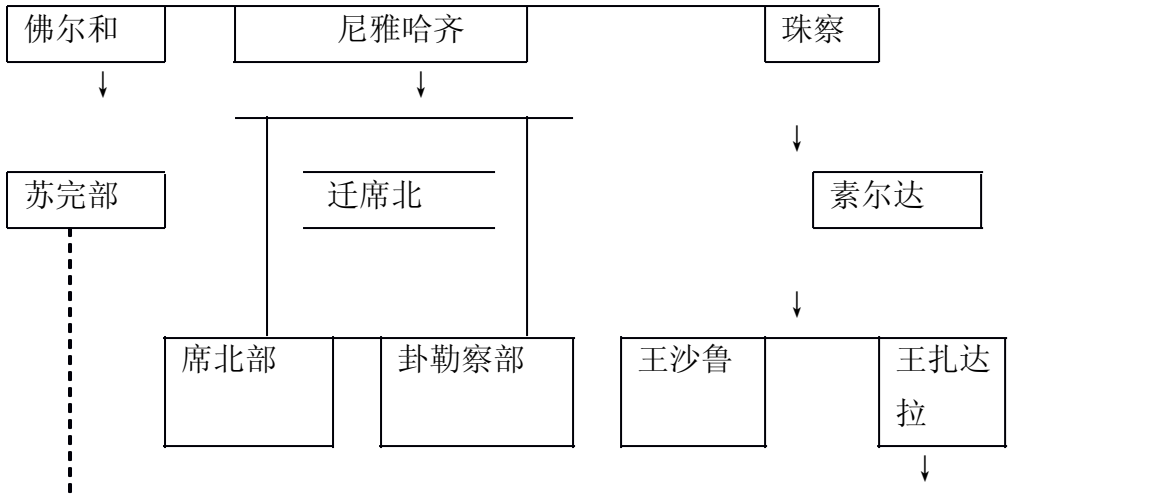
(其二)《八旗满洲世族通谱》一帙二册记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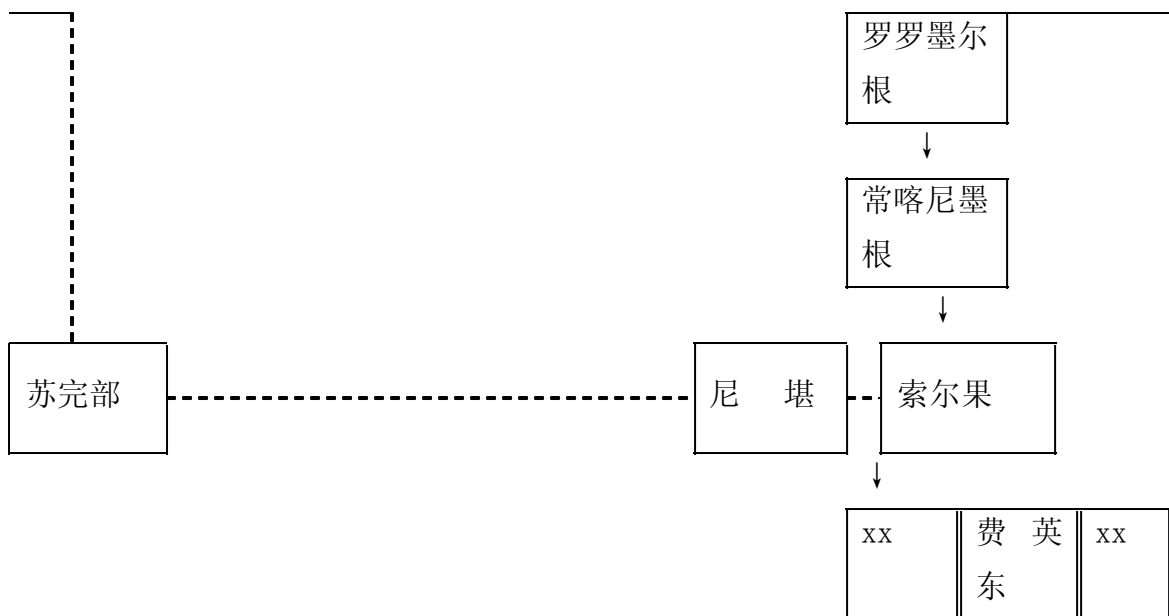
费英东·扎尔固齐，镶黄旗人，苏完部长索尔果之次子也。国初率五百户来归，太祖喜之，授一等大臣，以女孙妻焉……瓜尔佳氏；瓜尔佳本来地名，因以为姓，其世族甚繁，散居苏完、叶赫、纳殷、哈达、禹拉、安楚拉库、斐悠城。瓦尔喀、嘉未瑚、尼马察、辉发、长白山各地方。

苏完地方瓜尔佳氏：瓜尔佳这满洲著姓，而居苏完者尤著。其先有同胞兄弟三人，长曰佛尔和、次曰尼雅哈齐、三曰珠察。后离居：佛尔和仍居苏完、尼雅哈齐迁席北、珠察由瓦尔喀再迁西尔希昂阿济合渡口。辛察生素尔达。素尔达生二子；长曰王沙鲁、次日王扎达拉。王扎达拉生莽喀尼。莽喀尼生罗罗墨尔根。罗罗墨尔根生常喀尼墨尔根。蒂喀尼莫尔根生

二子；长曰尼堪、次讳索尔果。索尔果为苏完部长，有子十人，其族最盛。

又日本三田村泰勒所著的《清朝前史的研究》第二章《明末清初满氏族的源流》中，列出了苏老部同胞兄弟三人以后到费英东的世系表如下：





一户另户瓜拉佳氏锡伯奉御玉军汗之子超，莫勒根衔，之子名奇拉浒、巴图鲁衔。之子名达吉伦，都督衔；次子名万，都督衔；三子名占，都督；四子名额尔吉马，都督。

达吉伦之子名卜克蝉，贝勒衔。之子名巴本，贝勒衔。之子名吾巴泰、扎拉胡七，贝勒衔，之长子名卜达力，次子名阿密，莫得七衔；三子名阿力哈，衣特合勒图衔；四子名绰克代升，五子名图门，六子名筹合礼，七子名说色，八子名巴牙拉图。由达吉伦、莫吉伦、卜达力等之子皆为扎兰章京衔。

托合代之长子名吾巴什，次子名丁住等，此户皆拔京都住防。

阿密·莫得七之长子名拉卜代，次子名万，三子名六什，四子名名国什，五子名阿力琿。拉卜代之长子名五十八，次子名厄尔格，三子名息厄得，四子

名库格得。万之长子名万七，次子名克兴厄。六什之子名阿什图。国什之子名塔什图。

此户依伯根，必力克图、必力琿、阿力琿、五十八、厄尔格等子皆拔辽阳正黄旗。阿什图、塔什图、巴牙拉、克兴厄等户皆拔金州厢白旗。

阿力哈·衣特合勒图之子胡思布之长子僧保。次子名占之长子名七力克图、次子名绰拉海、三子名索伦、四子名拉必。奇力克图之长子必力、次子名尼堪：绰拉海之子名法拉太。拉必之子名托格达。三子名阿哈达之长子得拉图。次子那思图之长子蒙古，次子巴力。得拉图之长子枣达马，次子五拉胡莫，三子沙克七。

此户法拉太，衣伯根等子拨盛京镶红旗。

此户得拉图，那思图等子拨盛京镶白旗。绰克代升之长子名那木什，次子名艾岳什，三子名俄奇勒，四子名老蝉。那木什之长子名牛牛，次子名阿拉孙，三子名舒勒虎。艾岳什之子名绰也贵。俄奇勒之长子名尼堪，次名扎兰布等户之子皆拔辽阳正黄旗。

图们之长子莫合勒、次子绰什西、三子吠拉马，四子诺未七，五子多吉拉，六子都拉麻。莫合勒之长子奈密达力，次子吠拉图，三子巴图。奈密达力之长子拉西，次子撒哈连，三子付卡，四子苏棍，五子衣伯根，六子花山。和拉西之长子衣克莫，次子提拉滚，三子科库。撒哈连之子卡唐伊代。付卡之子吾勒滚吉。衣伯根之长子金保，次子阿拉胡木，三子特布钦。花山之长子达尼，次子达来。吠拉图之长子西达达，次子沙金。沙金之长子厄勒得束，次子阿鲁木，三子浩格，四子卡吉。

吠拉马之子古水得、查克金、张一固、朱恩、阿那达。查克金之子扎木苏、厄勒卜、厄尔登厄。扎木苏之子卡郎开、撒未哈图。张一图之长子苏巴，次子衣车那、之子三七格。朱恩之子舒尔虎。舒尔虎之长子巴代、次子音得布。阿那达之长子托勒合、次子付寿、三子厄尔得厄。托勒合之长子阿曾厄，次子衣增厄，三子赛尚阿，四子三音保，付寿之子衣通保。厄尔得厄之子阿拉太。都拉麻之长子明安达力，次子说海色，三子舒木德、四子西迪、五子西什图、六子说伦、七子厄勒辛、八子衣勒图、九子阿木图。明安达力之长子牛和。牛和之长子阿吉海，次子阿思海，三子塔思海。说海色之子图和莫。西迪之长子厄力七伦。次子五斯会。厄力七伦之子官保，次子那三太。吾斯会之子元保等户之子续往依力地方。说伦之子厄尔得布。厄尔得布之子隆海。厄勒辛之长子海青阿，次子卡拉哈。海青阿之子特三那、春喜。春喜之子那他。

诺木七之长子吾拉代，次子他喜，三子胡拉图，四子说多，五子说奴代。

多吉勒之子厄勒合，阿图拉孙等户之子拔往盛京厢白旗。

绰和力(筹和礼)之长子他思哈。他思哈之长子艾青、次子外七、三子图遂、四子达班太、五子胡什布、六子阿拉都哈、七子拉卜七、八子阿卜代、次子来青、来青之长子班迪、次子性格、三子胡拉胡、四子阿拉代。

说色之长子麦色。麦色之子来格。次子五楞五。五楞五之子厄格木等户之子都拔辽阳正黄旗：

牛录章京巴牙拉图之长子牛录章京查哈、次子都拉、三子牛录章京必力卡、四子西什、五子阿沙哈、六子胡什图、七子阿三太、八子牛录章京厄伦七。查哈之子苏朱克图。苏朱克图之长子鲁他、次子阿敏、三子阿那朱、四子阿沁拉虎、五子三音、六子文都。鲁他之长子图格勒、次子克必图、三子阿吉木。克必图之长子马尔七该、次子扎该、三子囤格莫、四子锤扎巴、五子非羊五、阿吉木之长子阿密灵吾、次子马拉塞、三子托思图、四子阿力拉克孙。

都拉之长子凡七，凡七之子花山，花山之子赛库。次子班吉勒，班吉勒之长子俄巴尔、次子多色，三子阿卡。阿卡之长子沙要、次子必力克。必力克之长子得尔格勒。得尔格勒之长子卜拉、次子说瑞。次子五巴什之长子托多拉海，次子三音、三子家读。三子班迪，班迪之长子伯拉虎、次子三保朱、三子罗格、四子伯拉洪、五子阿吉格尔。四子和拉克，和拉克之长子厄必伦、次子托阿托合、三子郎图。

西什之子撒末代，撒木代之长子克拉卜、次子绰思海。绰思海之子达来，达来之子栓中。

阿卜沙哈之长子沙都勒，沙都勒之子他林。次子音扎那，音扎那之子达拉。三子奇达木厄、四子诺克虎拉图。

胡什图之长子尼堪、次子阿牛、三子衣他拉。衣他拉之长子五拉滚吉、次子扎尔哈马力。口子厄克，厄克之子也尔退。五子衣特根、六子马尼卜、七子年瑞、八子绰尔吉等户之子皆拨盛京镶蓝旗。

阿三太之长子阿兰太，阿兰太之长子乌麦、次子阿力拉虎。次子诺木曾，诺木曾之长子阿卜拉，次子马拉、三子西住、四子罗格。三子扎未拉，扎未拉之长子麻七克固、次子吉他那、三子巴哈那、四子加琿。四子必鲁扎那，必鲁扎那之长子蒙古、次子蒙五拉代。五子扎贵，扎贵之长子扎哈力、次子伯七、三子果力勒。六子衣恩会。

厄伦七之长子来住，来住之长子三音，次子俄多、三子阿必拉虎。次子恩初。三子达克伦，达克伦之长子厄黑、次子旦达力、三子秉图、四子图坤、五子图根。

莫七伦长子厄和力。达克伦莫七伦等户之子都拨辽阳正蓝旗。

阿拉吉麻(奇拉汗四子额尔吉马)都督之子托孟阿贝勒，托孟阿之子托太。

巴克什之子那木什、那木什力。那木什之子达言(注)、图和们。那木什力之子舒尔虎，舒尔虎之子阿力琿、阿拉等户之子皆拨辽阳正白旗。

此照满底抄录，但满底未分辈数，亦未有年月时拔往某外。姓氏未写以直速写下来，遇抄汉清前十数辈分晰等次抄写。嗣后亦照满底连川下来，大约有前十数辈等次，后边亦可看得明白。但要加意细看，方能分出辈数。若不细完者，能得其明确内中名下有许多无有子嗣，亦不知绝世未闻，亦不知是漏写无凭考查。此。

光绪六年二月中旬偶录休晒

(注)巴克什应为托孟阿之子，托太之弟。

以上这部“拔兵单”，原文是向下移字，向左移行，中楷草书，有读无句，阅读颇难。已整理列出此“拔兵单”的全部世系表，因篇幅太大，不便备录，兹仅列一从御五军汗，超·莫勒根至关世玉等二十二代的简单世系表如下，仅供参考。

御玉军汗后世简单世系表

次

御玉军汉

超·莫勒根

奇拉汗、巴图
鲁衔

四子	额尔吉马都督衔	三子	占都督 衔	次子	万都督衔	长子	达吉伦都督 衔
----	---------	----	----------	----	------	----	------------

卜克蝉都督
衔

巴本 都督
衔

扎拉胡七贝勒
衔

图们 (第五子)

吠拉马	(三子)	莫合勒	(长子)
-----	------	-----	------

(三子以下为东岗乡达子营关世明家谱)

张一图

奈密达力 (长子)

三七格

(三子)

花山 (六子)

(以下关世玉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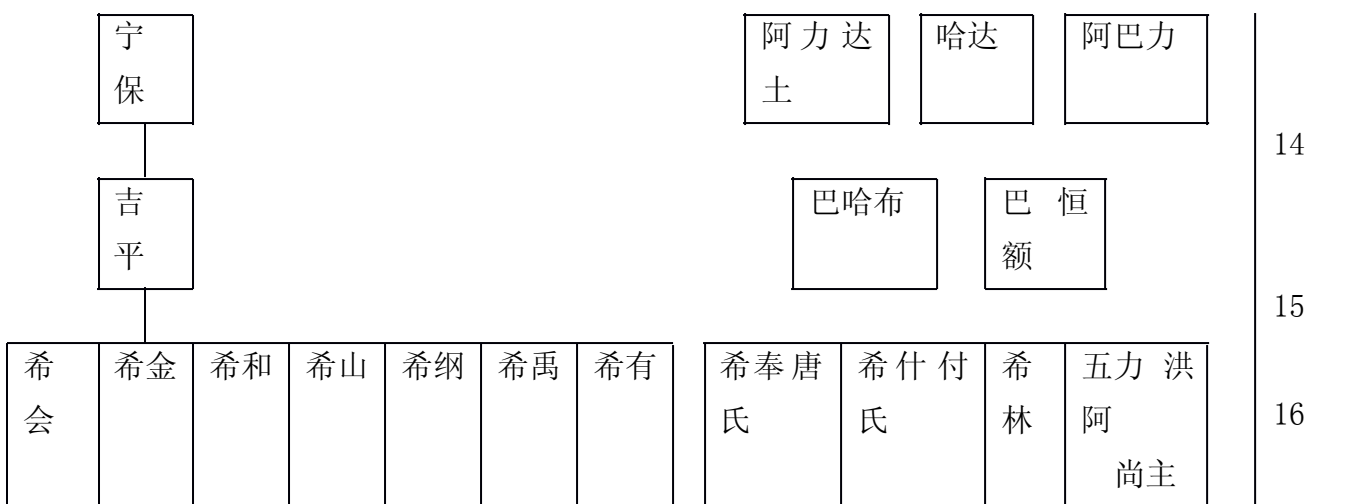
谱)

撒伦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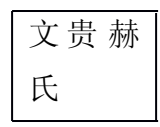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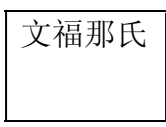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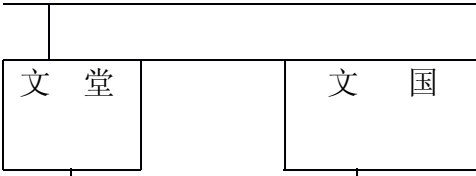
达来	达尼
----	----

宁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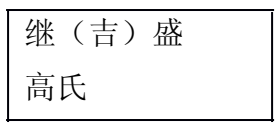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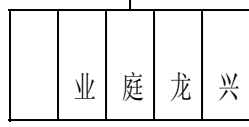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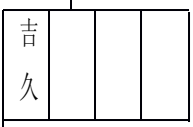
阿力达土	哈 达	阿巴力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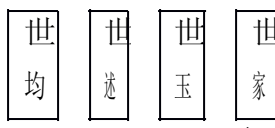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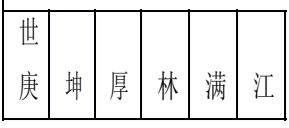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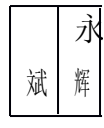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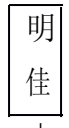
19



20



21



22



附记

关氏家谱很多，保存最完好的是关世玉家。“拨兵单原本在关世玉家。关家自15世希字辈始改汉姓，排行范字。花山一支自达来、达尼至关继盛间父子关系不明。

我们综合研究本节以上所举的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满族宗谱、锡伯族宗谱，说的是一回事，一个问题，即今天的锡伯族系出于女真族，其统治者一汗家系出于女真瓜尔佳氏，在苏完兄弟三人分离时的第二支。他们的第一世祖汗尼雅哈齐，御玉军汗，第二世祖是“超·莫勒根”（绰墨尔根）。超，是人名，“拨兵单”中即可看到锡伯人用超、占、万等单名的很多。“莫勒根”或墨尔根，是“善射者，或善猎者”之意，是美称，或绰号。

费英东是清初大名鼎鼎的五大臣之一，史学界尽人皆知。还有一位康熙帝的辅政大臣鳌拜，也是史学界尽人皆知的人物，《清史》都有传。他们都是女真瓜尔佳氏苏完部人，鳌拜是费英东的侄儿。现在不少锡伯人说与费英东同族，是对的，因都是女真瓜尔佳氏苏完部人，当然同是女真族，但不能说同是锡伯族，因费英东不曾到锡伯（溪泊）地方去。

以上这些史料也都能说明御玉军汗与尼雅哈齐同是一人，前者是人名，后者是职称。《八旗满洲世族通谱》中说尼雅哈齐是席北之始祖，在兄弟三人中

排行第二，“拨兵单”中说御玉军汗是锡伯之始祖。新宾《满洲苏完部瓜尔佳氏全族宗谱》里也说兄弟三人中的老二迁居锡伯地方。这些资料都说尼雅哈齐与御玉军汗是同时代、同姓瓜尔佳氏、同是苏完部人、同是兄弟三人中的第二人迁往锡伯者，同是锡伯之祖，这二人是同一个人已无待旁证矣。世界上那有这样巧合的事呢？

但，即使尼雅哈齐不是御玉军汗，并不影响“锡伯族系出子女真瓜尔佳氏苏完部”的结论。单只“拨兵单”开头的几句话，就已完全清楚的说明了问题。

“拨兵单”开头说：

原兄弟三人，在彼处已离散了。伊原驻防在苏苏刷觥河扎汉多宽地方。一户另户瓜拉佳氏锡伯，奉御玉军汗之子，名超，莫勒根衔……

这与《八旗满洲世族通谱》一二册中所说的：

瓜尔佳氏为满洲著姓，而居苏完者为尤著，其先有同胞兄弟三人，长曰佛尔和、次曰尼雅哈齐、三曰泰察。后离居，佛尔和仍居苏完，尼雅哈齐迁席北……

新宾满族自治县发现的《满洲苏完部瓜尔佳氏全藏宗谱》上所说的：

该部有兄弟三人，原来世居松花江达村苏完沃野，后来长兄仍居原地，老二迁往锡伯地方……

三部史料说的完全是一回事。“刷觐”即刷烟，即苏瓦烟，即双阳，我们已到双阳县去证实了这一问题。“瓜拉佳”即“瓜尔佳”。这些都是“锡伯族系出于女真服尔佳氏苏完部”的铁证。

(其三)《乃济陀音二世传》(载《满族研究参考资料》3、辽宁民族研究所1984年印)第四章“奉命出使”中所记的：同年(乾隆三十年)辛未年仲夏之月，皇上遣使臣召喇嘛活佛(乃济陀音二世)至宫中，接见并降旨道：“科尔沁十旗乃是你的檀越，也了的舅家，那里有我们满洲人的锡伯、呼勒沁部落，你去把锡伯、呼勒沁人请来，朕欲赐其诺颜，把他们招收过来。”于是，活佛奉命前往，途中所需差役、食粮，全由府库颁赏。活佛率领明噶塔尔·阿里哈达等近十名都统大臣，取道山海关而来，事先遣使致书于“我是托音呼图克图，钦奉圣谕，因事前往科尔沁十旗各地，望你们扎萨克和硕卓力克国亲王·巴扎尔属下所有王、贝勒、贝子、公、额附们、台吉官员全部到会”。

使者奉书到达之后，土谢图王额驸萨欣·达尔罕亲王班弟，原亲王阿喇善、扎萨克图王乌尔固·纳素图·鄂齐尔，宾图王达吉布，郡王袋布，郡王毕里克图，贝勒巴克什固尔，贝勒阿必达等全体科尔沁的诺颜、官员们，谨遵上命，齐集于卓力克图亲王府外。

喇嘛活佛与都统大臣们一道途经土默特的查干祥师之禅院，在此逗留了三日，禅师设宴欢迎，并进献大量供品，土默特二旗的僧众、官民数万人集会，叩拜三日……

却说活佛一行来到卓里克图亲王巴扎尔处，向科尔沁的全体王公、诺颜们传达了皇上的圣谕，讲明了自己担任请愿使者，奉命前来的目的。科尔沁的七

位王爷、二位贝勒、二位贝子、四位公爷等，共计一千多名王公、诺颜、官员一致表示：“我们都是圣主的臣民奴仆，我们的属民锡伯、呼勒沁同样也是圣主的百姓。尽管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把他们交给圣主，但是从我们，祖父直到今天，为活佛效忠，生而尽力，死而结草。如今活佛喇嘛奉使前来向我们恳求，我们一定照办。一来满足圣主的心愿，二来也是喇嘛和我们的荣誉，况且还有益于禅教与生灵的利益，有益于我们的声名”。于是，通过商议，王公诺颜们将所属大约一百个苏木的锡伯、呼勒沁(挂勒察)人全部献出来了。……

却说活佛完成使命，返回北京时，上报部院。部院上奏圣主，圣主令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活佛。活佛入宫，向圣主叩安，并奏报圣主，已征收锡伯、呼勒沁男丁一万多名。圣主听毕，龙颜大悦，设宴款待，并令活佛入大内府库参观。活佛得到他所喜欢的一对白瓷酒壶，酒壶外嵌金银，壶内各插一枝纯珊瑚树，都有一尺多高……天子赐给他金刚铃等大量赏品。还颁给他一百零八张僧侣度牒。对于科尔沁王公、台吉、官员，按锡伯、呼勒沁男丁数，每人各赏白银八十两。

这段史录是康熙帝由科尔沁赎出锡伯、卦勒察人的内幕。文中康熙帝明言锡伯、卦勒察是满洲人。赎回的动机也是因为锡伯、卦勒察是满洲人，与皇帝同族，当然不应再役属于科尔沁人。科尔沁人、锡伯人、卦勒察人对此也都没有别的说法。可见彼时康熙帝、科尔沁王公们、锡伯、卦勒察人们，对锡伯族源的认识都是很清楚的、正确的。

另外《满洲源流考》中，记有太宗诏谕嫩江一带的锡伯人时说：“我与尔之先世，本是同源”。又杨宾的《柳边纪略》中，也记述锡伯与满洲同源，其原文如下：

席北(锡伯)一作西北,又作席北,在船厂边外西南(应为“西北”)五百余里,土著(指锡伯人)自言与满洲同祖,而役属于蒙古之科尔沁。凡自船厂往墨尔根、瑗浑、黑龙江者,由此。天聪八年十一月,霸奇兰等征黑龙江,命由国舅吴克善所属之席北绰尔门地方经过,则为东北冲途久矣。特以地属外藩,会行劫夺。行旅每视为畏途耳。

按杨宾的《柳边纪略》是他在康熙二十八、二十九两年间,往宁古塔(今宁安县)省亲时将其亲自见闻。编集成书。彼时国人对锡伯族源也无争论。杨宾对此也无何个人成见,只是反映客观现实罢了。

由本(二十八)节例举的一系列史录看,清初国人对锡伯人系出于女真瓜尔佳氏苏完部的史实,是非常清楚的。再加上今天继续发现的瓜尔佳氏宗谱的证实,则“锡伯汗室系出于女真瓜尔佳氏苏完部”是千真万确的。

今之异端学说起自何秋涛。何在《朔方备乘》卷十七“锡伯利路疆域考叙”条中说:

臣秋涛谨按:锡伯利路,本鲜卑旧壤,故有锡伯之名。……据此如鲜卑音近锡伯,今黑龙江境,有锡伯一种,亦作席伯,亦作席北,既非索伦,亦非蒙古,即鲜卑遗民。

何秋涛完全出于个人臆测,竟作出“锡伯即鲜卑遗民”的错误结论。其后即有不少史学者步其后尘。为“锡伯系出于鲜卑”找出不少牵强附会的理由,混乱了后学者的视听。他们无视以上所举的真实史录。或狃于成见,虽见之,也不肯深研。当然他们根本就没见到新宾满族自治县新发现的《满洲苏完部瓜

尔佳氏全藏宗谱》和大连市新发现的《锡伯族瓜尔佳氏被拨往各地驻防兵员名单》。如果见到了这两件价值连城的新发现，则异端奇说自然息灭矣。

用“锡伯”与“鲜卑”音相近似，去推论锡伯就是鲜卑，实在有欠慎重。研究民族的源流必须从史实上去找线索，绝不能从音相近似上去找根据。在我国古往今来的少数民族中，非但音相近似的不一定是同一民族。就是名全同的也不一定是一个民族。例如科尔沁蒙古中有一个“杜尔伯特”部，准噶尔蒙古中也有“杜尔伯特”部，她们还都是蒙古人。但他们却根本没有父子祖孙的系统关系。又内蒙古有个奈曼（乃蛮）（元太祖创业时，击败的部落中也有个乃蛮部）部。这两个乃蛮之间却根本没有什么父子祖孙的系统关系。在这里正是“杜尔伯特，不是杜尔伯特，乃蛮不是乃蛮”。诸如此类的例子在民族史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何秋涛用音相似去推论族源，实近荒唐。故戏为一诗曰：史事流传非不真，稗官野史乱翻新。舍却史实求音近，鲜冠锡戴误后人。

第八章 蒙古巴尔虎旗人源流

（本章采用辽师大都兴智老师原稿略有变动）

巴尔虎系清初喀尔蒙古的属部。自康熙年间开始，部份巴尔虎人先后分批从外蒙南迁，被政府编入八旗，分驻黑龙江、吉林、盛京等地，至今他们的后裔多数仍聚居在原驻防域附近，本文拟对其源流略作考察。

第二十九节 巴尔虎族发祥地与族源

巴尔虎在不同文献上亦记作“八儿忽”、“八刺忽”、“巴尔浑”、“巴尔呼”、“巴儿忽惕”、“巴儿呼”、“巴勒瑚”等，是构成元代蒙古民族共

同体的古老部落之一。“巴尔虎本地名”，因以名其族^①。巴尔虎人最早的故乡在今苏联境内贝加尔湖东岸的巴古津河流域。元代巴尔古津河称巴尔忽真水，巴尔虎部因水得名，称巴尔忽惕部。

金末，今色楞格河下游以东、贝加尔湖沿岸之地被称作巴尔忽真脱窟木地区。据拉斯特记载，住在这一地区的有巴尔忽惕、豁里、秃刺三部，另外，住在乞儿吉思人附近的秃马惕部也是巴尔忽惕人的分支^②。狭意的巴尔忽惕人是指巴尔忽惕部，而广意则包括了以上四部。有的苏联学者认为，“布里亚特”就是巴尔忽惕的音变，现在的布里亚特人的名称和古时的巴尔忽惕是一回事^③。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布里亚特应即《蒙古秘史》中的“不里牙惕”，也是一个古老的部落名称，它属于贝加尔湖附近的森林部落。《蒙古秘史》卷10：“卯年(1207年)，命拙赤将右手军，征森林百姓。……拙赤受斡亦刺惕、不里牙惕、巴乐浑、兀儿速惕、合卜合纳思、康合思、秃巴斯等之降。”可见当时不里牙惕与巴尔浑普不是一个部落。后来由于部落的重新分化组合，到17世纪初，布里亚特形成了较大的部落联盟，其中也包括了巴尔虎部，俄国人把他们统称为布里亚特人。但在中国的文献中仍称之为巴尔虎人，所以有的苏联学者又称他们是“巴尔虎布里亚特人”^④。

巴尔虎原是一个游牧部落，金朝末年，其驻牧地与蒙古乞颜部、泰赤兀惕部、蔑儿乞部相邻。蔑儿乞部长脱黑脱阿被铁木真战败后，“顺薛凉格河(色楞格河)而下，入巴尔忽真之地”^⑤。巴尔虎部与乞颜部联系密切。据传说，铁木真九世祖蔑年士敦幼子纳真为八刺忽民家赘婿，其母莫伦与诸兄在与札刺儿部冲突中被祸，纳真收养其侄海都，后率八刺忽怯谷诸民共立海都为汗，重振乞颜部^⑥。铁木真祖父把儿坛把阿秃儿的长妻也是巴尔忽惕部人，巴尔忽惕

与乞颜部“互相嫁娶姑娘”⑦。当时巴尔忽惕部的活动范围大体上北起今巴尔古津河流域和维季姆河上游，东到雅布洛诺夫山西麓，南到大肯特山和鄂嫩河上游一带，西止贝加尔湖和色楞格河下游。

巴尔虎在唐代时称拔野古，构成该部的主体应是古代活动在贝加尔湖沿岸的丁令、铁勒的后裔。后来由于草原上不同族系之间长期交往和频繁迁徙，又融进了一部分其它族系的血液。如迁居呼伦贝尔的陈巴尔虎人中有呼尔拉特氏，达呼尔族亦有此姓。还有富察氏，显然是个女真姓。这说明到了清代，巴尔虎人中还包涵了部分东胡和肃慎族系的后裔。

第三十节 巴尔虎人的南迁

巴尔虎在元代直辖于中书省太仆寺，明初归努尔干都司属下的乞塔河卫(治今苏联赤塔)管辖，明末清初由喀尔喀蒙古车臣汗喇统镇，其活动范围逐渐南移。康熙二十一年(1682)，“以(车臣汗)所属巴尔呼人私拣鸟珠穆沁部界，议增汛兵严防御”⑧。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上谕大学士等曰：夸闻外藩蒙古出汛界哨地，有侵害抢掠喀尔喀之巴尔呼等蒙古者甚多，以后著严行禁止”⑨。这说明当时有部分巴尔虎人已移牧到内外蒙交界处附近。据清臣马喇等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奏称：“喀尔喀巴尔虎人时贩牲畜等物至尼布潮(尼布楚)，尼布潮人亦捕貂与之交易，得以生存”10。与尼布楚进行互市为巴尔虎人当时是车臣汗诺尔布的属部，其驻牧地距尼布楚、唯克萨较近。清军往征雅克萨，“诏诺尔布饬所属绝市”11。

据史料记载，清初巴尔虎人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部落统属于喀尔喀，而是分属于不同的外蒙王公部下，其多数隶车臣汗部各旗，少数属土谢图汗部。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与沙俄侵入后贝加尔及在这一地区与外蒙势力的争夺直接有关。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末，沙俄的侵略魔爪伸向了后贝加尔。1648年，在巴尔

古津河口建立了侵略据点，到五、六十年代，又先后建立了尔琴斯克（尼布楚）、色楞格等几个据点，对当地的布里亚特人和蒙古人进行残酷地镇压，强迫他们臣附沙俄，交纳赋税，激起了布里亚特各部的反抗，他们不断地举行武装起义和集体逃亡。使“那些土地完全变成了无人区”¹²。1658年，整个贝加尔地区的布里亚特人举行大起义，他们“带着财产，赶着牲畜，逃亡到蒙喀尔（即蒙古）人那边去了”¹³。外蒙各部对沙俄的入侵进行过不同形式的斗争。1667年，土谢图汗在清廷授意下遣使至莫斯科进行交涉，沙俄不理，因而于1668年出兵进攻前贝加尔的巴尔干斯克等沙俄据点。1669年又袭击尔琴斯克，夺回了一部分布里亚特人和鄂温克人。1687年大举进攻色楞琴斯克，翌年，由于准噶尔部的东侵，才被迫撤兵。由于上述原因，巴尔虎人先后分批移牧喀尔喀界内。因其原驻牧地邻近车臣汗部。又受其领辖，故该部收纳的巴尔虎人较多。

关于巴尔虎人最早迁移外蒙的具体时间，《钦定外藩蒙古四部王公表传》卷58载：“康熙三十四年，额尔克阿海子锡喇布以罕笃诱夺所属瑚尔拉特等众诉于朝。遭官往鞠，罕笃诡言，车臣汗硕垒尝以瑚尔拉特人畀其祖噶尔玛，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犹识之。询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则云畀额尔克阿海，不闻畀噶尔玛。”这里所说的“瑚尔拉特”即陈巴尔虎的呼尔拉特氏。车臣汗硕垒自1635年始通贡于后金，1655年卒，这说明陈巴尔虎呼尔拉特氏之归该部是在1655年（顺治十二）以前，与上述沙俄侵吞贝加尔，同蒙古在该地区争夺的时间大体是相符合的。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领主噶尔丹去击溃了喀尔喀三部，巴尔虎人亦各随所部领主南移内蒙，有的则乘乱北逃。三十年多伦会

盟，康熙将外蒙三部重新编为三十七旗。三十六年“昭莫多”之役后，三部之众重返原驻牧地。在此期间，部分巴尔虎人或在辗转迁移过程中与原领主脱离，或因其它缘故被清政府编入八旗，先后被派往盛京、吉林、齐齐哈尔、墨尔根、布特哈、察哈尔等地驻防，部分巴尔虎人又随原领主返回漠北。雍正年间又先后从布特哈和外蒙车臣汗部调来二批巴尔虎人驻防呼伦贝尔。以后各驻防城的巴尔虎兵员虽稍有增减，但他们的绝大多数及其家族都居住在原驻防城的周围，世代繁衍生息至今。

巴尔虎人的成份也较复杂，迁居齐齐哈尔和呼伦冠尔的巴尔虎人就有新、陈之分，二者最明显的区别是“陈巴尔虎”俗不敬喇嘛，“而新巴尔虎”俗敬喇嘛，托命与佛，与陈尔虎相水火云¹⁴。

第三十一节 盛京地区的巴尔虎旗人

据档案资料记载，康熙三十一年(1692)，盛京地区拨来巴尔虎人5000余口，其中壮丁1273名，编为10佐领。驻盛京3佐领，开原、辽阳、熊岳、复州、金州、岫岩、凤凰城等7城各驻一佐领15。每佐领甲兵55名，十佐领共553名，余为附丁，均属干上三旗—满洲旗分，但各城巴尔虎人均单设旗衙门，俗称第九旗。当年迁到盛京地区的巴尔虎人多以巴尔虎三字命名新居地。现已掌握的材料证明：开原巴尔虎人后裔主要居住在今开原县金沟子乡巴尔虎营子村；辽阳巴尔虎后裔住今辽阳城南达子营和首山达子营两处；复州巴尔虎后裔居今复州城北双山村(赫家营子)和城西的东、西巴尔虎村。有康、寇、赫、韩、卜五姓；金州巴尔虎后裔居今金州城西北七顶山满族乡，有车、白等姓；岫岩巴尔虎后裔居今庄河县吴炉乡巴尔虎营子、太平岭满族乡土城子村和岫岩县的“巴尔虎胡同”等地，有寇、白、石三姓；凤凰城巴尔虎人初驻今凤城县城东南蒙古营子，后移居城西南，有敖、吴、马、何等11姓。

盛京地区的巴尔虎人原属外蒙哪个王公部下。从何处迁来?在大连地区发现的巴尔虎后裔赫姓先祖碑和《巴尔虎本源考》(手抄本)一书提供了线索。碑文记:

“巴尔虎系驻防，原籍卡勒卡四部落七旗。男女共五千余口，壮丁一千二百七十三名，移之奉天、辽阳以西。……由奉天将军奏请，领其披甲，于康熙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奉圣旨，依议著塔旺札布袭为二等佐领，额尔得尼代清、卡勒唐袭佐领，钦此。着百丁作一佐领，每佐领领催、兵五十五名，余下作为上三旗兼管。由此中选其堪挑佐领者，拟以正陪奉请引见，编为十佐领，拔往复州、熊岳、辽阳、开原、岫岩、凤凰城、金州各一佐领，奉天三佐领”。

从文体和内容看，碑文很可能是摘自《上谕八旗》或《上谕旗务议复》之类的文献。其中提到的三个人名均见诸《巴尔虎本源考》“洪阔尔代清之子塔旺札布、孀居媳妇乌巴里、额尔得尼代清附控，原来卡勒卡巴尔虎等，均系管辖之人，均将我们编为佐领等语。达寨桑之妻附控，祈将我家世使七十名丁出佐领贡给主子，如是著我幼子卡勒唐袭替佐领等语。“由此知塔札布为洪阔尔代清之子，卡勒唐系达寨桑之子。

洪阔尔代清即《清圣祖实录》中的“洪俄尔岱青”，《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作“洪俄尔戴青”，车臣汗硕垒之孙。达赛寨桑即“达赖宰桑”，原属洪俄尔岱青部下。洪俄尔岱青是车臣汗部被噶尔丹击溃后最早归附清朝的外蒙王公之一，该部原驻牧克鲁伦河南木垒和硕玛塔特之地。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诱执洪俄尔岱青属达赖宰桑，授之檄，令还诱其主，洪俄尔岱青弗从，遣使

乞内附。会上幸塞外，驻蹕红川，洪俄尔岱青率众来归。”¹⁶。因洪俄尔岱青之母在雅克萨战役中曾以牛马军粮资清军，洪俄尔岱青归附又在诸部之先，故康熙皇帝慰勉有加。“二十八年，授礼萨克，谕辑所属溃散者。二十九年，以巴尔呼人肆劫，命尚书阿喇尼往辑，擒其首，询知洪俄尔岱青及达赖宰桑为噶尔丹所掠，不获归，洪俄尔岱青见子罕笃代领其众。”¹⁷。可知二人被掠后，妻、子难以约束部众，溃散星落，属下的巴尔虎人乘机肆劫，后被阿喇尼制服。据《凤城县志》和凤城县巴尔虎后裔《敖奇勒氏家谱》记载，这部分巴尔虎人曾被清政府安置在张家口外的内蒙地区游牧，后因生计艰难，才拔往盛京，编为佐领分驻各城。

盛京地区的巴尔虎人被编入上三旗，其中盛京镶黄、正黄、正白旗各一佐领(正白为世管佐领)；开原、复州、岫岩为镶黄旗(开原系世管佐领)；凤凰城、熊岳为正黄旗；辽阳、金州为正白旗¹⁸。盛京三佐领归蒙古协领统辖。其余隶属各城城守尉或副都统。盛京地区的巴尔虎人都崇信佛教，他们的后裔有的至今还在居室的西墙供奉佛像，故应属“新巴尔虎人”。

第三十二节 吉林、黑龙江地区的巴尔虎旗人

《盛京通志》、《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八旗通志》、《吉林通志》等文献均记载，康熙三十一年吉林兀拉驻防增设喀尔喀巴尔虎兵400名，编为八佐领，其中有世管佐领二，设蒙古协领一员以辖之。至雍正四年，裁巴尔虎佐领、骁骑校各一员，兵65名，还有七佐领。由此知驻防吉林乌拉城的巴尔虎佐领编制与盛京巴尔虎佐领是相同的，他们编旗的时间应是同时的，清代吉林兀拉城东门称巴尔虎门，即与驻防的巴尔虎兵有关。至于他们的来历，萨英额《吉林外记》卷3：“巴尔虎，台吉阿玉喜之属下人。阿玉喜家谱内，初编佐领阿玉喜之侄绰斯克，为巴尔虎佐领可证也。”阿玉喜，又作阿玉什，《清圣祖实录》卷155作阿玉玺，系土谢图汗部台吉，后有功清室，封辅国公。

黑龙江地区最早设立巴尔虎佐领的时间略晚于盛京和吉林。《盛京通志》卷52：“齐齐哈尔驻防，康熙三十三年，增设巴尔虎佐领四员”。关于这四佐领巴尔虎人的来历，《清圣祖实录》卷164记：“康熙三十三年八月甲辰，理藩院题喀尔喀台吉恭额萨木频等进献巴尔虎二百四十余丁，应编为四佐领，从之。“从时间看，齐齐哈尔的四佐领巴尔虎应即上述蒙古诸台吉进献的240余丁。这部分巴尔虎人原属哪个蒙古王公？《蒙古游牧记》卷9记，车臣汗乌默客三从叔父额尔克台吉车布登，康熙二十七年率部归清，三十三年卒，其子旺札苗袭爵。

“时所属巴尔呼人散居兴安岭后霍功乌勒辉，纠众肆劫。旺札勒幼，母博第苏克遣台吉往辑之，不克，具以闻。命黑龙江将军就近招抚之。巴尔呼凡数种，有称齐巴齐鲁特者，其塔布囊等，避噶尔丹，携六百户奔附札萨克阿哩雅所，而留五百户于呼伦贝尔之鸟棱地，无所依，谕旺札勒白其母收之。“当时旺札勒属下的巴尔虎人溃散，清廷命外蒙王公们协助追缉，台吉恭额萨木频等向理藩院所献的240余丁应是旺札勒部下的巴尔虎逃众。

《黑龙江志稿》卷26，齐齐哈尔驻防沿革：康熙三十三年，增设巴尔虎佐领，骁骑校各四人。……四十五年，调墨尔根城巴尔虎兵二百四十名移札齐齐哈尔”。《墨尔根城驻防沿革》：“康熙四十年，增设协领三人，巴尔虎兵二百四十名。四十五年，移去巴尔虎兵二百四十名驻齐齐哈尔”。我认为墨尔根城康熙四十年增设的240名巴尔虎兵应即康熙三十三年齐齐哈尔所设的四佐领巴尔虎人。因为第一，二者兵员人数相同，不会是偶合；第二，康熙四十五年

墨尔根的巴尔虎兵迁齐齐哈尔后，该城的巴尔虎兵员仍为四佐领240名¹⁹。如果是两部分人，那么齐齐哈尔原设的四佐领巴尔虎人哪里去了呢！

《黑龙江外记》卷3：“巴尔呼亦作巴尔虎，亦有新旧之别。在齐齐哈尔者，旧巴尔呼也；在呼伦贝尔者，新旧巴尔呼相间，而新者盛也。”这说明旺札勒属下的巴尔虎人当系陈巴尔虎。

第三十三节 呼伦贝尔地区的巴尔虎旗人

关于呼伦贝尔陈巴尔虎人的来历，《黑龙江志稿》和《呼伦贝尔志略》均记载：“以戍边闯入俄境，清康熙时征俄，遂自俄境来归，编入八旗，附打牲部之后。先后驻防黑龙江、齐齐哈尔各城。此族昔在木兰围场游牧，后迁至兴安岭北迤东一带。雍正十年，由布特哈迁驻呼伦兵数为二百七十名，编制索伦八旗以内（今两旗分立）”。康熙征俄，自俄境来归之说恐不确。因齐齐哈尔的陈巴尔虎人并不是康熙征俄时“自俄境来归”已如前述。“昔在木兰围场游牧，后迁至兴安岭北迤东一带”应指的是旺札勒部下的巴尔虎人在兴安岭后霍勒乌勒辉纠众劫掠事。车布登归清后，该部被安置在木兰围场（今河北围场）一带游牧，车布登卒，其妻、子不能约束部众，如前述有部分巴尔虎人逃至兴安岭后，清廷命黑龙江将军就近招抚。因此，附于布特哈打牲部之后的陈巴尔虎人也应为旺札勒的部属，其编旗时间不能早于康熙三十三年。

呼伦见尔的新巴尔虎人，上引两书记：“又有新巴尔虎，昔在外兴安岭北麓游牧，嘉庆间渐向南移，遂成部落。因语言与陈巴虎相通，新编入旗，故习新巴尔虎。迁至呼伦者，在雍正十二年，由外蒙车臣汗移来兵二千四百八十四名，编为八旗，在伊敏河两岸游牧”。这种说法更加含混不清。既然雍正十二年就迁来2400多人编旗，怎会嘉庆年间才由外兴安岭北渐向南移、遂成部落呢！二书编者显然是混淆了时间概念。

新巴尔虎人之迁呼伦贝尔，是和雍正年间车臣汗各旗属下的巴尔虎人叛逃事件直接有关。雍正八年，额尔克台吉车布登从兄弟、阿南达之孙延楚布多尔济和车臣汗乌默客再从兄弟沙克杜尔札布旗下的巴尔虎人联合逃往俄境，被遣返后再次叛逃²⁰。雍正十年，清军击准噶尔部于额尔德尼昭，车臣汗部骚动，又发生了多起叛逃事件。沙克杜尔札布之子根木丕勒属下蒙古、巴尔虎入叛逃俄罗斯，该旗只剩兵丁 30 余名。为此，理藩院驻蒙官员照会俄方，要求按《尼布楚条约》有关规定将逃人遣返，同时派尚书查克丹率兵追缉。成褒札布（车臣汗，硕垒曾孙）旗下“巴尔呼八佐领人叛窜俄罗斯，成褒札布率兵随尚书查克丹追擒之，无脱者”²¹。雍正十一年，“车臣汗部辅国公格埒克巴木丕勒（硕垒五世孙）以所属巴尔呼人由塔尔巴哈台遁俄罗斯，驰击之”²²。雍正十二年，阿南达曾孙旺舒克达尔札“以同族札萨克台吉沙克都尔札布属图济格等煽动齐布齐格特人遁俄罗斯且肆劫，命随尚书查克率丹兵缉之，无脱者”²³。清政府为了防止巴尔虎人逃亡，加强黑龙江地区的防卫力量，决定于呼伦贝尔之地构筑城堡，先从布特哈拨索伦、陈巴尔虎兵共 3000 名驻防该城²⁴。然后又派理藩院郎中依特格尔“带颜楚布多尔济等属下巴尔虎人等，去看安置于呼伦贝尔之索伦巴尔虎等生活状况”²⁵。先将部分已追回的巴尔虎逃众迁到该处。经我方多次交涉，雍正十二年十月四日，俄方将逃入俄境的原属根木丕勒旗下部众 263 户（1140 余口）由集尔浑卡伦逐回，交给查克丹。同时，原属颜楚布多尔济旗下的逃众 394 户（1570 余口）也自动由伊玛尔呼卡伦返回中国。被遣返的逃众也混有非巴尔虎的蒙古人，故“其中倘有喀尔喀蒙古人，则交各该旗严加管束，倘有巴尔虎人，则照各札萨克前呈请之例，应将之安置于呼伦贝尔地方。”²⁶查克丹将巴尔虎人先迁至墨尔根哈玛地方（在呼伦及尔城西），交给驻当地总管索伦、巴尔虎大臣永福，进行编旗和具体安置。

巴尔虎人迁居呼伦后，其中少数人曾于乾隆七年随索伦人拔往布特哈，多数仍驻原地。后以陈巴尔虎人为主体的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人则组成新巴尔虎左、右二旗，名称沿袭至今。据《呼伦贝尔志略》记：陈巴尔虎姓氏有呼尔拉特氏、齐布齐诺特氏（新巴尔虎亦有此姓，该姓人世居巴尔古地方）、乌里雅特氏、鄂里木苏氏、李佳氏、胡佳氏、富察氏；新巴尔虎有哈勒斌氏、吉克忠氏、永台布氏、奎车里克氏、康锦氏等。

第三十四节 其他地区的巴尔虎族人

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巴尔虎人在明代末清初百余年的时间里颠沛流离、频繁迁徙，后来竟成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居民。除上述迁居东三省、内蒙东部的呼伦贝尔地区外，其它巴尔虎人大致有以下几个去向：

（一）编入察哈尔和京师八旗中。

雍正四年，一个从俄国逃回来的蒙古人向蒙古郡王丹津多尔济报告说，他听俄国人在交谈中谈到“欲索取托伦诺雅特、八旗察哈尔所属之巴尔虎等”²⁷。《清世宗实录》卷120，雍正十年六月，军机大臣奏称：“今察哈巴尔虎生蒙古壮丁一千四、五百名，弓箭可观，人丁健壮，连各处觅食人丁，共二千有余。请将此人丁编设十九佐领，合之旧有八十一佐领，共成一百。……从之”。毫无疑问，察哈尔八旗中的巴尔虎人也应是康熙年间迁来的。

《清世宗实录》卷114，雍正十年正月：“谕大学士等，穆垒驻兵一事，最关紧要。……前京师派往之骁勇兵一百名、巴余虎兵一百名、额驸阿保属下兵丁五百名，俱著派去。”知当时京师八旗中亦有巴尔虎人。

（二）留居外蒙

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命明素克偕员外郎常禄赴噶尔达台河，收贝勒旺札勒旧属齐巴齐努特百余户”²⁸。明素克系诺尔布之子，“齐巴齐努特”即巴尔虎齐布齐诺特氏。明素克之孙德木楚克于乾隆十三年袭爵。二

十一年，属下巴尔虎人又叛，大肆劫掠。二十二年，德木楚克“侦贼什第等窜呼伦贝尔之西墨尔根哈玛尔，偕同郡亲王巴雅尔什第等掩擒之，叙功加一级”²⁹。这部分巴尔虎人既称是旺札勒的旧属，当为陈巴尔虎人。颜楚布多尔济旗下的巴尔虎人除迁往呼伦外，余仍隶该旗。乾隆二十一年，所属齐木齐格特（即齐巴齐诺特）人肆劫，颜楚布多尔济不能缉，乞避居巴噶部界。诏喀喇沁贝子湖图灵阿会郡王德木楚克等严缉之”³⁰。这部分巴尔虎人居住在靠近呼伦贝尔的牙蒙地区。

以上所述及其它外蒙王公旗下的巴尔虎人后裔绝大部分都融合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蒙古旗之中。

（三）流入俄境。

1688年，噶尔丹击溃外蒙各部时，就有部分巴尔虎人被迫流亡俄境。《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外蒙的巴尔虎人多次叛逃俄国，俄方虽根据条约中双方不准容留对方逃人的规定，将其多数遣返，但有时也故意寻找各种借口对少数叛逃者予以庇护。如康熙三十四年，旺札勒属下鄂勒巴图尔宰桑所率的一佐领巴尔虎人因避噶尔丹而流入俄境，后来又陆续收留到俄境省亲的巴尔虎共40多人，中方虽多次交涉，俄国仍不予理会；³¹。康熙六十年八月，车臣汗部辅国公格勒克巴木丕尔旗下塔布囊班丹等率巴尔虎761人叛逃俄罗斯，理藩院多次向俄人催索，俄方以入档册为借口，只将其中26人选回，其余留居俄国³²。流入俄境的巴尔虎人后来都融进了俄国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之中。

（四）融入厄鲁特部成或其它民族之中。

准部在进攻喀尔部过程中就掳掠了部分巴尔虎人，如康熙二十九年，与洪俄尔岱青、达赖宰桑同时被掠的部众中就有巴赉虎人。康熙三十四

年，一个厄鲁特降人供称：噶尔丹于是年八月至克鲁伦河源屯聚，派兵3000人：掠喀尔喀纳木札尔陀音及巴尔虎等”³³。被厄鲁特所掠的巴尔虎人后来即融入该部。

康熙五十三年，达斡尔霍托克甲喇那苏尔图牛录人鲁尔吉梅向理藩院申控：“我家巴尔虎男人厄林辰及其妻哈尔达克、女儿厄特吉曾携马四匹、弓箭一副出逃”³⁴。后知其逃至尼布楚，黑龙江将军扬福行文尼布楚守城官，要求遣还。这户巴尔虎人显系鲁尔吉梅的家庭奴隶，说明在达斡人当中也有巴尔虎，后来当融入达斡族之中。

本章注文

①《黑龙江志稿》卷11。

②《史集》一卷一分册198~200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

③《布里亚特蒙古史。选译》，《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辑。

④苏K·B·维亚特金娜《布里亚特人》《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十辑。

⑤《蒙古秘史》卷3。

⑥《元史》卷1，太祖纪。

⑦《史集》一卷一分册200页。

⑧《钦定外藩蒙古四都王公表传》卷45。

⑨《圣祖仁皇帝圣谕》卷67。

10《东北边防辑要》卷下，征罗刹。

11《钦定外藩蒙古四部王公表传》卷5'1。

1213《布里亚特蒙古史(选译)》，《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十辑。

L4《呼伦贝尔志略·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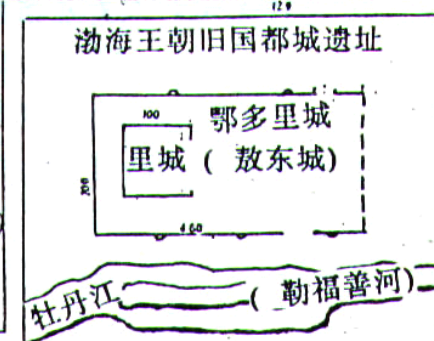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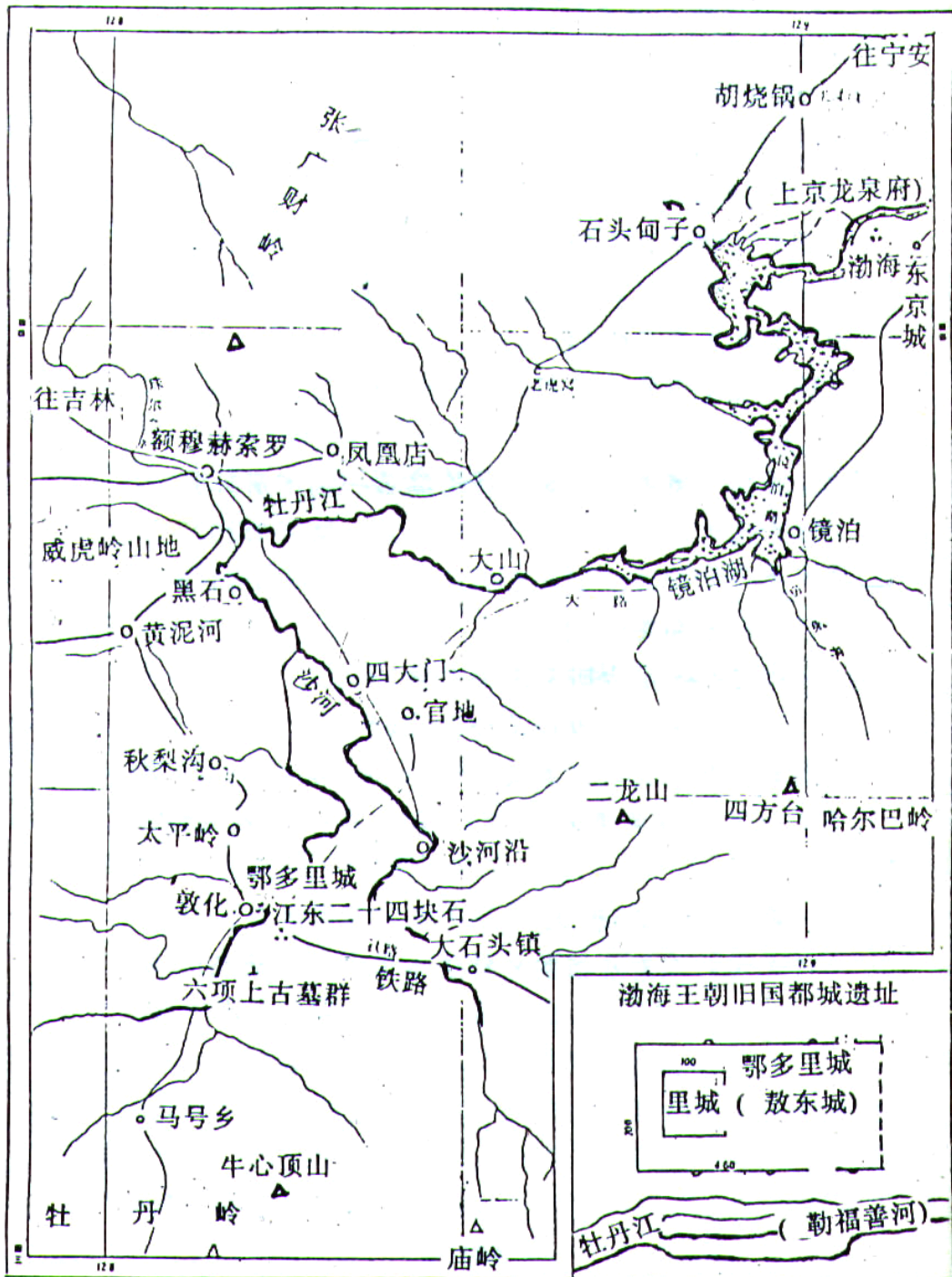
15 详见《盛京通鉴》卷3。

16《蒙古游牧记》卷9。

- 17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 58。
- 18 详见《盛京通鉴》卷 4。
- 19 参见方式济《龙沙纪略·纪制》。
- 20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册》565 页。
- 21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 59。
- 22 《皇朝藩都要略》卷 5。
- 23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 59。
- 24 参见《清世宗实录》卷 117。
- 25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585 页
- 26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020 页。
- 27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449
- 28 《皇朝藩部要略》卷 4。
- 29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 55。
- 30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 57。
- 31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303 页。
- 32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109、426 页。
- 33 《蒙古游牧记》卷 9。
- 34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350 页。

附图第一

敦化市附近渤海古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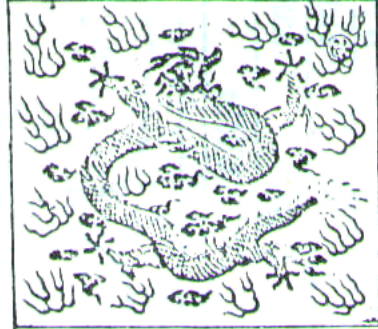


▼ 正黄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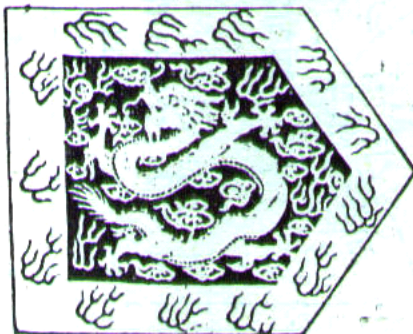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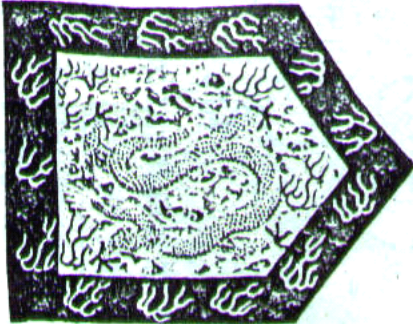
▲ 正红旗

▼ 正白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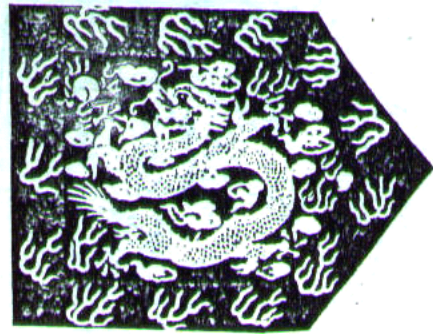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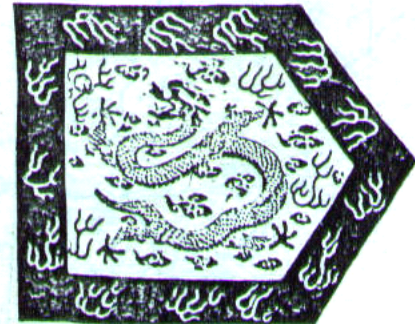
▲ 正蓝旗

▼ 镶黄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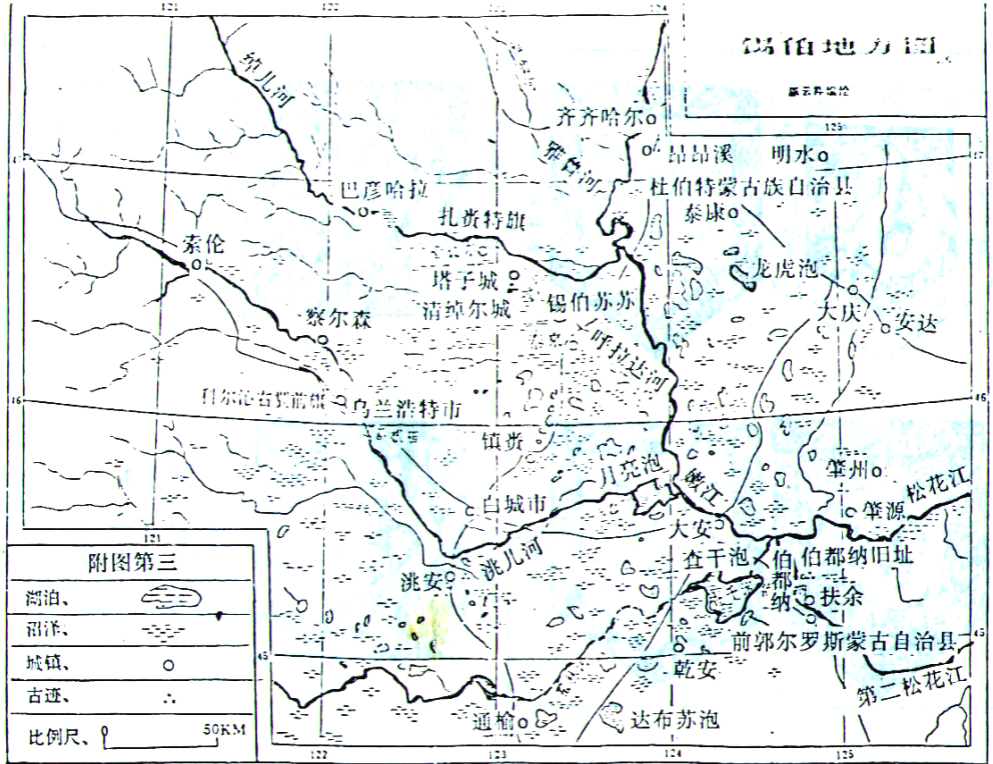


▲ 镶红旗

▼ 镶白旗



▲ 镶蓝旗



审核定稿 蒋永维 田将庆
责任编辑 王胜利 童方 于礼萍

封面设计 瀛云萍

大连市文化局出字 (内) NO:005381

第八节 八旗汉军的建立

“八旗汉军”，‘就是大清国八旗制度内，用汉人或汉化了的女真人为将，统领汉旗兵的部分。大清(后金)国内汉将领汉兵的军队，从八旗制一开始就存在。八旗最初编成时的四百多个牛录中，就有十六个汉将领汉兵的牛录，即由汉人任牛录厄真，率领由汉人编成的牛录军民。这些人都是原来就居住在后金(女真)国内的汉族人。编成八旗后，他们基本上都变成了“陈满洲”。

后金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围攻抚顺时，明游击将军李永芳投降，努尔哈赤厚待之，以女孙妻李永芳，称为：“抚顺额驸”，为三等副将，即令其管领抚顺投降的汉族军民。但彼时他们没编入八旗牛录，也不称“汉军旗”。天命六年(1621)后金攻沈阳、辽阳等地时，李永芳均率所部汉军从征，有功，晋升三等总兵官。又有汉化了的女真人佟养性，原居辽东佟佳地方，遂以居地为汉姓，迁居抚顺为商贩，暗通后金，明边官捕之入狱。后逃归努尔哈赤，赐以宗女为妻，授二等副将。时归附后金的汉人日众，遂以佟养性为总兵官统领之。天聪初，为佟养性单编一队汉军，满语呼之为“乌真超哈”。天聪五年(1631)以佟养性为昂邦章京(领四个牛录)天聪六年七月卒。

天聪七年(1633)早已叛明的将领孔有德、耿仲明率其所属的官兵及眷属等二千多人投奔后金。太宗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仍领其旧部官兵，称之为“天佑兵”。次年，明将尚可喜又率部降于后金。太宗封尚可喜为智顺王，仍领其旧部官兵，称之为“天助兵”。以上这些汉将领汉兵者，均无“汉军旗”的称号。

正式建立汉军旗是从天聪七年一月开始的。太宗下令，原先分入八旗

满洲中的汉人壮丁，每十丁中抽出一丁披甲入伍，共得一千五百人，组成了一个“汉军旗”。旗用黑色，由汉将马光远任固山厄真。

马光远，明顺天大兴人，原任明建昌参将，天聪四年正月永平战役中，降于后金，升为副将。天聪五年攻明大凌河，马光远有功，故以之为此一汉军旗的固山厄真。

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登极称帝后，于议定《令典》中，明文规定：“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式样，男不许穿大领大袖、戴绒帽，务要束腰；女人不许梳头、缠脚……该管牛录章京稽查，若有违者，本身及该管牛录（章京）拔什库俱有罪”。从此，清帝统治下的汉人均改着满装，女人天足。

崇德二年（1637）七月，太宗又把一旗汉军扩展为两翼旗汉军，以马光远为右翼旗固山厄真以石廷柱为左翼旗固山厄真。旗的编制均照满洲各旗办理，两翼旗均用黑色。

石廷柱原系女真人，姓瓜尔佳氏，。世居苏完。其曾祖布哈，明成化中任建州左卫指挥僉事。其祖阿尔松袭父职。其父石翰始迁辽东，遂以石为姓。天命七年太祖攻广宁，廷柱时为明千总，出迎。太祖赐之金印鞍马，令其抚慰城中士庶，廷柱遵以城降，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命其管领降众，旋以随上征巴林有功，晋三等男爵。天聪七年以积功晋三等子，后以罪解任，至是起复为左翼固山厄真。

崇德四年（1639）六月，太宗又将两翼汉军旗扩展为四旗汉军。每旗辖十八个牛录，下设梅鹿章京二员、甲喇章京四员（即每旗分四甲喇）每甲喇辖四或五个牛录。

马光远为汉军正黄旗固山厄真。马光辉、张大猷为梅鹿章京，用蓝旗镶黄边。

石廷柱为汉军正白旗固山厄真。达尔汉、金维城为梅鹿章京，用蓝旗镶白边。

王世选为汉军正红旗固山厄真。吴守进、孟乔芳为梅鹿章用蓝旗镶红

边。巴颜为汉军正蓝旗固山厄真，李维汉、佟图赖为梅鹿章京，用蓝旗不镶边。

每旗仍为十八牛录，每牛录兵丁百余名，四旗合计兵丁七千二百名。

崇德七年(1642)六月，太宗又将四旗汉军扩展为“八旗汉军”。旗式、编制、官兵员名额数均同于“八旗满洲”。总共有兵丁24,050名。此八旗的固山厄真分别是：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昉、佟图赖、石廷柱、巴颜、李国翰等。

同年八月，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奏请以所部在汉军旗下行走。太宗允之，以孔有德部入汉军正红旗籍，耿仲明部入汉军正黄旗籍，尚可喜部入汉军正蓝旗籍，其后所有汉兵均入汉军旗籍。如佟养性部、李永芳部均入汉军正蓝旗籍。

第三章 八旗的发展变化

第九节 八旗的扩展

八旗制度自万历四十三年(1615)“八旗满洲”组织完成后，即继续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程度的扩展中。天命三年(1618)十二月，东海女真的呼尔喀首领金达，率一百多户归附后金，天命四年(1619)三月，明经略杨镐与朝鲜联合进攻后金，被金击败之于萨尔浒。朝鲜兵统帅姜宏烈率其残部五千多兵降于后金；是年八月努尔哈赤灭叶赫部，均分别编入八旗中，他们后来都变成“陈满洲”。太宗天聪元年(1627)后金兵入朝鲜，原居于朝鲜境内的女真人瓦尔喀部二百多户都回归后金。天聪六年(1632)赫哲部的乌札拉族归附后金，分别编入八旗满洲的镶白、正蓝、正黄三旗中。天聪

七年后金又将瓦尔喀部 1, 950 名收服。天聪八年(1634)十二月, 金将霸奇兰等北到黑龙江滨收得呼尔喀部 1, 590 名。天聪九年(1635)又得呼尔喀人 7, 202 名, 收服编户壮丁 2, 483 名, 又得瓦尔喀壮丁 560 名。妇幼 590 名。天聪十年(1630)又得瓦尔喀部 2, 100 人。崇德三年(1638)黑龙江呼尔喀部萨哈连族受抚来归, 均分别编入八旗满洲的镶白、镶黄、正白三旗中。崇德四年(1639)三月, 平定了黑龙江上游索伦木博果尔之乱, 得其壮丁 2, 709 名, 妇幼 2, 964 名均编入八旗满洲之中。不久, 又有索伦部 337 户: 其中丁壮 481 名来归, 安置于郭尔罗什、玛库玛勒之地, 也都属于八旗满洲籍。又得索伦部鄂温克人、鄂伦春人共 5, 673 名, 亦编入八旗满洲之中, 并单编牛录。十二月又得索伦男妇 900 名, 呼尔喀部男妇 336 名, 又得呼尔喀部男丁 419 名来降。崇德六年(1641)索伦部 147 人来降。次年又招降呼尔喀部 1, 400 人。崇德七年(1642)将汉化了了的佟养性一支编入汉军正蓝旗。崇德八年(1643)又得呼尔喀部 3, 703 人, 以上先后来归之众, 均分别编入八旗满洲之中。另外俘虏来的人口, 则分别编入八旗满洲中为“阿哈”(家奴、或农奴)。这些太宗时代获得八旗满洲籍的, 均称“伊彻满洲”, 即新满洲。

顺治元年(1644)关外的八旗兵大部分“随龙入关”, 参加讨伐明国的战争。仅有小部分八旗兵留驻于东北各地。留驻盛京地区的计盛京八佐领, 746 人, 兴京 50 名。凤凰城 150 名, 牛庄 32 名, 盖州 96 名, 广宁 28 名, 合计 1102 名。

顺治八年(1651)在嫩江流域有不属于科尔沁蒙古的女真人“挂勒察”部, 有的被编入八旗满洲之中, 特保留其原名, 称“挂勒察满洲”。

康熙十年(1671)居于东北地区的墨尔哲人, 由宁古塔将军巴海收编为四十个牛录, 共二万多人, 均加入“八旗满洲”籍。康熙十年至十六年间, 将原驻松花江、瑷春河一带的赫哲人、库雅拉人连续在宁古塔及乌拉编成 78 个牛录(佐领), 这 78 佐领于康熙十七年(1678)移驻于北京八佐领, 移驻于盛京地区

31 佐领(共 1, 131 户, 壮丁 3, 531 名, 眷属 11, 180 名)。其中章京 29 员、骁骑校 29 员, 苏拉哈番一员, 领催及甲兵 1, 378 名, 在盛京地区的驻盛京 17 佐领, 甲兵 850 名; 驻锦州 5 佐领, 甲兵 291 名; 驻义州 7 佐领, 甲兵 325 名, 驻广宁 3 佐领, 甲兵 141 名。

康熙二十年(1681)在金州地区“就地编旗”, 共征壮丁 576 名, 其中百名披甲, 余为附丁, 约合五丁供一甲, 连同眷属均入八旗满洲籍, 驻防于当地。

康熙二十一年(1682)在盛京又编成八佐领, 壮丁 419 名披甲驻防。到康熙三十八年(1699)止在盛地区驻防的新满洲, 共 40 佐领, 甲兵 1, 991 名。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间又有一批入关的“八旗满洲”兵又“随龙出关”, 到盛京, 然后分配到各地驻防, 目地在巩固东北边防。

康熙三十一年(1692)原属于科尔沁蒙古的女真部落~锡伯人、挂勒察人和部分达尔人等, 共男丁 14, 158 名, 全部由皇帝出钱, 以每丁 80 两纹银的“赏额”, 从科尔沁王公手中赎出。其中可披甲者 11, 850 名, 编为 84 个佐领, 均籍列上三旗的八旗满洲籍, 但保留“锡伯”称呼分别驻于齐齐哈尔, 伯都纳(今扶余县城北 15 公里许), 乌拉三城。驻齐齐哈尔地方者, 壮丁 3, 600 名, 其中 1, 200 名披甲, 2, 400 名为附丁, 合编为 24 个佐领。其中锡伯人佐领 19 个, 兵丁 2, 580 名; 达斡尔人佐领五个, 兵丁 750 名。驻伯都纳地方者, 壮丁四千名, 其中二千名披甲, 二千名为附丁, 共编成 40 个佐领。其中锡伯人佐领 30 个, 挂勒察人佐领十个。驻防乌拉者, 壮丁三千名, 其中一千名披甲, 二千名为附丁, 共编为二十佐领。

以上合计八十四佐领, 用上的壮丁 10, 600 名。

还有蒙古巴尔虎人于康熙年间被编入八旗之中。详见本书第八章《蒙

古巴尔虎旗人源流》。

康熙三十八年(1699)至四十年(1701)间，将锡伯兵总分为四部一部驻黑龙江，一部驻北京，一部驻盛京，一部驻德州。移驻盛京者三千名壮丁，不再单编牛录，而混编于满蒙八旗佐领中。乾隆二十九年(1764)由盛京地区抽出锡伯兵一千名，携眷开赴新疆驻防。今新疆伊犁河南的“查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即其裔也。

康熙五十三年(1714)原居于东北纳奇林、锡绿林一带的赫哲人，和原居于珲春以东的雅库特人也都编入了“八旗满洲”中。这些都称伊彻满洲。

同年又将金州城西南辽东半岛南端的全部民人(汉人)编入上三旗汉军旗籍，驻防原地。计镶黄旗包括毛营子、南关岭、大连湾一带居民。正黄旗包括老虎滩、青泥洼、小平岛、营城子一带居民；正白旗包括长城、龙头、水师营、旅顺街、双岛、老铁山一带居民。这些人是明末清初，主要是顺治十年(1653)由山东登莱青等府先后迁来辽东半岛的民人。雍正四年(1726)又从山东、云南拔来庄河(当时属岫岩)的报地植田的汉人，编为正红、正黄、镶红、镶蓝四个旗籍。凡编入旗籍的就统称“旗人”，以别于及高于民人。

据《盛京通鉴》卷四记载：“查金州汉军佐领，系康熙十九年经前任将军安(珠瑚)奏请，将该城招安壮丁420名编设二佐领，选甲兵一百名，按月发给饷银……嗣于廿六年……请编为厢黄、正黄、正白汉军三旗”。则1714年及1762年辽南汉军旗的增编，是康熙廿六年(1687)的继续。

第十节 八旗的变化

八旗制度，开始是努尔哈赤创建的一种军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其内容随时随地都在发展变化中。大体看入关前后的变化很大。入关前，八旗制是以农奴制为经济基础，以军事为目的，全体壮丁战时为兵，平时生产，兵天定数，兵器装备等一切自备的初级社会组织。入关后。变成了以封建地主经济为基础，

以提供八旗兵源为目的，为封建帝王中央集权统治服兵役，军械装备薪饷统由政府负担的组织。

八旗的基层是牛录(佐领)，各牛录都包括人民、土地和军队。初编旗时是合五牛录为一甲喇，合五甲喇为一固山。这是一般的规定，实际上一固山不一定是五甲喇，一甲喇也不一定是五牛录。每甲喇所辖的牛录数差别更大，有的一甲喇只有三牛录，有的一甲喇可有二十多牛录。有的牛录籍贯上属于某旗，实际上并不属于某旗的某甲喇，而直属于其驻地的军事长官，或某位宗室贵族私人。

各牛录的兵丁数相差也很大，有的一牛录只有几十名兵，有的一牛录则有几百名兵。这些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变化很大。

牛录，汉译为佐领。甲喇，满语意为“节”，汉译为参领。固山，汉译为“旗”。牛录的首长，满语称牛录厄真，天聪八年(1634)改牛录厄真为“牛录章京”。汉译仍为佐领。(单位与首长同称)。甲喇的首长满语称甲喇厄真，天聪八年改称“甲喇章京”。汉译仍为参领(又是单位与首长同称)。固山的首长满语称固山厄真，顺治十七年(1660)定名为“都统”。

佐领的副手满语称“代子”，或“分得拔什库”，汉译为骁骑校，每佐领二员。都统的副手满语称梅鹿厄真，天聪八年改称“梅鹿章京”，顺治十七年改称“副都统”。各牛录在佐领、骁骑校之下有四员章京，四名领催(小拔什库)分管本佐领的四个达旦，向佐领负责。

旗内各级官员的品级及顶戴如下：

都统：一品，亮红顶，单眼大花翎，相当于现代的上将。

副都统：二品，大红顶，单眼大花翎，相当于现代的中将。

参领：三品，涅红(菠菜根色)顶，单眼花翎，相当于现代的少将。

副参领：四品，亮蓝顶，蓝翎，相当于现代的上校。

佐领：五品，正蓝顶，蓝翎，相当于现代的中校。

骁骑校：六品，涅蓝顶，蓝翎，相当于现代的少校。

章京：七品，水晶白(亮白)顶，野鸡翎，相当于现代的上尉。

各级官员的品级都可上下浮动一级，当然一品大员不能向上浮动，各级官员之下都可配置“笔帖式”掌管文书，其官阶由四品到九品不等，以六、七品者最多。八品官为正白顶，九品官为涅白顶，都是野鸡翎，相当于现代的中、少尉。

计八旗内，每一旗有都统三员、副都统六员，即满、蒙、汉军都统各一员，副都统各二员。每旗都有印务参领一、二员，带兵的参领五员(也有多少不同)。带兵的正参领与副参领员数相等。参领下有印务章京四至八员。佐领数不定。八旗内的官员，都由各本旗的人员担任，到光绪三十二年以后，开始有民人任八旗都统的，如刘永庆、冯国璋、王世珍、王栾楷、秦绶章、葛宝华、张英麟、段祺瑞等。

牛录是八旗的基础，佐领是全牛录的父母官，平时负责管理本牛录的户籍、婚丧、比丁、授田、租税、差役、教育、诉讼、生产生活等一切事宜，战时则为全牛录的指挥官。佐领的任命大体上可分为“世袭佐领”和“流官佐领”两大类。凡后金建国初期努尔哈赤的旧部任牛录厄真者，努尔哈赤、皇太极时率部来归的酋长，即以其所部编为牛录，以原酋长或其宗支任牛录厄真者；有功之臣受封为牛录厄真者，基本上都是世袭。其中又有“勋旧佐领”及“世管佐领”的两大类，但二者之间界线不易分清。“世管佐领”中又有一种“互管佐领”，即原来是由两个部落全员合编为一个牛录的，该两酋长及其后裔即互相交替任该牛录的佐领。原任佐领出缺时，即由两家中选出贤者继任佐领，而不是平均的互相替换。还有宗室及觉罗佐领也都是世袭。

清帝室宗族，有“宗室”及“觉罗”的区别：凡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的后代子孙均属宗室，努尔哈赤的曾祖福满的后代，除宗室一支外，其余均属“觉罗”。这是天聪九年（1635）规定的。《宗人府则例》卷一“宗室觉罗支派”条云：“凡宗室载入玉牒者，以显祖本支为宗室，叔伯兄弟之支为觉罗。宗室束金带（黄带子），觉罗束红带（红带子）。”由宗室编成的牛录最多时有十个，由觉罗编成的牛录，是从雍正二年（1724）开始的，当时觉罗牛录均在上三旗行走，由皇帝直辖。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时，觉罗牛录有三十一一个，平均分隶于八旗，每旗四个，只有正红旗三个。

流官佐领是量才录用的，基本上都是由骁骑校升任。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基本上都是世袭佐领。但也有流官佐领。八旗汉军中基本上都是流官佐领，但也有世袭佐领，如尚可喜海城墓地的守墓佐领即由尚家世袭，一直到民国建元才终止。

公中佐领，较其他佐领为贵，例如李侍尧在乾隆十四年（1749）任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十七年（1752）六月授公中佐领，十二月调热河副都统，可见公中佐领的地位相当于副都统。觉罗佐领在上三旗行走时，亦称公中佐领。

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等二十四旗编成后，即按旗色归宗，凡同一色的旗，即归同一旗主领有。如《雍正令典卷一兵部~官制》记曰：“国初设立八旗，曰镶黄、曰正黄、曰正白、曰正红、曰镶白、曰镶红、曰正蓝、曰镶蓝……又以镶黄、正黄、正白为上三旗。五旗以王贝勒统之。每旗又分为满洲、蒙古、汉军为三旗”。这个“国初”当指入关之后，满蒙汉军混编的八旗情况。因入关前无所谓上三旗，更非努尔哈赤时，因役时并无二十四旗。

牛录，即是八旗的基层组织，也是皇帝、诸王贝勒、宗室贵族封建领主们的财富。各领主们拥有的牛录数随时都有变化。有功的可受到增牛录之赏，有过者可受到拨出减少牛录之罚。同为旗主、同等爵位，而功罪不同，则实际领有的牛录数也不相同。每因整编，也可将各旗的牛录数变更。如《康熙会典卷104兵部27》记载：“国初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遇敌交锋，若七旗败遁，一旗攻战有裨于七旗者，将七旗七个佐领人丁给予一旗。若一旗败遁，七旗攻战，则将败遁旗人丁与七旗。若一旗内一半攻战，一半败遁，则将败遁之人丁与攻战之人……”。（此军令首见于《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八月庚午）这是各旗牛录数变化增减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兹不一一列举。

各牛录属于何旗，随时随地都可变更，拨到何旗，就属于该旗籍，但原来的族籍是不变的。变更都是整个牛录的行动，即八旗满洲牛录，拨到何旗，都仍是八旗满洲牛录。八旗蒙古牛录拨到何旗，都仍是八旗蒙古牛录。八旗汉军牛录，无论拨入何旗，都仍是八旗汉军牛录。牛录的族籍是基本稳定的，旗籍是
不
定
的
。今天满族～旗人所报的旗籍，是他家在八旗制消亡时所属的旗籍。但旗籍的变化不是很大的，有的家的旗籍是未曾变过的。

入关后总共只有八旗，每旗内再分满、蒙、汉军三旗。即镶黄旗内又分为“镶黄旗满洲”、“镶黄旗蒙古”、“镶黄旗汉军”。余类推，严格的说不应再称“满洲镶黄旗”、“蒙古镶黄旗”、“汉军镶黄旗”。旗内各族旗又称“旗分”，如“镶黄旗满洲旗分”、“镶黄旗蒙古旗分”、“镶黄旗汉军旗分”等。

每一旗中究竟有多少满洲、多少蒙古、多少汉军？入关后，八旗成为常备兵制。定期在八旗各佐领中挑补旗兵，兵额基本固定。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八旗兵数，全国共有两千多佐领。八旗平均，则每旗应有250佐领，但没有各

旗牛录的全数记录。《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 171，八旗都统条，只记有驻京八旗在乾隆二十二年的佐领数目是：

满洲佐领镶黄旗八十五有半(内宗室一、觉罗四、蒙古九、俄罗斯半、新满洲四)。正黄旗九十二有半(内宗室三、觉罗四、新满洲四、蒙古八有半、朝鲜二)。正白旗八十六(内宗室三、觉罗四、新满洲四、蒙古二)。正红旗七十四(内觉罗三、蒙古一、朝鲜四)、镶白旗八十四(内宗室一、觉罗四、蒙古四)。镶红旗八十六(内宗室一、觉罗四、蒙古一)。正蓝旗八十四(内宗室八、觉罗四、蒙古八)。镶蓝旗八十六(内觉罗四、蒙古二个半)合计 678.5 佐领，内老满洲 581 佐领，其他 97.5 佐领。

蒙古佐领镶黄旗二十八，正黄旗二十四、正白旗二十九、正红旗二十二、镶白旗三十一、镶红旗三十二、正蓝旗三十、镶蓝旗二十五、合计 221。

汉军佐领镶黄旗四十、正黄旗四十、正白旗四十、正红旗二十八、镶白旗三十、镶红旗二十九、正蓝旗三十、镶蓝旗二十九，合计 266。

总计一千一百六十四佐领，三个“半佐领”。《圣武记》《兵制兵饷》条中所记的佐领数与此不同。驻防京师以外的各旗籍的佐领数无法统计。

乾隆二十二年驻京八旗各旗分的佐领数是：

镶黄旗籍：满洲旗分佐领 85 个半、蒙古旗分佐领 28 个、汉军旗分佐领 40 个。正黄旗籍：满洲旗分佐领 92 个半、蒙古旗分佐领 24 个、汉军旗分佐领 40 个。正白旗籍：满洲旗分佐领 86 个、蒙古旗分佐领 29 个、汉军旗分佐领 40 个。正红旗籍：满洲旗分佐领 74 个、蒙古旗分佐领 22 个、汉军旗分佐领 28 个。镶白旗籍：满洲旗分佐领 84 个、蒙古旗分佐领 31 个、汉军旗分佐领 30

个。镶红旗籍：满洲旗分佐领 86 个、蒙古旗分佐领 32 个、汉军旗分佐领 29 个。正蓝旗籍：满洲旗分佐领 84 个、蒙古旗分佐领 30 个、汉军旗分佐领 30 个。镶蓝旗籍：满洲旗分佐领 86 个半、蒙古旗分佐领 25 个、汉军旗分佐领 29 个。

入关后每旗领旗的王公数目都不止一人，每位王公领有的佐领数有以下的记录可供参考。如康熙十四年顷正蓝旗和硕亲王常宁领有的佐领数是：满洲旗分佐领六、蒙古旗分佐领三、汉军旗分佐领三、包衣佐领二、管领一，共为 14 个佐领，一个管领。其中满洲旗分佐领是从镶黄旗拔来的津分(金布)佐领、噶布喇(嘎布拉)佐领；由正黄旗拔来的噶布喇(嘎布喇)佐领、霍尔敦(和尔敦)佐领；由正白旗拔来的夸代佐领、布鲁佐领。其中蒙古旗分佐领是从 XX 旗拔来的墨赫德(墨克得)佐领、恩克佐领；由镶黄旗拔来的额卜根(厄博根)佐领。其中汉军旗分佐领是从正白旗拔来的李廷霖佐领。佟文玉佐领。其中汉军旗分佐领是从正白旗满洲拔来的阿那代佐领。从正黄旗汉军拔来的姚质义(姚智义)佐领；从正黄旗拔来的噶布腊管领(半佐领)。此例请参看《八旗通志·初集“满洲规则”“实录”旗分志》。

道光十八年(1838)有规定，如《宗人府则例‘卷六’仪例》道光十八年云

凡外旗佐领，王公内有道光十八年前全无佐领，并有独缺蒙古旗分者，型未添给。此后定额军功之爵所属佐领：亲王应有满洲八、蒙古四、汉军四……

总的佐领数，乾隆二十二年的情况一直到清末无大变更。

各旗中的官员，除各旗中的佐领以下官员基本上由各该族所属的人员担任外，参领以上的高级将领均可越旗，越族任用。即统率满洲旗分的参领，不限定用满洲人，用八旗蒙古人、八旗汉军人均可。同样统辖各旗中蒙古旗分的参领，统辖各旗中汉军旗分的参领，只是旗人都行。至于都统，副都统等大员更没有旗别族别的限制，只是旗人都行。例如道光年间的正蓝人灵桂，他一个人

曾先后出任过正蓝旗蒙古都统、镶白旗蒙古都统、镶兰旗汉军都统，镶白旗满洲都统，正黄旗蒙古都统，正红旗满洲都统、正蓝旗汉军都统等职。

八旗都统，在顺治前是各旗领主的僚属，到顺治十六年（1695）才正式铸“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都统印各一颗”（共二十四颗都统印）发给各都统，到雍正年间（1723——1735）才正式设立都统衙门，开府治事。

入关前各旗中旗分的都统、副都统均由各旗领主推荐本旗人员充当之，直接向本旗领主负责。入关后逐渐改为由皇帝量才委用，直接向皇帝负责，不再秉承各该旗领主的意志办事。政府对都统的职守也作了明确的规定：“掌管八旗政令、宣布教养、厘诘戎兵，以赞旗务”（见《清史稿》卷117）实际上掌握了各旗分的军政大权。八旗领主的权利逐渐被削减，除上三旗外，各代皇帝都先后分封子弟到下五旗，以分原领主的权势，变成了各旗都是很多王、贝勒、贝子等贵族共有一旗的局面。雍正年间更把下五旗的“旗分佐领”（由正身旗人编的佐领）全部拨入公中，由皇帝直接控制。只有各旗的包衣佐领仍归各旗王、贝勒等直辖。上三旗的包衣佐领由内务府管辖。

入关后，八旗户口有“正身旗人”及“户下旗人”的区别。正身旗人是国初平民以上身分者的后人，他们有独立的户籍，当兵的义务，读书的机会，做官的权利。他们是封建帝国的平民，不再是各旗领主的私属。户下人，又称旗下人、旗下家人，是皇帝、各旗领主、八旗官员们的家奴，庄园上的农奴。他们没有独立的户籍，依附于主人的户下。户下人有功，可以另立户口，称为“开户”，多由国家代为赎身，或由其主子“恩赐”开户的。雍正时，开户者仍须与原主人保持一定的从属关系，与正身旗人仍有不同。

正身旗人的户口称“正户”，正户的子弟成丁后，可分出报户口，称为“另户”。另户的子弟再成丁时，再分报为另户，原另户即成为正户。所以正户、另户都属正身旗人。开户者不能称另户。这种封建奴主关系阶级压迫的社会制度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才被彻底推翻。

第十一节 八旗兵的补充和编制变化

清代规定，凡八旗正身男丁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但并非一律当兵，因时因势规定抽丁服役的比例，入关前基本上是三丁抽一，康熙时五丁抽一，乾隆时八丁抽一。其后抽丁比例更加缩小。被抽上的丁，入伍当兵(或某级官员)，没服役的丁，称为“闲散”。

国家对旗人丁壮三年编审一次，是为“比丁”。比丁时各户家长将本户丁壮数如实呈报。对每名丁壮都须写清其祖、其父的姓名年龄，任过何职，是否健在；本丁的名字，年龄，是老丁或新丁。如服现役者，须写清呈报时的职级、入伍年月等，是谓之“比丁册”。比丁册由各牛录的佐领、骁骑校、领催族长等逐一签名做保，然后上报给参领或当地驻军长官，再总呈报给各该旗，最后到京师都统衙门旗务处存案后遇有出缺挑补、出兵、调防或袭职等情，均以比丁册为根据办理。

旗兵有缺即补，无缺时，新丁多了，也可增编新牛录。挑选新兵时，要考试马术和箭法。选中者才能入伍。入伍后，骑射均佳者可当马甲，次者充步甲。步甲优者可升马甲。步甲马甲中之优秀者可升领催，委前锋校、护军、前锋等。领催，委前锋校可升骁骑校、护军校、这就进入了军官行列。承平无事时，也不扩编军队，由兵升官是很不容易的，八旗兵的升迁皆重才能，有才者虽出身奴隶亦可升官，亦可升至高级官员。

八旗兵制在定鼎燕京后，有了显著的变化，渐变为驻防京师的“八旗劲旅”和驻防京师以外各地的“八旗驻防”两大类型。（主参看《圣武记·兵制兵饷》）

八旗劲旅的编制可分为六种：（一）八旗骁骑营；（二）八旗前锋营、八旗健锐营；（三）八旗亲军营（内务府三旗前锋、护军、骁骑三营）；（四）八旗护军营、圆明园护军；（五）八旗火器营、八旗虎枪营；（六）八旗步兵营、五城巡捕营。兹分述如下：

（一）八旗骁骑营，起于天聪间的“阿里哈超哈营”，到顺治初详为定制。八旗中满蒙汉军每旗分各设一营。满蒙旗分每佐领各出兵二十名组成汉军旗分每佐领各出兵四十二名组成。按乾隆二十二年各旗所有各种旗分佐领数计：

镶黄旗：满 85 佐领 \times 20 名兵=1, 700 兵；蒙 28 佐领 \times 20 名兵=560 兵；汉军 40 佐领 \times 42 名兵=1, 680 兵。

正黄旗：满 92 \times 20=1, 840 名兵；蒙 24 \times 20=480 名兵；汉军 40 \times 42=1, 680 名兵。

正白旗：满 86 \times 20=1, 720 名兵；蒙 29 \times 20=580 名兵；汉军 40 \times 42=1, 680 名兵。

正红旗：满 74 \times 20=1, 480 名兵；蒙 22 \times 20=440 名兵；汉军 28 \times 42=1, 176 名兵。

镶白旗：满 84 \times 20=1, 680 名兵；蒙 31 \times 20=620 名兵；汉军 30 \times 42=1, 260 名兵。

镶红旗；满 $86 \times 20 = 1$ ，720 名兵；蒙 $32 \times 20 = 6$ 们名兵；汉军 $29 \times 42 = 1$ ，218 名兵。

正蓝旗；满 $84 \times 20 = 1$ ，680 名兵；蒙 $30 \times 20 = 600$ 名兵，汉军 $30 \times 42 = 1$ ，260 名兵。

镶蓝旗；满 $86 \times 20 = 1$ ，720 名兵；蒙 $25 \times 20 = 500$ 名兵；汉军 $29 \times 42 = 1$ ，218 名兵。

合计满洲兵 14, 540 名，蒙古兵 4, 420 名，汉军兵 11, 172 名，总计 29, 132 名兵。

汉军骁骑营内有特种兵炮甲每旗 40 名，共 320 名；藤牌兵每旗 100 名，共 800 名；舁鹿角兵每佐领下八名，共 2, 128 名，合计 3, 248 名，余 7, 924 名为普通马甲。此 3, 248 名特种兵为满蒙骁骑营中所无者。

入关后的八旗兵，唯“八旗骁骑营”仍归各旗都统直辖，分驻京城内，战时需要则外调出征。平时驻扎京师的分布，根据《八旗通志·旗分志·八旗驻防》条载：

镶黄旗居安定门内，西至鼓楼大街，南至东直门大街，东至北城根。

正黄旗居德胜门内，东至鼓楼大街，南至西直门大街，北至城根。两黄旗并在北方。

正白旗居东直门内，北至东直门大街，南至朝阳门大街，西至皇城根，东至城根。

镶白旗居朝阳门内，北接正白旗，南至单牌楼，西至皇城根，东至城根。两白旗并在东方。

正红旗居西直门内，北至西直门大街，南至阜成门大街，东至皇城根，西至城根。

镶红旗居阜成门内，北接正红旗，南至单牌楼，东至皇城根，西至城根，两红旗并在西方。

正蓝旗居崇文门内，北至单牌楼，西至东长安门。东南至城根。

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北至单牌楼，东至西长安门，西南至城根。两蓝旗并在南方。

四色旗居地的分布，都是按“五行”的生克关系配备的，骁骑营是八旗劲旅的主力，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

(二)八旗前锋营，备折冲(防敌)之用，起于天聪间所设的，“噶布什贤超哈营”。顺治初详定军制，由八旗满蒙旗分中，每佐领各出丁二名组成。依乾隆二十二年八旗劲旅的佐领数计；满洲旗分佐领 $678 \times 2 = 1356$ 名兵，蒙古旗分佐领 $221 \times 2 = 442$ 名兵。合计前锋营应有兵丁 1,799 名，分左右两翼，设统领、参领等官统率之。

八旗健锐营，亦前锋营之一种，是乾隆十三年(1748)组成的。斯时因用破两金川敌石碉之需要，仿前锋营兵源由满蒙旗分中选拔精锐士卒二千名，施以攻破石碉的特技训练，后随大学士傅恒大军赴两金川参战，后又于乾隆三十七、四十一年两次赴金川参战，所到之处都大显神威，战绩辉煌。回京后，因其有大功于社稷，特保留其建制，驻于北京香山，即原来训练特技故地。其驻营以香山为中心。依山势往东为左翼，驻镶黄、镶白、正白、正蓝四旗兵；依山势往南为右翼，驻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兵。

(三)八旗亲军营，司宿卫、兵额数与前锋营同。即内务府三营，由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出丁组成为；护军、前锋、骁骑三营。初隶领侍卫内大臣，后隶于内务府总管。

(四)八旗护军营，主司扈警蹕，始于天聪间的“巴牙喇营”。初制，上三旗守禁门。雍正时始定为均司禁卫。兵源由各旗满蒙旗分每佐领各出兵 17 人

组成。依乾隆二十二年八旗劲旅佐领数计：满洲旗分佐领 $678 \times 17 = 11,506$ 名兵，蒙古旗。分佐领 $221 \times 17 = 3,757$ 名兵，合计护军营应有兵丁 15,283 名。

圆明园护军，置于雍正三年(1725)由护军营中拔出。每旗设护军统领一员率领之。

(五)八旗火器营，司远攻，康熙三十年(1691)置，又分为“鸟枪护军”与“炮甲”两种。“鸟枪护军”由京旗满蒙旗分中，每佐领出六人组成，依乾隆二十二年京旗佐领数计：满洲旗分佐领 $678 \times 6 = 4,068$ 名兵，蒙古旗分佐领 $221 \times 6 = 1,326$ 名兵，合计“鸟枪护军”共有兵丁 5,394 名。炮甲由京旗满蒙旗分每佐领各出兵一名组成。即满洲旗分 678 名，蒙古旗分 221 名，合计 899 名。“城内外、城上共贮炮 1,937 位，每年秋季配一百位运芦沟桥燃放。白塔山设信炮五，有警则鸣放，九门信炮毕应”。又有八旗虎枪营，康熙二十三年(1684)置，兵额六百名，为皇帝行围进哨之用，皆以领侍卫内大臣兼任总统。

(六)八旗步兵营，康熙十三年(1656)置，由京旗满蒙旗分中，每佐领出步兵领催二名，步兵十八名；由汉军旗分中，每佐领出步兵领催一名，步兵十二名组成之。依乾隆二十二年京旗佐领数计：满洲领催 $678 \times 2 = 1,356$ 名，步兵 $678 \times 18 = 12,184$ 名，蒙古领催 $221 \times 2 = 442$ 名，步兵 $221 \times 18 = 3,978$ 名，汉军领催 266 名，步兵 $266 \times 12 = 3,192$ 名。合计领催 2,064 名，兵 19,354 名，总计士兵 21,418 名。其任务是驻守京师九门，设步兵统领管辖之。雍正元年(1723)又设“五城巡捕营”步兵一万名，由绿营兵中挑选组成，亦归八旗步兵统领管辖。此官对八旗步兵称“统领”，对五城巡捕营称“提督”。其全衔是“提督九门巡捕五营步军统领”，或“八旗步兵统领、兼提督九门事务”，简称“九门提督”。其机关称“步军统领衙门”。其职守是：稽查门

禁、缉捕、断狱、编查保甲等事宜，即：“统辖京营、总司缉捕”。凡统治国人的各种禁令，如官民住房，服用，乘车不许违背定制 越，不许编刊警句、小说，不许夜间行走等，该衙门都有权干涉。

京师还有“养育兵”，在清室统一全国后，八旗兵额有定数，而八旗人口不断增加，故顺治十七年(1660)即从八旗满、蒙、汉军各旗分中，挑选余丁之优者四千八百人训练之，称“养育兵”。到乾隆时养育兵增至二万多名。

总计京师八旗劲旅兵额为 85,724 名，(养育兵不在内)。

八旗驻防：据《钦定八旗通志》卷二十五《兵志》所载，全国各地驻防八旗兵九十处，总计兵额 123,893 名。计盛京驻防 25 处，兵额 18,652 名，吉林驻防 10 处，兵额 9,960 名。黑龙江驻防 6 处，兵额 11,047 名。直隶驻防 18 处，兵额 16,956 名。直省(各省)驻防 20 处，兵额 47,126 名。新疆驻防 11 处，兵额 20,098 名。合计如上数。

八旗驻防自乾隆年间以后，改为携眷长期定居。再据《圣武记·兵制兵饷》条所载，加上守陵兵 1,419 名，守围场兵 850 名，总计全国驻防兵 126,108 名。兹将《钦定八旗通志》卷三十五“兵志”所示“八旗驻防详细分布情况”分别列表如下：

八旗驻防的分布（根据《钦定八旗通志》卷三十五《兵志》）

其一、盛京省驻防

驻地	兵数	兵的族属	驻军长官 衔	今地名
盛京	6 , 831	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巴尔虎旗，汉军旗	将军	沈阳市
北京	473	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	城守尉	新宾满族自治县
抚顺	130	属于满蒙牛录的锡伯兵，汉军旗	防守尉	抚顺市
凤凰城	635	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巴尔虎旗，八旗汉军	城守尉	凤城县
辽阳	449	八旗满洲，八旗蒙古	城守尉	辽阳市
开原	855	八旗满洲，（伊彻满洲），巴尔虎旗	城守尉	开源县老城

大连文史资料-八旗源流

铁岭	200	八旗汉军	防守尉	铁岭市
牛庄	377	八旗满洲，八旗汉军	防守尉	海城县牛庄镇
广宁	400	八旗满洲（老满洲，新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	防守尉	北镇县城
巨流河	200	满旗，汉旗	佐领	新民县城东北巨流河
白旗堡	200	满旗，汉旗	佐领	新民县城西南大红旗
小黑山	200	满旗，汉旗	佐领	黑山县
闾阳驿	200	满旗，汉旗	佐领	北镇县城南西闾阳镇
熊岳	950	满旗，蒙旗，巴尔虎旗	副都统	盖县城南西24公里
复州	599	满旗，蒙旗，巴尔虎旗	城守尉	瓦房店市复州镇
金州	830	满旗，蒙旗，巴尔虎旗，汉军旗	城守尉	大连市金州区治所
岫岩	547	满旗，蒙旗，巴尔虎旗	城守尉	岫岩县
旅顺水师营	560	汉军旗	协领	大连市旅顺口水师营
盖州	385	满旗，蒙旗，汉军旗	城守尉	盖县
锦州	960	满旗（老满洲，新满洲）	副都统	锦州市兴城

				县
宁远	200	汉军旗，满旗锡伯兵	佐领	锦州市
中前所	200	同上	佐领	绥中县西南前所镇
中后所	200	同上	佐领	绥中县城
小凌河	200	同上	佐领	
义州	1， 180	满旗，蒙旗，汉军旗	城守尉	义县

加上法库等十六处边门 660 人，合计 18, 625 名兵丁。

其二 吉林省驻防

驻地	兵数	兵的族属	驻军长官 衔	今地名

大连文史资料-八旗源流

吉林	3 , 678	满旗（满，锡伯兵），巴尔虎旗，汉军旗	将军	吉林市
宁古塔	1 , 400	满旗	副都统	宁安县
琿春	450	满旗	协领	琿春县
伯都纳	1 , 000	满旗（挂勒察，满州兵），蒙旗	副都统	扶余县城北伯都纳村
三姓	1 , 520	满州兵	协领	依兰县
阿勒楚喀	406	同上	副都统	阿城县
拉林	406	同上	协领	阿城县南拉林
伊通	200	同上	佐领	伊通县
额木赫索罗	120	同上	佐领	敦化市城北额穆乡
打牲乌拉	700	同上	总管	吉林市北乌拉街

以上加伊通、巴廷俄佛罗等四处边门满旗兵 80 名，合计 9960 名兵。

其三 黑龙江省驻防

驻地	兵数	兵的族属	驻军长官衔	今地名
齐齐哈尔	3 , 107	满洲, 索伦, 达斡尔, 巴尔虎, 汉军旗	将军	齐齐哈尔市
黑龙江城	1 , 540	满洲, 索伦, 达斡尔, 汉军旗	副都统	爱珲县
墨尔根	1 , 900	索伦, 达斡尔, 巴尔虎, 汉军旗	副都统	嫩江县
呼兰河	500	索伦, 达斡尔, 汉军旗, 卦勒察	城守尉	呼兰县
呼伦贝尔	200	索伦, 巴尔虎, 额鲁特蒙古	副都统	海拉尔市
打牲处	2 , 000	索伦, 达斡尔, 鄂伦春	总管	

合计 11, 047 名兵

其四 直隶驻防

驻地	兵数	兵的族属	驻军长官衔	今地名
保定府	511	满旗	蒙旗	城守尉
沧州	511	同上	同上	沧州市
山海关	860	同上	副都统	山海关
永平府	100	同上	防守尉	卢龙县
玉田县	100	同上	同上	玉田县
三河县	100	同上	同上	三河县
喜峰县	200	同上	同上	喜峰口（迁 西县北）
罗文峪	100	同上	同上	
冷口	150	同上	同上	冷口（迁安 东北）
密云	2 , 000	同上	副都统	密云县

古北口	200	同上	防守尉	古北口
热河	1 , 440	同上	副都统	承德市
喀拉河 屯	400	同上	协领	
围场	800	满旗, 蒙旗	总管	围场县
化育沟	200	蒙旗	协领	
察哈尔	7 , 700	察哈尔蒙古兵 (察哈尔八旗)	都统	集宁市
张家口	1 , 000	满旗, 蒙旗	协领	张家口市
独石口	134	满旗, 蒙旗	防守尉	独石口
辖千家 店				

加良乡宝坻等九处满州, 蒙古兵合计 16, 956 名

其五 直省驻防

驻地	兵数	兵的族属	驻军长官衔	今地名
青州	1, 860	满旗, 蒙旗	副都统	益都县
绥远城	2, 700	同上	将军	呼和浩特市东北部
右卫	380	同上	城守尉	
归化城	5, 000	蒙古土默特左右两翼两旗	副都统	呼和浩特市西南部
太原	860	满旗, 蒙旗	城守尉	太原市
开封	540	同上	城守尉	开封市

江宁	4, 246	满旗	将军	南京市
京口	1, 534	蒙旗	副都统	镇江市
杭州	2, 050	满旗, 蒙旗	将军	杭州市
乍浦	1, 700	同上	将军	平湖县乍浦
福州	2, 000	满旗	将军	福州
水师营	600	汉军旗	(归上)	
广州	3, 424	满旗, 汉军旗	将军	广州市
水师	600	(归上)		
荆州	5, 180	满旗, 蒙旗	将军	江陵县
成都	2, 424	同上	将军	成都市
西安	6, 240	同上	将军	西安市
宁夏	3, 400	同上	将军	银川市
凉州	1, 540	同上	副都统	武威县
庄浪	816	同上	城守尉	庄浪县

合计 47, 126

其六 新疆驻防

大连文史资料-八旗源流

驻地	兵数	兵的族属	驻军长官 衔	今地名
伊犁	12 , 021	满, 锡伯, 索伦, 达斡尔, 察哈尔, 厄鲁特	将军	惠远城
乌鲁木齐	3, 352	满旗	都统	乌鲁木齐市
塔尔巴哈台	1, 150	满, 索伦, 察哈尔, 厄鲁特	参赞大臣	塔城县
巴里坤	1, 060	同上	副都统 领队大臣	巴里坤 哈萨克 自治县
古城	1, 060	什厄特蒙古	领队大臣	奇台县
乌什	200	满旗马兵	参赞大臣	乌什县
叶尔羌	206	同上	办事大臣	莎车县
喀什噶尔	329	同上	办事大臣	疏勒县
英阿杂尔	60	同上	领队大臣	
吐鲁番	560	同上	办事大臣	吐鲁番 县
哈密	100	满旗	同上	哈密市

合计 20, 098

驻防各地的八旗兵，基本上是从京师以牛录为单位调到各地的，唯内蒙古及东三省有的是就地编旗驻守原地的。驻防屯兵虽其旗籍属于某旗某旗，但已不归各该旗都统的指挥，而由其驻防地的军事长官直辖。兵额的补充，亦由各该驻防地旗人的闲散余丁中挑选之。各地驻防的军事长官有将军、都统、独立的副都统、城守尉；总管、协领、防守尉，防御、佐领等不同的官职。将军、都统衙门中常设有副都统为副手。而副都统（二品）、城守尉（三品）、协领（二、三品）、总管（二、三品）也都可为各地独立的军政长官，直接向皇帝负责。防守尉以下各级驻防长官，可分属于某将军、某都统、副都统等。

在新疆驻防各地的军政长官除将军、都统、副都统外，还有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官职。回疆（天山以南）的渚大臣总归“总理回疆参赞大臣”节制。总理回疆参赞大臣始设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驻牙喀什噶尔。乾隆三十年（1765）因“鸣什事变”乃移驻乌什，乾隆五十一年（1786）复移回喀什噶尔。总理回疆参赞大臣既直接向皇帝负责，也受伊犁将军节制。准部（天山以北）各大臣均归伊犁将军节制。伊犁将军设于乾隆廿六年（1761）。

东三省、新疆驻防的“旗兵”种族复杂，可详阅《八旗驻防的分布表》中的“兵的族属”栏。驻防旗兵以满蒙合驻者最多。其次是满洲旗分独驻一地。再次是满、汉军合驻一地。蒙古、汉军合驻一地者很少。满蒙汉军与锡伯、巴尔虎、索伦、达呼尔、鄂伦春、土默特蒙古兵、厄鲁特蒙古兵、察哈尔蒙古兵合驻昔亦有之。有的并非“八旗兵”，而是外藩兵。故以上所谓“八旗驻防的分布表”的统计，只是相对的情况而矣。

八旗驻防各地的将军、都统、独立的副都统衙门，都设有左右两司，各以协领一员、笔帖式数员负责办事，分别职掌办理官员的升迁调补，旗兵编制训练及官兵给养、户口、马乾武器、旌表、抚恤等诸事务。各地八旗驻防人数较

多者，则设有“旗民理事同知”、“专管硝磺、铅弹、八旗官兵米石，及旗、民交涉事件”。是旗政方面的专官，形同州县。

第十二节 八旗官兵粮饷的变化

八旗官兵的粮饷，入关前是靠旗地经济维持的。即以丁壮为基础的土地分给制。平时生活赡养家口，出征时的一切所需，均出自所分土地的生产中。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政府也实行某些补助，但那不是制度。战争时的掠夺所得，也是彼时经济来源之一。随着入关的同时，也开始产生了“俸饷制”。俸饷制的初期，仍是与原有的“旗地制度”并存的。即官有俸银、俸米，兵有饷银、饷米。同时各旗户还都有旗地。后来随着旗地制的逐渐消亡，又产生了“口粮制”。

入关后的旗地，都是“圈地政策”得来的。大规模的圈地行动有三次：第一次是顺治元年十二月（1645年元月），第二次是顺治二年十月（1646年11月），第三次是顺治四年正月（1647年2月），零星的圈地行动时有所闻。圈地的范围，开始限于京师附近三百里内，继而扩展到五百里内，最后扩展到直隶全省。除广平府（治广平，今县）、大名府（治大名，今县）外，其余保定（治清苑，今保定市）、承德（今承德市）、永平（治卢龙，今县）、宣化（治宣化，今县）、天津（治天津，今市）、正定（治正定，今县）、河间（治河间，今县）、顺德（治邢台，今市）、顺天（治京师）等九府属县，及化（今遵化县）、定（今县）、深（今县）、冀（今县）、赵（今县）等五州都有被圈占的土地。

开始圈占限于“无主荒田”，后来不论有主无主，看好了就圈占。随着八旗的需要，圈地更及于山东省的济南府（治历城，今济南市）、德州（今市）、临清州（今市）；江苏省的徐州府（治铜山，今徐州市）；山西省的太原府（治阳

曲，今太原市)、潞州府(治长治、今市)、平阳府(治临汾，今县)、蒲州(今永济县地)等处。圈占有主地虽有些补济措施，然多未落实。直到康熙八年(1669)重申圈地禁令，延续二十年之久的“圈地”行动才彻底结束。

分给官员的土地称“官员庄田”，都是由官员们拥有的奴隶(多是战争中虏去的汉人)、农奴(被圈占土地的原有农户无奈服从)为他们耕种，所以官员们都是丰衣足食的。

分给兵士的土地称“份地”，也称旗地。旗地一般计丁授田，每丁三十亩。属于士兵级的也有贫富的差别，如马甲、护军、前锋、领催等家中都或多或少拥有奴隶。分来的土地由闲散率领奴隶们合力耕种，自可丰衣足食。而绝大部分兵丁则自能由家中闲散耕耘。每因长期从征，或遇旱涝天灾，生活就发生困难，口粮不能自给。因之，自顺治十一年(1654)开始，准许家有四丁以下的出征旗兵，可将旗地交回本旗，由国家“量加钱粮月米”。从此“旗地经济”逐渐消亡。

从顺治元年(1644)至顺治十七年(1660)的过程中，俸饷制发展到基本成熟。俸饷制支給官员的称“官员俸禄”，简称“俸禄”；支給兵士的称“兵饷”，俸饷支給又分为银钱与粮米两种，米又分为“俸饷粮”、“口粮”两种。各级俸饷的数额各时期常有变化。然大清二百六十七年间，币值稳定，变化不大。

顺治十年(1653)兵饷额一律每月银二两；前锋、护军、领催每人每月银三两。兵饷米，康熙廿四年(1685)规定：前锋、护军、领催、马兵每岁发给饷米四十六斛(每斛五斗，每斗合现在十二市斤)；步兵每岁支米二十二斛，分春秋二季支給。

官员的俸禄按《世祖实录》卷七十一，顺治十年春正月癸巳条说：

更定多罗贝勒以下品级官岁支俸禄

宗室贝勒银一千五百两、固山贝勒一千三百两……异姓一等公七百两、二等公六百八十五两……固山额真、尚书一百八十两，梅勒章京、侍郎一百五十两；甲喇章京、理事官、一等待卫一百三十两；牛录章京、副理事官、二等待卫一百零五两；托沙喇哈番品级官、三等待卫八十两；护军校、骁骑校、他赤哈哈番六十两、七品等官四十五两；八品等官四十两。其禄米照俸银一两支给一斛。

又规定官的职品有出入的，职高品低，照职支给；品高职低，照品支给。口粮的支给与否，是与旗地对立的。有旗地就不给口粮，没有旗地的就支给口粮。口粮的支给不按各户的实际人口数，而按在位者的职级定支给的人口数。顺治十一年规定的口粮支给人数是：

固山额真(都统)六十口；

梅勒章京(副都统)四十口；

甲喇章京(参领)三十五口；

牛录章京(佐领)和闲散等官三十口；

兵丁匠役等十口。

每口每月支给口粮二斗五升(今三十市斤)。凡支给口粮的，即不再支给俸米、饷米。口粮的支给，各地有所差异，如《八旗通志》卷二十九、兵制四、八旗兵饷“驻防兵饷”中记有福州驻防旗兵俸饷口粮的例子：驻福州将军俸银一年一百八十两，红心纸张银一年二百两，家口米四十口，马二十匹，春秋大料每匹日支谷六升、草二束；夏冬小料每匹日支谷四升，草一束。副都统俸银一年一百五十五两，家口米三十五口。协领俸银一年一百三十两，家口米三十口。佐领俸银一年一百零五两，家口米二十五口。领催饷银一年三十六两，家

口米十口。马兵饷银一年二十四两，家口米十口。口粮每人每月仍为二斗五升。

多罗贝勒以上官员的俸禄，据《世祖实录》卷二十二、顺治三年正月丁丑条中说：“定给俸制，摄政王银二万两，和硕亲王银一万两，多罗英郡王银一万两，多罗郡王银五千两……”。

《光绪会典事例》卷二百四十九，俸饷文武官员俸禄的定例中说：“正从一品俸银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正从二品俸银一百五十五两，米一百五十五斛……”。这与顺治十年春正月癸巳条中的规定：“固山额真、尚书岁俸银一百八十两、禄米照俸银一两支给一斛”的数额完全相同。（固山额真、尚书均一品官）。

八旗兵出征时还另加补贴，《康熙会典》卷三十七“凡出征官兵支给”中说：“顺治十年议准，出征亲王月给银二百两，郡王一百两，贝勒五十两，贝子四十两，公二十五两，伯候、都统二十两…五品官护军校、骁骑校、委署官、六七品笔帖式三两。其所辖职大品小者照职支级，若品大职小者，照品支给，永著为例。”又说：“顺治十二年议准，出征月支行粮，亲王八斛，郡王六斛，贝勒四斛，贝子三斛，公二斛，候、伯、都统一斛二斗……佐领、前锋侍卫、托沙喇哈番、品外郎、主事、委署官、笔帖式三斗，护军校、骁骑校、护军拔什库、披甲人后每二人支出一斛。”又同书，“兵饷”，凡出征官员支给中说：“顺治十八年题准，统兵大臣月给银六十两、米二斛。参赞大臣银二十五两，米一斛三斗。都统银二十两、米一斛二斗。副都统、统领银十四两、米一斛。署副都统、统领、一等待卫银十两、米一斛。参领、学士、二等待卫银七两、米四斗。佐领、散官、侍读学士、三等待卫、前锋侍卫银五两、米四斗。委署闲散官、主事、中书银四两、米三斗。护军校、骁骑校、六七品笔帖式银三两、米三斗。止照出征职掌，不照官品支给”。这对以前出征补贴银米数额有所修改，但出入不大。

据《圣武记·兵制兵饷》中记：“八旗兵饷之制，前锋、亲军、护军、领催、弓匠长月给银四两，骁骑、铜匠、弓匠月给银三两，皆岁支米四十八斛。步军领催月给银二两，步军一两五钱，皆岁支米二十四斛。炮手月给银二两、岁支米三十六斛。由觉罗补前锋、亲军、护军者，月加银一两。教养兵月给银如步兵数，不给米。绿营之饷制，京师巡捕三营马兵月给银二两，步兵一两，皆月米五斗(给岁米二十四斛)”。

这里看出旗兵较绿营(民兵)的银粮待遇高出很多。但除官员外，旗兵及其家属的生活是很贫困的。只靠入伍当差者的饷银及口粮生活，此外不准旗人经商习艺，作其他生产活动。旗人人身固着于本牛录许可活动的范围内，形同软禁。

以上所说的都是京旗和关内驻防旗兵的情况。关外~东北地区的旗人经济情况与上不同。当明清换鼎之际，东北地区原住的汉人，除降清入旗者外，其余基本上都逃亡入关。如天命四年(1619)“萨尔浒战役”后，原居于明辽东都司境内的汉人，走死逃亡，十不存一。有的逃入山海关内，有的从旅顺跨海逃回山东，有的逃往朝鲜。辽东土地基本上荒凉无人，常常行百里不见人烟。所以原在关外的旗人也好，后来“随龙出关”重回东北的旗人也好，他们都在驻防地区“跑马占荒”，各家各户都拥有大片的沃土良田。每丁不受三十亩旗地限制，比入关前旗人在故地上的土地更辽阔，取之不尽，占之不完。有的自家人丁与奴隶合力耕种，而绝大多数都是招收关内“逃荒”(跑关东)的民人(汉人)耕种。所以关外旗人多数都成了“庄园地主”，生活是比较富裕的。他们不靠口粮生活，当差的照领俸饷银米。经营的范围也不限农业，凡牧畜、渔猎、养殖、采集和农副产品的交易均可。

逃荒出关到东北地区的民人，基本上都投靠于占有土地的旗人户下，充当旗人的佃户、农奴、世仆，民国建元后，这些人也多报了旗人一满族。

第四章 八旗的民族

第十三节 “满洲”族名的由来

“满洲”一词接替女真族名使用，始于清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太宗皇太极说：“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只称我满洲原名，不得毋前妄称”。（见《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五及《满文旧档》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

太宗所说的“满洲”这个词是原来女真语“Manju”一词的音译，使用“满洲”这两个字是有深刻意义的，同次年的改国号为“清”的意义同出一辙。因满洲人非常重视“五行生克”学说。当时汉族的明帝国有三重“火”的意识在内；汉族之称，来自汉朝，汉以火德王，用赤帟，称炎汉。“炎”字分明是双火组成的；“明”字是日月二字组成的，日有火意，而帝室姓朱，朱赤色，亦有火意，故朱明之合亦一火也。故用满洲族名之双水以灭“炎汉”，用清之一水以灭明火。因五行生克，“水能克火”也。

这样从“满、洲、清”三个汉字的结构上去解释“满洲”族名，只是说明问题的表面。而根本问题是“Manju”这个女真词之所在，才是满洲族名的真正来源。对“满洲”一词的解说截至目前止(1989. 2. 10)，史学界已有十五种说法，兹分别列举如下：

(一)“我国肇基于东，故西藏每岁献丹书，皆称“曼殊师利大皇帝”，至今汉字写作满洲音者，盖因洲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成

俗。”

(二)“史又称金之先出靺鞨(羯)部，古肃慎地。我朝肇兴，称旧所属珠申，后被称满珠，而汉字相沿，讹为满洲，其实即古肃慎为诸申之音转。”(以上二说均见《满洲源流考》乃乾隆皇帝之语。)

(三)认为满洲二字从建州二字转变而来。(见傅斯年著《东北史纲》)

(四)认为是隋唐之瞞咄，明时之满住同为国君之尊称。(见孟森著《元明清通记·满洲名义考》)

(五)主张满洲二字，前一字取满住之“满”，后一字取建州之“州”，又加三点水而成。(见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

(六)谓“满洲”二字乃“蛮主”二字之音转。(见《满洲字义考》一文，载《东北丛刊》第一期)

(七)谓满洲一词为清亮之意。

(八)谓满洲一词为勇猛之意。

(九)谓地产珠，名满珠，训作满洲。

(十)谓因夷酋得救于猪，而命名。

(十一)谓满洲为满仲之重出。

(十二)谓由勿吉之音转。

(十三)谓满洲乃满节之音转。

(十四)谓出自建州女真之尊号“满住”。

以上(七)至(十四)均见冯家升的《满洲名称之种种推测》一文，原载《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十七号。他还提出与(一)(二)(四)相同的三种说法，合计他搜罗了十一种说法。

(十五)主张“满洲”一词是由地名变为部落名，又被皇太极推而广之。”(见孙文良的《满族发展史上的几个问题》一文，载《满族研究》

1986. 2. 29 页)

以上十五种说法的前十四种，包括乾隆皇帝自己的说法在内，都有牵强附会处。唯有第(十五)种说法，言之有据，他是从朝鲜人申忠一写的《建州纪程图纪》中研究出来的。在《图纪》中用“蔓遮”一词称呼山川部落等名，先后出现九次之多，其地域皆在努尔哈赤及其父、祖们活动的范围内。后来这些“蔓遮”地方都被努尔哈赤首先统一的，所以孙文良先生“初步认定满洲与蔓遮可能就是一个名称。二者在朝鲜人的发音大约是相同的”。因此他本人的结论是：“满洲由地名而变为部落名，又被皇太极推而广之，定为十七世纪初年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专用名称……”

其实，“满洲(Manju)”一词，在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太宗下令用“满洲”接替“诸申(女真、肃慎)”一词之前，就早已记入了中国史册。我翻阅了不太多的有关书刊，就发现十处之多，兹分列于下：

(一)《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记载叶赫曰：“乌拉、哈达、叶赫、辉发、满洲语言相同，势同一国，岂有五王分立之理。”这与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太宗所说的范围完全一样。

(二)《清史稿》“杨吉努”列传也谈到，“扈伦诸部与满洲语言相同，宜合五为一”。

(三)《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记有，努尔哈赤起兵时(1583年)女真已分成十五部，其情况是：“时各部环满洲国扰乱者，有苏苏河部、浑河部、王家部、东果部、折陈部、长白山内阴部、鸭绿江部；东海兀吉部、斡哈部、虎儿哈部；胡笼国中兀喇部、哈达部、叶黑部、辉发部。各部烽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攻杀。”

(四)《满洲实录》明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载“有苏完部长索尔果率本部军民来归……又栋鄂部长克辙孙何和里亦率本部军民来归……又雅尔古部长扈拉瑚杀兄弟族众率军民来归……太祖遂招徕环满洲而居者”。

(五)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辛卯年(万历十九年、公元 1591 年)记有夜黑派人告努尔哈赤说：“兀喇、哈达、夜黑、辉发、满洲总一国也，岂有五王之理”。

(六) 《八旗氏族通谱》卷七载有：“赫东额、镶黄旗人，世居马佳地方，国初同亲弟尼玛禅率满洲五十户来归”。

(七) 《旧满洲档》万历四十一年(1613)九月载有“女真满洲国昆都仑汗”努尔哈赤的称号。

(八)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 1619)八月，在努尔哈赤攻灭叶赫后，记有：“叶黑自此灭矣，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至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语言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

(九) 《满洲老档秘录》上编天命八年(1623)七月《郡主自缢》中记有癸未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时，其“一祖所生六贝勒之子孙，亦欲杀朕，屡施毒手，竟未如愿。于是各处之满洲、汉人皆存杀朕之心，相继攻伐”。

(十) 汉译《满文旧档》辽宁大学历史系印第 57 页载：“天聪九年(1635)五月初六，一来自黑龙江的降人穆克什克讲起了满洲起源的神话故事，也说布库里克雍顺是满洲部(国)的同族。”

以上这些记有“满洲”一词的史录，可说明以下问题：

(一) 天聪九年(1635)九月十三日太宗谕旨中句句都与史实相符合的。他明言“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在上面十条史录中完全可以证实。即最迟在太祖努尔哈赤起兵时(1583)年，亦即太宗下谕时(1635年)的 52 年前，就有了“满洲国”的称号。彼时国名、族名是分不清

的。

(二) “满洲国”的地理位置：综合这十条史录研究，也很明显，这个“满洲国”就是努尔哈赤父、祖以来直属部落所在地，即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南苏子河畔，烟筒山东麓的费阿拉城（努尔哈赤起兵地）故址，及永陵镇东的老城—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的首次都城）城址附近一带地，原称“Manju”，苏子河上游一小支流本称满洲河。

这十条史录第(三)条的部落名与本文第四节相对照：苏苏河部，即苏克素护河部，王家，即王甲(完颜)部。东果部，即董鄂(栋鄂)部。折陈部，即哲陈部。内阴部，即讷(纳)殷部。东海兀吉部，即窝集(勿吉)部。斡哈部，即瓦尔哈部。虎儿哈部，即呼尔喀部。胡笼国，即扈伦四部，他们都姓那拉，有时四部统一。叶黑部，即夜黑，或叶赫部。较第四节少了个长白山的朱舍里部，尚未远及于黑龙江诸部。

(三) “满洲国”的地理范围随着努尔哈赤的王业发展而发展。如十条史录的(八)《太祖武皇帝实录》1619年所记，太祖攻灭叶赫后，“满洲国”的范围扩展到“自东海至辽边北至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间的广大地区。

(四) 天聪九年时，后金国的领域已及于鸭绿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日本海以西，大明国以东的广大地域，较1619年时，又超过了五、六倍，统一了所有女真人的分布区。当然“满洲国”一词的使用地区也应随之而及于全域。当时“金国”号与“满洲国”国号，在人们意识中还是并存的。正如中国历朝都有国号如唐宋元明等，但也都称中国或“汉”（少数民族当国例外）一样。所以太宗下谕用“满洲”一词接替了“诸申”（女真、肃慎）一词，是自太祖以来“满洲国”发展史的延续。这一点在历史上阿尔泰语系诸族，建立国家名称的由来大都如此。如鲜卑、蠕蠕、突厥。薛延陀、回纥、蒙古等莫不如此。都是由统治者所在原来小部落的名称，扩展为所建立的国家的名称。其实中原王朝的夏、商、周、秦、汉、晋、

隋、唐等国号的由来，也都是这个规律。只大金国不用女真为国号，和忽必烈将民族名与国名分开，改蒙古国为“元”，是一大进步。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新国时，不再用“满洲”旧名而称“金”。然这种较高级的意识，在后人的思想里是有反复的。所以在1619年的史录里又出现“满洲国”的称呼，忽视了彼时的正式国号是“金”。

皇太极对国号与民族号的概念在天聪九年时，还是模糊不清的，所以下谕时还说：“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长，相传栞世，自今以后止称我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改的是国名呢？是民族名呢？到次年改国号为“大清”时，他的认识才算清楚了。其后“满洲”一词才专做族名用。但太宗对“满洲”一词由来已久是很清楚的。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满洲”一词，是努尔哈赤的父(塔克世)、祖(觉昌安)以来，其直属部落所在地的名称，也是其直属部落的名称，也是对内的“国名”。皇太极用“满洲”一词为已变化了的，以女真人为主体的，又融合了大批汉人、蒙古人及部分朝鲜人于其中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族名”。彼时女真族分化后的各部族名，基本上都是由所在的地名而来的，很少例外。

第十四节 八旗满洲的民族成分

“八旗满洲”编成时，总共是402个牛录，其中蒙古女真混合牛录308个，纯蒙古牛录78个、纯汉人牛录16个。后来又加入了朝鲜人和俄罗斯人。总的说以蒙古族的成分为最多，其次是女真人的成分，再次是汉人成

分，再次是朝鲜人的成分，最少的是俄罗斯人成分。

(一) 蒙古人的成分：初编八旗时 308 个女真蒙古混合牛录，以女真、蒙各占一半算，应当是 154 个女真牛录、154 个蒙古牛录。154 加上 78 个纯蒙古牛录等于 232 个蒙古牛录，占总数 402 个牛录的半数以上。属于蒙古语支的达斡尔族，也是八旗满洲的成员之一。他们是太祖太宗两世先后经营黑龙江女真、东海女真时，收入八旗满洲的；清代的吉林将军长顺就是达斡尔族，他姓郭博罗氏，属八旗满洲正白旗。到乾隆二十二年顷，八旗满洲中还有单由蒙古族编成的牛录三十五个，和两个“半牛录：即镶黄旗满洲旗分中九个、正黄旗中八个半、正白旗中二个、正红旗中一个、镶白旗中四个、镶红旗中一个、正蓝旗中八个、镶蓝中二个半。他们是属于满洲旗分的，与“八旗蒙古”不同。

这些满洲旗分中的蒙古佐领，有的详记其来源，如镶白旗满洲都统下第五参领的第八佐领“系国初从察哈尔地方来归之人丁编立……”（见《八旗通志》卷七（旗分志七）。又如正黄旗满洲都统下第五参领的第八佐领“系康熙十八年将准噶尔玛索诺木额附之蒙古及公主随嫁满洲编为佐领……”（见《八旗通志》卷四（旗分志四）还都不是初编八旗时的蒙古之裔。

(二) 汉人的成分：明末，原居辽东的汉人，在明清换鼎的连年战争中，除逃亡者外，其余都投归满洲，编入八旗。

八旗的人口由初编八旗时的 402 个牛录计，每牛录约 300 兵丁，合 120,600 名兵丁。当时三丁抽一，则全壮丁数为 361,800 名。每丁以有眷二口计则全人口是 1,085,400 人。在这百万人口中，编成佐领的汉人是 16 牛录，4,800 名兵丁，14,400 名丁壮，43,200 人口。此外则是战争俘束为奴的汉人，计算在满洲人口户下，不计其数。仅举一例，可见一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55 页记有：“毁抚顺城，上率大军还，至抚顺城东之野，各营兵齐集出边，至甲板驻营，论将士功行赏，以俘获人三十万分之”。仅这一次战俘就有

三十万加入“八旗满洲”人口中，等于全八旗人口的三分之一多。其他各次战争的俘虏呢？由此可见“八旗满洲”中汉人成分之大了。

八旗满洲中的女真人口有多少呢？初编八旗时的402个牛录中，一个纯女真牛录也没有，由308个女真蒙古混合牛录中，分出一半计算，是154个牛录，合46,200名兵，138,600名丁壮再乘以3，等于415,800人口。这四十一万五千八百人中，除俘入的汉人外，其奴隶贵族平民以上的“女真人”，也不全是女真血统。如董鄂部是八旗满洲中，女真人口的主要成员之一，但他们却是赵宋皇族的后裔，是女真化了的汉人部落。这段的证明，是清代满人昭禔的《啸亭杂录》卷十《宋人后裔》条记曰：

两汉以下，惟宋室最为悠久，虽屡遭变迁，其业犹存，即亡国后，其裔亦未遭酷毒者。按野史谓元顺帝为天水苗裔，事虽暗昧，未必无因也。近日“董鄂冶亭”制府考其宗谱，乃知其先乃英宗越王之裔，后为金人所迁，处居董鄂；以地为氏。数百年之后，尚有巍然兴者，何盛德之至也。

文中的“董鄂冶亭”印铁保、满洲正黄旗人，姓董鄂氏，为清代乾隆四大书法家（成刘翁铁）之一。这是说清代大书法家铁保，自己考证自己的家谱，确知自家一董鄂氏是宋英宗之后，非其他史家考证所得者之可比，当然是可靠的。

考宋徽钦二帝北狩时，宋宗室除康王外，举族三千多人皆同俘从亡，东北迁于松花江畔的五国头城，即今牡丹江入松花江口的伊兰县地。这批人的子子孙孙都同化于女真人中。而彼时女真人绝大多数都随金帝西南入于中原，居留东北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只是全女真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当时三千多人的汉人部落处在留居东北的女真人中，是个不小的数目，后来与女真人共同生

殖繁衍成为元明时女真的的一部分。他们女真化后，改原来的“赵”姓为“觉罗”（jiaolao）哈拉，就是今天许多“觉罗”氏满族之先民。今天诸觉罗哈拉，都基本上复原为“赵”姓，也有例外的是极少数在松花江一带的宋裔，一部分后随胡里改、斡朮怜两万户府南迁，辗转落脚于董鄂地方（今辽宁省桓仁县境内）是合乎历史变化情况的。今浑江西来的一大支流一大雅河，原名董鄂（冬古、东果）河。在建州女真分化为许多。小部落时，董鄂部落就住在今桓仁县。

今天居住在黑龙江省的同江、抚远、饶河一带的赫哲（黑斤、黑津）人，也是八旗满洲中女真成员之一。天聪六年（1632）赫哲部的乌扎拉族即归服后金，编入八旗。然赫哲族也是女真化了的宋帝后裔。此说明典籍证明如下：

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三记有：三姓中有民觉罗。国初之黑斤秀而黠者来投，因编为旗。其人以国家有民公之封，自以为宋后，因自名为“民觉罗”（伊尔根觉罗）。

同书同卷又记曰：

“黑斤”乃“徽钦”二字之音讹也。在三姓东三千里外散处，东至海边，以鱼为生，即以鱼皮为衣，故由“鱼皮管子”或谓“黑斤管子”，名异而实同也。……余内弟左子恕宜任伯都纳巡检，知之最详，为余言之。

按姚元之（1776～1852）安徽桐城人。此段记事是根据他内弟左恕宜讲的。左公是任过伯都纳（今吉林省扶余县城北）巡检的。伯都纳与黑斤人居住的地方都在第一松花江沿岸，一水相通，春秋夏用船舶，冬用爬犁（雪橇）交通便利，连络容易，况左公是地方官，调查研究都远较一般治史者为容易，所以他讲述的资料是可靠的。况董鄂为宋裔之说出在乾隆承平之世如非史实，清廷岂有不过问之理。

由此看来，满汉两族先人的“交叉迁徙”～女真人向西南迁入中原，汉人向东北迁入松花江滨；又“交叉同化融合”～迁入中原的女真人同化

于汉族，迁到松花江流域的汉人同化于女真族。到明末清初，女真、蒙、汉混成的“满洲人”再同华北迁来的“汉化女真人混成的汉人”再同化、再融合而形成清代的“八旗满洲”新的民族共同体。所以“八旗满洲”绝不等于任何一个古代民族。有人把“八旗满洲人”说成是单纯女真人的后裔，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旧《辞海》中对“觉罗”一词之解释：

[觉罗]清室宗族之称号。《清会典》“凡玉牒所载以显祖宣皇帝之本支子孙为宗室，以伯叔兄弟等旁支子孙为觉罗”按此为官觉罗；又有宋徽钦二帝北狩时所留之后裔，居于三姓（即今吉林省依兰县）等处，清初编入八旗者，亦有觉罗之号，是为民觉罗。

这段解释词与《竹叶亭杂记》卷三所记可互相印证。

（三）朝鲜族成分：八旗满洲中的朝鲜人成分，主要是天命四年（1619）收入的。是年三月，朝鲜兵助明军进攻后金，被努尔哈赤击败之于萨尔浒后，朝鲜助明军统帅姜宏烈率残部五千余人降于后金，均被编入于八旗满洲之中，后来他们的眷属也陆续迁来。天命九年（1624）十二月又有朝鲜叛臣韩明链的儿子韩润、韩义兄弟来投于后金，亦被编于八旗之中。到乾隆二十年顷，八旗满洲中还有由朝鲜人单编的六个牛录：即正黄旗满洲旗分中有二个朝鲜牛录，正红旗满洲旗分中有四个朝鲜牛录。每牛录以300兵计，六个牛录则有兵1,800名，当时是八丁抽一，则应有丁壮14,400名，则全人口应为43,200人。其中正黄旗包衣第四参领的第二高丽佐领“系国初编立……”（见《八旗通志》卷四“旗分志四”）正红旗满洲都统第一参领的第十二佐领“系国初从朝鲜来归人丁编立……”（见《八旗通志》卷六“旗分志六”）

（四）俄罗斯族人成分：八旗满洲中的俄罗斯人，都是顺治五年到康熙二十二年间先后来归的俄罗斯人编立的佐领。到乾隆二十二年顷，镶黄旗满洲都

统第四参领的第十七佐领，即由俄罗斯人编成的。（见《八旗通志》卷五“旗分志五”）

这就是：民族血统似江流，汇集百川下归下游，百川各有源名在，江水谁知是哪流。

第十五节 旗人的民族称呼问题

旗人，不单是清代的“八旗满洲”，而是指八旗的全体成员。其中包括“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巴尔虎旗”、锡伯人、挂勒察人等。到清末，旗人已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在历史的长河中，某些旧民族形象、名称的消失，新民族形象、名称的产生，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的。如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大民族鲜卑、大月氏（曾在印度建立贵霜王朝）等不都早就消逝了吗！蒙古、满洲等不都是后来新产生的大民族吗！

八旗制度中的“满洲旗分”（其中包括锡伯兵、挂勒察兵不单编牛录）“蒙古旗分”、“汉军旗分”、“巴尔虎旗”（属于满旗，但单有牛录）都是八旗制度的整体。而满洲旗分的成员民族成分是很复杂的。“蒙古旗分”中同样也有满洲人、汉军人。“汉军旗分”中也不单纯是汉人。如鼎鼎大名的汉军旗固山厄真石廷柱，本文第七节中已交代过，他原是女真人，可他的后人却都编在汉军正白旗中。又如曾任昂邦章京的佟养性，也是女真人，他的后人都编在汉军正蓝旗中，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在清代，旗人与民人（没有旗籍的汉人）之间有着森严的壁垒。清廷规定：“旗、民不交产”、（旗人与民间不得互相买卖田宅）“旗、民不通婚”、（不是满汉不通婚）“旗、民不同刑”（审判机关不同，服刑的办法不同，旗、民之间在法律上不平等）。而实际上旗人与旗人之间，不分满、蒙、汉军，一切皆通。做为区分民族的重要条件之一的“血统”，在满旗、蒙旗、

汉军旗间已混成一团，形同水乳。尤其满旗与汉军旗之间，满旗与蒙古旗之间婚姻关系最多。从清太祖、太宗时起，满汉上层之间的婚姻就已经开始。如本文第七节中交代的“明抚顺游击李永芳降金后，太祖即以孙女儿嫁之，招为“抚顺额驸”。太宗曾下令对于降清的汉官“凡一品官，以诸贝勒之女妻之，二品官，以国中大臣女妻之……复查各牛录中寡妇，给配各官”，成为制度。（见《清太宗实录》）。在下层，原居辽东的汉人（多是辽代、明代移来的）早已与女真人通婚。皇太极时五次入关掳获大批汉族的妇女，多配给满洲的兵丁为妻。大清定鼎中原之后，八旗满洲官员多娶八旗汉军的小姐，因其知书明礼，会侍奉丈夫。而八旗汉军的官员，则多愿娶八旗满洲的格格为夫人，藉以加深与满洲人的关系，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满蒙之间的婚姻关系开始得更早，原居东北地区的蒙古人与女真人早已互通婚嫁，所以弄得有些部落很难分清是蒙古？还是女真。例如扈伦四部的叶赫部，原本都是从松花江北一个支流的呼兰河（扈伦、胡笼皆呼兰之对音）流域迁到辽河流域的女真人。但因叶赫与蒙古关系最密切，所以就有的人认为她们是蒙古人。如《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就记载说：“夜黑始祖蒙古人，姓土默特”。蒙古科尔沁部与满洲通婚也最早，太祖努尔哈赤就娶科尔沁贝勒明安之女及翁阿岱之女为妃。天命末年太祖以聪古兔公主嫁给喀尔喀蒙古台吉占里布什，以族弟之女嫁给喀尔喀蒙古台吉莽果尔。太宗皇太极的孝端文皇后是科尔沁贵族莽古斯之女；孝端后早卒，太宗又纳莽古斯之孙乌克善之女为继室，即大名鼎鼎的孝庄文皇后。皇太极共有十六个女儿，有十二个是嫁给蒙古贝勒的。太宗的三位贵妃，也都是蒙古贝勒之女。天聪元年太宗又以皇姐哈迭公主嫁给蒙古赦汉部长琐诺木杜棱。顺治帝的孝惠章皇后也是蒙古贝勒绰尔济之女。满蒙间的婚姻，也逐渐成为制度，并以法制形式固定下来。而满蒙间的婚

姻并不限于旗人，八旗以外的蒙古亦可通婚。这较满汉通婚只限于八旗满洲与八旗汉军之间者，更为广泛。八旗汉军与八旗蒙古间的直接婚姻较少，但间接的血缘关系，还是千丝万缕的。所以在旗人与旗人之间的满、蒙、汉军间的界线，只是从男(父)系关系维系的，如从母系看，则八旗中满、蒙、汉军的界限已不复存在。

旗人的衣冠制度也是一致的，本文第七节中已有交代；天聪七年编成一旗汉军后，天聪十年于议定《令典》中，即有明文规定“凡汉人(指汉军旗)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式样……女人不许梳头、缠脚……”后来国人称缠足的小脚女人为“民装”，旗人不缠足的女人为“旗装”，有人把“男女一双鞋”(都是天足)看成是旗人不同于民人的显著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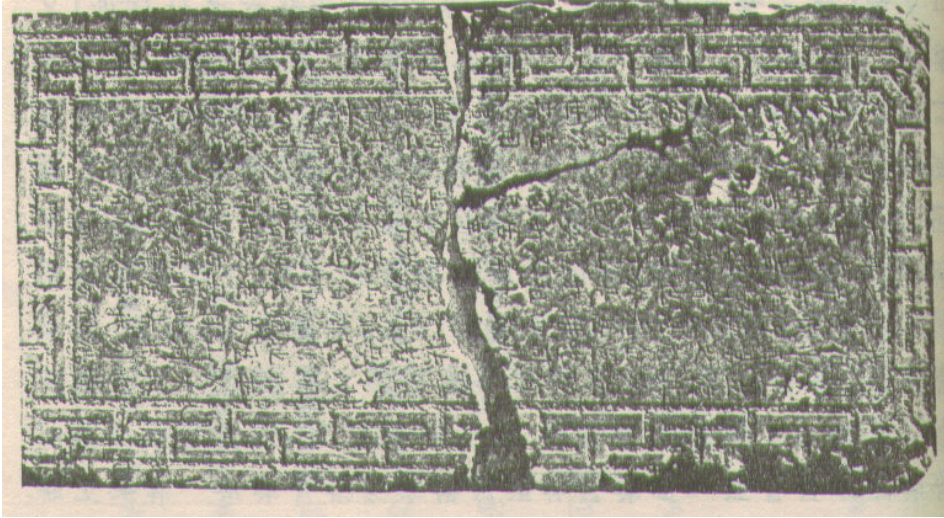
八旗人由于长期居住于共同地域，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的社会组织(牛录)，共同的经济来源，共同的兵役任务，各种文化间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从而形成了共同的语言文字(汉语文)共同的心理状态。为什么汉语文成了旗人的共同语文呢？一则由于汉语文的科学性远较蒙古文、满文为高，且使用范围广，古往今来积累了大量的图书典籍，可谓之“书山学海”取用无穷。二则无论驻京旗人，驻防各省各地的旗人，都处于汉族民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旗人的生活都得与民人打交道，而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所以旗人的共同语文，只有向汉语文方向发展。这种波澜壮阔的历史潮流，绝不是某些少数人的意志所能阻止的。所以最后八旗中的满蒙成员，尤其是满旗成员都放弃了自己固有语文文字，而操汉语，用汉文。也正由于采用了汉语文，旗人的文化才得到了高度的发展。旗人高水平的文学、史学成就都是用汉文写出来的。

做为同一民族的应有条件：共同的语言文学，共同的居住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心理状态，共同的血缘(表现在历史和体貌上)和某些基本相似的风俗习惯，共同的宗教信仰如都信奉或不反对佛教，供奉关羽，都不同程度信萨满教等等，凡属旗人都具备了这些共同的条件，所以早就形成了一个新的

民族共同体——“旗族”。清末在北京广泛流传着：“只分旗民，不分满汉”的说法。就是说彼时只有“旗人”与“民人”间有明显的区别，而旗人内部不再有满、蒙、汉军的明显界限。因此，“旗族”的称呼到清末，民国初年间，已经普遍。如民国初年就出版了《旗族》杂志，其第一期(1914. 4)发表了署名的文章《旗族解》：“八旗制度，又有满洲、蒙古、汉军之畛域乎……究其(八旗种族)实质，固非纯一血统；然往籍流传，俱可考里，有清一代之历史，其血统(指绝大多数而言)、语言、文字、宗教、住所、习惯、精神、体质，确已纯然同化矣。”因之该作者的结论是：“凡旗人不应再分满蒙汉军三旗，而应统称“旗族，”。(见李燕光《满族史中的几个问题》载《满族研究》创刊号19页)

又如民国三年(1914)成都地区的旗人上层人物为解决八旗人的生计问题，曾给当时民国政府写了份报告，中称“阖城旗族约一万四千余人，其中能自立者，不过十之一二，余皆家无恒产”。“成都旗族，不能自立者不下一万二千人”。(见关克笑《满族试论》载《满族研究》1988. 1)

笔者在实际调查采访中，还发现一座刻有“旗族”称呼的碑文，是大连市金州区七顶山满族乡，满族又姓满的一家的墓碑。碑文中记其先人“籍列旗族，受职行伍”。碑主人满家原是巴儿虎蒙古人加入八旗满洲的。彼家现住七顶山满族乡老虎山村。兹录其碑文如下：



尝闻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皆欲勒诸金石以期永垂于不朽也昔我祖由燕京之赴金邑也同胞兄扶老母远旧地历山河籍列旗族受职行伍蒙思无息耕田教子背井离乡荒烟满目此皆我祖之辛苦备尝者也于是我祖卜居老虎山伯祖奉老母卜居东房身先择吉地于台子山阴又择佳城于南山之阳安居乐业以终天年于是乃安是土乃宴新居幸得子孙绳绳百世荣昌瓜瓞绵绵千载吉祥谨修墓志以慰泉壤幽冥虽隔情理何殊我祖有灵尚其来飨

择字二十以备后辈名次选用谨将二十字开列如左

廷玉连治水德明继世荣 运兴增鸿业 文士复元成

金州七顶山满族乡老虎山村满家墓碑（民国十二年立）

事实上现在全国已报“满族”的九百多万人口中，是包括着清代的“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巴尔虎旗”等各种旗人的后裔在内的，绝不只是清代的“八旗满洲”人。在清代对“八旗成员”中统称他们为“旗人”，但绝不能称其中的“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巴尔虎旗人”为“满族”。而只能称“八旗满洲”人为满族。到清末，“满洲”的名称渐被“旗人”的名称所掩盖。“旗人”也成了满族的代称，而又包括了所有的旗人在内。“旗人”一称，也冲淡了旗人内部满蒙汉军残存的民族界限。所以清末民国初年间，自发的产生了“旗族”的称呼，这是顺理成章，反映了真实历史面貌的事。我们在历史上所称的汉人、满人、蒙古人、西藏人，不就是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人吗？则“旗人”自然就是“旗族”了。可惜辛亥革命后，国民党人举起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旗帜。今天几乎尽人皆知我国不只是这五个民族。五族的说法显然有“挂一漏万”之失，且其所指的“汉、满、蒙、回、藏”五族的概念，除藏族外，其他回族都不清楚。汉族是指所有操汉语的民族吗？还是另有别的条件呢？满族是指“八旗满洲”人？还是指全部旗人？还是指操满语的人？汉军旗人算汉族？算满族呢？蒙族是指“盟旗蒙古”？是指“八旗蒙古”呢？回族是指今天的回族（用汉语文信伊斯兰教的人）呢？还是指所有信回教（依伊斯兰教、天方教）的人呢？维吾尔、壮族，这些大民族又属于五族中的哪一族呢？因受当时“民族知识”水平的限制，他们是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其“满族”一词，却一直影响到今天。就以大连地区的二十多万“满族”来谈，其中汉军旗人、蒙八旗人、巴尔虎人、随旗人（包括母系是旗人，旗人的农奴、世仆、佃户等之裔）等人口之和，占全满族人口的半数以上。如金州石河满族镇的一万多满族中，汉军旗王氏一姓的人口就有五千多。庄河县桂云花满族乡二道岭村的满族曹姓就是汉军旗，曹家一姓占全村人口半数以上。这些汉军旗人及当地民人（汉人）的意识中，认为“旗人就是满族”。桂云花人认为曹家是“老满洲”。所有因母系而报“满族”的，他们只说“随旗”，而不称“随满”。历史的客观现实如此。再详读本书第十七节和十八节的内容，则对“满族”一词的问题就会有更新的认识。今天的“满族”，实际

上已不同于清代的满族，正同清代的满洲已不同于明代的女真的情况一样。在清初对包括诸申、蒙古、汉人、朝鲜人的八旗人——新的民族共同体，如仍称“诸申”（女真），则原来的女真人、蒙古人、朝鲜人、汉人对此称呼的内心感受是不会相同的。改称“满洲”后，这原是编旗时所在的地名，在满洲中的各族人根本就消除了客主之分，大家都去掉原族名，而用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新名。同样对今天包含着“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巴尔虎旗人”、“朝鲜旗人”、“随旗的人们”在内的，旗人的民族共同体，他们是因“旗”而结合在一起的，单用其中一部分人的原名为代表，就显然存在着主客之分，人们对此称呼的感受是不同的，这会影晌旗人——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团结。这一点笔者在与现报满族的人们的调查采访中，是有深刻的感受的。

第十六节 现在旗人分布的情况

今天旗人的分布，同清代八旗驻防的情况有密切的关系，（参看本书第十节）。当然时过境迁，百余年来已有了显著的变化。兹列出 1982 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中，“满族”人口分布的情况如下；今天的满族，基本就是清代的旗人，有出入，但不会很大。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的满族人口分布情况					
政区	满族人口	分布情况			
北京市	116, 776		浙江省	1, 220	杭州
天津市	16, 587		福建省	2, 090	福州
河北省	383, 233	全省都有, 北部密	江西省	1, 890	
山西省	8, 625	太原、大同	湖南省	2, 456	
山东省	11, 706	益都、青岛、德州	四川省		成都
内蒙古自治区	236, 390	全区	甘肃省	8, 499	武威、永登
辽宁省	1, 989, 989	全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7, 085	银川、石山咀、银南

大连文史资料-八旗源流

吉林省	577, 276	全省	青海省	3, 048	西宁
黑龙江省	908, 910	全省	广东省	4, 427	广州
陕西省	8, 488	西安、宝鸡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河南省	23, 811	开封、南台、 叶县、内乡、 栾川	云南省		
江苏省	2, 649	南京市	贵州省		
上海市	2, 164		西藏自治 区		
安徽省	1, 744	肥东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9, 137	伊宁、乌鲁 木齐、奇台
湖北省		江陵、沙市、 武汉	全国合计	4, 418, 191	

1953年全国人口统计中，满族人口是2, 418, 931；1982年的全国人口统计中，满族人口是4, 418, 101；到1988年全国的满族人口已达到七百多万。

199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满族人口已达九百多万。

1982年的统计表多与客观现实不相符合，例如该表中的甘肃满族是8, 499人，而1959年8月甘肃省的调数则只是1, 330人，岂有一十三年中翻了七翻之理，而1983年辽宁省编辑的《满族社会史调查》中采用的是：1959年旧数，又未加说明其问题。又如1982年的统计表中四川省没有满族，而《满族社会调查史》转载的1959年10月写成的《四川省成都市满族社会史调查报告》中，明言“成都市共有满族1, 536人，占全市总人口的0. 13%”。笔者曾亲临其地接触过许多满族一旗人，而1982年统计表中竟无一人。又1982年的统计表中湖北省也无满族，而辽宁省《满族社会史调查》最后的《全国满族人口分布略图》中明白标注江陵、沙市、武汉有满族人口分布，这三个城市笔

者都亲历其地，确知那里有不少旗人，可证《满族社会史调查》是正确的。1982年统计表中，贵州省也无满族，而《满族社会史调，全国满族人口分布略图》中也明白标注贵阳、黔西、金沙都有满族分布。

实际上全国满族人口数还不止于九百万，因清末全国满族就有四、五百万，（见关克笑的《满族拭论》载《满族研究》1988. 1）而彼时全国的人口是四亿。今天全国人口是十一亿多，满族相应数当为一千万左右。何况今天的满族是包括了清代的各种旗人在内的。虽然辛亥革命后，无知的北洋军阀对满族一旗人（旗族）有所杀害，但为数不多。因彼时汉、满两族的表面区别实在太少了，所以满人完全可以混入汉人行列中隐遁下去，况有的地方革命军的领袖就是满人（如新疆伊犁革命军的领袖是故将军广福）。到民国年间满族总人口下降到一百五十万左右，原因也如上述。就新中国成立后满族人口的增长率看，由1953年的二百多万，上升到1982年的四百多万，又上升到1988年的七百多万。这比1953年多出来的五百多万人口，当然不是由人口的自然繁殖而来的。基本上都是原来报汉族的“旗人”子女的后裔改报“满族”而来的，直到现在（1990，2）也不会全改报完的。

凡属旗人的子女，就都是直接或间接满洲旗人，蒙古旗人、汉军旗人的混血种。从清末到现在旗人与“民人”的混血儿又日益增多。今天的民族政策规定，父母为不同民族的子女，都有报父母任何一方族籍的权力。现在同胞兄弟姐妹不是同一族籍的多得很。目前旗人与民人的混血儿多报的“满族”，由母亲是旗人而报满族的，则俗称为“随旗”，由父亲是旗人而报满族的，则视为当然，而无“随旗”称呼。这还保留着“男权社会”的残余思想。这些情况笔者在采访中屡见不鲜，特别在农村，因父母双方都是少数民族可多生一胎，所以能与少数民族有关联者，就向少数民族方面靠拢。由此往后汉人与少数民族间的通婚比例就显然下降。旗人与民人间过去的血统关系，已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况。如果“民、旗混血儿”都报满族，那个数目就无法估计了。

第五章 五个满族自治县旗人的来源

到1988年止全国已建立五个满族自治县，到1989年止全国已建立317个满族乡镇，64个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混合乡镇。

大连文史资料-八旗源流

五个满族自治县一览表如下

五个满族自治县一览表

县名	治所	面积 方 公 里	全县 总人口	满族 人口	占全 人口%	成立年月	含其它少数民族 人口
辽宁省 新宾满 族自治 县	新 宾 镇	4 ， 378	305 ， 100	185 ， 440	63.5	1985.1.17	朝鲜、蒙古、 回、锡伯、达斡 尔、苗、土家， 共 13, 656 口
辽宁省 岫岩满 族自治 县	岫 岩 镇	4 ， 500	474 ， 896	304 ， 727	71.7	1985.6.11	蒙古 2, 772 口 朝鲜 77 口，回 1, 754 口锡伯 59 口，尚有苗瑶 壮彝等
辽宁省 凤城满 族自治 县	凤 城 镇	5 ， 755	594 ， 932	319 ， 800	54.5	1985.6.17	蒙古，朝鲜，锡 伯，回等共 88， 549 口
河北省 青龙满 族自治 县	青 龙 镇	3 ， 580	247 ， 734	51, 4		1986.11 月	
河北省 丰宁满 族自治	大 阁 镇	8 ， 760	342 ， 039	166 ， 355	48.64	1986.11 月	朝鲜，回，蒙 古，锡伯，达斡 尔，苗，土家，

县							共 13, 656 口
---	--	--	--	--	--	--	-------------

第十七节 新宾满族自治县

新宾县地处辽宁省东部山区，属抚顺市，东接吉林省、南接本溪市，北接抚顺市，西接辽阳市。县治在新宾镇，即明时的新宾堡。八旗的创建人努尔哈赤自其前五世祖童仓以来，就生息繁殖于这个地区。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创业的费阿拉城，就在该县的主要河流—苏子河中游的南岸。

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建立了四旗兵制。所以费阿拉城是“旗兵”的发祥地。万历三十一年(1603)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北三公里许建筑了“赫图阿拉城”，(即今老城址)徙都之。万历四十一年(1613)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满潮国昆都仑汗”，当时满洲的地面包括今新宾县大部及集安县北部、恒仁县东北部在内。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将四旗满洲兵制扩展成八旗满洲制。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八旗满洲”在这里发展成熟。次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金，建元天命，称大莫明汗，后发展成大清帝国，所以说“赫图阿拉又是大清帝国的发源地”。

努尔哈赤的前五世祖童仓就驻节费阿拉城。童仓是建州左卫的第三任领袖，与其叔凡察—建州右卫的始祖，都是从图们江南故地迁徙而来的。新宾县的坐地户就是满洲人。这和其他满族自治县的满族都是外来户不同。

新宾县地区的开发很早，西汉玄菟郡的第二冶所就在新宾永陵镇南苏子河南岸的台地上。汉初，这一带乃古高句丽族集居地，属于汉族燕人卫氏所建的朝鲜王国。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 年)汉灭卫氏朝鲜置玄菟、乐浪、临屯真番四郡。玄菟郡置有高句丽、上殷台、西盖马等县。于是在今永陵镇南苏子河南岸台地上，为高句丽县筑县城，汉昭帝元风六年(公元前 75 年)又在高句丽县城附近筑玄菟郡城。原来玄菟郡治在沃沮城

(今朝鲜咸镜南道兴城附近)后因受貂夷侵逼,乃于昭帝元凤六年迁于高句丽城。渤海国时在此建木底州。辽金时此地归沈州管辖。明代此地先后为建州卫(李满住时)及建州左卫的治所。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在赫留阿拉称女真满洲国昆都仑汗,后又发展成金国。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后金由此迁都辽阳又迁沈阳。今天聪八年(1634)金(清太宗以赫图阿拉为兴王故地,乃改称为“兴京”,派旗兵驻守。康熙帝有诗云:“霭霭兴王地,风云莫可攀,滌洄千曲水,盘造万重山”,以推崇兴京。康熙九年(1670)设永陵总管(正二品)衙门。十一年增设永陵掌关防衙门(正四品),二十六年(1687)设兴京城守尉衙门,旋改为兴京协领(正三品)衙门。乾隆二十八年(1763)以锦州理事通判移驻兴京,改为“厅”,隶奉天府。光绪三年(1877)改为兴京抚民同知,移治新宾堡。宣统元年(1909)升为兴京府,辖今新宾、桓仁、通化、浑江,集安一带地。民国二年废府改置兴京县,民国十八年(1929)七月二日改称新宾县。伪满时又称兴京县。1947年解放后又改称新宾县。1985年一月七号经国务院批准建为“新宾满族自治县”。全县分九个镇、十一个乡、一个市(抚顺市)辖矿区。

新宾是满洲人的故土,古满洲国地,八旗满洲的发祥地,大清帝国的发祥地,第一个满族自治县。

依《建州纪程图记校注》(申忠一著、徐恒晋校注)所示:努尔哈赤直属部落的农场在今新宾县治东十五公里许的“旧门”。舒尔哈赤直属部落的农场,一处在今旧门东偏南八公里许的旺清门)一处在今桓仁县水库北端库内(富尔江入浑江口)。佟阿敦部落的农场在今新宾县东南边境双砬子之东,(富尔江一小支流)。佟时罗波(sirab)的农场在今集安县北部新开河入浑江口处财源村附近。佟流水的农场在新开河中游台上村东南五公里许处。(佟姓即努尔哈赤本家)这些地方都在浑江的支流富尔江、新开河一带。可见当时“满洲国”的中心地带是今苏子河、富尔江、新开河一带。

第十八节 岫岩满族自治县

(二) 概说:

岫岩县属丹东市，地处辽宁省东南部，千山南麓、大洋河上游山地间东接凤城、南接庄河、西接盖县、营口、海城，北接辽阳市境。县治在岫岩镇，东距丹东市政府 158 公里，北距辽宁省会—沈阳市 250 公里。

岫岩设治置官，始干金太祖收国元年(1115)在此设大宁镇，归盖州管辖。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升大宁镇为秀岩县。“秀岩”二字来源于金转运使王寂的《鸭江行部志》：“已未发龙岩山前，数十里北望，大山连绵不绝，数峰侧立，状如翠屏，秀色可鞠，里人谓之磨石山，以山出磨石故也，予恶其各不佳，欲改为竞秀岩”云云。元时属辽阳路。明洪武元年(1368)取同音字，改为“岫岩”，设通判，仍属盖州。今该县红旗营子乡(在县治东北 14 公里许)双山村，出土了明代的“岫岩营粮通判关防”长方形(3.9×5.8 公分)篆文铜印。清天命六年(1621)抚降岫岩，天聪七年(1633)派兵驻防。顺治元年(1644)八月设修岫岩城守尉。康熙廿六年(1687)于岫岩设三品城守尉一员、七品笔帖式一员、五品防御八员、归熊岳副统管辖；廿八年(1689)又增设六品骁骑校八员；三十一年(1692)又增设四品佐领一员，这些职官统归城守尉管辖，其下设八个牛录及巴尔虎牛录，统称“九旗”。八旗(八牛录)各由五品防御一员、六品骁骑校一员、领催五名管理之；其中正黄、正白、镶蓝、镶红四旗(四牛录)各有马甲五十名，其余四旗各有马甲四十九名巴尔虎旗(一牛录)由四品佐领一员、六品骁骑校一员、领催六名管理之，有马甲五十名。此外各旗设“图记处档房”办事外郎各二员。乾隆三十七年(1772)将熊岳通判移驻岫岩，同时置巡检衙门，次年发给“管理岫岩等处理事通判关防”主办民事。至此，岫岩有城守尉、通判、巡检三个衙门(见《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一年(1776)凤凰城移归岫岩管辖(见《岫岩志略》)。光绪二年(1876)升岫岩为州，三十二年(1906)分出岫岩南部为庄河直隶厅。民国二年(1913)改岫岩为县新中国 1985 年 6 月 11 日由国务院批准成立“岫岩满族自治县”。全县分二十个乡、四个镇、共 253 个村，满族分布全县各地。据 1985 年统计全县人口 474,896 人，其中满族 3,10,727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7 %。

(二) 岫岩满族的来源

(A)八旗满洲(含锡伯、巴尔虎)。最早进入岫岩的八旗满洲人,是天命六年抚降岫岩城后,即派八旗兵前来驻防。第二批是太宗天聪七年三月派舒尔哈赤之子济尔哈郎率八旗兵到岫岩筑城和驻防。第三批是顺治八年(1651)由京师拨一批八旗满洲到岫岩,如偏岭乡满族关氏(瓜尔佳氏)即其后裔。第四批是康熙三年(1664)由京师拨一批八旗满洲到岫岩,如哨子河乡、满族曹氏(索绰罗氏)原属镶红旗满洲,即其后裔。第五批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又从北京拨一批八旗满洲人到岫岩,如杨家堡乡齐氏(喜塔拉氏)属镶白旗满洲京牛录。据杨氏谱书记载,其始祖名昂乌都礼“巴颜”,二世祖名金都力,三世祖都督多力齐。多力齐的长子缠查生二子;长子阿古都督,次子卷孤都督。阿古都督之女“哈芬不哈”为显祖宣皇帝后,太祖努尔哈赤之生母。从这段谱书的记录与明、清史书相对照,则缠查即明史中的王果。阿古,即明史中之阿台,卷孤即明史中之阿海。王果之世系由此可见端绪矣。

第六批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又从北京拨一批八旗满洲来岫岩,如哨子河乡正蓝旗汪氏(完颜氏)、正黄旗白氏、大房身乡镶蓝旗蔡氏(萨麻喇氏)}红旗营子乡正白旗傅氏(富察氏)、正红旗罗氏(萨格达氏);场沟乡正白旗赫氏(赫舍里氏)兴隆乡正黄旗赵氏(伊尔根觉罗)、镶黄旗费氏、正黄旗田氏;苏子河乡镶黄旗王氏、岫岩镇正蓝旗唐氏(他塔拉氏);朝阳乡镶黄旗吴氏;雅河乡正蓝旗洪氏等先人都是康熙二十六年拨来岫岩驻防的。

据《清朝文献通考》第二册卷 182 所载;康熙以前岫岩常驻的八旗兵只有 205 名,由于不断的调来调去,至康熙二十六年岫岩常驻的八旗兵增至 1,205 名。其后各时岫岩的驻防旗兵数是;康熙三十年(1691)905 名,三十一年 959 名,三十三年 844 名,三十四年 229 名,三十七年 612 名,三十八年 694 名,三十九年 649 名,四十五年 606 名。

按成丰二年(1852)修补的《盛京通志》记载:岫岩驻防满洲兵五百二十七名,巴尔虎蒙古兵五十五名,蒙古兵七十六名。此数之和是 658 名。

又据《钦定八旗通志》卷三十五《兵志》记载：岫岩驻防八旗兵有满旗、蒙古旗、巴尔虎旗和计 547 名。

驻防岫岩的八旗兵中的锡伯兵，是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间从齐齐哈尔、伯都纳等地调来盛京的三千多锡伯兵中，有 171 名调来岫岩，乾隆二十九年(1764)又由岫岩调走 28 名锡伯兵到盛京集合一千名锡伯兵带着属赴新疆。今岫岩满族中只有红旗营子乡关氏（瓜尔佳氏）记得他们的祖先是锡伯人。

岫岩满族中的巴尔虎人，是康熙三十一年将游牧于张家口外的巴尔虎人每百丁编一佐领。共编十佐领，每佐领中 55 名披甲，先移驻于辽阳、牛庄等处放牧，同年九月二十三日奉命拨往盛京三佐领，辽阳、开原、熊岳、复州、金州、岫岩、凤凰城每城各一佐领。拨来岫岩的一佐领，属正黄旗满洲旗分。惟巴尔虎人怕被佛满洲人轻视，经北京批准，独立巴尔虎旗衙门，因满洲原有八旗，因号巴尔虎为第九旗，（仍是正黄旗满洲）。今岫岩县满族中的巴尔虎旗人，有寇姓、白姓、石姓等。

岫岩的八旗满洲中，还有原是汉人的。据《岫岩县志》记载：“哨子河街张氏，原籍云南，有张宽者，清初随京兵来岫岩驻防，雍正四年因功编入满洲正黄旗当兵“（他不属汉军旗）。

(B) 八旗蒙古：岫岩的八旗蒙古人，也是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间，由盛京拨来岫岩驻防的。今哈达碑乡镶红旗蒙古李氏（李雅拉氏）、镶蓝旗蒙古谢氏（萨拉氏）；前营乡镶黄旗蒙古张氏（治良匡氏）；汤沟乡正黄旗蒙古卜氏；苏子沟乡镶红旗蒙古何氏；大营乡蒙古族黄氏；朝阳乡蒙古族鄂氏、包氏、勤氏等皆其后裔。这些八旗蒙古之裔有的报满族，有的报蒙古族。

(C) 八旗汉军：岫岩满族中的八旗汉军有三种来源。第一种是明代原居此地的汉人，先入盛京旗籍者。第二种是顺治八年及雍正四年(1726)开垦岫岩，准民户报领旗地入旗当差的。第三种是平定三藩之乱后。将俘虏的官兵进山西，又转送往山东，又由山东转送来岫岩，编入汉军旗籍的。这些经山西、山

东转送来的吴三桂叛军。常称他们在山西、山东曾驻过的地方为：“小云南”，以纪念云南故籍。现在岫岩满旗中八旗汉军之裔多居住在哨子河乡，有张、邓、杨、刘四大姓。其次在黄花甸子乡、三家子乡、牧牛乡等乡的满族刘氏，也是八旗汉军之裔。

第十九节 凤城满族自治县

凤城县属丹东市，地处辽宁省东南部，河中上游及大洋河支流牛子河、拉古河等流域的山地间。有“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的说法。其县境东接宽甸，南接东沟，西接岫岩，北接本溪市境。

凤城县地自战国末期至秦统一六国后，一直为辽东郡地。两汉西晋时，在此置武次县。高句丽地方政权割据时的隋代，在此地置乌骨城（乌骨城即凤凰山城，又名古里城，在今凤城县东南五公里处，故城址尚存）。唐时属安东都护府。渤海国盛时，凤城县地属渤海国东京道开州开远县。金代属东京路（治辽阳府）来远州。元时属辽阳行省辽阳路。

凤凰城之名，始见于《明史·地理志》“……东南有凤凰城堡，在凤凰山东南（应为西北）成化十年（1474）年筑”。凤凰城堡隶辽东都指挥使司，明嘉靖中（1522~1565）将原在辽阳的定辽右卫移于凤凰城堡（见《明世宗实录》553）。清天聪八年（1634）太宗派部分旗兵进驻通远堡（在今凤城镇北铁路线上），此堡乃当时沈阳与朝鲜交通孔道，在军事上很重要。崇德三年（1638）将通远堡旗兵移驻，凤凰城堡，即今凤城县治。时有甲兵300名，附丁20名设城守官（后称城守尉）。顺治六年（1640）凤凰城设全八旗。前此凤凰城地区地广人稀，只有少许人家散处于林海草原间，以渔猎为业，兼亦务农，因无治安设施，居民们只能过着贫困生活。既八旗开始驻防后，当地仅有的居民们纷纷投入八旗，如土著王姓，原籍山东，于明代逃荒东北来此，至是投入八旗被编入汉军旗籍。

又如土著胡尔佳氏，乃元世祖忽必烈后人，元亡，避居于此，至是率子弟加入八旗。

康熙十年(1678)从乌拉(今吉林市)地方迁出伊彻满洲万余口到盛京，其中吴、杨、陈等三姓拨来凤凰城，加入八旗驻防中。康熙廿六年(1687)从京师拨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等携眷来凤凰城充实八旗，并置城守尉管理军政事务。康熙三十一年(1692)编成巴尔虎蒙古兵十佐领，拨来凤凰城一佐领。巴尔虎佐领属于八旗满洲，但单立旗衙门处理本牛录事务，称“第九旗”。据《凤城县志》卷二“九旗”载：“九旗共设防御七员骁骑校八员、领催62人，满洲兵529名，蒙古兵94名，巴尔虎兵48名，汉军兵34名，共计兵705名”。(此记录当有误，按九旗应设防御八员，骁骑校九员，另有巴尔虎佐领一员。

九旗共有兵705名，加武官18员，领催62名，总计官兵应为784员(城守尉衙门在外)每位官兵都代表一户旗人，由此可概见当时旗人的总人口数。

凤凰城东南十三公里许有“边门”，在凤凰山南，为当时朝鲜与中朝交通必经之路，故又称“高丽门”。清廷于此设章京一员，宁兵五十名管理之，二年轮换一次。此“边门”除接待朝鲜使臣外，朝鲜商人亦可在此与清人互市。

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后，从云南经山西、山东拔来一批氏人(汉人)充当台丁，驿丁等，彼等也都加入了八旗。台丁分驻凤凰城，边门、阳。驿丁分驻通远堡、凤凰城、雪里站等地。

康熙三十八年(1699)自伯都纳拨来盛京的二千多锡伯兵中，有部分拨来凤凰城加入八旗满洲中。

乾隆二十六年(1761)发给凤凰城城守尉关防“专司催科，捕盗及旗籍、户婚等事”。是即“旗衙门”，衙内设库、户、兵三司，各司各设笔帖式一员，下有司员、司达等职无定额。(见《凤城县志》卷二城守尉。)

乾隆二十九年(1764)将凤凰城旗兵调往塔尔巴哈台(今新疆西北部)45名，次年又裁兵45名(仍留原地)，后又拨往金州、海城各若干名。至此每旗(牛录)尚有甲兵63名、铁匠一名，合计九旗共有兵匠576名。

乾隆四十一年(1776)设凤凰城巡检司，隶岫岩通判。光绪元年(1875)将凤凰城改为“直隶抚民厅”，即“凤凰厅”，设同知衙门。衙门设经历、教谕、驿丞

等官，其后大批民人(汉户)来此开荒植田。光绪年间凤凰城地区人口情况如下表：

光绪年间凤凰城地区人口情况如下表：

类别		男口	女口	人口合计	占总数%
旗人	满洲	21, 305	14, 780	36, 030	10.7
	蒙古	10, 500	6, 732	17, 232	5.2
	锡伯	5, 846	4, 030	9, 876	2.9
	汉军	22, 820	18, 425	41, 245	12.3
	驿丁	885	565	1, 450	0.4
	台丁	125	97	220	0.06
民人	汉户	124, 590	103, 506	228, 096	68.2
居民	总计	186, 116	148, 135	334, 251	100.0

国民二年(1913)改凤凰厅为凤凰县。次年，因与湖南省凤凰县重名乃改为凤城县。新中国1985年建立了凤城满族自治县，撤销原凤城县。全县分22个乡、三个镇。其中满族乡16个，满族镇一个。

据1985年调查，凤城县有汉、满、蒙古、朝鲜、锡伯、回等十六个民族。总人口594,932人。其中少数民族408,259人，占总人口的68.6%。其中满族319,800口，占总人口的54.5%。

第二十章 清龙满族自治县

青龙县属河北省秦皇岛市，位于长城东端冷口、桃林口、界岭口、义院口之北，青龙河(滦河北来的一大支流)中游地带。县治青龙镇(大障子)位于七老图山脉的都山(海拔1846米)东南16公里许，青龙河一小支流的各地中。该县全境多山，重要聚落均在青龙河本支各流的河谷间。该县南界长城，北界《辽宁省，西接宽城县。在明代，令蒙古人沿长城二百里以外驻牧。因之，这一带成为荒地，林木丛生，鸟兽成群。

清廷入关后，在京 附近长城以南圈地不足，乃向长城以北扩展。据《清圣祖实录》卷三十记载，康熙帝谕户部“……至于旗人无地，亦难资生，应否以古北口外边空地，拨给耕种，令议政王贝勒大臣确议以闻”。同上，卷三十二康熙九年正月，户部议复“查以古北口外地拨与镶黄旗、正黄旗；罗文峪(在遵化县治北)口外地拨与正白旗，冷口(青龙县治南)外地拨与镶白旗、正蓝旗、张家口(万全县)外地拨与镶红旗、镶蓝旗”。于是八旗人遂分批出塞占荒开田落户。今青龙县满族—清代的旗人，就是这些占荒人的后裔，其祖先们来此者有下列五种情况：

第一种是占荒管田庄头：如大巫岚(在青龙县治东21公里)乡东干河子(在大巫岚北三公里)村的正蓝旗于家，他们祖先系山东省登州府大水泊(今文登市治)民(汉)人，原兄弟八人，于康熙九年(1670)自故乡(他们是平定吴三桂之乱后，由云甫拔来山东大水泊的)拔来，编为正蓝旗籍，出冷口分别在大于杖子、东于沟子、狮子沟(在县治东北)、温家河子、马圈子西庄、小汇河等地占

荒落户，其始祖于德辉任庄头，立号“德润堂”。又如巫岚大院正蓝旗翟氏祖先也是来自登州大水泊，拨来编入正蓝旗的，为豫王管理田头，是个较大的庄头，立有“古义堂”、“善德堂”、“九思堂”等字号，每个堂院都占地十亩。其管理的地面在今青龙县的大巫岚、隔头河、土门子(在大巫岚北十公里青龙河东北岸)、双山子(在大巫岚南偏西八公里)、大于杖子等处。又如木头凳子(在县治东偏北45公里)牛角沟村正蓝旗丁家的祖先，原系山东登州府黄县民人，康熙九年拨来编入正蓝旗的。从义院口出塞，在此“跑马占荒”为木头凳、邱杖子、三星口一带庄头，立号“谒然堂”。仅木头凳子一带在康熙八九年，先后来了周、林、匡、李、樊、丁等六姓，都属于正蓝旗，多是豫王的庄头。

草碾(在县治南21公里青龙河西)正蓝旗王家，至今还保留有《皇家庄头执照》记有“……顺治年间，世祖章皇帝恩赏公主祭田、座落在写字洞草碾一带。”当时派王德为“永平府迁安县之冷口外草碾庄头”，另“派王宽充当庄头之差，于历年十月十五日自行进京交纳”(租银)。

第二种，是占地定居的功臣。据伪满《热河省各县旗人情况》一书记载：“康熙八年，皇帝允许其部下十二名立下战功的出关到该地(指青龙)定居“。他们“各领部下一百五十名到该地跑马占荒，凡一日内绕行一周的土地，均归其所有，作为对他们旧功的酬谢”。这块地是在今青龙县青龙河以东的碾子沟、土胡同(在双山子东南平地间)、楼子石(在县治南偏东25公里青龙河东岸边)、小西岭、张杖子(在县治东46公里)、新庄子之间。今碾子乡歪头沟腰庄张氏宗谱记有“始祖……辽阳河工堡人(汉人)，我清奋起，以从龙功屯田永平府滦州……康熙间沿边圈地，分临榆义院口外土胡同屯田正蓝旗界，世即正蓝旗”。

又据南杖子乡庄窠董氏及其同宗楼子石董氏家谱所记：董氏原系铁岭人氏(明朝居于铁岭的汉人)其祖先从龙入关，又从征吴三桂等有战功，赐他们在滦州

昌黎一带长城内外占地落户，当然也都编入旗籍，繁衍至今，现在都报为满族。

第三种是正白旗汉军包衣出口屯田：这些正白旗包衣们的先人，有的是奉明帝之旨出关开边的汉人，有的是出关经商，因而留居铁岭的汉人，有的是明清交战中被清军俘去的明朝官兵安置于铁岭定居的。后来都加入八旗“从龙入关”，开始驻防于京师、滦州一带，顺治时被调往口外开垦。当时出口的有四大姓十三户，通称“三肖、四郜、五马、一枝扬”。不久又被调到马兰庄(马兰峪，地在遵化县西)。康熙八年、九年再次调到口外屯垦。(见《河北省青龙县肖营子满族调查报告》詹绪先等1963年写，载《满族社会史调查》辽宁出版社1985年，沈阳)跑马占荒。这次出口的共有“张王李肖佟宋满高刘杨·谢马金于崔邵”十六姓。其占荒地地域：东自青龙河，南至冷口止，西至擦岭(县治西十余公里)，北至虎头石(在今青龙县北界外青龙河岸边)

今肖家营子和大石门保存的杨氏谱序言中记曰：“我杨氏始祖本系铁岭人也，清初随龙定鼎，标入正白旗汉军包农牛录……康熙九年出冷口居横道河肖家营至今已传十三世。”

第四种是解决生计问题拨来口外的旗户：据董氏家谱记载“祖先随龙功劳数载，历经三世蒙皇恩浩荡，计功赏田……惟择居于法家宝城宅之内，因支派繁衍，幼丁众多，难以同居，故又居于五口之外；长支居山拉嘎、二支居官场、三支居庄窠、四支居捎技谷。子孙繁衍，确居不下三十余处，可谓盛矣”。

又据楼子石李氏家谱记载：圈地后，李氏同宗家族散居口外肖营子(冷口外不远)，西双山、王厂(县治西偏北21公里)、逃军山(县治西邻)、三榆树、大石门、湾杖子、加道沟、八哈岭、石扳沟、响水沟、杨树林子、肖杖子、头道林子(县治北15公里)、岭后东、厂沟、小汇河等二十余处。

肖营子是青龙县旗人的集散地，许多旗户出口后，即居肖营子，然后又迁往各地。如嘉庆年间，从肖营迁往响水沟、盔家铺、榆树沟、大石门、大杖子、王坎子等地的杨家；迁往西双山的肖家、迁往打虎店的于家等。

第五种是逃荒而来的旗户：如张杖子(冷口北10公里)乡石杖子村的石家祖先，就是乾隆三十六年由永平府卢龙县逃荒至此，立庄加入旗籍的；马杖子马家祖先是嘉庆年间由山东逃荒至此种旗地定居加入旗籍的；河南村王氏祖先是光绪六年由永平府迁安县逃荒至此定居加入旗籍的。

乾隆二年顷，今青龙县地是分属临榆、抚宁、迁安三县的，1930年由三县分出置都山设治局，伪满时置青龙县、治青龙村，光复解放后，仍为青龙县。1986年11月经中央批准，改为青龙满族自治县。

总观青龙县的今满族均非女真人后裔，基本上都是八旗中满洲旗分的汉人包衣和汉军旗分包农牛录等的后人。

此段资料来自杨贺春先生的《青龙县满族源流初考》载《满族研究》>>1987, 3。

第二十一节 丰宁满族自治县

丰宁县属河北省热河地区，位于河北省北部中央、北京市正北，北接内蒙古南边，西接沽源、赤城，东接滦平、隆化。治大阁镇，滨潮河西南岸。全县境皆山地，重要聚落皆在河谷地带。

丰宁县的旗人，是从顺治元年(1644)入关后，即开始陆续移入，及当地蒙古人加入旗籍形成的。其迁入户大体可分为五种类型。

第一种是皇庄、王庄的庄头庄丁等。顺治元年，朝廷就在喜峰口外、古北口外设置“皇庄”，(见《内务府则例·会计司》卷一：粮庄纳粮定额条)康熙四年(1703)“古北口以外……远近悉成皇庄”，见汪颢《随銮记恩》古北口外皇庄，主要就在滦平、丰宁二县辖区内。肃亲王豪格、庄亲王石塞，等在丰宁都有免赋庄田，“乾隆年间庄亲王永曾以……丰宁庄地九十顷……分给兄弟”(见扬学琛《清代的王公庄园》)永，即石塞的后人。肃亲王之妹下嫁给蒙古王子，死后葬于隆化城，故隆化城又称“皇姑屯”，她有陪嫁的“胭脂地”在丰宁的西北川(彼时丰宁县治凤山)。

第二种是御马场和军马场的官兵服役人员。据《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国初，称近口横豆诸山曰大坝，定坝内为农田，坝外为上驷院及王公牧场”。这些牧场都派有佐领，防御和兵丁管理，并有放牧人员保护和放牧牲畜。彼等长期工作和生活在这里，久之遂成为当地的居民。如现在的“官场沟”、“骆驼场”（在大阁镇西十五公里）、海留图（又名大滩，在县境西北边地）都是彼时的牧场所在地。

第三种是“守围”和驻防的满蒙八旗兵：自顺治时即开始派遣八旗兵到此驻防，委派都尉管理之，将大片土地收归官有，并指定当地蒙古人加入“八旗蒙古”。康熙年间，先在丰宁西部设立“西围”，后来又开“东围”，即“木兰围场”。八旗驻防兵遍布于丰宁境内。现在丰宁境内很多“xx营子”、“xx旗”等地名，都是当时驻防旗兵留下的名称。乾隆十六年（1751）五月礼部铸造的八六二号铜印“满洲镶黄旗第七牛录之图记”犹保存至今。据实地调查证明，现在的“镶黄旗村”（在大阁镇南东三十五公里潮河北岸）一带，即第七牛录驻防地；石人沟（在镶黄旗村东偏北九公里）一带为第四牛录驻防地；南辛营子（在大阁镇南）一带为第三牛录驻防地。

第四种是圈地、封地等功臣官员及其服役人员等：如南辛营子乡满堂村陈姓先人陈友功，曾任京兆尹，原属正蓝旗，后升入镶黄旗，因封地在满堂村，于是由蓝梁底下（今属滦平县、在县治（鞍匠屯）东北三十五公里）迁往满堂村定居下来。又后营子满族乡姜营子村吴姓一族的人口，即占全乡满族人口的三分之一。吴姓的先人吴能（档子名七十五）“从龙入关”，于康熙初曾任镇殿将军，后封地于此定居。光绪六年（1880）的吴氏墓志记有“七十五四世孙京都正黄旗内务府都尉司佐领下，五扎拉七古六家祥泰”。此“祥泰”即七十五四世孙。

南三营村满族石氏先人，于雍正三年退役，持“路引”（护照）来此定居，按人丁分配给“马莲滩”每人三十亩。现存有1.3公尺高的石柱标记。

清政府为旗人颁发的“田照”顺契的“契尾”现存丰宁县档案局的有一百多份。

第五种是上三旗京官的眷属和包衣等在此定居的：南辛营满族乡汤牛沟门刘氏先人，世代为“佟王府”的包衣，晚清佟王府的大管家周士元（汉人）就死于汤牛沟门，葬于刘氏墓地，其墓碑尚存。

丰宁的设治始于雍正十三年(1735)，清政府将原设于八沟(今平泉县治)的“通河理事通判厅”迁来凤山(又称土城子在大阁镇东50公里)，是为丰宁设治之始。乾隆元年(1736)改设“察哈尔四旗厅”(镶黄、正白、镶白、正蓝)于凤山。乾隆四十三年(1765)改厅设县，取名丰宁。伪满时迁治丰宁村(今大阁镇)。1968年11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丰宁满族自治县。全县辖四十三个乡、二个镇，其中有满族乡四十个，满族人口遍布全县各乡镇村。

本段资料主来自闫秀峰先生的《丰宁满族来源》载《满族研究》1987，3。

第六章 其他旗人集居区旗人的来源

第二十二节 桓仁县

桓仁县属辽宁省本溪市，现在全县共有十八个乡镇，其中有十一个满族乡镇，六个满族朝鲜族联合乡镇。满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42.1%，1986年比1982年恢复的满族人口111,222人。(以上资料来自杨友清的《关于本溪满族历史及现状的调查报告》(载《满族研究》1988.3))

桓仁县的满族基本上都是坐地户，这里同新宾一样，是满旗的故乡。其先人都是在努尔哈赤建立“满洲国”(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前就居留在该地的女真人，大体可分作下列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明代的建州卫李满住部，是永乐二十二年(1424)从古渤海国率宾府建州(今绥芬河畔东宁县东大城子)地方迁来此地的，他们到此地后，开始住在兀刺山(今桓仁县城北偏东九公里许的五女山)南的瓮村(在今桓仁水库底，

没前为长岗村)，有众一千多户。宣德八年(1433)因受朝鲜李氏王朝的打击，乃迁部落于兀拉山北的兀弥府，即今桓仁县东北部拐磨子镇的东古城地方。正统二年(1437)又遭到朝鲜的袭击，次年再迁其部落于苏子河南灶突山东的费阿拉地方(今新宾县永陵镇南苏子河南二道河村附近)。景泰二年(1451)初，又率部落离开费阿拉，迁回瓮村故地。景泰六年(1455)朝廷以李满住年老，命其子李古纳哈代其职，盖于此顷又迁至兀弥府故地。成化三年(1467)九月，因建州女真总管三卫的大首领叛乱，明廷出师讨伐，同时命朝鲜国王派兵助攻。于是李王派其大将康纯帅兵万余进攻兀弥府，阵斩李满住及李古纳哈。杀其部众386人，生擒23人，获其牛羊马匹二百余头，焚其积聚217所，予该部以沉重的打击。战后仅余八户，由李满住幼子甫乙加大率领。成化五年(1469)明廷命李满住之孙完者秃为建州卫都指挥僉事章卫事。成化十七年晋其级为建州卫都督，弘治十三年(1500)致仕，由其子弗刺答继任。弗刺答正德四年(1509)歿，由其子李童继任。到嘉靖二年(1523)以后建州诸卫均分裂。建州卫先后自称都督者有九名之多。不相统属，各自为政。到万历十七年(1589)李童的后人李以难降于努尔哈赤，李氏建州卫至此告终。其后努尔哈赤的建州卫称呼，是指他所统辖的建州诸部而言。

李以难降于努尔哈赤后，李氏建州卫的后裔仍居留于兀弥府一带。

第二部分是建州右卫凡察的后人。自正统七年(1442)二月建州左卫分编为左右两卫后，凡察掌右卫，居于三土河(今辉发河支流三统河)一带；童仓掌左卫居于冬古河(今大雅河)一带。但三卫部落犬牙相错，并三卫领导皆亲属关系，故三卫间并无不可逾越的界限。总之今辽宁的新宾、桓仁、吉林的柳河、通化一带皆建州三卫共同的活动地域。右卫凡察之孙纳郎哈为都督掌卫事时，约在景泰二年(1451)顷，迁其部落于婆猪江(浑江)西支“吾毛水”(今六河)畔，当今六道河子村附近。吾毛水南之山称牛毛大山。吾毛水盖为牛毛水之对音。彼时左卫童仓亦与李满住同居于瓮村。大约在明景泰五年(1454)顷，童仓迁往费阿拉城。而右卫无再迁徙的史录，其后裔当仍在六道河村一带。

第三部分是董鄂部，(参看本书第十三节《八旗满洲的民族成分》)董鄂部的远祖是宋英宗的后裔，金时，随徽钦二帝北狩，迁于五国头城(今依兰)同化于女真族中，后随胡里改、斡朵怜两万户部落南迁到长白山以东，后又辗转西迁于婆猪江流域的董鄂水(大雅河)一带定居下来，遂以地名称其部。董鄂部有三个重要集居点；其一是“董鄂城”，在今桓仁县城西、浑江西岸的“南老台村”附近；其二是齐基达城，约当今六河北岸的“三道河村”附近；三是翁哥洛

城，在今桓仁县城东，水库南端，横道川村附近。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二年（1584）进攻的齐基达城和翁哥落城即此。董鄂部就分布在这三城及其附近地带。万历十六年（1588）董鄂部长何和礼率部归于努尔哈赤《清史稿》“何和礼传”曰：“何和礼、董鄂氏，其先自瓦尔喀迁于董鄂，别为一部，因以地为姓”。董鄂部众只一部随何和礼北上，其大部分仍留居于原地，是当地土著的主要成分。

第四部分是岐州卫部；据《满族研究》1986，3 刊载的《满族先世在桓仁》一文中所记。

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这一部落自成体系，号称岐州卫，居住在左右两卫之间，共八十户，约是十五世纪五十年代自朝鲜北部迁来的①。其部落离婆猪江很近，在弘治十年（1497）八九月间这个部落的王山赤下等人在婆猪江上曾阻拦朝鲜往建州三卫的官员渡江②。为报仇，专门与朝鲜为敌。其第二代酋长金山赤下（即王山赤下）曾数次率人至朝鲜掳掠③。按《李朝实录》记载的方位里程推判，此部落弘治年间当在今桓仁县洼泥甸子附近④。

①《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二 750 页

②《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二 758、759、768 页

③《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二 750、758、759 页

④《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二 558、559 页

按桓仁县洼泥甸子村，在县城北偏东 21 公里许富尔江东岸，则该部与建州卫相邻。其地彼时正当朝鲜与建州三卫间的交通要道。

第五部分是王兀堂的残部，王兀堂是嘉靖（1522~1566）年间与王杲同时代兴起的建州女真大酋之一。王杲一直与明朝为敌，而王兀堂则不犯明边（参看本书第三节《建州诸卫的变化》）万历三年（1575）王杲被明军消灭后。王兀堂仍与明边保持和平共处关系。到万历七年（1570）因明永甸边官参将徐国辅的贪鄙压榨，王兀堂乃兴兵报复。于万历八年开始侵掠永甸（奠）、宽甸（奠）等地，旋即被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及副总兵姚大节所消灭。其所部伤亡惨重，共残部当仍留于桓仁、宽甸、集安地区内。

第二十三节 本溪直属区及本溪县

本溪直属区共有九个乡镇，其中有三个满族镇。本溪县有十七个乡镇，全部都是满族乡镇。1982年本溪市直属区人口 793, 401 人，报满族的只有四百四十多人，本溪县人口 310, 962 人，报满族的只有一万九千多人。1986年后，市直属区报满族的达到五万五千多人，本溪县报满族的达到十五万人左右。以下统称这两个区划为“本溪”。

本溪满族的来源可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原住本地的女真人后裔：本地区原是女真人的故乡，在八旗满洲编成前，这里就是女真人的居留地。明朝于洪武十五年(1382)就在草河堡(本溪县草河城满族镇的草河村，在本溪县城南偏西 45 公里许)设千户所，安置和管理女真人。可见彼时这里女真人口的密度已达到相当程度，否则不会在这里设治。《明实录·太祖》卷之一百四十四中记有“洪武十五年夏四月辛丑，辽东东宁草河千户所招降故元合罗城万户府校卒及鸭绿江东遗民凡二千六百八十六人，送至辽阳，诏以衣粮给之”。可见草河千户所彼时的国防、政治地位都很重要。成化三年(1467)明廷为防备建州女真童仓等的骚扰，据《辽东志》的记载·曾设东州、马根、清河、碱厂、瑗阳诸堡。后又增设一堵墙、孤山等堡。其中清河、一堵墙、碱厂、孤山等堡均在今本溪县境内：清河堡故城址，在清河满族镇政府所在地，在县城北偏东 18 公里，故城址四框尚明显，正方形，每边长约 500 公尺。碱厂堡故址在县城末偏南 20 公里，今碱厂满族镇政府所在地，故迹已无痕。孤山堡故址在县城东南 29 公里，兰河峪满族乡的孤山子村，故迹犹存。明万历年年(1573)孤山堡往北移五公里许，在兰河峪满族乡新城子村，孤山新堡故迹亦存。其城正方形，每边长 300 公尺。以上这些城堡的连线，在今本溪县东部，今本溪的大部地区，在明朝直接统治区内，居留该地的女真人与汉人同住，渐渐汉化。后来是否全入了旗籍，无详细史料可证。

第二种是驻防八旗满洲的后裔：后金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努尔哈赤亲统八旗满洲兵夺取了抚顺等地，是年七月夺取了清河堡，平毁了一堵墙堡、碱厂堡。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 年)草河城、孤山堡、威宁营(今本溪市高台子满族乡威宁营子村，在市街东北三公里许铁路东)等三城归降于后金(见《清文献通考》)八旗满洲兵遂开进碱厂、连山关(在本溪市治南铁路线

上,本溪县境内)等地驻防,同时将土地分给八旗满洲兵耕种。据《浦文老档·太祖朝》卷四十六所记,天命八年(1623)三月“命爱达汗、申彻和率两白旗、两蓝旗的马甲四百人驻守草河堡”。天聪七年(1633)皇太极命杜度贝勒监筑碱厂城,设碱厂边门。据《盛京通志·兵防》记载:“碱厂边门设章京一员,防御一员,属下旧设满洲兵六名,汉军兵二十五名,共三十一名”。《盛京内务府档案》记载:“碱厂边门下设三个边台,各有台丁一百一十一名。”如今山城子满族乡邓氏始祖原住兴京、二世祖因八旗驻防迁居威宁营,三世祖一支迁往牛心台(本溪市直属牛心台镇);一支迁居山城子(县城南七公里)磨石峪;一支迁居偏岭子(县治西北18公里)满族乡土家子,至今已有300多年。邓氏家族至今已有一千多口,仍分布在本溪境内。又如碱厂满族镇满族赵氏《族谱》记载:其第二世祖扎库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从兴京拨往碱厂边门驻防,其后代定居碱厂赵家洼子。又如东营坊满族乡(在县城末偏南34公里)满族关氏《宗谱》记载,其始祖阿木钦于雍正年间,拨往碱厂边门驻防。又如赫氏(赫舍里氏)《谱书》记载·其始祖从龙入关,二世祖罕都将军洼尔达由京师拔往奉天,驻防凤凰城,其一支现居本溪县草河城满族乡。又如赵氏《家谱》记载,赵氏为陈满洲,康熙三十三年(1694)拨往碱厂边门为兵。又如《富氏家谱》记载,富氏原居长白山后迁叶赫城(今在四平市治东南26公里)。又从龙入关,在北京因误朝差被革佐领之职,发往盛京,随旗当差,而落户本溪,现居富家楼子满族乡(在县城东北19公里)。

第三种是八旗汉军的后裔;据本溪全县满族宗谱统计,其中五十多家宗谱记载是顺治八年(1651)开始从山东,直隶(河北)、山西等省迁来的民户(汉人)投旗占地加入八旗汉军的。如革河城满族乡满族屈氏《族谱》记载,屈氏原系山东“小云南”人,顺治八年由小云南迁来本溪草河城落户,加入盛京镶蓝旗(汉军),随伊将军当差。又如连山关满族王氏《宗谱》记载,王氏原籍清(青)州府诸城县大王庄人,系民籍,于顺治八年始祖王采忠由鲁迁辽,投汉军正白旗第三佐领(喜纯牛录)下为丁,先居海城,康熙年间迁辽阳落户,占地九十二亩(彼时连山关属辽阳,尚无本溪县)。又如小市满族镇(县治)满族马氏《族谱》记载,马氏始祖原居山东登州府栖霞县,于顺治十三年(1656)迁居盛京城北投旗。康熙二十年前后,由盛京(今沈阳)迁到“杯犀湖”(后改本溪湖)观音阁庙东南落户,给内务府正黄旗当壮丁,交纳鱼干供品,到乾隆年间改为交纳细鳞

鱼。五世祖在小市堡子“斩伐草木、，夙兴夜寐，开垦田土”有功，给红册地二十五日，升科地二十一日。内仓地四日。现马氏家族成为本溪地区满族中的大户。又满族《高氏宗谱》记载，高氏原籍云南，耕读为业，明崇祯十五年(1642)地方不靖“他处犹轻，惟云南为甚”，始避居于山东登州府蓬莱，后四豪强聚众，掳掠良氏，于是越海迁辽阳，其后一支在今本溪，以当初地广人稀，非旗人不准播种，是以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入沈阳镶白旗汉军第三佐领领下，开占红册地。现在草河城的满族陈氏、艾氏、詹氏、东营坊的满族刘氏、平山区桥头镇的满族翁氏、明山区高台乡霍家堡的满族霍氏、曹氏、新岭的满族崔氏等等都是过去皇庄的壮丁即包衣满洲。以上这些投旗的民户(汉人)由于长期与八旗满洲生产生活在一起，且满洲人居于统治地位，所以这些人与满洲人自然地融合成为一体了，他们是今天本溪满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种是旗人母性的子女及其后人，在清代有“旗民不通婚”的严格规定，旗人只能与旗人通婚，而旗人内部是不分“满洲、蒙古、汉军”的。所以旗人(旗族)这个在清代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在血统上也是单成体系的。但到晚清，“旗民不通婚”这个规章，已被历史潮流所冲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乃正式许可旗民通婚。旗民通婚后，其子女的族籍是从父系的，但这并无法律明文规定，只是封建父系制度旧习惯，在“中华民国”时期一直是这样。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父母不是同一民族的，其子女有权报父母任一方面的族籍。现在旗人与民人通婚的子女，父亲是旗人的，当然都报满族，母亲是旗人的也多报的满族，而自称为“随旗”。随旗的人数并不少，是今天“满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种情况凡有，旗人之地，概皆如此。

第二十四节 大连地区

大连市共划分为六个直属区，一个县级市、三个县。据1986年初的调查是，全市总人口4,915,809人，其中一千人口以上的少数民族有五个：满族214,320人，回族11,750人，锡伯族8,836人，蒙古族3,672人，朝鲜族3,080人。

大连地区满族人口分布的情况是：中山区2,729人，西岗区2,544人，沙河口区4,875人，甘井子区6,825人，旅顺口区2,622人，金州区52,660人，瓦房店市65,544人，新金县12,273人，庄河县63,856人，长海县128人。已建立了十一个满族乡(镇)，是：金州区的七顶山满族乡，全人口

20, 981人, 其中满族8, 393人; 石河满族镇, 全人口27, 667人, 其中满族10, 660人。瓦房店市的老虎屯满族镇, 全人口24, 943人, 其中满族7, 909人; 三台满族乡, 全人口25, 982人, 其中满族9, 482人, 杨家满族乡, 全人口25, 407人, 其中满族8, 341人。庄河县三架山满族乡, 全人口22, 649人, 其中满族10, 104人; 塔岭满族乡, 全人口21, 855人。其中满族6, 981人; 高岭满族乡, 全人口17, 789人, 其中满族6, 706人; 太平岭满族乡, 全人口23, 517人, 其中满族7, 727人; 桂云花满族乡, 全人口10, 353人, 其中满族3, 719人; 小孤山满族乡, 全人口21, 687人, 其中满族10, 328人。这里只有小孤山是1988年8月的调查数, 其余都是1986年的数, 到1988年各满族乡镇满族的数目都有增加。

大连地区满族的来源可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 坐地户的后裔: 坐地户就是清代以前就住在这个地方的渤海、辽金等国的后裔, 他们都先后被编入八旗, 主要是八旗满洲之中。由于东北是他们的故乡, 史书上对他们的居留情况却少有记载。只有渤海后裔的迁来辽南, 史书上是有的, 第一次是辽太祖天显元年(926)正月, 辽国攻下渤海国西北边疆的重镇扶余府(其故址在今四平市或农安县), 即迁其民的一部分到今复州、金州一带地, 在今复州镇(复州古城)地置“扶州”以居其民。旋改为“迁民县”。第二次是天显二年辽灭渤海国, 当时渤海国人口总计十余万户, 由渤海太子大光显率二万多户投奔新罗。旋归于王氏高丽, 得赐姓王, 附宗籍; 辽取渤海国的名宗望族数千户来辽南。置于今盖县地方, 后又迁之于迁民县, 置曷苏馆女真国大王府以统治之。第三次是辽圣宗统和二十八年(1010)辽征王氏高丽, 克开京(今三八线上的开城)俘得前投高丽的渤海国人众, 置于今盖县与复州古城之间, 置归州刺史(治所在今熊岳城西南归州满族乡)以统治之。辽兴宗时(1031—1054)于迁民县置复州怀德军, 始有“复州”之名, 沿用到今。金朝亦置曷苏馆领

有今大连地区。然由于年湮代远，渤海后裔已很少能自知其为渤海遗民矣。在笔者抽访的大连满族万余人次中，只有瓦房店市三台满族乡三台村的赵氏（西林觉罗）尚能记忆其祖先是渤海遗民，是从岫岩城南十三公里许的杨家乡杨家村迁来三台的，现在他们宗族仍多住在杨家村故地。

第二种是八旗满洲的后裔：康熙二十年（1681）在金州就地编成的576名丁的八旗满洲的后裔仍多分布于金州以北地区。康熙二十六年（1687）又从北京开回一批佛满洲到盛京，在盛京就地编成一批旗兵分驻于“内城十五、路九、边门十六”合计四十处。其“十五城”为盛京、兴京、辽阳、开原、熊岳、复州、金州、岫岩、凤城、牛庄、锦州、广宁，义州、抚顺、铁岭等，分设城守尉等统辖之”。（参看第十一节《八旗兵的补充和编制变化》中的附表～《八旗驻防的分布》）。

雍正年间（1721～1735）将熊岳、锦州两处原设城守尉的，改设副都统，又扩大了旗兵的编制。其中复州（今瓦房店市）、金州皆属今大连市。今大连所属的庄河县是从岫岩分出来的（参看第十七节《五个满族自治县旗人的来源》中《岫岩满族自治县》）。熊岳今虽不在大连市境内，但大连地区的满族人不少是从熊岳分迁来的。乾隆二九年又从凤凰城拔来金州九十名满洲兵。大连地区古今政区的变化很大，所以无法统计今大连地区满人来此的时间和人数户数等。

据笔者采访调查所得，康熙年间迁来大连地区的满旗兵，多系“随龙入关”又“随龙出关”分来此地的，如瓦房店市胜利乡药庙下村的满族老人赵昌智，自称满姓伊尔根觉罗，祖籍长白山八道沟人，于顺治初年“随龙入关”。于康熙二十六年又“随龙出关”到盛京，又分来复州西蓝旗驻防的，道光年间因西蓝旗土薄年荒，乃大部移往双城堡（今双城县）。赵昌智家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因河患迁来药庙下屯的。又如瓦房店市老虎屯满族镇三家子村郭家，满姓郭路路氏。白云祖居长白山六道沟，属镶黄旗满洲付力户佐领下，于顺治初年“随龙入关”到北京住于草帽胡同。于乾隆年间拨来复州，后分居各地。其始祖黑达色官骁骑校，二世祖白起官协领。他家藏有乾隆十六年诰封广宁（今北镇）佐领白起及其妻佟氏的圣旨原件。该圣旨长三公尺，宽三十一公分，用五彩龙纹图案的绫子书写装裱而成。又如瓦房店市三台满族乡西蓝旗村的满旗苍家，满姓萨麻拉氏，白云祖籍长白山二道沟人，于顺治初年“随龙入关”，分驻于北京草帽胡同及固安大王庄。康熙二十六年（1687）其四世祖金太“随龙出关”，拨来复州西蓝旗驻防，占地落户，繁衍至今。金太的四世孙常平曾任开原防御。他家保存有道光二十五年（1845）诰封常平本身及其妻室、诰封常平之父母

等两道圣旨原件。这两道圣旨均长 2.5 公尺，宽 33 公分，仍是用五彩龙纹图案绫子书写装裱而成。“圣旨”都是满汉文对照书写，汉文由右向左移行书写，满文由左向右移行书写，玉玺加盖在正中间，也是满汉文的各一分。

附白起，常平三道圣旨汉文部分原文如下：

又如金州七顶山满族乡老虎山村的满族文氏，自言祖籍长白山四道沟人，顺治初年“从龙入关”，属正黄旗满洲舒勒佐领下。其祖先花色于康熙十年（1671）由北京马家胡同拨金州驻防的。其家族一小部分位于老虎山村，其余分居各地。又如七顶山满族朱家，满姓都拉欢氏，自言祖籍长白山三道沟人，属正黄旗满洲宁康佐领下，顺治初年“随龙入关”，康熙七年（1668）其始祖索弘与夫人文氏自北京草帽胡同拨来金州驻防的。其族人定居于大朱家村及小朱家村（都是朱家定居以后才有村名的），也有分居别处的。又如瓦房店市老虎屯满族镇虎头村满族吴德厚家，自言祖籍长白山三道沟人，属正蓝旗满洲数易佐领下。顺治初“随龙入关”，驻北京穆字胡同，于康熙二十六年（1087）又“随龙出关”，拨来复州驻防的。嘉庆二十五年（1820）其族人一部分拨往双城堡，留复州的一支分布于今老虎屯满族镇各村。

还有未曾“随龙入关”直接从长白山迁居辽南的。如瓦房店市三台满族乡西蓝旗村的满族马家，自言祖籍长白山七道沟人，顺治年间直接从长白山老家拨来复州开荒的。他们家族分别驻于驼山乡、马房身、西蓝旗，北海等地，至今已传十六世矣。又如三台满族乡三台村（乡政府所在地）百岁（1985 年）老人那永春自言祖籍长白山头道沟人，顺治年间由长白山老家随军来复州，在康熙年间编入八旗的，他们家族分布在三台满族乡各村。

诰封白起及其妻佟氏

乎豹

略思隆三锡褒嘉特焕夫

龙章

尔盛京驻防广宁佐领白

起职

司军旅材裕韬铃迪果毅

于

行瓜牙攸寄懋勤劳干王

室车

服宜旌钜典式逢湛恩用

沛兹

以覃恩特授尔阶中宪大

夫锡

之诰命于戏师克在和尚

辑起

桓之众功期罔懈益张赫

濯之

威

制曰干戈载 端资硕画於

戎行

琴瑟咸和更赖同心于闾

内尔

盛京驻防广宁佐领白起

之妻

佟氏柔嘉维则淑慎其仪

勤以

相夫虎旅奋从王之烈敬

才策府书勋天室重酬庸之典

尔开原防御常平才猷英果器

识沈雄修捍疆隅允称干城之

选完善封守聿推保障之能特

赉宠光用申奖励兹以覃恩授

尔为武德骑尉锡之诰命于戏

措一方于 席懋巧成功涣三

锡之丝纶钦予休命

制曰建威立 国资宣力之臣说礼

敦诗家赖同心之助尔开原防御

常平之妻刘氏持身淑慎赋质才

明恒德能修聿著巾褂之范内言

不出益谐琚 之声兹以覃恩封

尔为宜人于戏颁武功之大赉纪

在司勋被国典之徽章荣逾象服

开原防御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

常平本身妻室

教始庭帙诞启析薪之诚尔恩
多力什乃开原防御常平之父
躬笃行训子义方燕翼维勤
殫深心于韬略象贤能继廓大
业于弓裘兹以覃恩赠尔为武
德骑尉锡之诰命于戏恩光上
逮式膺殊渥之施惠泽下流益
表令名之著

制曰家法严明奖忠教之旧德壶仪
纯备嘉徙宅之前劳尔关氏乃开
原防御常平之母早习规箴夙姻
训典相夫以礼式彰聚敬之风教
子有成茂展策勋之志兹以覃恩
赠尔为宜人于戏锡翟 以扬徽
休声益著 鸾亟而烧彩茂社长
绥

开原防御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
常平之父母

据《奉天通志》记载，复州最初的驻军是满洲兵 653 名，蒙古兵 84 名，汉军兵 15 名，巴尔虎兵 55 名，都是八旗兵。

关于八旗满洲人祖籍所报的“长白山几道沟”的问题，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按清初“八旗满洲”的成员，几乎集东北诸民族之大成，其中女真人就包括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黑龙江女真的三大部。海西女真和黑龙江女真的活动地域距长白山都很远，只有建州女真诸部在历史上都与长白山或多或少有些关系，尤其长白山三部～鸭绿江部在长白山西，讷殷部在长白山北，朱舍里部在长白山东北。然编成八旗满洲时，是在赫围阿拉进行的，都住在今新宾满族自治县及桓仁县北部，本溪县东部一带地。当然这一带在地理上统属于长白山地。苏子河和富尔江各河流域，也有“几道沟”等地名，但这是否就算长白山的几道沟呢？按具体的长白山是指白头山，即天池所在的山块，这个山块周围一道沟到十几道沟的地名有三大组。就是图们江的大支流海浪河流域有一至八道沟的一组地名；婆猪江流域有一至十一道沟的一组地名；鸭绿江北岸有一至十八道沟的一组地名。此外长白山周围称几道沟的地名很多、很多。今天自报祖籍长白山几道沟的，谁也说不出来是哪个几道沟的。而海西女真、黑龙江女真与长白山根本拉不上关系，怎么今天八旗满洲人都成了长白山几道沟的祖籍呢？

这显然多数出于牵强附会而来的。这是了解满族史的一大障碍。当然有的人真是祖居长白山几道沟的，如鸭绿江部就住在鸭绿江北岸的一道沟至十八道沟的；朱舍里部是居住在海浪河的一至八道沟一带的；董鄂部是居住在婆猪江的一至十一道沟一带的，这些几道沟都可称长白山几道沟的。如真是这些几道沟的祖籍，也应当说明是哪一组的几道沟才能取信于人。而现在八旗满洲都说自己祖籍是长白山几道沟的，就显然与史实不符了。

第三种，是八旗汉军的后裔：八旗汉军的后裔，是今天大连地区“满族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原因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将金州南门以南半岛上的全部汉族居民。都编入了旗籍。即今老虎滩、青泥洼、小平岛、营城子一带编为“正黄旗汉军”、金州城西南毛营子、南关岭、大连湾、革镇堡、辛寨子一带编为“镶黄旗汉军”；今长城、龙头、水师营、旅顺街、双岛、老铁山一带编为“正白旗汉军”。这些人都是明末清初，主要是顺治十年(1653)由山东省登、莱、青等府迁来的民户(汉人)。今天这三旗汉军(俗称“汉三旗”)的后裔，已布满了大连直属六区及瓦房店市、新金县等地。如金州区石河满族镇的王家，原属正黄旗汉军。他家祖籍山东省，登州府，福山县古现村人氏，明末，由山东原籍迁于辽东宁远(今兴城县)落户，后又迁至海青岛，(在金州城东南，今新港西北)居住。大清定鼎燕京后，王京又从海青岛迁至金州城，于康熙二十六年编旗时王家投入正黄旗汉军。后世他家宗支繁盛，世代 纓。今其族人主分布于石河满族镇、革镇堡、金州镇北三里庄及七顶山满族乡的梅家村、瓦房店市的长店堡等地。单只石河满族镇，王家的人口就占全镇一万多满族人口的一半以上。王家宗谱记载其源流颇详细，其谱序云：

吾王氏原籍山东登州府福山县古现村人氏，当明末，迁来关东，先在宁远落户，后来搬到海青岛居住。迨至清朝定鼎后。始由海青岛徙于本城。康熙初，在满军八旗外增设汉军，是以我祖先投汉军正黄旗。儿孙当差后，即有王连贵任汉军正黄旗佐领，于乾隆三十七年八月，在城北三里庄祖莹为其祖考永福公祖妣金太君、曾祖考有功公、曾祖妣唐太君立碑，以光祖德。嗣有王连文孙王安邦，王安广兄弟俱任佐领之职，亦于该地立碑，纪念祖先。我曾祖考廷玺公原任汉军正黄旗佐领，四品顶戴，同其胞弟廷瑶公(道光十四年甲辰举人)共立

龙头碑于祖莹。此系不忘根本之谓欤，仅知梗概如此而矣，备作后人参考耳。
(原谱行文乃下行右移繁字)

此谱序为石河满族镇居民王世捷所著，谱存王世捷家。谱上始祖名王孝吾，原居福山县古现村者。王永福为王孝吾第三世孙，王连贵为王孝吾第五世孙。王安邦、王安广为王孝吾第七代孙，王廷玺为王孝吾第八代孙，王世捷为王孝吾第十一代孙。王氏谱书一厚册，其中载录数千人。王氏祖莹碑文中叙其世代分支繁衍情况更详细，都是研究旗人~今“满族”源流的宝贵资料。

又如金州区七顶山满族乡大莲花泡村的满族周家，为正白旗汉军之裔，他家祖籍云南，后移至小云南(在山西)，又由小云南移至山东登州府大水泊(今文登县治)又由大水泊迁来旅顺，于康熙五十三年被编入汉军正白旗，今其族人仍多居旅顺。又如七顶山满族乡大朱家村的满族夏家，为镶黄旗汉军之裔，他家祖籍山东省，后迁来金州城西南毛营子，康熙五十三年被编入镶黄旗汉军的，其中一支后迁来大米家村。此外庄河县桂云花满族乡有镶蓝旗汉军的后裔，主分布于该乡二道岭、三道岭村，如二道岭村书记曹希勇(1986年顷在任)，祖籍山东省青州府安邱(其祖莹碑中误作安秋)县大曹家沟人。曹希勇的前十六世祖曹邦远，约当明正德(1506~1520)年间自原籍迁来二道岭落户的。清初曹家依附于巴尔虎旗人，后在雍正四年(1726)顷，被抽出编入镶蓝旗汉军的。二道岭居民多为满族曹氏。桂云花满族乡居民异口同音称曹希勇家为“老满洲”。概曹家是最早开发桂云花一带的旗户之一。因此笔者先后两次拜访了曹希勇同志。他家宗谱及祖莹碑对其家史记载甚详。桂云花满族乡的满族四大姓——曹、刘、唐、张都是汉军旗后裔。刘、唐、张三姓祖籍都是山东省登州府莱阳县人氏。里姓亦桂云花满族大姓属八旗满洲。

第四种，其他原因成为今满族的：

(一)巴尔虎蒙古人的后裔：巴尔虎蒙古人于康熙三十一年编入八旗满洲后，拨到今大连地区的有三佐领，分驻于复州、金州、岫岩三城。在岫岩的巴尔虎人有两支驻于今庄河县吴炉乡的巴尔虎营子和太平岭满族乡的土城子等地。他们现在多数报满族，少数报蒙古族。如七顶山满族乡大莲

花泡村的满族车家，就是巴尔虎蒙古人的后裔，其始祖车三会是康熙三十一年拨来金州驻防的，由车家宗谱上得知车三会是骁骑校。又七顶山满族乡七顶山村的满族姓满的，也是巴尔虎旗的后裔，其祖莹有碑文（见本文第十五节）。巴尔虎旗的后裔。以寇姓为最多，大连满族的寇姓，约占大连地区满族总人口的十四分之一。大连满族以关、赵、寇、王为“四大姓”。巴尔虎寇姓主分布于庄河县的高岭满族乡的来宝沟、曲木房、老蚕场；太平岭满族乡的土城子、吴炉乡的巴尔虎营子；塔岭满族乡东瓜川；大营乡的四家子等地。

(二) 旗人女儿的后裔；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 取消旗、民不通婚的禁令后，民国以来旗、民通婚已成普遍现象。由于几千年男权思想的作祟，旗人男性的子女当然还是旗人，今天都报满族。旗人女性的子女呢？今天也多报的满族，称为“随旗”。好象与随父报满族的人有所差别似的。

(三) 随旗的满族；这是指并非旗人女儿的后裔。所谓“随旗”，是他们的父母都不是旗人，但他们的祖先都与旗人有长期密切的关系，从而加入旗籍的。有的是其祖先从关内随旗人出关，或从关里逃荒到关外依附旗人为生，而成为旗人的佃户、农奴、世仆等。因长期依附于旗人，生活习惯均已“旗化”，所以今天也报了满族，他们也自称“随旗”。

第二十五节 北京

北京市辖十三个区、四个县。据 1959 年统计，总人口为 6, 259, 687 人，其中满族 89, 181 人，占总人口的 1.45%。据 1982 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统计，全市总人口 9, 230, 687 人，其中满族 116, 776 人，此外有回族 184, 693 人，蒙古族 9, 577 人，朝鲜族 3, 909 人，壮族 1, 789 人，其他少数民族 5, 353 人，合计少数民族共 322, 207 人，汉族 8, 908, 480 人。

北京市的满族都是“外来户”，都是顺治帝入关后。驻防京师八旗兵的后裔。大清帝国全盛时期，全国有旗兵二千多个佐领，二十多万官兵。其中半数驻防京师，称为“京旗”，半数分驻全国各军事要地，称为“驻防八旗”。(参看本交第十、十一节)

京旗的详细人数《清史稿·兵制一》(卷130)中记载：京旗职官六千六百八十人，兵丁十二万三千三百九人”。《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71，八旗都统条)记载驻京八旗在乾隆二十二的佐领数是一千一百六十五个半。其中满洲旗分佐领六百七十八个半。蒙古旗分佐领二百二十一个，汉军旗分佐领二百六十六个，合计如上数。每佐领兵丁平均约一百名，兵丁总数应为十一万至十二万名之间，总之京旗官兵总数是十二万左右，是国防力量的核心、主力。

京旗的防地是按五行生克关系配备的，即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并在北方，北方属水，而黄色属土取“土能克水之义”。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并在东方，东方属木，而白色属金，取“金能克木之义”。正红旗驻西直门内，镶红旗驻阜城门内并在西方，西方属金，而红色属火，取“火能克金之义”。正蓝旗驻崇文门内，镶兰旗驻宣武门内。；并在南方。南方属火，而蓝色属水，取“水能克火之义”。这和今天北京满族的分布还有一定的关系。

今天户籍册上的“满族”，基本上是清代的旗人后裔。(参看本书第十五节)今天北京的满旗。都是京旗的后裔。是满洲旗分，蒙古旗分、汉军旗分融合而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小部分。《清史稿·兵老一》中所载的京旗官兵总数是126,989人，是乾隆时的数目，乾隆时对旗人的兵役是“八丁抽一”，则京旗的壮丁数是兵数的八倍，即 $8 \times 126,989$ 人，是1,115,912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则彼时北京旗人的数目当在三百万以上，而现在北京的满族人口，1957年是85,301人，1959年是89,181人，1982年是116,776人，只有乾隆时京旗人口总数的三十分之一，彼时壮丁数的九分之一。而乾隆时全国总人口尚不足三亿，彼时的领土是一千二百六十万方公里，今天只有九百六十多万方公里，却有十多亿人口，从这个比例上看，现在北京的旗人应当有多少呢？而北京现在的满族却只有十多万，原因何在呢？

其一是辛亥革命推翻大清帝国的统治后，大部分旗人憧憬着将会有一场血腥的民族报复(满汉之间)和阶级报复(旗民之间)的发生，尤其旗人中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更加恐惧，所以有些旗人，尤其满旗人都想方设法报了民人~汉族，从而蒙混下去，这在自然情况上是轻而易举的。因到清末，旗人与民人之间，满人与汉人之间，除了人为的政治上的不平等待遇外，人与人之间，在体貌上、语言文字上，风俗习惯上，宗教信仰上诸多方面的差异实在太少了，所以旗人报民人，满人报汉人皆很容易，只要没有熟人在眼前，就没有什么不妥的。

虽然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没搞什么民族报复和阶级报复。但无知的反动军阀们，是搞了一些对旗人的报复，即压迫歧视活动。如宁夏银川新满城居留的旗人，在1935年还遭到反动军阀马鸿逵的全部驱逐，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见《满族社会调查史》165页)。在北京流传一个故事说：一个北洋军阀的小军官，骑马行于街市上，见一旗人。小军官问曰：“你是干什么的”？旗人答称：“小人是旗人”！小军官勃然大怒说：“老爷骑马你骑人？该打”。举手就打了旗人几马鞭子。旗人忙说：“不是，不是！小人在旗”！小军官仍佯怒曰：“再骑！再打”！说着又是几鞭子。旗人无奈，只得隐忍而去。这虽然是个故事，但它反映了彼时一些旗人受压迫受歧视的情景。所以旗人改报民人，满人改报汉人还是有远见的。

其二是八旗官兵及眷属们，在清代只能靠国家发给的饷粮过生活，不准许旗人有其他生产活动，不得与民争利。清室倒台了，旗人的生活来源断绝了。原来的大小官员们，靠他们积累下来的财富，还可继续生活下去。而下层兵丁们就什么依靠都没有了，只有走死逃亡，多数人不得不离开京师、到外地去谋取生路，本节后面檀营村的情况，就是清朝灭亡后，北京旗人历史的缩影。这就是大清帝国首都北京今天只剩下了十多万满族的历史根源。

新中国建立后，正确的民族政策，使所有的少数民族都得到了真正的平等待遇，少数民族更得到较多的优待与照顾。少数民族成员们无不感戴新政府的深思厚泽。但要彻底弄清每个人的族籍，已成为不可能的历史事实。因凡属中华民族的“族中族”，都有着千丝万缕的互相渗透，都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尤其汉满两族之间满蒙两族之间、汉蒙两族间已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事实。绝大多数汉满之间，已难找到没有民族间鱼龙演化关系的、纯粹的的个人，所以有的已报汉族的满族~旗人不想再改报满族，这种情况以城市为最

多，城市中尤以知识阶层为最多。所以北京的满族人口永远也不会有大幅度的回升，更不会恢复乾隆时的数目。

在《满族社会调查史》中1959年北京的满族人口是89,181人，其分布的情况是东城区20,185人，西城区19,214人，朝阳区10,434人。这三区满族人口的合计是49,833人，合全市满族总人口的半数以上。其次是崇文区3,242人，宣武区3,853人，海淀区9,313人，丰台区3,289人，通州区115人，大兴区1,590人，周口店区1,717人，门头沟区176人，昌平区573人，密云区6,404人，顺义区894人，平谷区10人，延庆区2,684人。怀柔县5,490人。1982年全国人口第三次普查时，北京市满族人口回升到116,776人。以上的数字和分布情况仅供参考。

现在北京市的满族基本上是与汉族杂居的。在市区内只有西郊西山脚下的健锐营故址，和东郊的松树、南营(朝阳门外)尚有小的满族聚居点。全北京市已成立了三个民族乡，其中有怀柔县的、“喇叭沟门满族乡”、“七道沟满族乡”和密云县的“檀营满族蒙古族乡”。

檀营满族蒙古族乡，自清亡到现在的变化情况，是这段时间内旗人历史的一个纵断面，兹简单介绍如下：檀营村原属密云县城关公社，在1959年顷全村人口除因修密云水库迁来的新户外，原来本村的户口为1,188人，其中满族760人，占全村原总人口的63.9%，蒙古族166人，占全村原总人口的14%，满蒙人口总合926人，占全村原总人口的77.9%。

“檀营”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直到民国初年，一直是清帝驻扎亲兵的营房，民国十七年(1928)才改称檀营村。以前驻扎马甲2,000名，(其中八旗满洲兵1,600名)加上官兵的眷属，共有旗人9,000名，(其中满族6,900名)。这九千旗人中，有原来副都统以下官员49名，(其中满旗37名)及其家属占原总人口的3%左右。其余97%为兵丁及其家属们。

辛亥革命后，原驻檀营的贵族官员们，都先后迁回北京城或其他城市，用他们原有的较兵丁们不同程度的富有的财产，继续过他们不同程度的较优裕的生活，而留在檀营的兵丁差役及其家属们的生活则完全陷于绝境。他们原来靠

“铁杆庄家老米饭”（粮饷）生活的，什么生产知识都没有。再加反动军阀的残酷压榨和部分汉人的歧视，使他们“拆典当卖，死走逃亡，卖女卖儿，妻离子散”。据檀营老人的回忆，自民国三年(1914)至解放前(1949)前的三十几年间，该村大约有6,500(其中满旗人4,600)多人逃亡在外。外逃最多的时间是民国九年至民国十五年(1920~1920)。外逃人中大约有2,000人(其中满旗人1,400)多人至今下落不明。最后停留在檀营的只有2,000(其中满旗人1,650)多人。其中多数没有生产能力，只有少数年青力壮的，开始揽地种、当长工、短工、或割柴草、挑担走乡串村作小本生意，能维持部分人的生活。有的人连这些活也找不着，或干不了，则只有在死亡线上挣扎了。有的沦为乞丐，从而檀营被称为“花子村”。由于饥寒交迫加疾病，大约有一千(其中满旗人770)多人死亡了，大约有百多户人家卖掉了儿和女，拆散了夫妻。民国六年(1917)和民国十年(1921)灾难最严重，有一天就死亡三十多口人(其中满旗人十名)。全村九千多人，到解放前只剩下了210户(其中满旗人167户)906(其中满旗人760)人，其中鳏、寡、孤、独的单身人有70户(其中满旗人65名)。原来檀营有瓦房4,800(其满旗人有3,800间)，只剩下了590(其中满旗人的350)间。解放后，檀营的满旗人，蒙古旗人的贫民都得到了新生，在政府的扶助、照顾、救济下，到1958年全村都达到了有吃、有穿的温饱生活。

第二十六节 锦州市地区

现在锦州市地区，包括市直属的古塔、太和、南票、凌河、葫芦岛等五区及锦、义、锦西、兴城、绥中、北镇、黑山等七县。

在1953年的调查统计中，锦州市地区共有人口2,337,169人，其中满族为226,338人，占全地区总人口的9.68%。彼时满族的分布是：市直属五区9,566人。锦县64,035人，义县10,246人，锦西县10,800人，兴城县64,053人，绥中县63,158人，北镇县45,515人，黑山县23,000人。到1981年顷，锦州地区的全人口增加4,467,909人，满族人口按1953年的9.68%计，相应为440,515人。到1989年，按照辽宁省及大连市地区满族人口变化的情况估计，锦州市地区的满族~旗人的人口应在六十万以上。

到1989年底止，锦州全区198个乡镇中，已有74个满族乡镇，一

个回族满族镇。其中，兴城市有曹庄，羊安、元台子、白塔、闻家、望海、刘台子、大寨、围屏、高家岭、碱厂、三道沟、红崖子、旧门、药王庙、拣金、海滨等十七个满族乡；沙后所、东辛庄、郭家等三个满族镇。（该县共有 26 个乡镇）绥中县有宽邦、大王庙、荒地、大台山等四个满族镇；西平坡、葛家、高台、高甸子、黄家、范家、明水、网户、叶家、沙河站、小庄子等十一个满族乡。（该县共有 29 个乡镇）北镇县有常兴店、正安、中安、赵屯、青堆子、高山子等六个满族镇；大市、富屯、汪家坟、罗罗堡、鲍家、广宁、高力板、曹屯、大屯、五粮、窟窿台、沟邦子、吴家、柳家、新立等十六个满族乡，闾阳一个回族满族镇。1989 年 1 月调查，北镇县已有满族 302, 853 人，已发展有 22 个满族乡镇（全县共有 25 个乡镇），1989 年 6 月国务院已批准北镇成为满族自治县。义县有稍户营子、九道岭二个满族镇、头道沟、地藏寺、留龙沟、大定堡、聚粮屯、车坊、瓦子峪、罗家屯、红墙子、头台等十个满族乡。该县总共有二十三个乡镇。黑山县有白厂门、无梁殿二个满族镇；司屯、镇安二个满族乡。该县总共有三十一一个乡镇。锦县有右卫一个满族镇；温滴楼一个满族乡。该县总共有三十二个乡镇。锦西县有二十七个乡镇，无满族乡镇。总的看锦州市地区是辽宁省一个重点满族集居区。

锦州市地区满族人口分布的史地情况是：一部分分布在沈阳至山海关间的要道上，都是明清争夺战中的军事要地。一部分是交通比较便利，土质又肥沃的地方。前者是因军事目的而进驻旗兵的，后者是清朝的王公贵族们建立庄园而聚集旗人的。

今天锦州市地区的满族，小部分是八旗满洲的后裔，绝大部分是八旗汉军的后裔。

(一)八旗满洲人耒锦洲地区的历史：自1622年(明天启二年、金天命七年)至1641年(明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间，清军先后攻取了明朝的闾阳驿(在北镇县西南边境，今已建回族满族镇)、广宁(今北镇县城)、锦州(今锦州市治)、宁远(今兴城县治)后，即随时派八旗兵驻防各该地，皆当时兵家所必争之要地。后在锦州设副都统衙门。各地驻防八旗兵中，都只有少数八旗满洲兵。其后裔在今锦州市、北镇县的今满族中。

兴城县清时为宁远州，常驻八旗兵200名，其中有满旗兵20名。顺治、康熙年间，先后在山海关以东至锦州以北汉蒙交界地带设立了七座“边门”，即：明水边门(在今绥中县北中部)、白石咀边门(在今兴城县西北逆境的上坎子附近)、宽邦边门(今绥中县东北角宽邦满族镇政府)、犁树沟边门(在白石咀子边门东北五公里许)、碾子沟边门(在犁树沟边门东北、新台边门西南)、新台边门(在锦县西北角与北票县边界上)、松岭边门(在锦州市西北边境外朝阳县境内)。边门上均驻有八旗兵，如白石咀边门彼时常驻八旗兵40名。其中满旗兵五名。

在1953年的调查统计中，兴城县六万四千多满族中满旗人后裔只有二千名左右，其余均汉军旗后裔。就整个锦州市地区今满族内的成分(满族的族内族)看，基本上都是汉军旗后裔，满旗后裔只有十分之一左右。

(二)八旗汉军在锦州地区的发展史：锦州地区八旗汉军的来源可分为四种：

第一种，投充旗下者：大清定鼎燕京后，此“关东走廊”一带地的汉族居民，为政治形势所迫，只好投充旗下。如绥中县今满族陶玉坤的祖先，原居上海，传说于明洪武年间，因犯罪被遣发关外，开荒种地落户于该地，到明末陶家已发展成一大家族。当明清战争中，陶家有56人死于战乱中。其余陶家人被迫投充旗下，获得得旗籍，其原有的土地即被称为旗地、照旧由陶家耕种，每年向旗衙门交租，比民人向国家交租轻得多，社会地位又高于民人，故自愿如

此。又如杨慎之的祖先，原系山东登州府人氏，于明天启年间(1621~1625)逃荒来此地，到清顺治间，投充旗下获得旗籍。再如绥中县今满族李再南、范承路等人的祖先是同样情况加入汉军旗籍的。

第二种，降军入旗者，明清交战中，投降清军的明朝官兵，一般情况下是编入汉军八旗的。如绥中县今满族凌汉源的祖先，是明朝驻守山海关的兵士，投降清军以后，被编入汉军八旗。又如绥中县今满族石庄头的祖先、原是山东济南府人，曾任明朝驻辽阳的指挥使，投降清军后，被编入汉军八旗的，并奉命驻中后所(今绥中县城)掌管皇庄事务。

第三种，是拨民来此开荒，从而投入旗籍者：顺治、康熙之间，在关外土质肥沃的地方设庄固、放庄头、并从关内拨民户来此开垦。拨来的汉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平定三藩之乱后，将其属下调拨到此地，编入庄内，从事生产劳动；一种是从直隶、山东拨来开荒种地的民户。据说到这里民户，入旗与否？

听其自愿。他们有的是进入庄园即隶旗籍的，有的是独立开荒种地向民衙门交租，始终还是民户。凡入旗籍的，在清代他们都是旗人，今天都报的满族。凡民户，今天都报的汉族。

第四种，是因给旗人贵族服务的匠户，从而加入旗籍的：当时关外王公贵族等所需的生活用品，是由关内拨来一批手工业者，按照贵族们的需要进行生产的。这些人被编入汉军旗籍，做为贵族们的奴仆来使役的。如义县今满族中的汉军旗后裔，就有一部分，其祖先是拨给固伦公主的“七十二匠人”中的成员

附记：

这一篇《锦州地区满族的源流》是根据《满族社会史调查》、《辽宁

省县名志》、《辽宁省地图册》)分县附说地图、辽宁省测绘局编制)、《东北地方史稿》(张博泉著)、《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图》(辽大历史系印)、《全国满族自治县,满族乡镇》(载《满族研究》1988,4及1989,4)及伪满时的分省地形图等参考编辑而成者。因所据资料较旧,新资料太少,故自知不甚理想,仅供参考而已。

据1990年初的消息,除上述五个满族自治县外,国务院又先后批准了成立吉林省伊通、河北省围场、宽城,辽宁省本溪、桓仁、宽甸、北镇、清原等八个满族自治县。

第七章 锡伯旗人源流

第二十七节 锡伯源流综述(附图三)

锡伯,为蒙古语“Shibiz”之音译,为“沼泽”之意。指的是以嫩江下游西岸月亮泡为中心的一片大沿泽而言。这片大沼泽北到齐齐哈尔东北,南到新开河流域,西到乌兰浩特西北的索伦,东到哈尔滨以西,总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与浙江省的面积相当。

这块地域内湖泊星罗棋布,河流纵横交错。这里的方言对湖泊通称“泡子”。著名的泡子有洮儿河下游的月亮泡(运粮泡)、霍林河下游的查干泡、乾安县西南的达布苏泡、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南的俄克碱泡等。其余的泡子与沼泽间的界线并不十分清楚,泡子水面的大小随季节、年代的不同多有变化。河流与沼泽间的界线也不稳定,涝年的雨季则河流沼泽连成一片,芦苇丛生,故隋唐时代对此地有“辽海”之称。这块沼泽的西侧为大兴安岭的东麓,古代森林茂密,鸟兽成群,所以这一带是渔猎民族的天然“乐园”。

在这块沼泽间,今天属于泰来县的塔子城,即明代锡伯族活动的中心城市“绰尔城”。此城曾为辽朝的泰州、金朝的泰州及乌骨敌烈部的治

所。今洮安县的四家子，曾为辽朝长春州、金朝新泰州的治所，今郭尔罗斯前旗蒙古族自治县及大安县、肇源县一带，曾为达鲁古部牧地。‘

这块沼泽地域在元明间均为蒙古族统治地，蒙古人依自然状况称之为“Shibiz”（溪泊）是合乎客观现实的。

我们开始汉译这“Shibiz”一词时，就应还原用“溪泊”二字。这“溪泊”一词的读音与含义都与蒙古语相符合，且又与满语“sibe”（铍草）一音偶合，而这一带又真的多生铍草。

“溪泊”（Shibiz）地名如上所述。锡伯“溪泊”的部族名是因此族人久居此地而得的。明清之际女真诸部之得名，基本都是由其所居地名而来的。如哈达部是因其久居哈达河（今辽河东来的一小支流，今名清河）而得名；苏克素护河部是因其久居苏克素护河（今苏子河）而得名；乌拉部是因其久居乌拉（江边之意）而得名；鸭绿江部是因其久居鸭绿江畔而得名，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则锡伯（Shibiz）因其久居溪泊地方而得名，是合乎当时习惯的：就如今天因久居辽宁而称辽宁人，因久居沈阳而称沈阳人，都是顺理成章的事。

女真族的“瓜尔佳氏”今多姓关（原用官字）也有姓金（如鳌拜的后人）和姓葛的，及金国后裔之大姓，其人口约占女真人全数的四分之一强。其得姓也是由于久居“安图（安土）瓜尔佳城”而来的。安图瓜尔佳城故址，据《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所记，当今新宾满族自治县上夹河乡腰站子村附近。瓜尔佳因人口繁盛，故部落很多，分布地域很广；散处于苏完（今吉林省双阳县）、叶赫（今吉林省梨树县叶赫村）、纳殷（讷殷、内阴，在今松花江上源二道自河一带）、哈达（故城在今开原县东，南城子）、安楚拉库（今吉林省安图县南部）、裴悠城（今吉林省珲春县三家子乡高力城子）、瓦尔喀（在斐

悠城北)、嘉木瑚(?)、尼玛察(今苏联乌苏里斯克(双城子)、辉发(今吉林省辉南县城东北辉发城)、长白山各地,而以居苏完地方者最盛。

约当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前后,有苏完地方的女真瓜尔佳氏兄弟三人分掌部落,长兄名佛尔和,次兄名尼雅哈齐,三弟名珠察。于刷靺河(刷烟河、苏瓦烟河、双阳河)地方分离:佛尔和仍居苏完,尼雅哈齐向西北迁于溪泊地方,珠察迁于瓦尔喀,又南移于希尔希昂河渡口(其地当今图们江由北岸,波谢特湾之北)。

尼雅哈齐迁于溪泊(Shibiz)地方后,又分居成两部;其中的一小部分居溪泊东北部,即今黑龙江省肇源县一带,用原姓“瓜尔佳”为部落名,后往复汉译成“挂勒察部”。《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上注明的很清楚。其大部分居于溪泊中部及西部,以绰尔城为中心,印以所居地名为部落名,称Shibiz部—本应汉译为“溪泊部”,或作“西北部”亦有理,因其地在故居苏完部,即长支佛尔和部所在地的西北方,后写作锡伯,席北等等很多同音名称。

溪泊地方,元末明初在兀良哈蒙古控制中,明初先后于此设置了三个卫所。三卫即:泰宁卫,洪二十年(1387)建,在今吉林省洮安县城附近;朵颜卫,洪武二十二年建,在今绰尔河流域的朵颜山附近;福余卫,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建,在今齐齐哈尔东北呼裕尔(福余)河流域。合称“兀良哈三卫,或朵颜三卫”。

大约在明仁宗洪熙(1425)年间,元太祖铁木真之弟合萨儿的十四世孙奎蒙克哈喇因避难由海拉尔河以北原牧地南徙于兀良哈三卫控制地内,成为兀良哈的附属部,称为“科尔沁蒙古”。大约在明英宗正统(1436~1448)年间,兀良哈三卫南迁于大宁(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以西)境内。科尔沁蒙古继承了兀良三卫的故地,与锡伯部和平共处。

“锡伯部”之名最早见于《满洲实录》所载的“哈达世系”哈达国汗姓那喇名万,本扈伦回族也,后因住哈达处,故名哈达,乃乌拉部彻彻木之子,纳

齐卜录第七代孙也。其祖克锡纳都督被族人达尔罕所杀。万遂逃往锡伯部(锡伯部名首见于此)绥哈城。其叔旺住外兰逃至哈达为部长。哈达部叛,旺住外兰被杀。其子博尔坤杀父仇人,请兄万,为部长…。

万高寿,至1582(明万历十年)年死去,推算其青年逃往锡伯部时,当在明嘉靖(1522~1565)初年,即十六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此时已有“锡伯部”。(见徐恒晋,马协弟著《锡伯族考略》载于《锡『白族史论考』》)

明武宗正德(1506~1521)年间,科尔沁蒙古强盛起来,控制了嫩江流域全部及西辽河以北地区,锡伯部、挂勒察部均沦为科尔沁蒙古的属部。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女真族的叶赫首领纳林布禄纠合哈达、辉发、乌拉(与叶赫合称“扈伦四部”或“胡笼国”)、朱舍里、纳殷等女真部落,及科尔沁蒙古与其所属的锡伯、挂勒察两个女真部落,(锡伯之名于此为二见,挂勒察之名于此为首见)共九部联军进攻“满州”(建州)。被努尔哈赤击败于古勒山(今新宾满族自治县西北境古楼村北)。史称“九国之战”或“癸巳之战”。其后即有锡伯部人先后投归努尔哈赤:如努尔哈赤天命十年(1625)《洲老档》记有“锡伯部巴达纳,奔其祖先世居之地,率丁三十名来投,有功,升为备御”(此为锡伯部名第三次见于史录)。又有“胡岱、巴珠、格卜库等三人自锡伯地方携妻子来投,有功,其子孙世代勿令当差”等。

癸巳之战后,锡伯及挂勒察部落组织即不存在,沦为科尔沁王公贵族之私属。

皇太极天聪四年(1630)科尔沁蒙古全部归属于后金。崇德元年(1636)科尔沁左翼族,左翼前旗,右翼旗、右翼前旗、右翼后旗,顺治五年(1648)置郭尔

罗斯前旗，后旗，杜尔伯特旗、扎赉特旗；顺治六年置科尔沁左翼后旗。以上统称“科尔沁十旗”，（这不属八旗制度）。原在科尔沁蒙古的锡伯人大部分按姓氏编成牛录，分别属于科尔沁各旗中。

科尔沁十旗，每旗设扎萨克一员为旗主（不称固山额真）以原来的王公台吉等任之，下设管旗章京、参领、佐领、骁骑校等职官。锡伯人可任参领、佐领、骁骑校等官：

康熙三十一年（1692）初圣祖将科尔沁蒙古所属的锡伯人，挂勒察人，达斡尔人等共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八丁，全部赎出，除老幼奴隶外，可披甲者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余丁，分别编成八十四个牛录，均属“八旗满洲”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等。分驻于齐齐哈尔、伯都纳、乌拉三处，隶于黑龙江将军及宁古塔将军（驻乌拉）管辖，统称为“伊彻满洲”。其后有从绰尔河流域继续来降之锡伯人，以其“归义来迟”，未获得满洲称号。

是年底科尔沁王公台吉等续献因病漏查的锡伯人等七名；其中有“科尔沁扎萨克图郡王鄂齐尔旗一等待卫珠克图家锡伯丁鄂退；二等台吉鄂齐尔所属费延图家锡伯丁阿布萨哈、阿尔彬；扎赉特固山贝子纳逊旗四等合吉乌鲁卓·波克齐家锡伯丁奇塔特；郭尔罗斯扎萨克旗阿哈泰佐领下莽色家达斡尔丁济兰泰、霍济泰；哈济噶尔家达斡尔丁齐勒泰等，对其主仍各赏银八十两”。这说明抽赎是很彻底的。

从科尔沁赎出的挂勒察人，只是挂勒察人的一部分，其余部分是早在太祖、太宗时已先后归服于满洲了，《清实录》中记有三次出征卦尔（勒）察的史事：

（一）天命十年八月，上（太宗）命雅护、喀穆达尼，率兵征东海北路卦尔察部，获其二千人以归，上出城迎之，赐宴而还。

（二）天命十一年丙辰，往征卦尔寨部落大臣达朱户，俘获人口及马牛以归。

(三)崇德二年十二月甲辰，命叶克书、星讷等率兵六百往征卦尔察(但翌年四月甲午朔条只记叶克书至萨哈尔察，俘获男女人口马牛以归，未明言是否为卦尔察部)

赎出的锡伯、卦勒察、达斡尔人等编入“八旗满洲”原因如下：

(一)当时沙俄的侵略魔掌已伸入我黑龙江北岸，筑雅克萨城(在今莫河县北江北岸)为久居计。我国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以武力赶走了侵略者，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订立尼布楚条约，划定了国界。但沙俄贼心不死，又策动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准噶尔噶尔丹叛乱，东侵喀尔喀蒙古，大批喀尔喀、巴尔虎等蒙古部众东逃耒嫩江流域，当地秩序大乱。为国防土及地方治安上的需要，只有将属于科尔沁蒙古的与满洲同祖的锡伯、卦勒察、达呼尔等人抽出，编入“八旗满洲”为有利。

(二)锡伯人、卦勒察等人，在彼时较满洲人落后，性喜掠盗，既清政府官员往返黑龙江路经其地者，也常遭彼等打劫。案件发生后，黑龙江将军以彼等属于科尔沁蒙古，不便直接查问，只能咨文理藩院。待理藩院派官往查时，已事过境迁，查询不易，故十之八九的案件只能不了了之，对其掠盗行为则无法禁止。

(三)科尔沁统治者对所属部众剥削残重，对其奴役的锡伯人、卦勒察人等当然更重。康熙帝又以锡伯人、卦勒察人与满洲同族，反而役属于科尔沁蒙古为可耻。

基于以上原因，圣祖认为只有将锡伯等人抽出，编入“八旗满洲”为得策。但科尔沁为帝室之姻亲，又是最得力的藩部。不能无偿地调出他们的私属，因而采取了“赎赏办法”。

锡伯、卦勒察、达斡尔人等赎出后编队及驻防的情况是。

(一)齐齐哈尔地方，当时在国防上最为重要，从其附近居、住的锡伯人、达斡尔人中选出一千人为披甲，驻于齐齐哈尔地方，筑城镇守。又选出二千六百名为披甲之附丁，合编为二十四牛录，其中锡伯人十九牛录，兵丁二千八百五十名；达斡尔五牛录，兵丁七百五十名。因原来属于科尔沁时，达斡尔人任官者少，因之此二十四牛录的佐领均以原任官的锡伯人充之，故此二十四牛录统称“锡伯牛录”。

规定“各官兵原来住于大路附近方便地方者，仍准其居住原地。凡居住远离大路拐弯之处及嫩江西岸者，皆迁于嫩江东岸依次安置，并酌设头目，以便督察”。

(二)伯都纳地方亦水陆通衢，其周围乃三江汇合之低湿地，唯伯都纳为一较大台地，较为乾燥，便于筑城居住，于是在伯都纳旧城西方修筑一座新城。从伯都纳附近居住的锡伯人、卦勒察人中，选出壮丁二千名披甲，镇守伯都纳新城。又将原住于科尔沁所属地方，如西喇木伦河及辽河流域的锡伯人，都集中于伯都纳附近；抽出其中二千壮丁，为原驻防兵之附丁。此前后四千名兵丁合编为四十个牛录。其中锡伯兵三十牛录，卦勒察兵十牛录。该四十牛录之官员，均于原有官员内选用。此四十牛录又分为左右两翼，每翼设协领、防御各一员管领之，均由满洲人担任。并将宁古塔副都统移驻于伯都纳，总统两翼事。又以图西吞地方为松花江嫩江汇合口，关系重要，由伯都纳副都统于原驻伯都纳的兵员内，抽调披甲五百名、附丁一千名前往驻防。

(三)乌拉亦关东军事要衢，又是造船基地，原有兵员不足调用。以宁古塔将军(时驻乌拉)佟保奏请，奉准，将距乌拉较近的锡伯人移住于乌拉，编成十六个牛录驻防乌拉。彼等的村庄田亩和附丁大部分仍在伯都纳地方。另外又编成四个牛录，驻防西喇木伦地方，其村庄田亩附丁亦在伯都纳地方的搜登、伊

勒门、萨伦等地安置。此二十牛录官兵，均由宁古塔将军管辖。（以上均参看《清实录》康熙三十年四月乙巳条）

以上从科尔沁蒙古赎出的锡伯人、卦勒察人、达斡尔人等。其编成八十四个牛录，他们的任务是“驻防城池、坐卡巡边、保站护台、防范盗贼。其附丁则自备耕牛、种籽、开垦种田”。当时共有附丁七千四百名，其中一半供养披甲，一半交纳官粮。每丁每年交纳五斗。

清政府以重金从科尔沁蒙古申赎出锡伯人、卦勒察人、达斡尔人等编入“八旗满洲”，对清政府来说，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英明措施。对锡伯等人来说，是他们历史发展上，一个大跃进的阶段。从此，彼等的经济由落后的渔猎放牧，进入了当时比较进步的农业阶段。

清政府规定，对锡伯人、卦勒察人、达斡尔人等，“各旗牛录有赤贫无耕牛者，以该牛录家资宽裕人等之犁协助耕种。有因病耽误无人耕耘耨收者，以牛录之力相助。有违令怠惰者该员责罚之。倘不此畏，仍旧怠惰，则来衙署首告，从严惩之。贫困无牛者，不以牛录之力相助，则将该管官员领催等严加治罪。“还规定三年免征官粮。

由于清政府一系列有利于锡伯等人生产力，发展及扶贫的措施，和锡伯等人的勤奋努力，使其农业生产得到快速进步。所产粮食除供应披甲及交纳官粮外，尚有盈余。例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驻齐齐哈尔的锡伯二十牛录协领瓦勒达、佐领扎斯秦等奏称：

我等锡伯原系蒙古之奴，蒙皇上重佑，赎出为兵，食俸饷、赐生计，故历年足获粮食。今将迁往归化(后实迁往盛京)请将我等现在迁移十二牛录官兵之私粮一千斛(每斛为一石；后改为五斗)贮入本地(指齐齐哈尔)粮仓。

虽然这盈余数目并不算多，但足以说明彼等已丰衣足食。

在政治地位方面，锡伯、卦勒察、达斡尔等族人，由科尔沁蒙古役属的附庸或奴仆，一跃而变为“八旗满洲”的成员。上升为清帝国统治阶级的“统治支柱”的一部分，比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绿营兵(绿旗兵)的地位都优越，可谓“一步登天”。

在文化方面，自编入“八旗满洲”以来，也得到了发展。锡伯人原与满洲人同操女真语言附属于科尔沁蒙古期间，他们又通蒙古语，编入“八旗满洲”后又都使用满语，但其中实夹杂一些蒙语。康熙三十四年(1695)又为锡伯、卦勒察、达斡尔、索伦等族在墨尔根(今嫩江县)设立了学校，每翼各建校舍一座、设置教官、教授彼等子弟学满语文。自是，锡伯等人始有了文字，这在历史发展上当然是一大进步。

康熙三十八(1699)年至四十(1702)年间，清政府将驻齐齐哈尔、伯都纳、乌拉等处的锡伯等族的兵员又作了一次大的调拔。从民族角度看，是锡伯族(包括属于锡伯牛录的卦勒察人、达斡尔人，以后只谈锡伯，不再单提卦勒察、达呼尔)的一次大迁移。其迁移往各地的兵数如后表：

大连文史资料-八旗源流

年代	往迁	康熙				年代不明	小计	附计
		38年	39年	40年	41年			
		200	580		275		1,055	本表参考锡伯史论考一三九页及白友寒锡伯族源流史纲一〇四页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锡伯族简史四六页等研究去取调制而成。对新疆锡伯族
	凤凰城	250				179	429	
	辽阳	247		45			292	
	牛庄	10	10	45			65	
	熊岳城	131					131	
	金州	159					159	
	复州	178				164	342	
	开原	285		40			325	
	岫岩	82				89	171	

铁岭	10		10			20
宁远	20				20	20
中前所	20					20
中后所	20					20
小凌河	20					20
巨流河	20					20
抚顺	20					20
白旗堡	20					20
小黑山	20					20
闾阳驿	20					20
广宁		40				40
锦州		44				44
北京	1 , 000					1 , 000
兴京			10		53	63
盖州					24	24
义州		108				108
德州	42					42
总计	2 , 774	782	150	275	509	4 , 490

调往盛京及其所属地区的，多是原驻齐齐哈尔、伯都纳一带的。调往北京的，是原驻乌拉的。这次调迁的原因，一方面是根据国防配备的需要，因自康熙三十(1691)年以来，对沙俄策动与支持的准噶尔酋噶尔丹的用兵，原驻盛京的“八旗满洲兵”多调往关内，盛京防务需要调兵接替。一方面因锡伯等族

人，对清帝将彼等由科尔沁的奴隶身份赎出为八旗满洲官兵的深恩厚泽并不真心感戴，也不真诚忠于帝室。故康熙三十九年(1700)内务府衙门奏称：锡伯等原系科尔沁之奴，为科尔沁纳贡奴役不堪生存。蒙皇上眷佑，不惜钱粮，支银数百万两，将伊等自科尔沁赎出。安置于乌拉等地，驾临乌拉时，(注)锡伯等本应致死效力，以报皇上大恩。锡伯等并不效力，丝毫不懂道理，故迁至盛京、锦州等地及京师诸城，均分至八旗兼管，令其披甲，俾学道理。

(注)指康熙三十七年帝巡幸东北三省时事。

故迁至盛京、北京后锡伯兵不再单编牛录皆混编于“八旗满洲”诸牛录中，从此，凡获得“八旗满洲籍”的锡伯等族人，都逐渐与满洲人融合。因系驻防性质，其后又有调动。

调盛京的锡伯兵民，于康熙四十六(1707)年顷，在盛京修建了太平寺“锡伯家庙”，始建时只有青砖瓦房五间，后于乾隆十七年(1752)起又逐渐增修了正门、中殿、大殿、配殿等，“文革”时被破坏，寺院变成了摩托车厂。其故址在今沈阳市和平区站前街实胜寺西邻。据说此锡伯家庙内原有石碑两块，一为汉文，一为满文。今只存满文的一块。1959年新疆查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的肖夫同志到沈阳发现了这块满文碑，并作了抄录。文革后经民族学院赵展同志向有关部门的呼吁，此碑被挖出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馆。经赵展同志据博物馆所赠的拓片及肖夫所录原文对照整理译成汉文如下：

总集三世诸佛之大成，广开三乘之教义，弘扬释迦牟尼佛法。历史明载世传之锡伯部族，原居海拉尔东南扎托罗河一带。其后，移居齐齐哈尔、墨尔根、伯都纳等处，编为七十四牛录，凡四十余载。康熙三十六年，荷蒙圣祖仁皇帝施以高厚仁恩，将锡伯部众分为三批，于康熙三十六、七、八年，迁入盛

京，并分置各省驻防效力。康熙四十六年众锡伯筹集白银六十两，购房五间，建立太平寺。自京师虔请甘珠尔经一百零八部，每年四季，集众喇嘛，诵经不缓，永偿所愿。

乾隆十七年，协领巴岱，佐领音德布、阿富喜等众锡伯协力共建三大殿，两侧配庑各三间，正门三间，恭塑三世佛。

至四十一年，协领罗卜桑、拉锡、德固苏、绰地等锡伯，修葺全寺，立宗喀巴、五护法、观世音、四天王诸佛，增请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每年四季，不断诵经，永不休止。

嘉庆八年七月十六日，梨树沟边门章京加一级记录二十一次花沙布谨立。

此碑文，笔者手中共有三种汉文译本。因原汉文碑已失落，又没留下碑文抄本，今天由满文碑译成的汉文，当然都不会与原来的汉文碑全同。即今三种译本除用字造句不同外，内容也有出入，唯所译碑文中的年月日等数字则全同。本文所取的汉译碑文，乃赵展同志所译者。

碑文中将锡伯祖居的“绰尔河”，误作扎兰陀罗(扎赉托罗)河。按“扎赉特是地名、旗名，而非河名。碑文中又将八十四牛录误为七十四牛录。又将移居齐齐哈尔、伯都纳、乌拉三个主要地区落掉了乌拉。又将康熙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年调拨时间，误为康熙三十六、七、八年间，这一切应以前文所写的史实为准，勿为此碑文所惑也。

康熙五十九年(1720)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廷先后平定由沙俄支持的准噶尔民族分裂主义者噶尔丹，和由英土帝国主义支持的回部伊斯兰教“圣裔”两和卓之乱，收复新疆后，以其地远处西北，地广人稀，国防空虚，急需加强西北兵力。故自乾隆二十七(1762)年起，就从热河、凉州、庄浪等地抽调满洲兵；从黑龙江抽调索伦兵；从张家口抽调察哈尔蒙古兵和厄鲁特蒙古兵西去充

实新疆防务。然当时伊犁将军(总管全新疆军政的全权大员)明瑞,尚感兵力不足,于是又向中央请求增调官兵,他奏称:

闻得,盛京驻兵,共有驻防兵一万六七千名,其中锡伯兵四五千名。伊等未放弃旧习,仍以狩猎为生,技艺尚可……于此项锡伯兵内,拣挑优良者一同派来,亦可与黑龙江兵匹敌。

清政府同意了明瑞的奏请,于是军机处乃行文盛京将军舍图肯:“遵旨于锡伯兵内挑选一千名眷移住伊犁”。这又是锡伯民族的一次大迁移。于乾隆二十九(1764)年,从以下各地驻防锡伯兵中抽出备齐:

计:盛京404名、凤城45名、辽阳66名、开原94名、牛庄23名、广宁60名、熊岳51名、复州52名、岫岩38名、金州44名、盖州15名、锦州24名、义州61名、兴京23名、抚顺10名,合计兵丁共1,010名。

带队官:防御、骁骑校各十员。官兵总计共1,020人。家眷3,275口,总共4,295人。由协领阿木呼郎、噶尔赛二员护送。编成两梯队:

第一梯队:防御五员、骁骑校五员、兵丁499名,眷属1,675口,由协领阿木呼郎护送,于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十日起程。

第二梯队:防御五员、骁骑校五员、兵丁501名,眷属1,600口,由协领噶尔赛护送,于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十九日起程。他们出盛京边墙的彰武台门(今辽宁彰武县),走克鲁伦路和蒙古路,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科齐斯山、霍博科赛尔、察汗俄博、珠尔虎珠、巴图鲁克、博罗塔拉等地,历时十七个月。行程万余里。于乾隆三十年(1765)七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先后到达伊犁。

他们自盛京出发前，锡伯族人开了个盛大的欢送会宴。欢送他们到西北国防最前线去保卫祖国的边疆。战士们慷慨激昂，表示义无反顾，更有许多征调以外的锡伯族人，自愿随行。

据乾隆三十年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奏称：

据护送一千名锡伯官兵之协领阿穆呼郎、噶尔赛呈称：“去岁我等前来时，除已入册之人口，沿途陆续新生男女幼童三百五十余名。此外我等于途中查出跟来之闲散四百余名。当即询问伊等，皆答称系官兵之兄弟子女，由原地起程时跟随而来。其中男 247 名，女 158 名。实系起程时跟随而来，并无他故，惟印册内无其名额“等因具结前来。加上沿途新生的及自愿随行的人员，共计去伊犁的锡伯族人总数实为 5,050 人(包括沿途死亡人员在内)。锡伯兵到伊犁后，暂驻绥定(乌哈尔里克)。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将锡伯人安置于伊犁河南岸，巴图蒙克地方，即今查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设一昂吉(军营)，下编六个牛录，其中四个牛录各为领催、披甲一百六十七人，两个牛录各为领催、披甲一百六十六人。昂吉内设有领队大臣、总管、副总管各一员。领队大臣由京城满洲官员中钦派补放，驻惠远城。总管、副总管由伊犁戍守大员中，不论满洲、索伦拣选补放，其办事机构称为“总管档房”。各佐领设佐领、防御、骁骑校各一员，由锡伯兵内拣选补放，其办事机构称“旗下档房”。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又增编两个牛录，共为八个锡伯牛录，分属八个旗籍，旗颜色均照八旗授给：第一牛录镶黄旗、第二牛录正黄旗、第三牛录正白旗、第四牛录征红旗、第五牛录镶白旗、第六牛录镶红旗、第七牛录正蓝旗、第八牛录镶蓝旗。

锡伯营主要驻守伊犁河南的巴图蒙克军台、固尔班托海、安达拉、沙布尔托海、托里、马哈沁布克、春稽、乌里雅苏图、额术讷察汗乌苏、塔木哈、察罕托海、厄楞莫多、哈拉乌苏色奇音(头勒克)、察林多宽等大小十六个卡伦。此外还将派兵去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英吉沙等地换防当差。所派官兵均自备马匹、口粮，每两三年流换一次。

锡伯人落户于今查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地方后，又有携眷迁移往索伦营的。锡伯人首次迁往索北营是嘉庆初年的事。因嘉庆元年(1796)索伦营天花流行，丁壮死亡很多，兵源补充困难。于是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伊犁将军保宁具奏给皇帝，他奏称：

查得，伊犁索伦营人丁孱弱。且有绝子嗣者。此之前挑选披甲之缺时，成年壮丁即不足选。不想去年染天花，该营之闲散与幼丁近四百人受损。今剩余之闲散与幼丁甚少，且均年少，尚未成人。故今挑选披甲时，难以获得壮丁。详审之，索伦营乃一支劲旅，若抽调兵丁，将未成年之幼童选入，或减少兵丁数目，均非可行。臣留意观察，这几年来，锡伯营彙生甚好，可选披甲之幼丁与闲散甚多。索伦、锡伯俱系东三省之人，习俗亦近，若见其足用，挑选锡伯营之闲散幼丁，迁至索伦营作为补充，则可成壮年之良丁，加同索伦，负其责职。臣请由锡伯营中十八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闲散幼丁中，即刻挑选出一百六十户，过至索伦营，视各牛录闲散幼丁数目的多少补分，令其披甲……。(见《朱批奏折》嘉庆二年十月) 嘉庆帝接到保宁的奏折后，立即降旨曰：

今伊犁索伦营长成之闲散幼丁甚少，不足挑选披甲，自应量加调剂，即按保宁所奏办理。(见《军机处上谕档》嘉庆二年十一月) 保宁接到嘉庆帝的批复后，立即着手办理迁移事宜。嘉庆三年(1798)正月二十七日，由伊犁将军传圣旨至锡伯营，令从营内挑选十八至二十三岁间的闲散幼丁一百六十户，准备迁往索伦营。“四月为移送闲散至索伦营事。从民衙雇车一百六十辆，佣银二百四十一两三钱，交与民人，秋后由兵丁俸禄中扣除”。这次迁往索伦营的锡伯人共有“一百六十户，大口五百五十二、小口一百零六，共有六百五十八人”(见《锡伯族史料拾零》锡伯文本 102、103 页)

锡伯人第二次迁往索伦营补充，是道光年间事。索伦营虽于嘉庆三年得到锡伯人口的补充，到道光年间天山南路发生张格尔之乱，伊犁将军先后于道光六年，十年两次调索伦营官兵到喀什噶尔参战，索伦官兵阵亡三百三十多人，同时嘉庆初年索伦营天花造成的后果尚未完全恢复，所以索伦营的力量仍很单薄。故当时的伊犁将军特依顺呆，决定依嘉庆三年旧例充实索伦营。

道光十三年(1883)十一月十七日，上谕内阁；

特依顺保等奏：伊犁索伦营之闲散余丁，俱未成丁，难以续挑马甲，可否照前成案，由锡伯挑选一百户，移居索伦营，以备挑选马甲，请旨一折。伊犁各营兵丁，该将军自应勤加训练，现在索伦部闲散余丁，俱属年幼，难以挑选马甲，著照所请，即由锡伯挑选一百名闲散余丁，并户移居索伦营，以备挑选马甲……。（见《军机处上谕档》道光十三年十一月）

“于道光十四年四月迁往索伦一百户，内大口四百三十八人，小口一百八十六人，共六百二十人”（见《锡伯族历史资料拾零》锡伯文本 104、105 页）

以上两次从锡伯营移往索的锡伯人共二百六十户，一千二百七十九人。据《绥定县志》载：“现在，原来翁瑚鲁索伦只剩一、二家，其余均锡伯营调补之人，至今称索伦为锡伯是也。”

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的“伊车嘎善锡伯族乡”和塔城地区，有二千五百多“锡伯索伦”。就是先后两次从锡伯营移往索伦营的锡伯人的后裔。

新疆在清代是英、土(土耳其)、沙俄交相侵扰的多难地区。驻守在伊犁塔城一带的锡伯族军民为防守祖国的西北大门，作出了过多的，千古不朽的贡献。无论西北发生了什么样的变乱，他们都坚决地赤忠于祖国，赤忠于中华民族。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未尝一日安枕。在新疆的全体锡伯军民，为了保卫祖国大西北，不知流了多少鲜血，牺牲了多少生命财产，因不在本文范围内，不克详述。

他们在生产劳动上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嘉庆七年（1802）他们开凿了“查布查尔大渠”振兴农业。“查布查尔”义为“粮仓”，即今天自治县命名的由来。

乾隆三十三年（1768）二月，征剿缅甸的将军明瑞战死。清政府乃派大学士忠勇公博恒为经略，率北京、荆州、成都、贵州、云南等省的满汉兵员赴云南南部（今西双版纳地区）继续征剿，战士们因“不服水土”，病者增多，战斗力削弱。于是清政府又征调了七千名索伦兵和贵州兵，但仍感不足。于是又征调了福建水师二千名，盛京锡伯兵一千名。

据《清实录》记载：

乾隆三十四年正月辛丑请军机大臣等曰：“征剿缅匪，东三省兵甚属得用，着再传旨盛京将军，于新满洲锡伯兵内拣派年力精壮者一千名，酌量兵数，于城守尉，协领内择其善于弹压者陆续带领来京。其应得之项俱照从前所派一体赏给”。

他们分两队出发：第一队锡伯兵五百名，由乾门侍卫富兴管带；第二队锡伯兵五百名，由前清门侍卫鄂林管带。于乾隆三十五（1770）年二月到云南。锡伯兵的任务是：驻守要塞，保护台站。同年十月征缅战事结束，而四川大小金川又叛。帝命大学士温福从云南率师进讨，锡伯兵又从云南从征两金川。乾隆三十八（1773）年小金川平定，即命锡伯兵复员回盛京。这说明这批赴云南、四川参战的一千名锡伯兵，纯系军队的调遣行动，与携眷开往伊犁久居的一千多锡伯官兵的性质不同。赴伊犁的在民族史上是一次“民族迁移”。赴云南、四川作战，战后又复员回盛京的与民族迁移无关系。赴云南作战的一千锡伯兵，在战

争中牺牲三百多，回到盛京的六百八十名。因当时是胜仗，所以伤亡数目不大。这是锡伯族在国防上，作出的又一次光辉的贡献。

嘉庆二十五(1820)年又由盛京、吉林等地调往双城堡开垦的旗人正丁四千户、副丁一千七百六十四户人口中，有四百九十五户，三千八百九十六名锡伯人。

据 1982 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锡伯人口为 83,629 人，其中辽宁省有 49,380 人，黑龙江省有 2,598 人，吉林省有 1,559 人，内蒙古有 1,474 人，新疆有 27,364 人，北京有 290 人，其他各地有 964 人，与历史上迁移情况相符。

第二十八节 锡伯源出于女真的论证

(其一)《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五第十九页所记的一段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名。向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绰墨尔根之裔，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长，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

汉译《满文旧档》(辽宁大学历史系译印)天聪九年十月十三记的：

(那天)汗说：“我们的国名原来是满洲、哈达、乌拉、辉发。不晓得那个的人叫诸申。叫诸申就与席北的超墨尔根同族了。那与我们有何关系。今后所有的人叫我国本来的满洲名，叫诸申时有罪。

以上这两段史录译的是一回事，因用字造句各有不同，对原满文内容的理解程度也有不同，所以颇有出入。

汉译《满文旧档》天聪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又记曰：

二十四(日)，在大门宣告说：“称国名为满洲。使旗的诸贝勒专有的诸申，叫那(旗)贝勒的诸申”。为让众人记住宣告了。

综观以上这三段史录，清太宗明白的知道满洲族人，锡伯族人都源出于诸申(女真、肃慎)，只是当时“诸申”一词已沦为被奴役阶层女真人的专称，不能再代表女真人的基体了，并彼时已编成的八旗全员，已不单纯是女真人，所以不能再用“女真”(诸申)来称呼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了。而当时锡伯人超·墨尔根的后裔已都沦为科尔沁蒙古的“诸申”了，他们适合仍用“诸申”的称呼，而对八旗人则不能用“诸申”概括了，因之改用“满洲”称号。但对各贝勒专有的诸申，仍用诸申称呼，只是加上旗别。实际上这时皇太极的国家，国号为“金”。(史称后金)，“满洲是编成八旗时所在的地名，旧时的部落名。皇太极当时对“民族名”、“国家名”、“部落名”的概念都是模糊的。我们不能用今人的认识去要求古人。

(其二)《八旗满洲世族通谱》一帙二册记曰：

费英东·扎尔固齐，镶黄旗人，苏完部长索尔果之次子也。国初率五百户来归，太祖喜之，授一等大臣，以女孙妻焉……瓜尔佳氏；瓜尔佳本系地名，因以为姓，其世族甚繁，散居苏完、叶赫、纳殷、哈达、乌拉、安楚拉库、斐悠城。瓦尔喀、嘉木瑚、尼马察、辉发、长白山各地方。

苏完地方瓜尔佳氏：瓜尔佳这满洲著姓，而居苏完者尤著。其先有同胞兄弟三人，长曰佛尔和、次曰尼雅哈齐、三曰珠察。后离居：佛尔和仍

居苏完、尼雅哈齐迁席北、珠察由瓦尔喀再迁西尔希昂阿济合渡口。珠察生素尔达。素尔达生二子；长曰王沙鲁、次日王扎达拉。王扎达拉生莽喀尼。莽喀尼生罗罗墨尔根。罗罗墨尔根生常喀尼墨尔根。常喀尼莫尔根生二子；长曰尼堪、次日索尔果。索尔果为苏完部长，有子十人，其族最盛。

又日本三田村泰勒所著的《清朝前史的研究》第二章《明末清初满氏族的源流》中，列出了苏老部同胞兄弟三人以后到费英东的世系表如下：

日本藤田春元所著《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苏完部条说：“苏完部在伊通州(今吉林省伊通县)东刷烟河(即双阳河，通过今双阳县城中的一条小河，北流入饮马河，入松花江)流域。苏完、刷烟、苏瓦烟等都是满语 Suwayan(黄色)一语的同音异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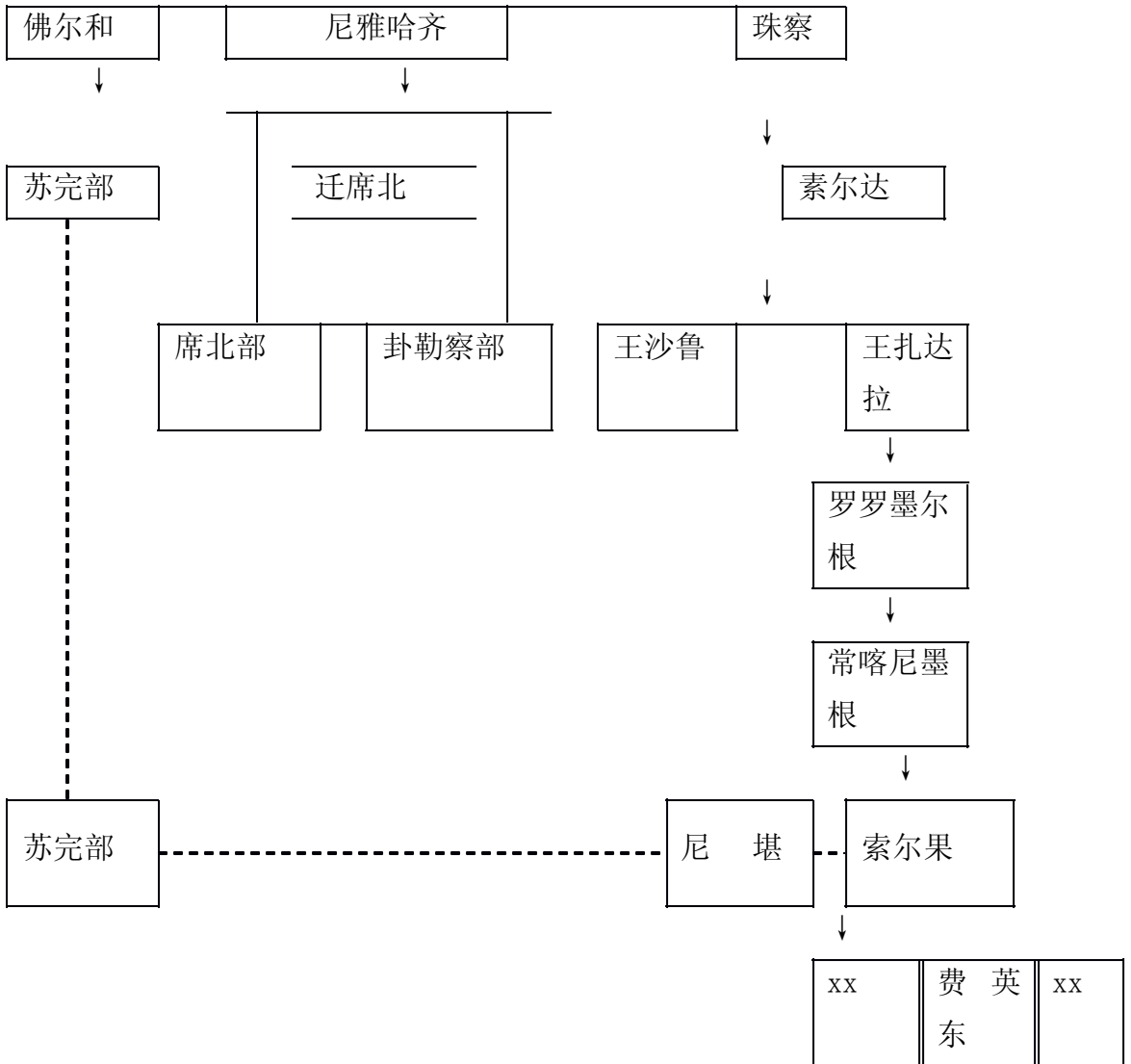
又新宾满族自治县已发现《满州苏完部瓜尔佳氏全族宗谱》谱上说：该部有兄弟三人，原来世居松花江达村苏完沃野。后来长兄仍居原地，老二迁往锡伯地方，老三迁往瓦尔喀尔喀。

又北镇县满族《瓜尔佳氏谱序》说：始祖世居长白山北麓安土瓜尔佳城，后迁广宁县。

又我们大连地区已发现了锡伯部汗家及其后人共二十二代全系统的宗谱。是搜集了许多锡伯族瓜尔佳氏(关姓)的宗谱综合研究而得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老谱”是一部《锡伯瓜尔佳氏被拨往各地驻防兵员名单》(后简称“拨兵单”)细看，才认出正是清太宗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所说的“席北”，起墨尔根关明乙家。“拨兵单”中，包括超·墨尔根之父御玉军汗至其后十四代的世系。其后又参考对照其他瓜尔氏宗谱才得到二十二代的。笔者已根据这部新的最有力的资料，写成《锡伯族源新考》发表于《满族研究》1988年第一季刊上。后来又得知“拨兵单”的原本，保存在金州区石河满族镇的锡伯族人关世玉家。兹将“拨兵单”的原文录入下：

原兄弟三位，在彼处已离散了。伊原驻防在苏苏刷觥河扎汉多宽地

方。



一户另户瓜拉佳氏锡伯奉御玉军汗之子超，莫勒根衔，之子名奇拉浒、巴图鲁衔。之子名达吉伦，都督衔；次子名万，都督衔；三子名占，都督；四子名额尔吉马，都督。

达吉伦之子名卜克蝉，贝勒衔。之子名巴本，贝勒衔。之子名吾巴泰、扎拉胡七，贝勒衔，之长子名卜达力，次子名阿密，莫得七衔；三子名阿力哈，衣特合勒图衔；四子名绰克代升，五子名图门，六子名筹合礼，七子名说色，八子名巴牙拉图。由达吉伦、莫吉伦、卜达力等之子皆为扎兰章京衔。

托合代之长子名吾巴什，次子名丁住等，此户皆拔京都住防。

阿密·莫得七之长子名拉卜代，次子名万，三子名六什，四子名名国什，五子名阿力琿。拉卜代之长子名五十八，次子名厄尔格，三子名恩厄得，四子名库格得。万之长子名万七，次子名克兴厄。六什之子名阿什图。国什之子名塔什图。

此户依伯根，必力克图、必力琿、阿力琿、五十八、厄尔格等子皆拔辽阳正黄旗。阿什图、塔什图、巴牙拉、克兴厄等户皆拔金州厢白旗。

阿力哈·衣特合勒图之子胡思布之长子僧保。次子名占之长子名七力克图、次子名绰拉海、三子名索伦、四子名拉必。奇力克图之长子必力、次子名尼堪；绰拉海之子名法拉太。拉必之子名托格达。三子名阿哈达之长子得拉图。次子那思图之长子蒙古，次子巴力。得拉图之长子衣达马，次子五拉胡莫，三子沙克七。

此户法拉太，衣伯根等子拔盛京镶红旗。

此户得拉图，那思图等子拨盛京镶白旗。绰克代升之长子名那木什，次子名艾岳什，三子名俄奇勒，四子名老蝉。那木什之长子名牛牛，次子名阿拉孙，三子名舒勒虎。艾岳什之子名绰乜贵。俄奇勒之长子名尼堪，次名扎兰布等户之子皆拨辽阳正黄旗。

图们之长子莫合勒、次子绰什西、三子吠拉马，四子诺未七，五子多吉拉，六子都拉麻。莫合勒之长子奈密达力，次子吠拉图，三子巴图。奈密达力之长子拉西，次子撒哈连，三子付卡，四子苏棍，五子衣伯根，六子花山。和拉西之长子衣克莫，次子提拉滚，三子科库。撒哈连之子卡唐伊代。付卡之子吾勒滚吉。衣伯根之长子金保，次子阿拉胡木，三子特布钦。花山之长子达尼，次子达来。吠拉图之长子西达达，次子沙金。沙金之长子厄勒得束，次子阿鲁木，三子浩格，四子卡吉。

吠拉马之子古水得、查克金、张一固、朱恩、阿那达。查克金之子扎木苏、厄勒卜、厄尔登厄。扎木苏之子卡郎开、撒未哈图。张一图之长子苏巴，次子衣车那、之子三七格。朱恩之子舒尔虎。舒尔虎之长子巴代、次子音得布。阿那达之长子托勒合、次子付寿、三子厄尔得厄。托勒合之长子阿曾厄，次子衣增厄，三子赛尚阿，四子三音保，付寿之子衣通保。厄尔得厄之子阿拉太。都拉麻之长子明安达力，次子说海色，三子舒木德、四子西迪、五子西什图、六子说伦、七子厄勒辛、八子衣勒图、九子阿木图。明安达力之长子牛和。牛和之长子阿吉海，次子阿思海，三子塔思海。说海色之子图和莫。西迪之长子厄力七伦。次子五斯会。厄力七伦之子宫保，次子那三太。吾斯会之子元保等户之子续往依力地方。说伦之子厄尔得布。厄尔得布之子隆海。厄勒辛之长子海青阿，次子卡拉哈。海青阿之子付三那、春喜。春喜之子那他。

诺木七之长子吾拉代，次子他喜，三子胡拉图，四子说多，五子说奴代。

多吉勒之子厄勒合，阿图拉孙等户之子拔往盛京厢白旗。

绰和力(筹和礼)之长子他思哈。他思哈之长子艾青、次子外七、三子图遂、四子达班太、五子胡什布、六子阿拉都哈、七子拉卜七、八子阿卜代、次子来青、来青之长子班迪、次子性格、三子胡拉胡、四子阿拉代。

说色之长子麦色。麦色之子来格。次子五楞五。五楞五之子厄格木等户之子都拔辽阳正黄旗：

牛录章京巴牙拉图之长子牛录章京查哈、次子都拉、三子牛录章京必力卡、四子西什、五子阿沙哈、六子胡什图、七子阿三太、八子牛录章京厄伦七。查哈之子苏朱克图。苏朱克图之长子鲁他、次子阿敏、三子阿那朱、四子阿沁拉虎、五子三音、六子文都。鲁他之长子图格勒、次子克必图、三子阿吉木。克必图之长子马尔七该、次子扎该、三子图格莫、四子锤扎巴、五子非羊五、阿吉木之长子阿密灵吾、次子马拉塞、三子托思图、四子阿力拉克孙。

都拉之长子凡七，凡七之子花山，花山之子赛库。次子班吉勒，班吉勒之长子俄巴尔、次子多色，三子阿卡。阿卡之长子沙要、次子必力克。必力克之长子得尔格勒。得尔格勒之长子卜拉、次子说瑞。次子五巴什之长子托多拉海，次子三音、三子家读。三子班迪，班迪之长子伯拉虎、次子三保朱、三子罗格、四子伯拉洪、五子阿吉格尔。四子和拉克，和拉克之长子厄必伦、次子托阿托合、三子郎图。

西什之子撒末代，撒木代之长子克拉卜、次子绰思海。绰思海之子达来，达来之子栓中。

阿卜沙哈之长子沙都勒，沙都勒之子他林。次子音扎那，音扎那之子达拉。三子奇达木厄、四子诺克虎拉图。

胡什图之长子尼堪、次子阿牛、三子衣他拉。衣他拉之长子五拉滚吉、次子扎尔哈马力。口子厄克，厄克之子也尔退。五子衣特根、六子马尼卜、七子年瑞、八子绰尔吉等户之子皆拨盛京镶蓝旗。

阿三太之长子阿兰太，阿兰太之长子乌麦、次子阿力拉虎。次子诺木曾，诺木曾之长子阿卜拉，次子马拉、三子西住、四子罗格。三子扎未拉，扎未拉之长子麻七克固、次子吉他那、三子巴哈那、四子加琿。四子必鲁扎那，必鲁扎那之长子蒙古、次子蒙五拉代。五子扎贵，扎贵之长子扎哈力、次子伯七、三子果力勒。六子衣恩会。

厄伦七之长子来住，来住之长子三音，次子俄多、三子阿必拉虎。次子恩初。三子达克伦，达克伦之长子厄黑、次子旦达力、三子秉图、四子图坤、五子图根。

莫七伦长子厄和力。达克伦莫七伦等户之子都拨辽阳正蓝旗。

阿拉吉麻(奇拉汗四子额尔吉马)都督之子托孟阿贝勒，托孟阿之子托太。

巴克什之子那木什、那木什力。那木什之子达言(注)、图和们。那木什力之子舒尔虎，舒尔虎之子阿力琿、阿拉等户之子皆拨辽阳正白旗。

此照满底抄录，但满底未分辈数，亦未有年月时拨往某外。姓氏未写以直速写下来，遇抄汉清前十数辈分晰等次抄写。嗣后亦照满底连川下来，大约有前十数辈等次，后边亦可看得明白。但要加意细看，方能分出辈数。若不细完者，能得其明确内中名下有许多无有子嗣，亦不知绝世未闻，亦不知是漏写无凭考查。此。

光绪六年二月中旬偶录休晒

(注)巴克什应为托孟阿之子，托太之弟。

以上这部“拔兵单”，原文是向下移字，向左移行，中楷草书，有读无句，阅读颇难。已整理列出此“拔兵单”的全部世系表，因篇幅太大，不便备录，兹仅列一从御五军汗，超·莫勒根至关世玉等二十二代的简单世系表如下，仅供参考。

御玉军汗后世简单世系表

次

御玉军汉

超·莫勒根

奇拉汗、巴图
鲁衔

四子	额尔吉马都督衔	三子	占都督 衔	次子	万都督衔	长子	达吉伦都督 衔
----	---------	----	----------	----	------	----	------------

卜克蝉都督
衔

巴本 都督
衔

扎拉胡七贝勒
衔

图们 (第五子)

吠拉马	(三子)	莫合勒	(长子)
-----	------	-----	------

(三子以下为东岗乡达子营关世明家谱)

张一图

奈密达力 (长子)

三七格 (三子)

花山 (六子)

(以下关世玉家

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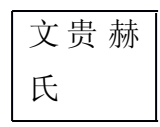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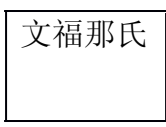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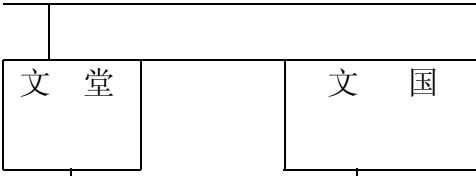
撒伦太

达来	达尼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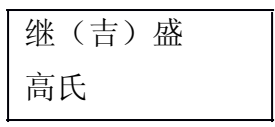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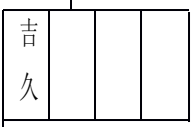
宁保

阿力达土	哈 达	阿巴力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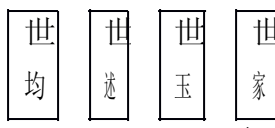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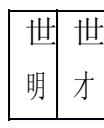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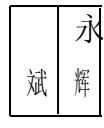
18



19



20



21



22



附记

关氏家谱很多，保存最完好的是关世玉家。“拨兵单原本在关世玉家。关家自15世希字辈始改汉姓，排行范字。花山一支自达来、达尼至关继盛间父子关系不明。

我们综合研究本节以上所举的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满族宗谱、锡伯族宗谱，说的是一回事，一个问题，即今天的锡伯族系出于女真族，其统治者一汗家系出于女真瓜尔佳氏，在苏完兄弟三人分离时的第二支。他们的第一世祖汗尼雅哈齐，御玉军汗，第二世祖是“超·莫勒根”（绰墨尔根）。超，是人名，“拨兵单”中即可看到锡伯人用超、占、万等单名的很多。“莫勒根”或墨尔根，是“善射者，或善猎者”之意，是美称，或绰号。

费英东是清初大名鼎鼎的五大臣之一，史学界尽人皆知。还有一位康熙帝的辅政大臣鳌拜，也是史学界尽人皆知的人物，《清史》都有传。他们都是女真瓜尔佳氏苏完部人，鳌拜是费英东的侄儿。现在不少锡伯人说与费英东同族，是对的，因都是女真瓜尔佳氏苏完部人，当然同是女真族，但不能说同是锡伯族，因费英东不曾到锡伯（溪泊）地方去。

以上这些史料也都能说明御玉军汗与尼雅哈齐同是一人，前者是人名，后者是职称。《八旗满洲世族通谱》中说尼雅哈齐是席北之始祖，在兄弟三人中

排行第二，“拨兵单”中说御玉军汗是锡伯之始祖。新宾《满洲苏完部瓜尔佳氏全族宗谱》里也说兄弟三人中的老二迁居锡伯地方。这些资料都说尼雅哈齐与御玉军汗是同时代、同姓瓜尔佳氏、同是苏完部人、同是兄弟三人中的第二人迁往锡伯者，同是锡伯之祖，这二人是同一个人已无待旁证矣。世界上那有这样巧合的事呢？

但，即使尼雅哈齐不是御玉军汗，并不影响“锡伯族系出于女真瓜尔佳氏苏完部”的结论。单只“拨兵单”开头的几句话，就已完全清楚的说明了问题。“拨兵单”开头说：

原兄弟三人，在彼处已离散了。伊原驻防在苏苏刷觥河扎汉多宽地方。一户另户瓜拉佳氏锡伯，奉御玉军汗之子，名超，莫勒根衔……

这与《八旗满洲世族通谱》一二册中所说的：

瓜尔佳氏为满洲著姓，而居苏完者为尤著，其先有同胞兄弟三人，长曰佛尔和、次曰尼雅哈齐、三曰珠察。后离居，佛尔和仍居苏完，尼雅哈齐迁席北……

新宾满族自治县发现的《满洲苏完部瓜尔佳氏全藏宗谱》上所说的：

该部有兄弟三人，原来世居松花江达村苏完沃野，后来长兄仍居原地，老二迁往锡伯地方……

三部史料说的完全是一回事。“刷觐”即刷烟，即苏瓦烟，即双阳，我们已到双阳县去证实了这一问题。“瓜拉佳”即“瓜尔佳”。这些都是“锡伯族系出于女真服尔佳氏苏完部”的铁证。

(其三)《乃济陀音二世传》(载《满族研究参考资料》3、辽宁民族研究所1984年印)第四章“奉命出使”中所记的：同年(乾隆三十年)辛未年仲夏之月，皇上遣使臣召喇嘛活佛(乃济陀音二世)至宫中，接见并降旨道：“科尔沁十旗乃是你的檀越，也了朕的舅家，那里有我们满洲人的锡伯、呼勒沁部落，你去把锡伯、呼勒沁人请来，朕欲赐其诺颜，把他们招收过来。”于是，活佛奉命前往，途中所需差役、食粮，全由府库颁赏。活佛率领明噶塔尔·阿里哈达等近十名都统大臣，取道山海关而来，事先遣使致书于科尔沁诸王，书称：“我是托音呼图克图，钦奉圣谕，因事前往科尔沁十旗各地，望你们扎萨克·和硕卓力克图亲王·巴扎尔属下所有王、贝勒、贝子、公、额驸们、台吉官员全部到会”。

使者奉书到达之后，土谢图王额驸萨欣·达尔罕亲王班弟，原亲王阿喇善、扎萨克图王乌尔固·纳素图·鄂齐尔，宾图王达吉布，郡王袋布，郡王毕里克图，贝勒巴克什固尔，贝勒阿必达等全体科尔沁的诺颜、官员们，谨遵上命，齐集于卓力克图亲王府外。

喇嘛活佛与都统大臣们一道途经土默特的查干禅师之禅院，在此逗留了三日，禅师设宴欢迎，并进献大量供品，土默特二旗的僧众、官民数万人集会，叩拜三日……

却说活佛一行来到卓里克图亲王巴扎尔处，向科尔沁的全体王公、诺颜们传达了皇上的圣谕，讲明了自己担任请愿使者，奉命前来的目的。科尔沁的七位王爷、二位贝勒、二位贝子、四位公爷等，共计一千多名王公、诺颜、官员一致表示：“我们都是圣主的臣民奴仆，我们的属民锡伯、呼勒沁同样也是圣主的百姓。尽管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把他们交给圣主，但是从我们的祖父直到今天，为活佛效忠，生而尽力，死而结草。如今活佛喇嘛奉使前来向我们恳求，我们一定照办。一来满足圣主的心愿，二来也是喇嘛和我们的荣誉，况且还有益于禅教与生灵的利益，有益于我们的声名”。于是，通过商议，王公诺颜们将所属大约一百个苏木的锡伯、呼勒沁(挂勒察)人全部献出来了。……

却说活佛完成使命，返回北京时，上报部院。部院上奏圣主，圣主令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活佛。活佛入宫，向圣主叩安，并奏报圣主，已征收锡伯、呼勒沁男丁一万多名。圣主听毕，龙颜大悦，设宴款待，并令活佛入大内府库参观。活佛得到他所喜欢的一对白瓷酒壶，酒壶外嵌金银，壶内各插一枝纯珊瑚树，都有一尺多高……天子赐给他金刚铃等大量赏品。还颁给他一百零八张僧侣度牒。对于科尔沁王公、台吉、官员，按锡伯、呼勒沁男丁数，每人各赏白银八十两。

这段史录是康熙帝由科尔沁赎出锡伯、卦勒察人的内幕。文中康熙帝明言锡伯、卦勒察是满洲人。赎回的动机也是因为锡伯、卦勒察是满洲人，与皇帝同族，当然不应再役属于科尔沁人。科尔沁人、锡伯人、卦勒察人对此也都没有别的说法。可见彼时康熙帝、科尔沁王公们、锡伯、卦勒察人们，对锡伯族源的认识都是很清楚的、正确的。

另外《满洲源流考》中，记有太宗诏谕嫩江一带的锡伯人时说：“我与尔之先世，本是同源”。又杨宾的《柳边纪略》中，也记述锡伯与满洲同源，其原文如下：

席北(锡伯)一作西北,又作席北,在船厂边外西南(应为“西北”)五百余里,土著(指锡伯人)自言与满洲同祖,而役属于蒙古之科尔沁。凡自船厂往墨尔根、瑗浑、黑龙江者,由此。天聪八年十一月,霸奇兰等征黑龙江,命由国舅吴克善所属之席北绰尔门地方经过,则为东北冲途久矣。特以地属外藩,会行劫夺。行旅每视为畏途耳。

按杨宾的《柳边纪略》是他在康熙二十八、二十九两年间,往宁古塔(今宁安县)省亲时将其亲自见闻。编集成书。彼时国人对锡伯族源也无争论。杨宾对此也无何个人成见,只是反映客观现实罢了。

由本(二十八)节例举的一系列史录看,清初国人对锡伯人系出于女真瓜尔佳氏苏完部的史实,是非常清楚的。再加上今天继续发现的瓜尔佳氏宗谱的证实,则“锡伯汗室系出于女真瓜尔佳氏苏完部”是千真万确的。

今之异端学说起自何秋涛。何在《朔方备乘》卷十七“锡伯利路疆域考叙”条中说:

臣秋涛谨按:锡伯利路,本鲜卑旧壤,故有锡伯之名。……据此如鲜卑音近锡伯,今黑龙江境,有锡伯一种,亦作席伯,亦作席北,既非索伦,亦非蒙古,即鲜卑遗民。

何秋涛完全出于个人臆测,竟作出“锡伯即鲜卑遗民”的错误结论。其后即有不少史学者步其后尘。为“锡伯系出于鲜卑”找出不少牵强附会的理由,混乱了后学者的视听。他们无视以上所举的真实史录。或徇于成见,虽见之,

也不肯深研。当然他们根本就没见到新宾满族自治县新发现的《满洲苏完部瓜尔佳氏全藏宗谱》和大连市新发现的《锡伯族瓜尔佳氏被拨往各地驻防兵员名单》。如果见到了这两件价值连城的新发现，则异端奇说自然息灭矣。

用“锡伯”与“鲜卑”音相近似，去推论锡伯就是鲜卑，实在有欠慎重。研究民族的源流必须从史实上去找线索，绝不能从音相近似上去找根据。在我国古往今来的少数民族中，非但音相近似的不一定是同一民族。就是名全同的也不一定是一个民族。例如科尔沁蒙古中有一个“杜尔伯特”部，准噶尔蒙古中也有“杜尔伯特”部，她们还都是蒙古人。但他们却根本没有父子祖孙的系统关系。又内蒙古有个奈曼(乃蛮)(元太祖创业时，击败的部落中也有个乃蛮部)部。这两个乃蛮之间却根本没有什么父子祖孙的系统关系。在这里正是“杜尔伯特，不是杜尔伯特，乃蛮不是乃蛮”。诸如此类的例子在民族史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何秋涛用音相似去推论族源，实近荒唐。故戏为一诗曰：史事流传非不真，稗官野史乱翻新。舍却史实求音近，鲜冠锡戴误后人。

第八章 蒙古巴尔虎旗人源流

(本章采用辽师大都兴智老师原稿略有变动)

巴尔虎系清初喀尔蒙古的属部。自康熙年间开始，部份巴尔虎人先后分批从外蒙南迁，被政府编入八旗，分驻黑龙江、吉林、盛京等地，至今他们的后裔多数仍聚居在原驻防域附近，本文拟对其源流略作考察。

第二十九节 巴尔虎族发祥地与族源

巴尔虎在不同文献上亦记作“八儿忽”、“八刺忽”、“巴尔浑”、“巴尔呼”、“巴儿忽惕”、“巴儿呼”、“巴勒瑚”等，是构成元代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古老部落之一。“巴尔虎本地名”，因以名其族^①。巴尔虎人最早的故乡在今苏联境内贝加尔湖东岸的巴古津河流域。元代巴尔古津河称巴尔忽真水，巴尔虎部因水得名，称巴尔忽惕部。

金末，今色楞格河下游以东、贝加尔湖沿岸之地被称作巴尔忽真脱窟木地区。据拉斯特记载，住在这一地区的有巴尔忽惕、豁里、秃刺三部，另外，住在乞儿吉思人附近的秃马惕部也是巴尔忽惕人的分支^②。狭意的巴尔忽惕人是指巴尔忽惕部，而广意则包括了以上四部。有的苏联学者认为，“布里亚特”就是巴尔忽惕的音变，现在的布里亚特人的名称和古时的巴尔忽惕是一回事^③。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布里亚特应即《蒙古秘史》中的“不里牙惕”，也是一个古老的部落名称，它属于贝加尔湖附近的森林部落。《蒙古秘史》卷10：“卯年(1207年)，命拙赤将右手军，征森林百姓。……拙赤受斡亦刺惕、不里牙惕、巴乐浑、兀儿速惕、合卜合纳思、康合思、秃巴斯等之降。”可见当时不里牙惕与巴尔浑不是一个部落。后来由于部落的重新分化组合，到17世纪初，布里亚特形成了较大的部落联盟，其中也包括了巴尔虎部，俄国人把他们统称为布里亚特人。但在中国的文献中仍称之为巴尔虎人，所以有的苏联学者又称他们是“巴尔虎布里亚特人”^④。

巴尔虎原是一个游牧部落，金朝末年，其驻牧地与蒙古乞颜部、泰赤兀惕部、蔑儿乞部相邻。蔑儿乞部长脱黑脱阿被铁木真战败后，“顺薛凉格河(色楞格河)而下，入巴尔忽真之地”^⑤。巴尔虎部与乞颜部联系密切。据传说，铁木真九世祖蔑年士敦幼子纳真为八刺忽民家赘婿，其母莫伦与诸兄在与札刺

儿部冲突中被祸，纳真收养其侄海都，后率八刺忽怯谷诸民共立海都为汗，重振乞颜部^⑥。铁木真祖父把儿坛把阿秃儿的长妻也是巴尔忽惕部人，巴尔忽惕与乞颜部“互相嫁娶姑娘”^⑦。当时巴尔忽惕部的活动范围大体上北起今巴尔古津河流域和维季姆河上游，东到雅布洛诺夫山西麓，南到大肯特山和鄂嫩河上游一带，西止贝加尔湖和色楞格河下游。

巴尔虎在唐代时称拔野古，构成该部的主体应是古代活动在贝加尔湖沿岸的丁令、铁勒的后裔。后来由于草原上不同族系之间长期交往和频繁迁徙，又融进了一部分其它族系的血液。如迁居呼伦贝尔的陈巴尔虎人中有呼尔拉特氏，达呼尔族亦有此姓。还有富察氏，显然是个女真姓。这说明到了清代，巴尔虎人中还包涵了部分东胡和肃慎族系的后裔。

第三十节 巴尔虎人的南迁

巴尔虎在元代直辖于中书省太仆寺，明初归努尔干都司属下的乞塔河卫（治今苏联赤塔）管辖，明末清初由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统领，其活动范围逐渐南移。康熙二十一年（1682），“以（车臣汗）所属巴尔呼人私拣鸟珠穆沁部界，议增汛兵严防御”^⑧。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上谕大学士等曰：今闻外藩蒙古出汛界哨地，有侵害抢掠喀尔喀之巴尔呼等蒙古者甚多，以后著严行禁止”^⑨。这说明当时有部分巴尔虎人已移牧到内外蒙交界处附近。据清臣马喇等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奏称：“喀尔喀巴尔虎人时贩牲畜等物至尼布潮（尼布楚），尼布潮人亦捕貂与之交易，得以生存”¹⁰。与尼布楚进行互市为巴尔虎人当时是车臣汗诺尔布的属部，其驻牧地距尼布楚、唯克萨较近。清军往征雅克萨，“诏诺尔布饬所属绝市”¹¹。

据史料记载，清初巴尔虎人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部落统属于喀尔喀，而是分属于不同的外蒙王公部下，其多数隶车臣汗部各旗，少数属土谢图汗部。这

种局面的出现是与沙俄侵入后贝加尔及在这一地区与外蒙势力的争夺直接有关。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末，沙俄的侵略魔爪伸向了后贝加尔。1648年，在巴尔古津河口建立了侵略据点，到五、六十年代，又先后建立了尔琴斯克（尼布楚）、色楞格等几个据点，对当地的布里亚特人和蒙古人进行残酷地镇压，强迫他们臣附沙俄，交纳赋税，激起了布里亚特各部的反抗，他们不断地举行武装起义和集体逃亡。使“那些土地完全变成了无人区”¹²。1658年，整个贝加尔地区的布里亚特人举行大起义，他们“带着财产，赶着牲畜，逃亡到蒙喀尔（即蒙古）人那边去了”¹³。外蒙各部对沙俄的入侵进行过不同形式的斗争。1667年，土谢图汗在清廷授意下遣使至莫斯科进行交涉，沙俄不理，因而于1668年出兵进攻前贝加尔的巴尔干斯克等沙俄据点。1669年又袭击尔琴斯克，夺回了一部分布里亚特人和鄂温克人。1687年大举进攻色楞琴斯克，翌年，由于准噶尔部的东侵，才被迫撤兵。由于上述原因，巴尔虎人先后分批移牧喀尔喀界内。因其原驻牧地邻近车臣汗部。又受其领辖，故该部收纳的巴尔虎人较多。

关于巴尔虎人最早迁移外蒙的具体时间，《钦定外藩蒙古四部王公表传》卷58载：“康熙三十四年，额尔克阿海子锡喇布以罕笃诱夺所属瑚尔拉特等众诉于朝。遭官往鞠，罕笃诡言，车臣汗硕垒尝以瑚尔拉特人畀其祖噶尔玛，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犹识之。询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则云畀额尔克阿海，不闻畀噶尔玛。”这里所说的“瑚尔拉特”即陈巴尔虎的呼尔拉特氏。车臣汗硕垒自1635年始通贡于后金，1655年卒，这说明陈巴尔虎呼尔拉特氏之归该部是在1655年（顺治十二）以前，与上述沙俄侵吞贝加尔，同蒙古在该地区争夺的时间大体是相符合的。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领主噶尔丹去击溃了喀尔喀三部,巴尔虎人亦各随所部领主南移内蒙,有的则乘乱北逃。三十年多伦会盟,康熙将外蒙三部重新编为三十七旗。三十六年“昭莫多”之役后,三部之众重返原驻牧地。在此期间,部分巴尔虎人或在辗转迁移过程中与原领主脱离,或因其它缘故被清政府编入八旗,先后被派往盛京、吉林、齐齐哈尔、墨尔根、布特哈、察哈尔等地驻防,部分巴尔虎人又随原领主返回漠北。雍正年间又先后从布特哈和外蒙车臣汗部调来二批巴尔虎人驻防呼伦贝尔。以后各驻防城的巴尔虎兵员虽稍有增减,但他们的绝大多数及其家族都居住在原驻防城的周围,世代繁衍生息至今。

巴尔虎人的成份也较复杂,迁居齐齐哈尔和呼伦冠尔的巴尔虎人就有新、陈之分,二者最明显的区别是“陈巴尔虎”俗不敬喇嘛,“而新巴尔虎”俗敬喇嘛,托命与佛,与陈尔虎相水火云¹⁴。

第三十一节 盛京地区的巴尔虎旗人

据档案资料记载,康熙三十一年(1692),盛京地区拨来巴尔虎人5000余口,其中壮丁1273名,编为10佐领。驻盛京3佐领,开原、辽阳、熊岳、复州、金州、岫岩、凤凰城等7城各驻一佐领15。每佐领甲兵55名,十佐领共553名,余为附丁,均属干上三旗一满洲旗分,但各城巴尔虎人均单设旗衙门,俗称第九旗。当年迁到盛京地区的巴尔虎人多以巴尔虎三字命名新居地。现已掌握的材料证明:开原巴尔虎人后裔主要居住在今开原县金沟子乡巴尔虎营子村;辽阳巴尔虎后裔住今辽阳城南达子营和首山达子营两处;复州巴尔虎后裔居今复州城北双山村(赫家营子)和城西的东、西巴尔虎村。有康、寇、赫、韩、卜五姓;金州巴尔虎后裔居今金州城西北七顶山满族乡,有车、白等姓;岫岩巴尔虎后裔居今庄河县吴炉乡巴尔虎营子、太平岭满族乡土城子村和岫岩县的“巴尔虎胡同”等地,有寇、白、石三姓;凤凰城巴尔虎人初驻今凤城县城东南蒙古营子,后移居城西南,有敖、吴、马、何等11姓。

盛京地区的巴尔虎人原属外蒙哪个王公部下。从何处迁来?在大连地区发现的巴尔虎后裔赫姓先祖碑和《巴尔虎本源考》(手抄本)一书提供了线索。碑文记:

“巴尔虎系驻防，原籍卡勒卡四部落七旗。男女共五千余口，壮丁一千二百七十三名，移之奉天、辽阳以西。……由奉天将军奏请，领其披甲，于康熙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奉圣旨，依议著塔旺札布袭为二等佐领，额尔得尼代清、卡勒唐袭佐领，钦此。着百丁作一佐领，每佐领领催、兵五十五名，余下作为上三旗兼管。由此中选其堪挑佐领者，拟以正陪奉请引见，编为十佐领，拔往复州、熊岳、辽阳、开原、岫岩、凤凰城、金州各一佐领，奉天三佐领”。

从文体和内容看，碑文很可能是摘自《上谕八旗》或《上谕旗务议复》之类的文献。其中提到的三个人名均见诸《巴尔虎本源考》“洪阔尔代清之子塔旺札布、孀居媳妇乌巴里、额尔得尼代清附控，原来卡勒卡巴尔虎等，均系管辖之人，均将我们编为佐领等语。达寨桑之妻附控，祈将我家世使七十名丁出佐领贡给主子，如是著我幼子卡勒唐袭替佐领等语。“由此知塔札布为洪阔尔代清之子，卡勒唐系达寨桑之子。

洪阔尔代清即《清圣祖实录》中的“洪俄尔岱青”，《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作“洪俄尔戴青”，车臣汗硕垒之孙。达赛寨桑即“达赖宰桑”，原属洪俄尔岱青部下。洪俄尔岱青是车臣汗部被噶尔丹击溃后最早归附清朝的外蒙王公之一，该部原驻牧克鲁伦河南木垒和硕玛塔特之地。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诱执洪俄尔岱青属达赖宰桑，授之檄，令还诱其主，洪俄尔岱青弗从，遣使

乞内附。会上幸塞外，驻蹕红川，洪俄尔岱青率众来归。”¹⁶。因洪俄尔岱青之母在雅克萨战役中曾以牛马军粮资清军，洪俄尔岱青归附又在诸部之先，故康熙皇帝慰勉有加。“二十八年，授礼萨克，谕辑所属溃散者。二十九年，以巴尔呼人肆劫，命尚书阿喇尼往辑，擒其首，询知洪俄尔岱青及达赖宰桑为噶尔丹所掠，不获归，洪俄尔岱青兄子罕笃代领其众。”¹⁷。可知二人被掠后，妻、子难以约束部众，溃散星落，属下的巴尔虎人乘机肆劫，后被阿喇尼制服。据《凤城县志》和凤城县巴尔虎后裔《敖奇勒氏家谱》记载，这部分巴尔虎人曾被清政府安置在张家口外的内蒙地区游牧，后因生计艰难，才拔往盛京，编为佐领分驻各城。

盛京地区的巴尔虎人被编入上三旗，其中盛京镶黄、正黄、正白旗各一佐领(正白为世管佐领)；开原、复州、岫岩为镶黄旗(开原系世管佐领)；凤凰城、熊岳为正黄旗；辽阳、金州为正白旗¹⁸。盛京三佐领归蒙古协领统辖。其余隶属各城城守尉或副都统。盛京地区的巴尔虎人都崇信佛教，他们的后裔有的至今还在居室的西墙供奉佛像，故应属“新巴尔虎人”。

第三十二节 吉林、黑龙江地区的巴尔虎旗人

《盛京通志》、《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八旗通志》、《吉林通志》等文献均记载，康熙三十一年吉林兀拉驻防增设喀尔喀巴尔虎兵400名，编为八佐领，其中有世管佐领二，设蒙古协领一员以辖之。至雍正四年，裁巴尔虎佐领、骁骑校各一员，兵65名，还有七佐领。由此知驻防吉林乌拉城的巴尔虎佐领编制与盛京巴尔虎佐领是相同的，他们编旗的时间应是同时的，清代吉林兀拉城东门称巴尔虎门，即与驻防的巴尔虎兵有关。至于他们的来历，萨英额《吉林外记》卷3：“巴尔虎，台吉阿玉喜之属下人。阿玉喜家谱内，初编佐领阿玉喜之侄绰斯克，为巴尔虎佐领可证也。”阿玉喜，又作阿玉什，《清圣祖实录》卷155作阿玉玺，系土谢图汗部台吉，后有功清室，封辅国公。

黑龙江地区最早设立巴尔虎佐领的时间略晚于盛京和吉林。《盛京通志》卷52：“齐齐哈尔驻防，康熙三十三年，增设巴尔虎佐领四员”。关于这四佐领巴尔虎人的来历，《清圣祖实录》卷164记：“康熙三十三年八月甲辰，理藩院题喀尔喀台吉恭额萨木频等进献巴尔虎二百四十余丁，应编为四佐领，从之。“从时间看，齐齐哈尔的四佐领巴尔虎应即上述蒙古诸台吉进献的240余丁。这部分巴尔虎人原属哪个蒙古王公？《蒙古游牧记》卷9记，车臣汗乌默客三从叔父额尔克台吉车布登，康熙二十七年率部归清，三十三年卒，其子旺札苗袭爵。

“时所属巴尔呼人散居兴安岭后霍功乌勒辉，纠众肆劫。旺札勒幼，母博第苏克遣台吉往辑之，不克，具以闻。命黑龙江将军就近招抚之。巴尔呼凡数种，有称齐巴齐鲁特者，其塔布囊等，避噶尔丹，携六百户奔附札萨克阿哩雅所，而留五百户于呼伦贝尔之鸟棱地，无所依，谕旺札勒白其母收之。“当时旺札勒属下的巴尔虎人溃散，清廷命外蒙王公们协助追缉，台吉恭额萨木频等向理藩院所献的240余丁应是旺札勒部下的巴尔虎逃众。

《黑龙江志稿》卷26，齐齐哈尔驻防沿革：康熙三十三年，增设巴尔虎佐领，骁骑校各四人。……四十五年，调墨尔根城巴尔虎兵二百四十名移札齐齐哈尔”。《墨尔根城驻防沿革》：“康熙四十年，增设协领三人，巴尔虎兵二百四十名。四十五年，移去巴尔虎兵二百四十名驻齐齐哈尔”。我认为墨尔根城康熙四十年增设的240名巴尔虎兵应即康熙三十三年齐齐哈尔所设的四佐领巴尔虎人。因为第一，二者兵员人数相同，不会是偶合；第二，康熙四十五年

墨尔根的巴尔虎兵迁齐齐哈尔后，该城的巴尔虎兵员仍为四佐领240名¹⁹。如果是两部分人，那么齐齐哈尔原设的四佐领巴尔虎人哪里去了呢！

《黑龙江外记》卷3：“巴尔呼亦作巴尔虎，亦有新旧之别。在齐齐哈尔者，旧巴尔呼也；在呼伦贝尔者，新旧巴尔呼相间，而新者盛也。”这说明旺札勒属下的巴尔虎人当系陈巴尔虎。

第三十三章 呼伦贝尔地区的巴尔虎旗人

关于呼伦贝尔陈巴尔虎人的来历，《黑龙江志稿》和《呼伦贝尔志略》均记载：“以戍边闯入俄境，清康熙时征俄，遂自俄境来归，编入八旗，附打牲部之后。先后驻防黑龙江、齐齐哈尔各城。此族昔在木兰围场游牧，后迁至兴安岭北迤东一带。雍正十年，由布特哈迁驻呼伦兵数为二百七十名，编制索伦八旗以内（今两旗分立）”。康熙征俄，自俄境来归之说恐不确。因齐齐哈尔的陈巴尔虎人并不是康熙征俄时“自俄境来归”已如前述。“昔在木兰围场游牧，后迁至兴安岭北迤东一带”应指的是旺札勒部下的巴尔虎人在兴安岭后霍勒乌勒辉纠众劫掠事。车布登归清后，该部被安置在木兰围场（今河北围场）一带游牧，车布登卒，其妻、子不能约束部众，如前述有部分巴尔虎人逃至兴安岭后，清廷命黑龙江将军就近招抚。因此，附于布特哈打牲部之后的陈巴尔虎人也应为旺札勒的部属，其编旗时间不能早于康熙三十三年。

呼伦见尔的新巴尔虎人，上引两书记：“又有新巴尔虎，昔在外兴安岭北麓游牧，嘉庆间渐向南移，遂成部落。因语言与陈巴虎相通，新编入旗，故习新巴尔虎。迁至呼伦者，在雍正十二年，由外蒙车臣汗移来兵二千四百八十四名，编为八旗，在伊敏河两岸游牧”。这种说法更加含混不清。既然雍正十二年就迁来2400多人编旗，怎会嘉庆年间才由外兴安岭北渐向南移、遂成部落呢！二书编者显然是混淆了时间概念。

新巴尔虎人之迁呼伦贝尔，是和雍正年间车臣汗各旗属下的巴尔虎人叛逃事件直接有关。雍正八年，额尔克台吉车布登从兄弟、阿南达之孙延楚布多尔济和车臣汗乌默客再从兄弟沙克杜尔札布旗下的巴尔虎人联合逃往俄境，被遣返后再次叛逃²⁰。雍正十年，清军击准噶尔部于额尔德尼昭，车臣汗部骚动，又发生了多起叛逃事件。沙克杜尔札布之子根木丕勒属下蒙古、巴尔虎人叛逃俄罗斯，该旗只剩兵丁 30 余名。为此，理藩院驻蒙官员照会俄方，要求按《尼布楚条约》有关规定将逃人遣返，同时派尚书查克丹率兵追缉。成褒札布（车臣汗硕垒曾孙）旗下“巴尔呼八佐领人叛窜俄罗斯，成褒札布率兵随尚书查克丹追擒之，无脱者”²¹。雍正十一年，“车臣汗部辅国公格埒克巴木丕勒（硕垒五世孙）以所属巴尔呼人由塔尔巴哈台遁俄罗斯，驰击之”²²。雍正十二年，阿南达曾孙旺舒克达尔札“以同族札萨克台吉沙克都尔札布属图济格等煽动齐布齐格特人遁俄罗斯且肆劫，命随尚书查克率丹兵缉之，无脱者”²³。清政府为了防止巴尔虎人逃亡，加强黑龙江地区的防卫力量，决定于呼伦贝尔之地构筑城堡，先从布特哈拨索伦、陈巴尔虎兵共 3000 名驻防该城²⁴。然后又派理藩院郎中依特格尔“带颜楚布多尔济等属下巴尔虎人等，去看安置于呼伦贝尔之索伦巴尔虎等生活状况”²⁵。先将部分已追回的巴尔虎逃众迁到该处。经我方多次交涉，雍正十二年十月四日，俄方将逃入俄境的原属根木丕勒旗下部众 263 户（1140 余口）由集尔浑卡伦逐回，交给查克丹。同时，原属颜楚布多尔济旗下的逃众 394 户（1570 余口）也自动由伊玛尔呼卡伦返回中国。被遣返的逃众也混有非巴尔虎的蒙古人，故“其中倘有喀尔喀蒙古人，则交各该旗严加管束，倘有巴尔虎人，则照各札萨克前呈请之例，应将之安置于呼伦贝尔地方。”²⁶查克丹将巴尔虎人先迁至墨尔根哈玛地方（在呼伦及尔城西），交给驻当地总管索伦、巴尔虎大臣永福，进行编旗和具体安置。

巴尔虎人迁居呼伦后，其中少数人曾于乾隆七年随索伦人拔往布特哈，多数仍驻原地。后以陈巴尔虎人为主体的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人则组成新巴尔虎左、右二旗，名称沿袭至今。据《呼伦贝尔志略》记：陈巴尔虎姓氏有呼尔拉特氏、齐布齐诺特氏（新巴尔虎亦有此姓，该姓人世居巴尔古地方）、乌里雅特氏、鄂里木苏氏、李佳氏、胡佳氏、富察氏；新巴尔虎有哈勒斌氏、吉克忠氏、永台布氏、奎车里克氏、康锦氏等。

第三十四节 其他地区的巴尔虎族人

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巴尔虎人在明代末清初百余年的时间里颠沛流离、频繁迁徙，后来竟成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居民。除上述迁居东三省、内蒙东部的呼伦贝尔地区外，其它巴尔虎人大致有以下几个去向：

（一）编入察哈尔和京师八旗中。

雍正四年，一个从俄国逃回来的蒙古人向蒙古郡王丹津多尔济报告说，他听俄国人在交谈中谈到“欲索取托伦诺雅特、八旗察哈尔所属之巴尔虎等”²⁷。《清世宗实录》卷120，雍正十年六月，军机大臣奏称：“今察哈巴尔虎生蒙古壮丁一千四、五百名，弓箭可观，人丁健壮，连各处觅食人丁，共二千有余。请将此人丁编设十九佐领，合之旧有八十一佐领，共成一百。……从之”。毫无疑问，察哈尔八旗中的巴尔虎人也应是康熙年间迁来的。

《清世宗实录》卷114，雍正十年正月：“谕大学士等，穆垒驻兵一事，最关紧要。……前京师派往之骁勇兵一百名、巴余虎兵一百名、额驸阿保属下兵丁五百名，俱著派去。”知当时京师八旗中亦有巴尔虎人。

（二）留居外蒙

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命明素克偕员外郎常禄赴噶尔达台河，收贝勒旺札勒旧属齐巴齐努特百余户”²⁸。明素克系诺尔布之子，“齐巴齐努特”即巴尔虎齐布齐诺特氏。明素克之孙德木楚克于乾隆十三年袭爵。二

十一年，属下巴尔虎人又叛，大肆劫掠。二十二年，德木楚克“侦贼什第等窜呼伦贝尔之西墨尔根哈玛尔，偕同郡亲王巴雅尔什第等掩擒之，叙功加一级”²⁹。这部分巴尔虎人既称是旺札勒的旧属，当为陈巴尔虎人。颜楚布多尔济旗下的巴尔虎人除迁往呼伦外，余仍隶该旗。乾隆二十一年，所属齐木齐格特（即齐巴齐诺特）人肆劫，颜楚布多尔济不能缉，乞避居巴噶部界。诏喀喇沁贝子湖图灵阿会郡王德木楚克等严缉之”³⁰。这部分巴尔虎人居住在靠近呼伦贝尔的牙蒙地区。

以上所述及其它外蒙王公旗下的巴尔虎人后裔绝大部分都融合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蒙古旗之中。

（三）流入俄境。

1688年，噶尔丹击溃外蒙各部时，就有部分巴尔虎人被迫流亡俄境。《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外蒙的巴尔虎人多次叛逃俄国，俄方虽根据条约中双方不准容留对方逃人的规定，将其多数遣返，但有时也故意寻找各种借口对少数叛逃者予以庇护。如康熙三十四年，旺札勒属下鄂勒巴图尔宰桑所率的一佐领巴尔虎人因避噶尔丹而流入俄境，后来又陆续收留到俄境省亲的巴尔虎共40多人，中方虽多次交涉，俄国仍不予理会；³¹。康熙六十年八月，车臣汗部辅国公格勒克巴木丕尔旗下塔布囊班丹等率巴尔虎761人叛逃俄罗斯，理藩院多次向俄人催索，俄方以入档册为借口，只将其中26人选回，其余留居俄国³²。流入俄境的巴尔虎人后来都融进了俄国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之中。

（四）融入厄鲁特部成或其它民族之中。

准部在进攻喀尔部过程中就掳掠了部分巴尔虎人，如康熙二十九年，与洪俄尔岱青、达赖宰桑同时被掠的部众中就有巴赉虎人。康熙三十四

年，一个厄鲁特降人供称：噶尔丹于是年八月至克鲁伦河源屯聚，派兵3000人：掠喀尔喀纳木札尔陀音及巴尔虎等”³³。被厄鲁特所掠的巴尔虎人后来即融入该部。

康熙五十三年，达斡尔霍托克甲喇那苏尔图牛录人鲁尔吉梅向理藩院申控：“我家巴尔虎男人厄林辰及其妻哈尔达克、女儿厄特吉曾携马四匹、弓箭一副出逃”³⁴。后知其逃至尼布楚，黑龙江将军扬福行文尼布楚守城官，要求遣还。这户巴尔虎人显系鲁尔吉梅的家庭奴隶，说明在达斡人当中也有巴尔虎，后来当融入达斡族之中。

本章注文

①《黑龙江志稿》卷11。

②《史集》一卷一分册198~200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

③《布里亚特蒙古史。选译》，《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辑。

④苏K·B·维亚特金娜《布里亚特人》《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十辑。

⑤《蒙古秘史》卷3。

⑥《元史》卷1，太祖纪。

⑦《史集》一卷一分册200页。

⑧《钦定外藩蒙古四都王公表传》卷45。

⑨《圣祖仁皇帝圣谕》卷67。

10《东北边防辑要》卷下，征罗刹。

11《钦定外藩蒙古四部王公表传》卷54。

1213《布里亚特蒙古史(选译)》，《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十辑。

14《呼伦贝尔志略·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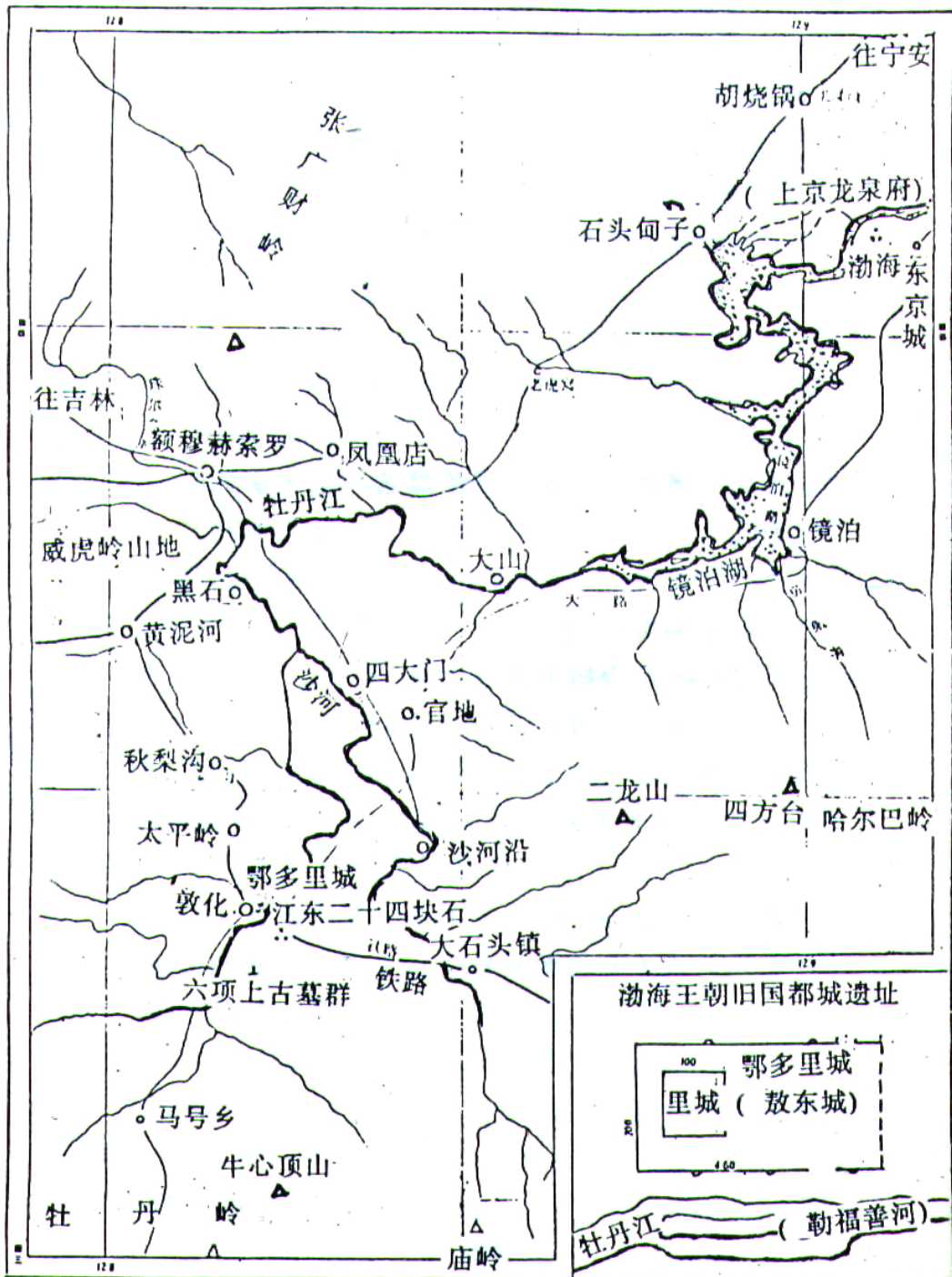
15 详见《盛京通鉴》卷3。

16《蒙古游牧记》卷9。

- 17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 58。
- 18 详见《盛京通鉴》卷 4。
- 19 参见方式济《龙沙纪略·纪制》。
- 20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册》565 页。
- 21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 59。
- 22 《皇朝藩都要略》卷 5。
- 23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 59。
- 24 参见《清世宗实录》卷 117。
- 25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585 页
- 26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620 页。
- 27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449
- 28 《皇朝藩部要略》卷 4。
- 29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 55。
- 30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 57。
- 31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303 页。
- 32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109、426 页。
- 33 《蒙古游牧记》卷 9。
- 34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350 页。

附图第一

敦化市附近渤海古迹图



▼ 正黄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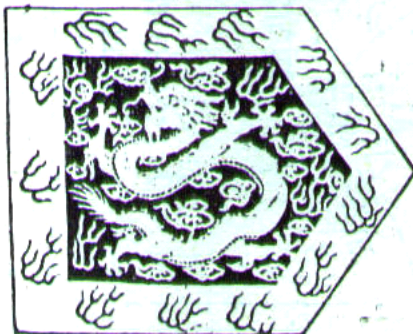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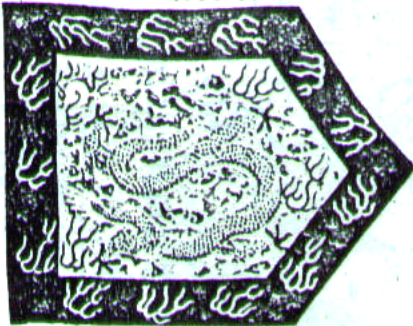
▲ 正红旗

▼ 正白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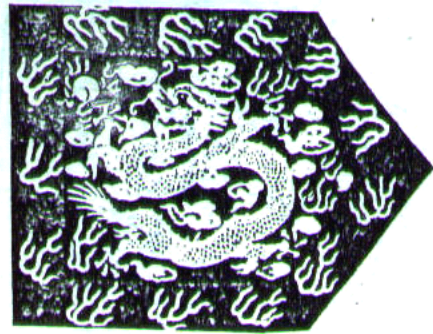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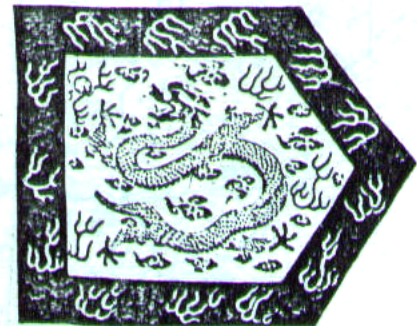
▲ 正蓝旗

▼ 镶黄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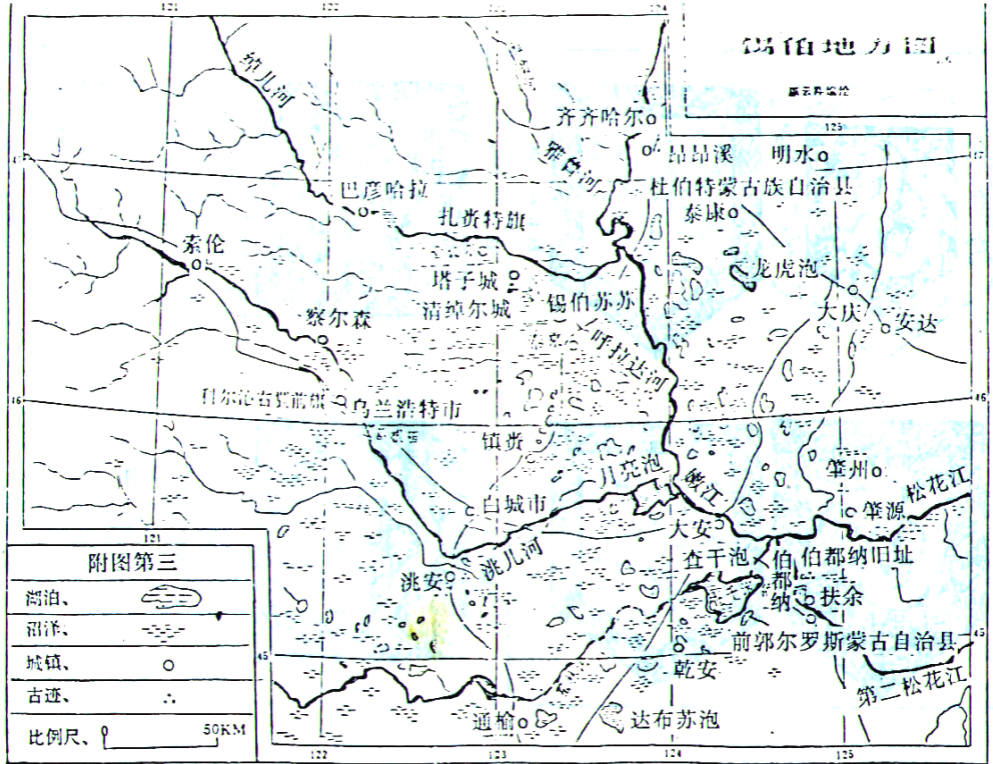


▲ 镶红旗

▼ 镶白旗



▲ 镶蓝旗



审核定稿 蒋永维 田将庆
责任编辑 王胜利 童方 于礼萍

封面设计 瀛云萍

大连市文化局出字 (内) NO:005381

